# 质性研究：实践与评论 第一卷

QUALITATIVE RESEARCH:PRACTICE AND REVIEW Volume 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万卷方法



ISBN 978-7-5624-7693-1



定价：48.00元

# 质性研究：实践与评论 第一卷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AND REVIEW Volume 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质性研究：实践与评论.第1卷 / 武晓伟等主编.—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9
（万卷方法）
ISBN 978-7-5624-7693-1

Ⅰ.①质… Ⅱ.①武… Ⅲ.①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文集 Ⅳ.①C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93846号

**质性研究：实践与评论（第一卷）**
总主编：朱志勇
主编：武晓伟 程接力
涂 玥 李廷洲 阮琳燕
策划编辑：雷少波 林佳木 邹 荣
责任编辑：邹 荣 何道刚 版式设计：邹 荣
责任校对：贾 梅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4 字数：498千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693-1 定价：48.00元

---

# 目　录

# 序　言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我与“质性研究方法”的结缘之路。

1997 年春，我在南京师范大学读研，参加了一个为期 5 天的“质性研究方法”训练课程[1]，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质的研究方法”。在之后的硕士学位论文《我国小学、初中语文教科书内容价值取向的分析》中，我虽然使用了质性研究方法，比如，实物搜集法等，但仍停留在“蜻蜓点水”的表层，论文洋洋洒洒数万语，而“研究方法”一节却只 26 行 680 余字（朱志勇，1998：9），而且对质性研究方法论层面的议题并未进行详细论述。1999 年，我进入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选修了研究生院开设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课程，以及所在学院开设的“质性研究方法”和“量化研究方法”两门课程。2000 年 10 月，我进入内地某西藏民族中学进行了一年多的田野研究。2003 年 8 月，结合对理论的思考和深入的田野工作，我递交了博士论文，并在其中花了 28 页的笔墨详述该研究的方法论、搜集资料与分析资料的方法、以及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对方法的反思（Zhu, 2004: 99-126）。2003 年秋季学期，我在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及社会工作系为硕士研究生开设了“质性研究方法”课程。2005 年 7 月初，我到西藏那曲地区达萨乡中心小学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田野调查（朱志勇，2006），在那里倾听和叙述老师、孩子们的故事，也在体验自己的生命，并让我对“质性研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体会。2006 年秋学期伊始，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为硕士研究生开设“质性研究方法”课程，2010 年秋季起为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开设“质性研究：理论与实践”课程至今。

质性研究方法（论）的训练经历、研究经历和教学经历使我认识到要成为一名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者，尤其是教育现象与问题的研究者，至少需具备三个要素（如图 1 所示）。

第一，研究问题意识。从研究话题中提炼研究问题是一种基本的学术能力（朱志勇、崔雪娟，2012），而研究问题从哪里来（邓猛、朱志勇：2012）？一是来自对前人研究的文献阅读，在批判性阅读中，你可以发现前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成为你研究发问的基础；二是来自日常生活的体验和经历，相对于文献的理性阅读而言，日常生活中的直觉或感性认识对于研究问题的提炼而言，“就像酵母对于酿酒的重要性一样，虽然不是主要成分，但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熊易寒，2013）。第二，研究方法和方法论。这主要是指一位社会科学的学者对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在方法论、研究方法或方式、具体的技术和技巧等层面（陈向明，2000：5）的理解与行动，这是从事实证研究或经验研究的社会科学学者的一个基本素养。如果说“思想求道”，那

[1] 1997 年春季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邀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向明博士给当时在籍的硕博研究生开设“质性研究方法”课程，参与者 40 人左右，学院部分教师也参与了这个课程。

么方法便是为“求道”便利的“技”，而方法论则是和“道”与“技”之间的关系之说。第三，学科视角，即“学科之眼”（吴康宁，2006）。当下，任何一位立志将来从事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工作的青年学子都必须要经过 4 年本科、2 ~ 3 年硕士以及 3 年或以上时间博士的学术训练。如此训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学生能够掌握并形成他 / 她所属的、所感兴趣的学科视角或学科思维方式，进而产生他 / 她对社会、对教育现象和问题的分析与解释“偏见”（这里意指“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去看待世界和事物”）（迈克尔·施瓦布，2008：14），如社会学视角、经济学视角、心理学视角、政治科学视角，等等。

图 1 中的三个要素对于一位社会科学研究的硕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训练来说是浑然一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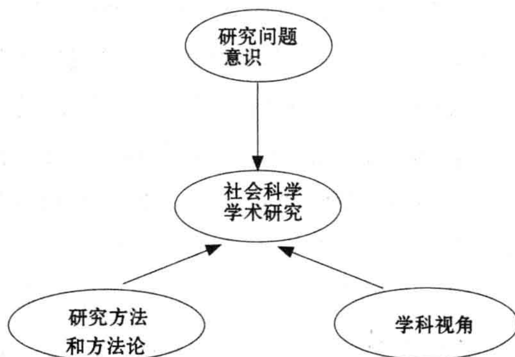



**图 1　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者三要素**

回到课堂上来，我所开设的“质性研究：理论与实践”这门课一直坚持在“做”中，也就是在真实的研究情境中去认知、使用、理解和反思方法与方法论，在“知”与“行”结合的过程中，逐步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学科视角”。这本集子就是一个典范。它所收录的 18 篇质性研究论文，每一位学生对其“研究问题”的提炼都经历了 2 个月以上的时间，这里有他们自己的故事，有他们对自身、他人，以及社会的深切关照和反思，研究的真正“魔力”是来自于研究者本人，他 / 她的经验、体验、疑惑，甚至是意外，就如同探险，一旦发现新的资料或阐释，会如获至宝，手舞足蹈，研究的快乐往往来源于对问题的挑战性、创新性探究和思考。

在使用观察法、访谈法、实物搜集法等质性研究特有的收集资料的方法搜集了大量资料之后，学生们面对这些纷繁芜杂的资料，常常感到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把这一块块“拼图”拼成一整副画卷。很多学者认为，到了此时应该是“想象力”和“灵感”发挥作用了。而我认为，敏锐的想象力和灵感正源自“学科视角”。缺乏一定的学科视角就像无骨的“风筝”一样，即使样子美观，也飞不上高空。本集论文的不少点评专家都不约而同看到了这点，而且该问题对于教育学的硕博士研究生尤为突出，其中原因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学是“基础社会科学学科”这种认知备受质疑（吴

刚，1995；郑金洲，1996；周浩波，1997），而教育学硕博研究生群体中其本科是教育学专业的学生占有不小的比例；二是教育学硕博研究生群体中本科专业来自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科学这些基础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同学微乎其微，少之又少。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研究教育现象或问题时，研究者，尤其是质性研究者，其背后的社会科学学科视角是何等的缺失，这种社会科学学科视角的欠缺也使得学生在描述和解释教育现象、分析与解释教育问题时，好比隔靴搔痒，总找不到“痛处”。而这种学科视角的训练又不像“研究方法”的训练在短期内就能达到一个状态，它需要长期的积累，否则那些以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科名称命名的院系以及以这些学科为名招生的本科专业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了。因此，年轻的硕博士研究生在面对教育研究学术共同体中有些学者在宣称自己为“跨学科学者”或“跨学科研究”时，需要谨慎对待（雅诺什·科尔奈，2006）。

另外，对于博士研究生的课堂教学，我主张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主动性，调动他们的“野性思维”（熊易寒，2013），课堂情境是互动沟通的、对话磋商的、建构生成的。学生不仅要提前阅读课程纲要中所列出的大量书籍和学术文章，还要根据自己设计的小型研究课题一步一步地去做，并且把“阅读”和“做研究”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反思”，撰写备忘录。这样，学生们都是带着阅读后所形成的问题和困惑、做研究所收获的经验和体会、反思所产生的答案和回应进入课堂，成为课堂真正的组织者、管理者、贡献者和建构者。因此，作为参与者的“我们”经常会在课上碰撞出很多“火花”，学生们纯净的、充满好奇的心灵透析着“他 / 她人的世界”、“自我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从纷繁的表象中梳理出真相，并发展出一个个生动的“理论”，如质性研究资料分析与解释的“分工论”，即质性研究资料的分析是“资料在说话”，质性研究资料的解释是“研究者在说话”；又如质性研究者在访谈研究对象时的“穿针引线”论；再如质性研究者面对资料时的“井底之蛙跳跃论”；本土概念乃本土文化的“密码”论；质性研究乃“北冥神功”论，等等。我坚信这样的课堂还会生成出更多质性研究的“解释性的微观理论”。

下面，我再来介绍一下这本辑子产生的历程。

在个人学术研究成长过程中，我发现两个很有趣的现象：一是学术期刊或学术性出版物呈现给读者的大都是“优秀的”、“上乘的”、“创新的”学术成果，而“不成功的”、“有瑕疵的”作品极少出版；二是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学术期刊（包括以书代刊的出版物）的主编、副主编以及编辑委员会成员基本是由学术界的“大人物”担当，学生鲜有机会出任。本着以上两个“观察”，我和选修本门课程的 23 位博士研究生经过讨论，在超越上面两种“常态”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一是从学生中民主选举出编委并成立编辑委员会，对 21 篇最终的课程论文进行评审、筛选和编辑，直至出版；二是辑子里不仅收录学生的作品，还希望邀请到国内外从事该领域的专家、学者对作品进行点评，学生在点评的基础上给予回应，因此，所选择的论文不一定是

非常成功的研究范例，正是这一来一回的“交手”，我们力求呈现给读者更加完整的研究过程。

这样就形成了这本论文集的编辑委员会：武晓伟、程接力、涂玥、李廷洲和阮琳燕。这个编辑委员会负责了整本书中论文的筛选、排序、评审专家的确定与邀请、专家对各篇学术论文评审意见的收集和编排、各位作者对专家评审意见的回应、文字的编辑和校审、出版经费的申请（我也一同参与）、与出版社的沟通等一系列琐碎而重要的工作。编辑委员会中主编武晓伟同学对我提出的“博士生们编辑学术刊物理念”的理解和践行，以及她对过程中各个环节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都表明她是一个事无巨细的学术编辑人！我期望他们对学术的专注和激情，对学术编辑工作的认同和投入、对创新的兴奋与践行、对团队合作的维护和贡献等方面能够激励后来者，激励他们能够呵护好这个像新生儿一样的稚嫩鲜活的出版物！

最后，这本辑子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和我非常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2013 年度“985 项目”评审委员会成员、教育学部领导和项目管理委员会的“独具慧眼”，认同并批准了我们为此申请的研究项目（项目编号为：9852013gr006），并给予了一定经费赞助出版，也希望他们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这个“创新物”的延续！同时，我们也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学办黄欣主任对这个出版物的关注与支持，她从自己负责的“研究生学术实践能力培养项目（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2013 年资助项目）”中拨付了一定的经费资助编辑委员会的研讨工作！我们更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处的管理团队对这门课程以及这个出版物的重视与大力支持。另外，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众多同仁和我与重庆大学出版社“万卷方法”丛书策划人雷少波先生及其团队成员的合作[1]非常愉快，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启发，我们的创作结晶就不能呈现在诸位读者面前，也希望我们未来进一步的愉悦合作能够为质性研究学术共同体尽献绵薄之力！

朱志勇

2013 年 8 月 23 日于北京师范大学英东教育楼

［参考文献］

北京师范大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质性研究论坛：教学与实践”论文集》，学术会议论文集，2011 年 7 月 4 日，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陈向明（2000）：《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邓猛、朱志勇（2013）：“从话题到问题：教育研究方法刍议”，《教育学术月刊》，第 3 期，第 25–29 页。

［1］举一例来说：在雷少波先生和我的努力和合作下，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重庆大学出版社于 2011 年 7 月 4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共同组织召开了首届质性研究论坛，论坛的主题是“教学与实践”（参见北京师范大学、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迈克尔·施氏布著、汪丽华译（2008）：《生活的暗面：日常生活的社会学透视》，2008年，第14页。

吴钢（1995）：“论教育学的终极”，《教育研究》，第7期，第19–24页。

吴康宁（2006）：“社会学视野中的教育”，《教育研究与实验》，第4期，第1–5页。

熊易寒（2013）：“生命体验与学术研究：在复旦大学108周年第47届科学报告会暨学术文化周的发言”，2013年5月21日，全文请参见 http://bbs.pinggu.org/thread-2450038-1-1.html。

雅诺什·科尔奈（2006）：“社会科学各学科是分离还是融合？”《比较》第27辑（吴敬琏主编），第1–12页，北京：中信出版社。

郑金洲（1996）：“教育学终极了吗？与吴钢的对话”，《教育研究》，第3期，第38–44页。

周浩波（1997）：“论教育学的命运：与吴钢、郑金洲商榷”，《教育研究》，第2期，第22–26页。

朱志勇（1998）：《我国小学、初中语文教科书内容价值趋向的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朱志勇（2006）：《学校教育与社区发展：西藏那曲地区一所牧区小学的个案研究》，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北京：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该研究报告的主体部分后来发表在由马戎、郭志刚主编（2009）的《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北京：民族出版社，第277–333页。

Zhu, Zhiyong (2004). State Schooling and Ethnic Identity: A Study of an Inland Tibet Middle School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h.D. Thesis.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这篇英文博士论文后来经过修改出版成英文专著，请参阅 Zhu, Zhi yong(2007). State Schooling and Ethnic Identity: The Politics of a Tibetan Neidi Secondary School in China.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朱志勇、崔雪娟（2012）：“研究生学术能力：一个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理论框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6期，第92–99页。

# 校庆，想说爱你不容易：

## 关于N大学110周年校庆的学生体验研究

文／程接力[1]
评／陈向明

［摘要］本文以质性研究的范式深入考察N大学110周年校庆中在校学生的真实体验。研究发现，此次校庆中在校学生的负面体验比较突出，主要因素一个方面是学生之外的客体因素，另一方面是学生自身的主体因素；这种体验对在校学生的学校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及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分别造成了不同的影响。研究者认为，大学校庆不但可以，而且应当将建立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心理契约、培育学生的学校归属感、促进学生的发展作为主要价值诉求之一。

［关键词］校庆　体验　影响

［1］程接力，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兴趣包括院校治理、教育质量保障等。

# 一、问题提出

## （一）问题背景

N 大学是国内一所知名的综合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全日制在校生 21 000 余人，教职工 3 000 余人，办学历史悠久，桃李满天下，在国内外都有着较大的影响力。

2012 年是该校建校 110 周年，大学将全年定为“校庆年”，将当月定为“校庆月”，举办了包括系列讲座、校友返校日、校友座谈会、庆典大会、文艺演出等一系列活动。但就在校庆日前后几天，校园网络论坛（以下简称“校园 BBS”）上却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三十多条对校庆表示抱怨和牢骚的帖子，点击量逾两万次，回帖逾两千条。这些抱怨和牢骚的帖子被学生们通称“吐槽贴”，内容主要涉及校庆没给学生们发校庆衫、学生大都不清楚校庆活动具体内容、多数学生没有机会参加庆典大会、没有机会观看文艺演出、学校操场停满汽车、食堂就餐时拉隔离带设置校友专区、学生被发“免费饭盒”以“鼓励”带饭回宿舍吃，等等。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批评这些“吐槽贴”的“辩护贴”，这些帖子认为那些抱怨和发牢骚的同学太过自我，不理解客观条件对学校的限制，缺少对母校的爱。

## （二）问题聚焦

虽然随着校庆活动的结束，争吵和冲突似乎已渐渐归于平静。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争吵和冲突背后的观念分歧依然存在，这次校庆给学生们带来的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依然存在，甚至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因此，下面几个问题显然值得认真地思考和深入地研究：

①这次校庆中，在校学生的真实体验究竟是什么样的？愉悦的？糟糕的？中性的？抑或其他？

②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验？形成这些体验的主体因素有哪些？客体因素又有哪些？哪些因素是最主要的？

③这些体验在认知、情感和行为方面会对学生当下，乃至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又会对学校带来什么影响？

④校庆与学生之间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学生在校

**文中“点”**

1. 最好开篇有一个总括性介绍；另外，在每个标题下面有一段对下面内容的简介，便于读者对本文有一种阅读期待。

2. 很有意思的开场白，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

3. 如果在这里提供一些对研究问题中重要概念的定义，应该对读者理解研究的问题有助益。

庆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占有什么样的地位？校庆怎么办才能让学生满意？

## 二、文献综述

### （一）相关研究检视

通过检索和梳理国内相关文献，笔者尚未发现关于大学生校庆体验以及大学生与校庆关系的专门研究，而相近文献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少量的针对大学校庆活动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献，以评论性文章居多。这部分文献较少涉及在校学生体验，更多的是从大学发展和文化建设的角度探讨校庆的作用意义以及校庆应该怎么办，仅有少数涉及校庆与在校师生之间的关系。

4.即使文献很少，也需要列出这些文献的出处以及它们的研究结论，并从此引出自己研究的重要性和创新所在。

另一类是一些关于大学生学校归属感的研究。这部分研究往往涉及校园活动（校庆本质上就是一种特殊的校园活动）对大学生学校归属感的影响，多采用问卷调查和量化分析的方法，对问题的深层本质缺乏深入的挖掘。

### （二）相关概念

#### 1. 校庆

校庆一般表现为学校为庆祝周年纪念而举办的各种纪念性、仪式性和教育性活动，具有组织性和教育性的特征。高校校庆活动应该通过建构与运作文化符号系统，凝练大学精神，建立师生相互责任的心理契约，培育师生的学校归属感，实现校庆文化价值的根本诉求（刘海，李晓明，2012）。

一般认为，校庆本质上是一种组织文化活动，应有助于促进其成员对于组织目标的认同、提升大学自身的知名度、密切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发挥大学文化的引领作用等。同时，校庆也是一种仪式性质的活动，对传承与发扬大学的历史传统、增强大学组织成员的凝聚力、促进大学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又具有积极意义（卢新伟，蔡国春，2009）。

5.应该提供你这个研究中对“校庆”的操作性定义。

#### 2. 学生学校归属感

国外研究一般认为，学生学校归属感是学生在学校环

境中感觉一定程度上被其他人所接受、尊重和支持（Singh, K., Chang, M. and Dika, S., 2010），是对学校的一种嵌入感以及与他人属于同一个地方的一种感受（Freenan, T. M. and Anderman, L. H., 2007:203–220）。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学校归属感是指学生对自己所就读的学校在思想、感情和心理上的认同和投入，愿意承担作为学校一员的各项责任和义务，乐于参与学校活动（包克冰、徐琴美，2006），是学生对自己属于学校一员身份的认同及对自身与学校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结果的情感体验和态度知觉（杜好强，2010：5）。

6. 如此简单地将以往的研究分成“国外”和“国内”两类值得斟酌。

显然，这些对学生学校归属感的不同定义在内涵上还是基本一致的。

## 三、研究方法

### （一）整体思路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的范式，在自然情境下通过访谈和实物搜集的手段获得研究资料，使用归纳的逻辑分析资料，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进而对实践问题的解决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启示。

### （二）研究对象及抽样

本研究直接选择事件的主体，即N大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了典型个案抽样的策略，从BBS发帖人中选择了8个人作为潜在受访对象，然后再通过BBS的短消息功能与他们取得初步联系，向他们说明了研究者的身份（本校教育学博士生以及姓名和学号）和目的（学术研究和给学校提建议），并保证严格遵守研究伦理，对他们的所有信息严格保密，如果必要还可以签书面保证。经过反复沟通和认真选择，研究者最终从愿意接受访谈的对象中确定4位较具代表性的受访者。第一位是教育学博士一年级的女生，她硕士阶段即在本校就读；第二位是理科硕士二年级的女生，她本科阶段在外地另一所大学就读；第三位是法学硕士二年级的男生，他本科阶段即在本校就读，而且是一名学生干部；第四位是数学本科三年级的男生。

7. 他们在什么意义上具有“代表性”？你抽样的标准是什么？“代表性”与“典型性”的区别是什么？

### （三）资料收集的方法

#### 1. 访谈

访谈是本研究重要的资料收集手段之一。访谈对象共有四位，甲、乙、丙、丁，每位的基本情况前文已述。本研究共进行了三次访谈，访谈的地点、形式、时间、内容和成果见下表：

| | 访谈对象 | 访谈地点 | 访谈形式 | 访谈内容 | 访谈时间 | 访谈成果 |
|---|---|---|---|---|---|---|
| **第一次访谈** | 甲 | 研究者的办公室 | 一对一单独访谈 | 见访谈提纲 | 约 40 分钟 | 约 7 000 余字的访谈录音 |
| **第二次访谈** | 乙 | 小餐厅 | 一对一单独访谈 | | 约 83 分钟 | 约 20 000 字的访谈录音 |
| **第三次访谈** | 丙、丁 | 研究者的宿舍 | 一对二访谈 | | 约 73 分钟 | 约 14 000 字的访谈录音 |

在第一次访谈之前，研究者拟定了一份访谈提纲，但感觉访谈过程中过多依赖提纲，以致错失了不少值得深入追问和挖掘的机会。访谈仅 40 分钟就结束了，录音也仅有 7 000 字。第二次访谈，研究者对第一次访谈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减少了对访谈提纲的依赖，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访谈对象所说的内容上，较为敏锐地抓住了一些值得追问和深入挖掘的机会，也获得了不少预料之外的有用信息。第三次访谈的对象是两位男生。之所以采用这种“一对二”的形式有两个原因，一是访谈对象时间安排的需要，二是研究者也希望看到不同访谈对象之间思想的真实交流和碰撞。也正是由于两位访谈对象之间的较好互动，这次访谈获得了一些更加有价值的东西。

8. 这样的访谈方式给你带来什么“效度威胁”吗？你是如何处理的？另外，每个受访者只访谈一次，对资料收集的丰富性和深入度有无影响？

#### 2. 实物搜集

本研究还通过实物搜集获得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资料，主要包括 BBS 上相关的帖子及回复，其中还含有一些图片和一首诗歌，总计约 12 000 字。对这些资料的收集，研究者尽量保持其原始形态，保留了主帖和回帖、回帖和回帖之间的联系，甚至还保留了很多帖子当中使用的“表情图片”。此外，研究者还搜集了校方关于此次校庆的 4 份组织文件，主要内容包括此次校庆组织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活动安排。这些资料和访谈资料之间形成了较好的互补和互证（包括证实和证伪）的关系。

9. 具体形成了什么样的互补关系呢？可否拓展说明？

10. 可否举例说明你具体是如何进行编码和分析的？计算机软件对你的资料分析起到了什么作用？

### （四）资料分析的方法

针对本研究收集到的资料内容和特点，研究者采用类属分析和情景分析相结合的分析策略，借助 Nvivo7.0 软件首先对所有资料进行了地毯式的浏览编码，然后再以浏览编码的结果为基础进行资料的二级编码，进而再从校庆应然的价值、功能和意义的视角出发，结合学生学校归属感的相关研究和理论，对资料进行分析和解释。

## 四、分析与讨论

11. 在大标题下最好提供总括性文字，介绍研究结果的整体结构。另外，“分析与讨论”这个标题似乎推论程度太高，应该先对资料进行描述，然后进行解释和分析。

### （一）吐槽：从“免费饭盒”开始

在校庆日的前三天，大学校长办公室和后勤管理处在校庆专题网站上发布了一则题为《关于做好 110 周年校庆日校友就餐服务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为在校师生免费提供一次性餐盒，鼓励师生带回办公室及宿舍，以多元化方式就餐。”原本这则通知及其中的内容都是很正常的，因为该校平时的实际情况就是校园面积狭小、就餐环境拥挤，端着饭菜等座位的情况很普遍，而校方发这则通知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这一实际情况。但出乎意料的是，这则通知很快被学生转发到了校园 BBS 上，其中关于免费餐盒的那句话还被特别标成红色醒目的字体。于是很多学生的神经被刺痛了，不满的情绪爆发了出来，引起了一阵不小的抱怨、牢骚，甚至自嘲、反讽。比如这样一则上了校园 BBS“十大热帖”板块的帖子：

“话说校庆不是应该有餐券么？发饭盒就不怕人笑话？高中和本科的时候就已经经历过两次校庆，校庆期间向学生发放免费餐券好像是个约定俗成的做法吧？咱们 N 大[1]这么好的学校，怎么就完全没有动静。话说回头，也不是说发了张餐券我就心满意足，但这至少是学校照顾学生，关怀学生的轻便之举啊，不就是几个钱吗，一年到头也没见花几个钱在咱们学生的切实生活上。咱们这种不参加校庆文艺表演的学生，也不能观摩，出入楼栋也受诸多约束，要如何感受校庆的气氛呢，难道真如蛋友[2]所说，

[1] 从研究伦理出发，本文对原始资料中的大学名称做了技术处理，下同。

[2] “蛋友”是该校 BBS 上网友的通称，因为该校 BBS 的名称中含有“蛋”字。

校庆就是校领导和杰出校友以及国家领导人闭门庆祝？”（网友：ayu）

这则帖子很快引来很多跟帖回复，内容大致如下：

“校庆学生福利——免费饭盒！新京报呢？”（网友：麦芽）

“第一次听说有学校校庆只给个免费的餐盒……”（网友：饮水思源）

“真的是饭盒哟，开始还以为盒饭呢……”（网友：绝世）

“楼主[1]快睡吧，明天去食堂抢110周年纪念版饭盒……”（网友：愤怒的白杨）

“颠覆了我们印象善良的N大校庆！”（网友：sunsky2012）

“心都凉了！午饭从XLQ[2]食堂用免费的餐盒买了份冰凉的宫保鸡丁，吃的心里拔凉拔凉的……”（网友：丫头0102）

“校友有盒饭，我们有饭盒。等为社会作出贡献了，才能吃到盒饭，否则手里永远捧着的就是空碗。好深刻，看来学校真是用心良苦……”（网友：碎影弄斜阳）

“感觉本来就不是给咱们庆的，有个饭盒不错了。”（网友：傻丫头）

“刚才去XLQ食堂，发现还拉了隔离带设置了校友专区，这是逼着我们占学校便宜啊，所以果断带回宿舍吃吧。”（网友：gavin）

与此同时，“吐槽”的内容也开始不断扩散。比如学校在校庆日当天将西操场临时用作停车场的事情，也招来了很多学生的不满和讽刺：

“西操被改成了停车场，这件事真的完全体现了两个字：‘谄媚’！干脆改名叫‘*** 停车场大学’算了！”（网友：管院混混）

“占用操场当停车场一事儿太过份了！校庆当天不让大家看节目，连大家平时活动的地方都不准进么！！！”（网友：撞羽朝颜）

---

[1]“楼主”是网络语言，指主帖的发帖人。

[2]此处对食堂名称做了技术处理。

“校友回校一趟的确不容易，可是他们难道不知道N大本就被吐槽为停车场大学，平日里路边就挤满了车，校庆这天还要把操场变成停车场，这不让N大成为名副其实的停车场大学吗？真的对N大有感情，尊重N大，爱护N大，就不应该把车开进学校！古时的官员经过孔庙，老远就要下马、下轿以示尊师重教，今日N大的校友对N大却连这点尊重都没有了吗？”（网友：凉席）

“以后有人问起：‘咦？你们N大110周年校庆的时候你是不是在校啊？’我只能答：‘哪有校庆？不是车展么？’”（网友：枕木）

此外，学生们“吐槽”的内容还包括多数学生没机会参加庆典大会和观看文艺晚会、没给学生发校庆衫或纪念品等事情。

当然，必须同时注意的是，这些吐槽也受到了另外一些网友的批评，他们认为抱怨和发牢骚的同学太过自我，只想着索取，不想着奉献，不理解学校客观条件的限制，过分强调学生权利，刻薄不通情理，缺少对母校应有的爱和理解，缺乏感恩之心：

“校庆日建议在校师生打饭回去吃，觉得无语吗？奇葩[1]吗？……N大本来食堂就少，光是校内师生都很拥挤了，那么校友回来的时候，我们尽量给他们坐在N大食堂里吃饭的机会，很困难么？只是午饭和晚饭啊！何况还是周六，大部分人都没什么课吧？如果你毕业了，作为校友回N大，你是想坐在母校食堂里吃，还是到周边饭店里吃？甭抱怨了，N大什么情况你们也不是不知道。据说西操场变成临时停车场是吧？有问题吗？很不可理解吗？如果你是校友，你车没地方停，你闹心不？我们每天都可以在N大晃荡，吃食堂的饭吃到要吐，可是对很多校友来说，这一生这样的机会都不多了。就1天、2顿饭，很困难吗？”（网友：豪猪）

“很多人就是那样矫情，真让你天天吃食堂你嫌这嫌那，这偶尔说给你饭盒让你回去吃或者食堂拥挤点，就又侵犯学生权利了，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思维方式铸就了这

[1]网络语言，比喻某人（或某事物）十分离奇，不落世俗，个性十足，世间罕至。例如：当你认为某人很不可思议时，你可以开玩笑地说：“你真是一朵奇葩！”

样的脑子。校庆你跟着欢乐就得了，学校给你点啥你就接着，不给你也没什么过错，人家毕业校友出去作了贡献给学校争了光，学校理应管顿饭。再说来者都是客，学校管顿饭理所应当，非跟他们争什么饭呢？再说学校也不是什么都没给我们，我们跟着沾光了。再再说，国庆的时候国家也没说给发粮发油，重要的是种荣誉感，荣誉感，哈哈。学生的权利意识真是用在了任何可以用到想到甚至想不到的犄角旮旯的地方！”（网友：shandingzi）

“你们这是怎样的一种思想感情？要110年校庆了，修个路，你们嫌烦，盖个楼，你们嫌吵，然后还喊着排场低，场面差，没有大boss来。到校庆那天呢，你们不帮着维持秩序，不帮着接待校友，一点儿贡献没有，却吵着抢免费的餐券、晚会的入场券，还要什么校庆衫，甚至还要盖百年讲堂。拜托，这是N大110年校庆，不是送终庆，校庆完了还得接着过日子呢。把钱给你们吃了喝了看晚会盖大楼了，以后怎么办？既然是N大人，参加校庆，多想想能为N大做些什么，别总想着从N大这刮走些什么。N大给你的东西不少了。”（网友：香聪鸡）

“N大的很多学生太没大气了，太不通情理了。很多学生太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很容易被外界的一些东西所左右，而发出一些不该发出的声音。”（网友：wijyr）

### （二）吐槽的背后：“他们的校庆”

不可否认，上述辩护贴对吐槽贴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批评让那些吐槽的学生既未心服也未口服，相反招致了更多的反驳和不满，马上就有人发出了下面一些帖子：

“到了这时候LZ[1]就出来装清高了？”（网友：专业打酱油）

“楼主是N大的学生吗？说出这种话真为你感到羞愧！”（网友：Amy123）

“@豪猪[2]在乎的不是饭盒，也不是一顿饭的问题，在乎的是感觉校庆完全在大部分人之外，不在乎饭，在乎

[1] 网络语言，“楼主”（主贴发帖人）的首字母简称。

[2] “@”是一种网络发帖提醒功能。“@豪猪”意味着发帖人特意提醒网友“豪猪”关注自己的回帖。

的是心凉。”（网友：管院混混）

“诚如楼猪[1]所言，就那么一两顿回寝室吃，我们会感觉无语吗，奇葩吗，难以理解吗？但事实是我们无语的是宣传得那么轰轰烈烈的校庆到最后与我们无关，当然除了要把我们赶出食堂。校庆我们参与了什么，又能参与什么？学校能给校友一顿免费的午餐，不能给在校生一顿饭吃？没有人缺一顿饭的钱，学校亦然。心凉的是被排除在校庆之外。动不动说人脑残什么心态？@豪猪@赤色彗星@Oryzasativa”（网友：a2722863）

“作为N大学生，我就不该知道有校庆这个事儿……我们从来不是这个学校的主角，这一次剧情需要咱们变成空气，我认了。LZ将来一定是个‘好校友’……”（网友：ayu）

“其实对于校庆，不是说吃饭的问题，不是说发纪念品什么的，这都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是，校庆这么盛大的事情，在校的大部分学生完全没有一种参与感，没有一种我们校庆，我们付出，我们参与，我们自豪的感觉。这样的校庆，和隔壁学校校庆又有什么区别？这样的校庆，哪怕是千年的校庆，又有什么意义？当我们身在学校，都没有能参与到校庆这种盛事当中，当我们毕业以后的数十年的母校校庆，不知道我们的内心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结。”（网友：appledandan）

“尝试用我最大的包容去理解，只是心中仍总是难掩失落……从一开始进入N大就在期待这个校庆的到来。甚至我不愿意成为台上的任何一个人而错过任何一个节目，而失去与观众，我的同学，师兄师姐，老师同乐的机会。如今校庆的一切活动看来是与我无关，看着前来的老校友，我的脸上难有微笑，我的心禁不住感伤。所有的热闹都与我无关，110年校庆，我怎么能提得起精神……”（网友：WOBUER）

从上面的帖子中，我们不难发现，学生们真正在意的并非是一顿饭、一张票或者一件校庆纪念品之类的具体物质，而是学校的关注和重视，是“参与”和“归属”的心

[1]“楼猪”，网络语言，同“楼主”、“LZ”，并不必然带有贬义和侮辱色彩。

理需要。在那些吐槽的帖子中，“毫无存在感的校庆”、“在校生被边缘化”、“没有参与者付出的快感”、“校庆是给校友过的”、“校庆是领导们的节日”、“感觉校庆完全和我没有关系”等词语和句子随处可见。在学生们看来，这次校庆只是领导和校友们，尤其是优秀校友们的聚会，是一个“小众化”、“精英化”的校庆，是“他们的校庆”，“与我们无关”，大多数在校学生、甚至教师都被“边缘化”或排除在外。

弗洛姆的需要理论告诉我们，人都有相属的需要，人们需要通过交往、参与活动等各种形式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信息、情感、思想等。（郑希付，1991：189）显然，大多数学生在这次校庆中未能通过交往和参与活动的途径获得自己精神需要的较好满足。这一点在研究者和受访者的谈话中也可以得到清楚的印证：

12. 这里是转引吗？为什么不直接查看原著？

访谈者：校庆前后，就你所知，都设计了什么活动？

受访者丙：我之前还真不知道它设计了什么活动，就光知道有一晚会，当天我师兄打电话给我，我才知道，噢，原来晚上有座谈会，就是这样子。

受访者丙：其实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就从来没有想从校庆得到什么，我就想参与一下。要说这也算是一种获益。其实本来好多活动我就想参与一下，比如执勤啊志愿者啊，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一种经历。其实很多纪念日，像结婚纪念日，吃饭之类的庆祝一下，你说我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得到。关键这一天我们庆祝一个特殊的日子，就是一个特殊的经历。校庆也是这个样子。……说句实话，（虽然）现在学生也不富，但把发个餐券看在眼里的人也不多。关键问题是你什么也没做，并不是我们想要这餐券，而是类似的行为什么也没有。餐券真是次要的，就是这个回忆。

受访者丁：我什么都没有记住，那天在我生命里，并没有成为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就是非常平淡的一天过去了。其实如果真的让我去当志愿者，我或许还真的能让这一天成为不平凡的一天。可以不考虑报酬去的。然后如果让我去参加节目表演的话，我当然也很乐意。结果现在弄得，都没有参与上，也没有说让我去见什么老校友之类的。

受访者乙：我没有那种跟人分享的冲动和感觉，就是跟我同学说，哎呀，我们学校110周年校庆了怎么怎么着的。

访谈者：你觉得校庆应该让人有分享的冲动？

受访者乙：对呀！就是我不能干给别人说一句我们110周年校庆啊！那我同学问我一句，那你们干嘛了？那我干嘛了？我没干嘛啊！你看别的学校校庆，人人网上大家晒的文字和照片，你应该看过吧？

访谈者：你是说需要一些具体的事情去分享是吧？

受访者乙：对对，比如说，我想说谁谁来给我们作报告了，或者谁谁来表演了或者什么的，但是我都没有看到啊！所以我分享什么呀？我总不能分享我们发免费饭盒吧？（笑）

受访者甲：毕竟是赶了100多年才赶上的，就像我之前讲的，希望是全校共庆，就是让大家都参与进来，都happy一下，但是发现越到跟前越不对。都没有发纪念品，什么都没有。就是说完全就和学生没有关系。到后来就有一种大失所望的感觉吧！关键问题还在这一点，你知道吗？N大本科生还好，关键是N大有很多研究生，人家在本科阶段都是经历过校庆的，那一对比就不一样了。当然这也不是功利性，食补啊饭补啊，一点纪念品啊还是应该有的，毕竟是告诉学生说我们学校现在在干这件事嘛！…… 其实很多庆典本身就是花钱的事情，你该花就花吧！但关键是你要花得让大家都高兴，都能参与一下，是不是？

从上述访谈记录中还可以看出，学生们的牢骚还来自一种“对比效应”。就是说，学生往往会把这次N大的校庆与其他学校的校庆作比较。尤其是对跨校考到N大的研究生而言，他们会不自觉地将自己在这次校庆的体验与以前在本科学校校庆中的体验做对比。即便是本科生也可能把高中生活经历的校庆作为参照。显然，对比的结果放大了学生的“被边缘化”、“无存在感”、“无归属感”等消极体验，导致了牢骚和不满的爆发。

13. 你并没有对4个人同时进行访谈，为什么呈现出来好像是如此？

此外，下面的一些帖子和访谈记录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学生的吐槽以及隐藏其中的心理感受：

“LZ确实很没道理！抱怨怎么了？越是抱怨就越证明我们爱N大，因为它是我们的母校！”（网友：青春很疼）

“@香聪鸡，无论怎么抱怨，谁心里不都是满满的对母校的爱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校园里在售卖的110年纪念品虽然价格很贵，但是我们依然义无反顾地愿意掏钱去买，因为母校毕竟在我们最好的年岁里刻下了最深的印记。但是爱和埋怨为什么一定是对立的？为什么爱一定要用歌功颂德来表达？如果用学术的话来说，我觉得某些帖在价值观上有严重的形而上学的错误。唯有这些抱怨，才能够不断地督促我们的N大向前发展，不是么？”（网友：strike08）

“路过主楼、物理楼，看到志愿者学生们为毕业的校友们热情地贴上校庆110周年徽章，真想上去问问那些老校友们，当他们还是在校生时，校庆时是不是也曾经像我一样被忽视过？我爱N大，也真心祝福N大的未来，微博上我也一直很积极地发过校庆的消息，可是看到校庆时在校生被边缘化的种种，还是有些失落……”（网友：幸福的长跑）

“受到不公正待遇来学校论坛吐个槽，找点安慰什么的，感觉还是可以理解的啊！因为大家把这儿当家，把蛋友都当自己人，就像回到家跟家人小抱怨一样，为甚么不可以呢？除了自己情绪可以得到舒缓之外，有些共同的现象，也是可以引起大家的自我反省的嘛，何乐而不为呢？”（网友：南瓜小哈）

“觉得那些辩护贴好官方呀，就是语气好官方呀！其实如果你让那些发抱怨帖子的人，再往深想一下，他们也会理解的啊，但是谁发帖子的时候还想那么多啊，就我现在就这么想的我就这么抒发，或者说发泄一下。这有必要批评辩解吗？”（受访者甲）

“（看到就餐隔离带）那一下我可能觉得不太好吧，然后我再一想，我觉得就这么一次嘛，他们就回来这么一次嘛！给他们专门的就餐区，就我也挺愿意让他们先就餐的。其实就算没有隔离带，假设这儿有一堆校友，我也会让他们先吃的。”（受访者乙）

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学生们的吐槽之中还隐藏着他们对母校深深的爱，如果没有了这种爱，可能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吐槽了，剩下的可能也就只有漠然和冰冷的商品关

系了，即学校作为商家提供服务，学生作为消费者购买服务。在商品关系中，消费者与商家是两个不同的群体，利益和目标相互冲突，不需要共同的组织文化，更谈不上谁对谁的归属感了。然而从大学组织的发展来看，学生显然不仅仅是大学的顾客，更是组织的核心成员以及长远的利益相关者，对学校发展负有着参与的权利和义务。（张维迎，2005：5–12）这就是大学独有的、不可忽视的组织特性。

当然，吐槽的背后还有一点不能回避，那就是学生自身的主动参与意识不强，正如一则辩护贴中所说：

“如果想增加自己的学校认同感，自己去联系自己的院系，接待下返校的校友。给校友们，尤其是岁数大的校友以帮助。坐在宿舍里灌水[1]，认同感不会给你送上门的。”（网友：香聪鸡）

但是也必须承认，从组织理论的角度看，为成员参与组织活动创造积极条件、提供有效途径，培养并增强成员组织认同感和归属感，应是学校的责任，管理者没有理由将这一责任单方面转嫁给学生。

在本次N大校庆的组织文件中，从指导思想到活动的安排设计，研究者很难找到重视学生参与、增强学生归属感等方面的明确内容。例如，《校庆活动指南》中列出的9项校庆日活动，能让多数学生充分参与的非常有限，而活动的具体设计和组织也未充分考虑学生的尽可能参与。再例如，学校和各院系的校友座谈会本来应该可以成为在校生参与的一个很好途径和方式,但也基本没有学生参加，多数学生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项活动。又例如，关于庆典大会和文艺晚会，组织者为了保证效果，选择了在座位有限的体育馆举行，而没有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选择在室外露天的场地举办。所以，不难理解网友cq317会说：“根本就没给我们参与和服务的机会呀！”

### （三）你伤害了我，却一笑而过

“这次校庆，作为在校生的我感觉很寒心！难道我们就不是N大的人么？”（网友：赵冉冉）

“感受不到校庆，感觉自己就像个外人，热闹都是杰

[1]“灌水”，网络用语，指在网络论坛中发一些毫无内容和意义的帖子。

出人物的。”（网友：花花是吃货）

“反正我还是没觉得我是这个学校的……”（网友：倚晴）

“来这儿一年了，我自认为没有归属感。在这里教育是用来经营的，而不是兴办的。”（网友：ayu）

“我们要归属感啊。校庆搞得确实像隔壁 Y 大校庆一样，感觉和在校生真没啥关系！今天在学校没有主人翁的感觉，几十年后再校庆，我们会回来吗？”（网友：zzh0617）

“我们宿舍集体发愿，毕业了一定不会回来这个学校了。”（网友：米盏）

“以后等我有钱了，捐钱给隔壁 Y 大……”（网友：feilixina）

“我给你说个现象吧，我宿舍的同学现在如果说‘我们学校’，一般指的都是本科学校，而说到咱们这边，一般都会说 N 大怎么怎么样，而不是说‘我们学校’怎么怎么样。”（笑）（受访者乙）

“归属”一词有双重意思，当我说“这属于我”，我的意思是我拥有某物；但当我说“我属于”，我的意思并不是我属于某物，而是我与某事物有非常密切的联系。（Capra, F. and Steindl, R. D., 1991:14）“归属感”是指个体将自己归属于某一团体，并对其产生亲切、自豪的情绪体验。（时蓉华，1988：187）如前文概念界定时所述，“学校归属感”是对学校的一种嵌入感以及与他人属于同一个地方的一种感受，（Freenan, T. M. and Anderman, L. H., 2007:203–220）是学生对自己属于学校一员身份的认同及对自身与学校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结果的情感体验和态度知觉。（杜好强，2010：5）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可以分为两类 7 个层次，前一类基本需要包含四个层次，后两个层次分别为归属与爱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是指每个人都有被他人或群体接纳、爱护、关注、鼓励及支持的需要，而尊重的需要，是指对自己社会价值追求的需要，包括自尊与他尊两个方面。（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2002：57– 58）当人们的生理需要基本满足后就会追寻更高的需要，大学阶段的学生

基本上都能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而他们进入大学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需要找到自己所属的群体，并得到群体的接纳、支持与鼓励等，这就是归属需要和尊重需要的体现。

从以上校园 BBS 上的帖子和访谈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次校庆的体验对在校生学校归属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准确地说，是降低或损害了在校学生的学校归属感。

这一点和国内相关研究的结论可以较好地相互印证。例如，史仕羽（史仕羽，2007）以某大学为例，运用问卷和访谈的形式考查了该校大学生的学校归属感、责任感及参与校园活动意识，发现学生的校园活动意识与学校归属感是相互影响的；彭正霞和蒲伟（彭正霞，蒲伟，2007) 也运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从校园文化满意度的角度考察其与归属感的关系，发现大学生对校园文化的满意度与其学校归属感是高度相关的，对校园文化整体状况的满意程度越高，学生的归属感越强。

14. 这些研究应该在前面的文献述评中先出现。

但是研究者还进一步发现，这次校庆体验对大多数在校生学校归属感的消极影响可能会随时间推移而减弱。下面的帖子和访谈记录应该可以说明这一点：

“其实我觉得说把钱捐给隔壁只是搞笑吧。大家吐吐槽就当好玩了。以后等自己离开 N 大就明白了。”（网友：11zaixian）

访谈者：那个说以后有钱宁肯捐隔壁 Y 大的帖子你看了吧？

受访者乙：这个我们宿舍人都看到了。（笑）

访谈者：你们怎么看这个帖子？

15. 这些帖子是何时出现的？有时间前后吗？

受访者乙：大家当时就笑，说就是的。但是觉得尽管现在这么说，以后应该不会吧。大家这会儿抱怨，到时候应该不会想到校庆时因为学校只给我发了个免费饭盒就把钱捐给隔壁了吧，应该不会吧。

访谈者：为什么呢？

受访者乙：就是可以这么说，你现在想，尽管一个母亲可能会打骂孩子，但孩子一般不会记恨一辈子的，等母亲老了，他还是会去孝敬妈妈的。最多一边对他妈好，一边还抱怨说：看你当年是怎么对我的。

访谈者：设想你以后有钱了，要拿出一笔钱捐赠教育，

这时候你愿意捐给你本科学校还是N大?

受访者乙：哇塞，（大笑）这和那个老婆和老妈同时落水先救谁的问题一样嘛!

访谈者：呵呵，是吗?

受访者乙：那要捐都捐呗，要不捐都不捐。

访谈者：真的吗?

受访者乙：就算我现在对N大有各种抱怨，到我毕业时也可能会有，但是就是在学校里怎么骂他怎么样，到时候还是会觉得他好，这就是母校。就是我一天可以骂他八遍，但是别人就不能骂他。再说我现在才在这儿呆了一年嘛，可能待了几年，可能感情……可能就感情比较深吧。

“这就像在一个有着很多孩子的大家庭里，父母也难免偶尔忽视或没有周全地考虑到每一个孩子的需要，但父母无疑还是爱每一个孩子的，孩子们也不会因此而记恨父母。所以我觉得，大家的吐槽都只是暂时的小发泄而已，慢慢就会淡忘的吧。”（受访者甲）

研究者相信，上述访谈和帖子中表达的是大多数学生的真实想法，因为前文也已经分析到，大多数学生的抱怨和牢骚背后还隐藏着他们对母校深情的爱，在提到自己和学校关系时会不自觉地使用母亲和孩子的比喻。即便这种抱怨偶尔会表现得极端和出格，也只是暂时的情绪发泄罢了，在学校的其他生活经历和体验会在时间长河里将这些负面体验逐渐稀释淡化。

同时，研究者还注意到，这次校庆活动体验对在校学生的思想影响已经超出了学校归属感的范围，甚至还对很多学生的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产生了影响：

“我待学校如初恋，学校觉我不值钱。今天在教工食堂吃饭，看到两位大妈在校友窗口打饭，其中一位问到：你收到邀请帖了吗？另一位很无奈地说：没有，听别人说的，回来看看。像后一位大妈这样的校友大概不是少数，毕竟，所谓的校庆只是“优秀校友”的节日罢了。说到底，这个社会还是以成败论英雄的，神圣的象牙塔也不能免俗啊！”（网友：D大人）

“校友回来是要给学校作贡献的，我们这些在校生能贡献多少呢。现在不好好学习，以后没地位都当不成校友

了。”（网友：zhuwhr）

访谈者：校庆当天有什么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吗？或者感受？

受访者乙：那天看到一些校友跟我们一样也比较可怜啊！

访谈者：可怜？为什么呀？

受访者乙：（笑）在食堂吃饭的都是一些普通校友，没名没权也没钱的。还有拖着小孩没有领到饭什么的，已经（下午）一点（钟）了吧，也没有人管他们啊。这类校友估计是学校没有邀请的，自己回来的。学校邀请的那些校友肯定都是有名有钱或者有权的，待遇肯定不一样。

“（十年前的百年校庆）某当时径直去院里找到班主任，提议说，百年校庆大家都挺关注的，我们就是学习相关专业的，到底谁去参加大会，是不是应该民主选择一下？这简单的一句认真话，谁曾想，会惹下祸端！不日，某收到党支部副书记的电话，说要我来一趟院里，我纳闷：是有好事吧！没想到的是，一见面，竟被书记劈头盖脑痛骂一顿，十分清晰地记得这几句训话：谁去参会，这是党委的决定，党委决定谁去就谁去，你能决定吗？党委的决定你能改变吗？你们想读就好好读，不想读，就滚！从此以后，某不再对入党有兴趣了。如有虚言，天打雷劈！在此抱怨的童鞋[1]，恐怕很多普通群众吧？恐怕很多不是学生干部吧？学干也只少部分有份儿。呵呵，这个社会的许多事情都是如此，这个社会到这个地步，不是没有道理的！大道理不废话，听完这个案例，希望你的心情能够开朗一些，从此多‘懂点事’！”（网友：ddlmwl）

16. 这句话前面已经使用过了，最好不要重复。

“LZ 由小看大啊，这确实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啊……”（网友：wolxl）

“西操场被改成了停车场，这件事真的完全体现了两个字，叫做‘谄媚’！”（网友：管院混混）

“校庆通知一点儿都不到位，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具体情况。但是某领导人要来的事却通知得非常到位，层层传达，（给）每个人发短信，还要回复确认什么的。”（受

[1] 网络语言，同“同学”，带有诙谐的感情色彩。

访者丙）

“校庆＝达官贵人！”（网友：myquanqs）

研究者在此不想评判这些资料中反映出的对在校生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但是研究者认为这在较深层面上的影响必定是重大、内隐而长远的。

17. 你的具体所指是什么？什么“影响”？如何“重大”、“内隐”而“长远”？

总之，基于校庆活动对在校学生产生的如此之大的多方面的影响，研究者认为学校有必要如网友VERAwr所说的那样：“能认真深刻地总结反思这次校庆活动，直面各种批评和抱怨的声音。”

### （四）我的校庆我做主

研究者在每次访谈的最后都向受访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十年后的120周年校庆由你来负责筹办，你会怎么办？”下面是部分访谈记录：

受访者乙：我觉得我肯定会本着一个思想——“全民参与”。

访谈者：“全民”都指哪些人呢？

受访者乙：就指的学生嘛，学生是大部分嘛！还有老师，你看这次大部分老师也好像没有什么校庆的感觉吧？

访谈者：哦，还有吗？

受访者乙：学生、老师还有校友嘛，三个部分都得参与进来。

访谈者：那你要怎么实现这个思想，你会怎么去做，能举个例子吗？

受访者乙：这个，我不太会组织，一时也想不到什么……但至少会注意细节的，比如发给小纪念品啊。

受访者丙：整体的思路就是增强校友和在校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这在将来这些一定会转化为学校发展的优势。一段时间之后，在校生变成毕业生，挣钱了，我们再回来捐款回馈母校。愿不愿意捐就是一种认同感。我有钱了肯定会捐。这样学校发展就很容易了。这也是一个很长期的事情。现在感觉校友与在校学生之间断层了，没有接触和沟通。应该想办法让学生参与进来，比如给学生做一个纪念章，那个肯定便宜，但是是个起码的参与形式。餐券也可以考虑，免费请午餐也没啥。志愿者让大家自愿报名，不限定范围，不强迫，自愿参加。

受访者丁：还有校友跟学生之间的交流，由院系来主持。展览宣传肯定会有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是拿出来给别人看的。可能会邀请其他高校的代表，这是出于礼貌方面，也是为了扩大影响。这是给脸上贴金的事情。

尽管由于时间和情景所限，受访者都没有很系统全面地阐述自己校庆组织设想，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学生参与的重要性，注重在校生与校友的互动交流。这既是学生从自身立场出发提出的主张，也是大学校庆的应有之义。

许多人把大学称做自己的“精神家园”，可见大学生活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多么重要。因此这种爱校情感必然是大学一种最宝贵的财富和资源。（崔继军，2008）校庆正是一个通过师生的具体参与促使这种情感不断升华的良好载体。借助校庆这样一种全校性的集体活动，每一位师生员工亲身参与、亲身感受，不仅能够更加理解组织目标的深刻意义以及目标与自己发展的重要性，而且还会主动把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学校的发展提供内在源源不断的动力，发挥组织文化的导向作用。

在大学发展过程中需要各种角色，“引导者”的主体是学术领袖和行政领导，“参与者”的主体是广大学生，“推动者”的主体是广大教师，“服务者”的主体是管理人员和教辅人员，“支持者”的主体是广大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李建军，2012）如果说校友是大学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的话，师生则是学校的活生生的、近在咫尺的自身主体资源。他们因为本身对学校的现状有着独到的切身感认，更应该直接参与到校庆中来，进行建设性的实践活动。所以在校庆中，要尽力使他们成为学校文化的建设者和受益者的统一。

18. 你上面说不想对这个事件的影响做价值判断，但现在你说的这些话有立场和价值倾向吗？

研究者注意到《北京日报》一则关于国内另一所著名大学校庆的报道。该校校庆的做法或许对理解本研究有一定启发。报道说，该校的校庆活动是在征求了在校师生和校友的意见后确定的，并且将首次引入“PARTY”模式，使校庆回归大学本位。校庆“PARTY”中的“P”代表“pioneer”即引领者，引领学校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改革方向；“A”代表“academics”即学术，强调学术活动是校庆活动的主体；“R”代表“responsibility”即责任，使校庆发挥社会

服务功能；“T”代表“touching”有感动之意，校庆要让校友受感动，师生受教育，社会受影响；“Y”代表“you”，即邀请“你的参与”，“校庆将成为师生、校友的共同节日”。据介绍，校庆多数活动的创意都来自在校学生。例如学生和校友将一起分享万块校庆蛋糕，学生和校友还将带着小马扎，一起看露天电影。（王东亮，刘欢，2012）

19. 这个部分的内容也许放到后面的讨论中比较合适？

## 五、结论

通过上文的资料分析，本研究归纳出以下四点主要结论。

①本次 N 大学 110 周年校庆活动中在校学生的负面体验比较突出，很多人感到被“边缘化”、“毫无存在感”，主要表现为抱怨、发牢骚、讽刺、愤怒、无奈、失落等形式。

②造成这种负面体验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生之外的客体因素，主要包括此次校庆活动组织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策划实施过程中未能给在校学生提供有效的参与途径和条件；另一方面是学生自身因素，主要包括学生较高层面的心理需要以及对母校的爱和期待没有被满足。

③校庆活动中的体验直接而强烈地降低了在校学生的学校认同感和归属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作用可能会被其他积极的校园生活体验逐渐稀释淡化。此外，校庆活动中的体验还间接影响大学生的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念，而且这种影响可能是内隐而深远的。

20. 如果今后仍旧没有“积极体验”会如何？另外，本结论的后部分好像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④大学校庆不但可以而且应当将建立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心理契约、培育学生的学校归属感、促进学生的发展作为主要价值诉求之一。

21. 第 4 个结论不像是结论，而是一个建议？

[参考文献]


包克冰、徐琴美（2006）："学校归属感与学生发展的探索研究"，《心理学探新》，第 2 期，第 51–54 页。

崔继军（2008）："大学校庆功能浅析"，《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 期，第 31–33 页。

Capra, F. and D. Steindl–Rast (1991). *Belonging to the Universe: Explorations on the Frontiers of Science and Spiritualit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杜好强（2010）：《大学生学校归属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重庆：西南大学。

Freeman, T. M. and L. H. Anderman and J. M. Jensen (2007). "Sense of Belonging in college Freshmen at the Classroom and Campus Levels." *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Vol. 75, No.3, pp. 203–220.

李建军（2012）："论大学校庆的目的、主题与主体"，《中国高等教育》，第 8 期，第 49–50 页。

刘海、李晓明（2012）："高校校庆活动的文化价值及其实现"，《高校教育管理》，第 3 期，第 42–45 页。

卢新伟、蔡国春（2009）："解读大学校庆的价值：组织文化和仪式的视角"，《煤炭高等教育》，第 9 期，第 15–18 页。

彭正霞、蒲伟（2007）："校园文化满意度对学生归属感的影响分析"，《理工高教研究》，第 6 期，第 45–48 页。

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2002）：《心理学基础》，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时蓉华（1988）：《社会心理学词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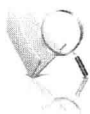
史仕羽（2007）："我校大学生对学校的认同归属感、责任感及参与校园活动意识的调查与分析"，《广东医学院学报》，第 8 期，第 481–482 页。

Singh, K., M. Chang, and S. Dika (2010). "Ethnicity, Self–concept, and School Belonging :Effects on School Engagement." *Educational Research for Policy and Practice*, Vol. 9, No. 3,pp. 159–175.

王东亮、刘欢（2012）："采用新模式，在校生、校友、附近居民共同参与人大校庆不办庆典办'PARTY'"，《北京日报》，9 月 25 日第 013 版。

张维迎（2005）：《大学的逻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郑希付（1991）：《现代西方人格心理学史》，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 文末“评”

本文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质性研究论文。其最大特点是：问题意识明确，针对一个很容易在大学校园内引发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反应的社会事件——“校庆”展开研究。虽然这类仪式性很强的事件表面上大家似乎都了解，对其中的一些“潜规则”也都“心知肚明”，但各类人士（特别是学生）具体是如何体验的，当学校行政强行实施一些“反常”规定时会有什么情绪反应和思考——其实公众是不够了解的。本文通过访谈和实物分析（主要是 BBS 上的跟帖），对某大学一部分学生的反应和解释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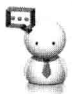
本文结构清晰，语言简洁，行文流畅。引用的一些大学生的跟帖和访谈引言生动有趣，具有很强的阅读感召性。由于研究者注意贴近被研究的大学生们的视角，其研究结果对公众了解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世界观、心理状态和语言习惯很有助益，特别是能够为大学行政领导改进工作提供参考。

作者在论文的后半部分呈现研究结果时提到了部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是整体而言对相关文献的检索和评议不够。虽然作者提到研究界很少有人研究“校庆”这类事件，但作者可以根据本问题域进行更加宽泛的文献检索，如学生与学校的关系研究、不同利益群体对校园活动的反应研究、校园活动对大学生学校归属感的影响研究（作者提到有一些定量的问卷分析，但没有列出具体的文献出处），等等。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评述，作者很难为自己研究的重要性和创新性提供足够的理据，也难以与学术界已有的成果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作者在论文中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是对抽样的标准、访谈的具体过程、分析资料的思路、研究的关系、效度和伦理等问题反思不够。我们知道，做质性研究是一个充满了悖论和困境的过程，如果研究者不保持高度的警觉和反思态度，很多问题就不会被察觉为“问题”。例如，本研究选取了 4 名大学生作为受访对象，作者称他们为“较具代表性”的受访者；然而，他们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代表性”，作者的抽样标准是什么，文中并没有说明。又比如，每位受访者只接受了研究者一次访谈，而且有两名受访者是同时接受访谈的；这种访谈的安排对本研究的结果有什么影响，作者在文中也没有讨论。总体而言，作者对研究过程的介绍让人感觉一切都很顺利——这很容易造成读者对质性研究难度的误解。

相比前面非常丰富的直接引言，本文最后的结论部分略显单薄，没有反映部分反对派学生的观点，而且有的结论没有提供相关证据。如果能够对一些重要的问题提供更加有深度的分析和拓展性讨论，本文的质量应该会有所

提高。例如，中国大学生对母校的“爱”、“期待”和“归属感”到底是什么？这些感受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让他们有这种感受？校庆之类的校园活动对他们形成这些感受有什么作用？）有或没有这些感受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校庆”在他们眼里有何象征意义？为什么该大学的学生对此次校庆的校方规定反应如此强烈？他们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学校情境等因素对他们的反应有何中介作用？等等。如果作者将这些在校生对本次校庆事件的反应放到目前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中加以考量，也许能够获得更有意蕴、更有深度的研究结果。



## 学生回应

众所周知，陈向明老师是令人尊敬的学界大家。第一次做质性研究的我能得到她细致、深入的点评，自然是很幸运的。在此首先向陈老师表示诚挚的谢意！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老师对拙文的21条“文中点”和一篇千余字的“文末评”，字字珠玑，我读了好几遍，也随之产生了很多思考，深化了对本文的反思以及对质性研究方法的认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关于相关文献的检索、评议和使用。正如陈老师批评的那样，本研究对相关文献的检索和评议确实是很不够，忽视了很多拓展性的文献，如学生与学校的关系研究、不同利益群体对校园活动的反应研究等。这不但影响了本研究的信度和深度，也使得建设性的学术对话难以进行。这是我在今后的研究中值得引以为戒的地方。但是在文献的使用方式上，我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说，文献的使用并不一定要专门集中到一起以“文献综述”的方式呈现，也可以分散在文中各处，这主要是取决于研究内容和写作风格的需要。

2. 关于研究对象的抽样。陈老师在“文中点”部分提到抽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问题，促使我对此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现在看来，我觉得自己在文中使用“具有代表性”这一表述是不妥当的。其实“代表性”这一概念大概更适合量化研究，主要指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这是其研究结果推广的重要基础。而对质性研究来说，学者们大都不追求结果的推广性，更多强调研究结果本身的深入性，这就需要在研究对象“选择”（不是“抽样”）

上注重典型性。一般来说，研究对象越是典型，就越有利于质性研究的深入。也正因此，质性研究在选择对象时，常使用极端案例，而这却是量化研究很忌讳的地方。

3. 关于对资料收集过程。陈老师在点评中指出，“做质性研究是一个充满了悖论和困境的过程，如果研究者不保持高度的警觉和反思态度，很多问题就不会被察觉为‘问题’。”这点我非常同意。其实朱老师在课上也曾多次和大家探讨这个问题，但是作为一个质性研究的新手，我此次在这方面一是做得确实不够，二是尽管做了一些反思，但在文章中却未做出必要的细致呈现。例如，由于访谈对象时间安排的需要，我对丙和丁同时进行访谈，这种类似集体访谈的形式虽然可以使研究者有机会看到不同访谈对象之间真实的思想交流和碰撞，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效度威胁的因素。具体说来，我忽视了两位访谈对象之间的关系，丙是一名研究生和学生干部，丁是一位本科三年级普通学生。在访谈过程中，丙似乎相对强势一些，一定程度上隐约控制着话语权，而丁说话明显有些被动，每次都是在丁说完之后才开口，很少插话，说的内容有不少也显然受了丙的影响。显然，对于这样的情况，我在研究过程和写作过程中都没与给予足够重视，所以“研究过程的介绍让人感觉一切都很顺利——这很容易造成读者对质性研究难度的误解。”

4. 关于资料分析和研究结果。陈老师在“文末评”部分对本研究在如何拓展和深化资料分析方面给予了非常好的建议，对我产生了醍醐灌顶般的启发。其实我自己在资料分析时就感觉到欠缺深度将是本文的最大软肋，但当时的思路和视野似乎受到了某种禁锢，仅仅将关注点停留在对学生体验的表象描述和梳理上，停留在对研究开始时那几个问题的肤浅回答，所以在最后成文时也就只能采用叙事的方式呈现一些资料本身外显的东西，而无法有效揭示其中隐藏的深层意义。我虽然考虑到了学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验，但却没有从他们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学校情境等更大的背景中去深入考量，自然也就难以获得“更有意蕴、更有深度”的研究结果。其次，还应该坦诚地承认，这其中也有本人理论知识不足的原因，需要进一步的积累和深化。

第一次做质性研究的过程是辛苦的，但更是令人兴奋和愉快的。我感觉这种独具魅力的研究范式已经开始影响、甚至改造我的学术思维。我已经开始爱上了它。感谢陈老师！感谢朱老师！感谢我的研究对象们！

## 点评专家陈向明简介

陈向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与人类发展系教授、博导，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研究方法、教师教育、课程教学论；教授“教育研究中的质性研究方法”、“质性研究设计与资料分析”、“课程教学论”等课程。现任北京大学华人与华侨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兼职研究员、《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编委、教育部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学术顾问、教育部师范司学术顾问、教育部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外籍学校认证专家等职务。

# 悬崖上的花朵：

## 一名女大学生恋爱的质性研究

文／李廷洲[1]
评／楚江亭

**［摘要］** 本文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大学生恋爱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恋爱中的自我认同"理论和"恋爱心理契约"理论。本研究认为，良好、融洽的恋爱关系促进着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大学生对恋爱关系的向往隐含着对自我认同需要的满足。另外通过对恋爱关系中双方角色期待的感知和认可，恋爱双方反思性地构建和形塑着自我对理想恋爱模式、对恋爱双方角色行为、对恋爱行为边界等的看法，也即形塑了自我的恋爱观，恋爱经历强烈地影响着个体的恋爱观。

**［关键词］** 大学生　恋爱　质性研究　自我认同　恋爱心理契约

---

［1］李廷洲，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教育社会学。

文中“点”

# 一、研究缘起

2001年4月，教育部规定，对参加高考的考生取消了年龄限制和婚否限制。2005年8月，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废除了“在校大学生不准结婚”的规定，大学生恋爱成为合理合法的行为（徐东芸等，2006:105-106）。大学校园里对于恋爱问题的讨论已由“能不能恋爱”[1]到“怎样更好地恋爱”。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确定恋爱关系并开始浪漫历程，研究也显示大学生恋爱呈现年轻化、理性化的趋势（徐伟玮，2004：18）。大学生的爱情中有甜蜜与温馨，同时也不乏由于家庭背景、性格和价值观等因素导致的摩擦与冲突。恋爱关系已经成为影响大学生学习、成长和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

1.“理性化”趋势，何以见得？

2. 缺少相关文献研究；应明确提出你的研究问题；研究思路应说明。

3. 概述仍旧不充分。

当前的研究取向主要有两个，多数研究集中在对大学生恋爱现象进行量化研究，具体来讲，对恋爱现象进行规模、结构的描述，对涉及的变量进行因果分析、差异分析、类属分析，对恋爱观的结构进行因素分析。在分析中发现问题，并提出纠正、教育策略也是这类研究所感兴趣的。第二个取向是对大学生恋爱现象从伦理、价值的角度进行思考。

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恋爱现象提供了大量的思想和素材。但是，恋爱现象固有的感性、主观性、情境化的倾向却不利于基于统计数据进行描述和分析。这些丰富的感情、波折的经历、独特的感受似乎更适合用质性研究的方法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此外，最重要的是，大学生对恋爱的态度和感受高度依赖于当时的情境和研究关系，这正是量化研究试图忽略而质性研究重点反思的问题。

# 二、他们的故事

本研究在选取研究对象的方法上采用的是“目的性”的策略，即寻找有恋爱经历的、相对比较健谈的人；这个人应该与我没有太多的共同朋友和生活圈子，以利于她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用担心干扰她本人的生活；这

[1] 刘长林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大学生在学习期间谈恋爱，已经成为学生工作不可忽视的现象。近几年来，这种现象在各大专院校有增无减，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身心健康。”参见：刘长林，1983:34.

个人应该可以方便地与我交流观点。最后，我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A（化名）。她是北京某大学的女研究生，在与我接触的时候刚入学3个月。她基本符合我的研究需要。

接下来是我们第一次接触的场景。在介绍人B的陪同下，A和另外一名她们的朋友C一起与我见面。（本来预定有两个人与我交流，这样的话就变成了三个）因为C对我的研究比较感兴趣，当时又没有其他事情做，就过来一起参与了。（这样看来，她们参与我的研究的积极性比较高，这对我搜集资料是比较有利的一个条件。）简单介绍和寒暄之后，她们又慎重地问了交谈内容的保密问题，我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并承诺研究成文以后一定获得她们的允许再公开。征求他们的意见之后，我们约在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聊天。我们在店里找了一个周围人比较少的座位坐下，一个圆桌，直径大概1米。地方稍显局促，我们面对面的距离很近，还偶尔碰到其他人的脚。近距离的交流允许我们很小声地交谈。咖啡吧里放着轻柔舒缓的音乐，光线柔和，空气中带着淡淡的咖啡香和花香。西侧桌旁一对情侣在面对面聊天，距离较远，不会相互打扰。东侧一个姑娘在用电脑，有可能是在打游戏。大厅里其他人有的在看书，有的在用平板电脑。整体来讲还算安静，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对方的声音（舒适优雅的气氛为我们展开讨论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这种氛围比较容易调动人的感情，与我的研究主题不谋而合。）在正式开始访谈之前我们简单聊了一下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的事情。我把话题引到恋爱问题上，以引起她们参与的兴趣。开始时气氛很好，大家有说有笑。

我以完全开放的形式倾听她们的故事，听她们讲述自己的恋爱经历以及当时的背景、情绪、想法等。我的参与主要是追问，一方面是用自己的语言重复对方的意思，以确定自己的理解是否准确，另一方面是对我感兴趣的问题和细节进行追问，以保证我获取的信息充分、完整。

B的故事内容丰富，而且第一次见面时间不是太充裕（访谈进行了约3个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听她的故事，

4. 会不会影响主讲人的情绪、心态，以致于有意掩盖什么呢？

5. 后来气氛如何？

6. 研究者主要关注什么？研究什么？

7. 没有读到内容丰富的故事！什么故事？怎么发生？她们如何处理的？为什么？结果如何？

对 C 的故事只有简略的了解。因此，我选取 B 进行重点分析，后续研究中我搜集资料的对象均来自 B。这些资料包括访谈记录（约 2 万字）、观察笔记（约 4 000 字）、3 篇日志（我从社交网站上获得）和一些照片。在资料分析方面，我采用 Nvivo7.0 进行文本分析。篇幅所限，这些资料无法完全呈现，我将以图示的形式展现 B 的故事，并进行适当说明和补充，如图 1、图 2 所示。在说明部分和下文的资料解释和理论构建部分，我将大量引用这些资料。

8. 为什么要用 Nvivo7.0 进行文本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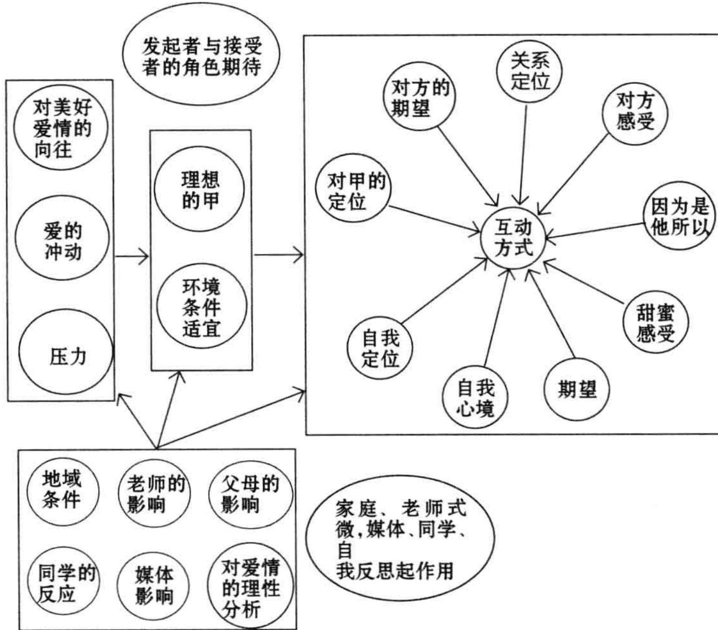



图 1　B 的故事（1）

图 1 大概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 B 对爱情有着美好向往，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理想的甲。他们开始了一段暧昧、青涩的情感经历。地域条件、老师、父母、同学、媒体、自我的理性分析都对这段感情有着一定的影响，老师和家庭的影响比较小，而来自媒体（“就好像‘红颜’中的情节”，“我‘分手快乐’了”）和同学的影响比较大，交往双方的自我反思也有较大的影响。起初 B 对甲有好感，甲知道这个事实，这种主动追求与被动接受的角色定位对后期两人的交往一直有影响，甲始终期待 B 有积极、主动的表现和态度。节点“压力”主要是在恋爱开始之间，对学习成绩和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当时压力比较大”，“压力巨大”）。“理想的甲”是一个对 B 来说形象、气质比

9. 这一段没有“故事”。应有主人公、事件、情节。故事需要有血有肉！

较理想的男生（“有点像混血儿，皮肤挺黑的，眉毛很浓，睫毛很长，肩膀特别宽，高中男生很少有鬓角，他鬓角很长，大概 179（cm）的样子吧。穿着打扮虽然很普通，但在那个年纪就是这样，休闲的，布的裤子，不嘻哈，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裤子，给人感觉很好”“他在他们的小圈子里是个小头头吧，各种观点比较有高度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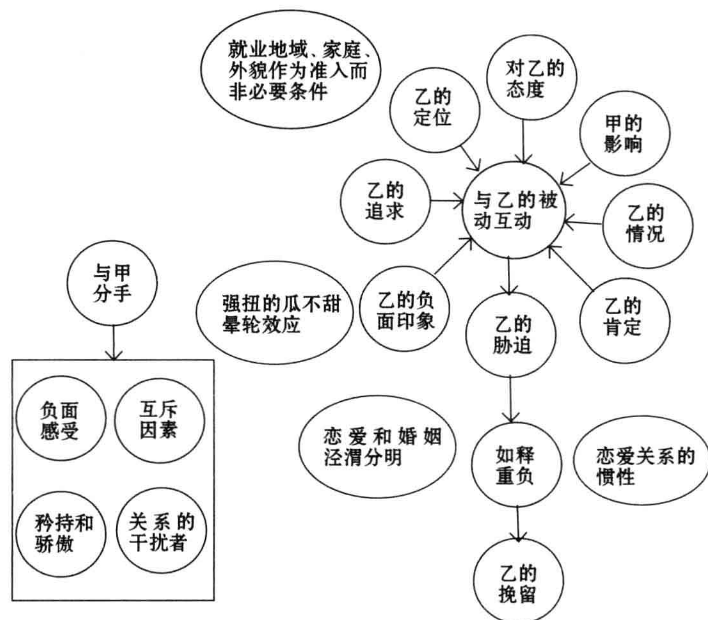



**图 2　B 的故事（2）**

图 2 大概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与甲有矛盾和冲突的情况下，另一个女生 D 与甲关系暧昧，同时，另一个男生乙又在主动追求 B。这促成了 B 与甲分手，开始了与乙的恋爱关系。对乙的家庭出身、未来工作打算和外貌这些条件，B 在恋爱开始时有所考虑，以后就很少关注这些因素。B 对恋爱关系和婚姻关系有明确的区分，这也是促成他们分手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有负气和冲动的成分，这段感情经历并不愉快，虽然如此，恋爱关系仍旧有一定的惯性，得到了较长时间的维持。最后，由于一个特定事件，这段本就“平淡”（B 的用词）的感情走向了终结，B 感到“如释重负”（“我从此觉得人生就快乐了，快乐了好长时间，我分手快乐了”）。

10. 没有看到什么故事！依然是理性的概况！

在这些故事的基础上，我将从社会学的视角，具体来讲是符号互动论、吉登斯的自我认同理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布迪厄的符号支配理论，进行解释，并构建两个本土理论。

11. 到底在他们的恋爱中出现了什么，需要用这些理论来解释！

## 三、恋爱中的自我认同

12 怎么突然就到了吉登斯，为什么？

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1]条件下的自我认同包括三个维度的特征。第一，拥有合理稳定的自我认同感的个人，会感受到能反思性地掌握的其个人经历的连续性，并且能在某种意义上与他人沟通；第二，通过生命早期建立的对他人和社会的基本信任和安全感，个体在实际行动中可以"过滤"掉许多普遍威胁到自我安全和完整性的威胁（食品安全、核战争、自然灾害、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无时无刻不存在，但个体仍旧可以在过滤掉这些威胁的情况下正常地生活而不至于陷入焦虑）；第三，个体能够把自我的生活和其他现实作为有价值的事物加以接受，从而体会到一种意义感（安东尼·吉登斯，1998：60）。接下来，本文将从这三个维度论述故事中的行动者在恋爱过程中的自我认同因素。

在高度现代性的条件下，以地域限制为特征的个体生活边界被打破。稳定的，具有共同传统、共享价值和共有文化的共同体被解构，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被切割成了一个个片段。电影、电视剧、图书、广告、新闻以近乎爆炸性的方式膨胀，各种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价值观和多种多样的虚拟形象侵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随着人际交往的日益丰富，大学生接触的人群在数量和种类上也更加多元化，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对大学生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美好的、令人向往的生活方式太多了，他们面临的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高度多元化，而自我的生活轨迹赤裸裸地呈现在外界信息面前，被不断地干扰、侵入甚至是支配。用被访者的话来说，"自己一个人像在漂泊"，"有个男朋友就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了"，"想要一种稳定的生活"，这些都体现着大学生对漂泊的、任意的生活方式的焦虑和对稳定、内在参照的生活轨迹的向往，而恋爱关系的确立似乎可以满足这种需要。恋爱中双方的亲密关系不仅为对方提供着认可和支持，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共享生活轨迹和生活方式。正因如此，大学生可以回答"我

[1] 吉登斯意义上的现代性是以时空抽离、脱域和反思性为基础的社会性质，其制度性维度包括对信息和社会督导的控制，以自然的改变和"人化环境"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化，战争工业化情境下对暴力工具控制条件下的军事现代化，市场经济、竞争劳动和资本积累四个维度。

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喜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的生活中都有哪些固定的因素”、“我的生活中有哪些人与我一起生活”这些关涉自我认同核心的问题，这对于大学生建构自我认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吉登斯所说的脱域[1]机制广泛存在的条件下，个体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是受专家系统控制甚至支配的。大学生穿的衣服由设计师和服装公司的专家生产；食物由食堂、餐厅、食品公司、农业专家生产；房屋和宿舍由建筑师和建筑公司负责设计和建造；出行的交通工具由汽车公司设计制造，并保障其安全性，交通规则则有交管部门制定和保证实施；接受的信息由专业的新闻媒体和各领域专家负责生产和传播。然而，大学生的生活中充满了类似的疑问：衣服是否安全？食品是否卫生？住房是否牢固？交通工具是否可靠？信息是否真实？既然看不到这些产品被生产的过程，也不明白其中的原理和科学，个体何以信任它们呢？生活中的这一切都是以一种基本的信任关系为前提的，个体不得不假设衣服是安全的，食品是卫生的，住房牢固，交通可靠，信息真实，否则个体的日常生活将难以继续，从而陷入一种焦虑之中。贝克的分析将这种威胁和风险进一步深化，他指出，全球化的风险已经侵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中，风险造成的灾难不再局限在发生地，而经常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风险造成的危害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预警能力的范围，且风险无法预测，无法估计（乌尔里希·贝克，2004：60）。典型的例子包括核战争、金融危机、生态危机等。随之而来的是大学生对个体安全的焦虑和对风险的潜在恐惧，在我的研究中，被访者提到的“踏实”，“有什么事可以找他”无不隐含着对安全威胁的焦虑。恋爱关系的确立，对大学生来说（尤其是女大学生），强化了个体的基本信任和本体安全。恋爱中的安全感和踏实的感觉提供了一种安全、可靠幻象，以应对脱域机制和风险社会带来的种种威胁。

13. 不仅大学生思考这些问题，人人都思考！

随着传统社会的解构，社会成员的共享价值观被一起解构了。社会上不存在一个共享的、被所有人认可的价值

[1] 吉登斯意义上的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具体包括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的产生和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的建立两种脱域机制。

观可供选择。另一方面，大学生作为未完成次级社会化的个体[1]，未来职业仍是不确定性的，还没有在社会中获得特定的角色定位。这样的个体更难以找到生活的价值和意义。随之而来的便是“空虚”、“迷茫”、“漂泊”的自我感受。恋爱中的大学生双方彼此的肯定和赞美，以及对未来美好家庭的向往，从而愿意为美好爱情付出努力，这些因素建构着大学生的意义感和价值感，从而巩固其自我认同。

14. 不用这样的研究也可以通过经验得出类似的结论。

综上，大学生的恋爱关系有利于维持其自我生活方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助于强化其信任感和安全感，有利于其意义感和价值感的确立。因此，我可以作出如下假设：良好、融洽的恋爱关系促进着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大学生对恋爱关系的向往隐含着对自我认同需要的满足。

为了避免目的论的倾向，此处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大学生恋爱行动者并不是有意识的以巩固自我认同为目的采取恋爱行为。事实上，满足自我认同大学生对恋爱关系的向往隐含着对自我认同需要的满足。满足自我认同的需要是恋爱行为的结果而非目的。行动者出于情感、生理、社会性需要开始的恋爱行为客观上影响着个体的自我认同。如前文所述，恋爱中个体的行动遵循一种实践的逻辑，下文将要阐述的恋爱心理契约可以更好地解释这种逻辑。

## 四、恋爱心理契约的逻辑

契约论（theory of contract）最初是西方政治哲学中试图证明国家政治合法性的理论之一，对其理论内容本文不拟深入讨论（姚大志，2003：94）。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契约关系是指具有平等的社会权利的利益主体与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崔宜明，2004：16）。而心理契约（psychological contract）则是更下位的，主要在组织行为学中加以探讨的概念。本文对心理契约的一个操作性的定义是个体之间形成的隐含的、非正式的、未公开说明的相互期望和理解（李原、郭德俊，2006：151）。接下来，本文将尝试在实证资料的基础上构建恋爱心理契约的理论内容。

15. 缺少资料的分析，这样论述很难看到质性研究！

[1] 彼得·伯格意义上的次级社会化，指制度或是以制度为基础的“亚世界”的内在化。（参见：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2009：:108）

恋爱双方为确立恋爱关系让渡了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或称“资源”。具体包括恋爱所需的时间和精力，恋爱带来的经济上的投入和开始这段恋爱关系带来的机会成本（开始这段恋爱意味着放弃了与其他人开始另一段恋爱关系的可能）。

恋爱关系能带给恋爱双方一些互惠性的因素，具体包括：满足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需要，包括性的、情感的、人际交往的需要，还有前文论述的寻求稳定且连续的生活方式的需要、巩固安全感和信任感的需要、寻找生活意义的需要等（这些需要在前文已有资料支撑，此处不再赘述）；满足作为成年年轻人的角色期待，大学生作为成年的年轻人，在父母、亲戚、同学、朋友那里获得了一种应该谈恋爱的角色期待（在我的研究中，被访者多次提到同学的影响，其中隐含了这种期待，也有亲戚主动询问B有没有男朋友，并提出帮她介绍。）

缔结这种恋爱心理契约关系的标志包括口头的“答应”（B的原话是“我就答应了”）、身体接触（牵手、亲吻等）等形式。

恋爱心理契约在形式上是隐含的、非正式的，未公开说明和明确恋爱双方的权利、义务、行为边界等。更多地是以一种承诺（“我不会再这样了”）、默契的形式体现在双方的角色期待当中（“我不高兴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他会陪我聊天”）。

恋爱心理契约的内容，即恋爱双方在权利和义务方面被期待的角色行为包括倾诉、陪伴、互送礼物、赞美、倾听、身体上的亲密行为、用情专一、相互帮助等。相应的，有一些被禁止的行为，例如不忠、忽略、冷落、纠缠等。具体的契约内容只能在恋爱双方的互动过程中被具体的构建。

16. 他们的故事中到底有多少是心理契约的内容？所以，必须相对明确研究问题，并分出层次！

在恋爱心理契约内容的建构过程中，媒体、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均产生了影响（如图1所示），恋爱中的个体理想中的恋爱关系模式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被反思性构建的。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大学生的社会背景、家庭出身、在学校场域中的位置以及这些因素形塑而成的惯习，深刻地影响了她对恋爱关系的认知模式，这种特定的认知模式会直接体现在其心理契约内容中。在双方交往的过程中，

随着各自付出、表达、倾听、妥协、反思的互动过程，恋爱中的个体逐渐认识了对方的期待和行为习惯，并对自己的期待和行为作出调整，逐渐形成稳定、清晰、双方认可的恋爱心理契约内容。在图 1 和图 2 中，恋爱双方表现出的期待、肯定、胁迫、反思等均是这个过程。

恋爱心理契约关系一旦确立，便成为一种外在于个体的、稳定的、有一定惯性的符号系统。这种性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来自父母、朋友、同学、老师的前反思性的假设，他们会不假思索地将这种恋爱关系作为一种前提，例如询问“你男朋友最近怎么样？”“这事找你男朋友啊。”不仅如此，随着恋爱双方共享生活轨迹、社会关系的增多和强化，这种前反思性的假设将个体塑造成她男朋友的女朋友（或他女朋友的男朋友），这便具有了米德意义上“客我”的意涵。至此，恋爱中的双方已不是外在于个体的某个人，而是自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恋爱心理契约关系一旦确立，便意味着恋爱双方已经适应了对方，并开始了稳定的恋爱关系（这一点下文将深入论述）。这种关系可以带给双方情感和生活上的相互依赖，而这种依赖是具有惯性的。如图 2 所示，B 与乙在恋爱关系稳定以后，虽然对这份感情始终不甚满意，但一直维持着恋爱关系长达 2 年。

至此，我已简要论述了恋爱心理契约的逻辑。恋爱心理契约可以很好地解释各种恋爱阶段论（恋爱中的蜜月期、适应期、共生期；共存、反依赖、独立、共生等）。从恋爱心理契约的角度看，“蜜月期”或“共存期”是恋爱双方专注享受恋爱的互惠性因素的时期，此时的个体沉浸在恋爱的幸福感中，对双方的角色行为和边界等都较少地考虑。“适应期”或“反依赖”、“独立”实际上是恋爱心理契约内容构建的时期，此时双方在彼此的权利、义务及其对应的角色行为进行妥协。随着这个过程的渐趋完善，便进入下一个阶段，即“共生期”。相反，如果双方无法成功构建稳定的契约内容，便很容易走向感情破裂，因此，这个时期也是分手的高发期。

通过对恋爱关系中双方角色期待的感知和认可（即恋爱心理契约内容的构建），恋爱双方反思性地构建和形塑

着自我对理想恋爱模式、对恋爱双方角色行为、对恋爱行为边界等的看法，也即形塑了自我的恋爱观。从这个意义上讲，恋爱经历强烈地影响着个体的恋爱观。

本文构建的两个本土理论只是作为设想的理论，留待后续研究的批判或证实，我也将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它们。

## 五、研究者的反思

第一，关于唯智主义偏见与实践的逻辑之间距离的反思（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2004：42）。这种努力绝非易事，尤其在本文的第三、四部分，我试图建构“恋爱中的自我认同”理论与恋爱心理契约理论的时候，唯智主义倾向不断干扰着我。思维中不断出现将理论进行完备论述的冲动，但这个过程往往脱离了我的研究资料，是在理论的框架内做的脱离实证的努力。

17. 为什么需要这些反思！研究还是质性吗？从哪里来的？扎根了吗？

我始终在尝试不断地回到研究情境，回到资料，让资料与理论对话。

当然，如果仅将这种反思性描述出来，而不将这种反思和警醒贯彻进研究和分析的全部过程，这种反思将变得毫无意义。我努力避免这种倾向，在确定研究现象、研究问题、搜集资料、分析资料、解释资料、整理成文的过程中贯彻这种反思性。

第二，关于研究伦理的反思。我在征求被研究者同意的情况下开展研究，并在行文中隐去了有关他们身份的资料。另外，在本文公开之前，我已征求被访者的同意。

我绝不是在价值中立和文化无涉的前提下进行研究，也不会做那种尝试，而是在充分反思的基础上，将这些价值、文化、情感因素揭示出来，呈现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现实”。这个“现实”中不仅有关于研究现象的故事、场景和历史，还有研究者的惯习、场域位置、价值取向、情感、背景。这里，我力图呈现的不是几个行动者在偶然互动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现象学，而是几个有着独特轨迹的行动者在历史中的际遇；不是个体与个体互动或反思，而是历史与历史的交汇和融合。

### [ 参考文献 ]

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2011）：《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

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1998）：《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著，汪涌译（2009）：《现实的社会构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崔宜明（2004）："契约关系与诚信"，《学术月刊》，第 2 期，第 15–21 页。

李原、郭德俊（2006）："员工心理契约的结构及其内部关系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5 期，第 151–168 页。

刘长林（1983）："大学生恋爱观问题初探"，《社会》，第 6 期，第 32–33 页。

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2004）：《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乌尔里希·贝克著，吴英姿、孙淑敏译（2004）：《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徐东芸、张万山、鲁芳（2006）："河北省部分高校大学生婚恋观状况调查及对策"，《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 3 期，第 105–106 页。

徐伟玮（2004）：《长春地区大学生恋爱观的现状及特点》，吉林：长春师范大学。

姚大志（2003）："契约论与政治合法性"，《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4 期，第 94–99 页。

朱国华（2004）："习性与资本：略论布迪厄的主要概念工具（上）"，《东南大学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1 期，第 33–37 页。



## 文末“评”

本文选题较为新颖，贴近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而且比较适合运用质性方法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不足之处主要有三点。

1. 研究资料不充分，尚未达到资料相对饱和的要求，致使后半部分资料的分析和解释没有有力的支撑，显得很单薄。

2. 资料分析不足。仅用逻辑图理性地展示资料，丢失了原始资料大部分的信息。

3. 资料解释有明显的套用西方理论的倾向。对理论的引用较为牵强和突兀，很难看到自下而上建构理论或对资料进行逐步抽象的过程。

总体来讲，本研究基本符合质性研究方法的要求，但在资料搜集、分析和解释方面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 学生回应

感谢楚江亭老师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对我的文章进行精彩、细致的点评，让我受益匪浅。

正如楚老师所说，我在研究中仅进行了两次访谈，资料远未达到饱和的程度。这直接导致故事的叙述内容空洞，没有细致的深描和丰富的情节。而且资料不足以支撑理论建构，致使资料解释部分空泛、脱节。

在行文过程中，许多细节的处理也比较粗糙，比如楚老师第 3、第 5、第 6 条点评，我都很认可。

此外，正如第 13 条点评指出的，从资料分析到资料解释部分的过渡较为突兀，语言是其中一方面原因，更重要的还是资料不充分、验证理论倾向明显导致的。

对于以上问题，我会在以后的学习和研究中继续努力，予以克服。再次感谢楚老师的精彩点评！

## 点评专家楚江亭简介

楚江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担任《教育学原理》《教育社会学》《教育发展战略》《教育管理学》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同时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党委副书记。曾在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文章50多篇，出版专著1部，合著、译著书籍8部，主持与参加国际、国家及有关部委项目、课题等15项。近年来，多次被有关省、市、县教育（厅）局邀请为局长培训、校长培训、教师培训、新课改培训、学校发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等做学术报告。国内知名教育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十佳教师"、北京师范大学"四大名嘴"之一。

# 教师的“诚”性与教学智慧生成之间的关系研究

文／王永明[1]
评／杜亮

[摘要] 本文通过对一位优秀的高中语文教师的个案研究，尝试从教师个人、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学校之间、教师与家长之间等方面，通过典型的教学故事，解读出教师的“诚”性和教学智慧的内涵以及二者之间存在的内在关系。

[关键词] 诚　教学智慧　真　善　美

[1] 王永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课程与教学论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学论。

文中“点”

## 一、研究问题

这是一个缺乏崇高道德追求的时代，一个缺乏理想精神信仰、充满了物质追求和享乐主义的时代。教育的使命不仅仅是给予学生以知识、技术和智能，以作为满足他们的身体或心理的低级感官需要的工具，教育还需要对美好理想的追求，需要弥补社会的自然发展所导致的弊端，需要引领社会向健康方向发展，因而现时代的教育需要加强道德和理想精神境界的培养。当下的中小学教学最重视的是知识的掌握和智力的发展，忽视了学生道德的培养。如何将人文道德精神渗透到日常教学中，把道德培养和智力发展融合起来呢？这是我希望探究的主题，即教学中的德与智的关系。

那么，研究教学中哪方面的德性和智慧之间的关系呢？《中庸》中的一段话给了我启发，“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教育是要“尽人之性”的事业，是化育人的事业，“能尽人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体现出教育的智慧。那么，教学中的“诚”与教学智慧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呢？这是我想探寻的问题。应该说明的是，实际上我已经假设教师的“诚”性与教学智慧发生之间是存在关联的，而是否真的存在关联，就是本研究需要探究的。

## 二、文献分析

1.“诚”作为作者研究的核心概念，是在研究中需要明确界定的概念。同时“诚”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与历史条件下关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相同。特别是作为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核心“概念”，

古代最初对“诚”的系统论述体现在《中庸》中，对于“诚”的内涵，《中庸》中提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从先秦到宋明理学，逐渐形成了对“诚”的确定理解，即“真实无妄”、“诚实无欺”（鲁芳，2004：42）。安乐哲、杜维明和郝大维认为“诚”含有“创造性”的意思（安乐哲、郝大维，2011：59）。在古代文献及其解释中，“诚”与智慧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当代，卢风探讨了“诚”与“真”的关系，他认为，“诚”将真理与真实性、真与

真实统一起来，将道德和自然知识统一起来，避免了"真"与"善"的分离（卢风，2005）。教育学中没有对"诚"进行专门的理论研究的论文或著作，有论述到教育中的"诚"也多只是实践经验的阐述，如"诚实是根本的教学智慧"（潘俊臣、张家秀，2010）。

关于"诚"的探讨可谓十分丰富，这就更加凸显作者界定明晰这一概念在本研究中的含义的必要性。

关于教学智慧研究的文献不少，包括对教学智慧的内涵、特征、类型、要素、生成、培养等方面。程广文、宋乃庆认为教学智慧本质上是实践智慧，它表征的是教师在复杂多变的教学实践中能选择具有教育(学)上的合理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的教学行为的能力，是教学经验、理论修养(包括学科修养)和德性三个方面在实践中的综合表现（程广文、宋乃庆，2006）。杜萍、田慧生认为教学智慧是教师个体在教学实践中，依据自身对教学现象和教学理论的感悟，深刻洞察并敏锐机智、高效便捷地应对教学情境而生成融通共生、自由和美的境界的一种综合能力，这种能力包含了多种具体教学能力的综合运用，是教师有关教学活动的感知、思维、创新、实践等多种能力整合后的高水平的系统能力（杜萍、田慧生，2007）。王鉴认为教学智慧具有"复杂性"、"情境性"、"实践性"，并且分高低层次，高层次的教学智慧与教学艺术、教学研究能力、教学缄默知识等相关（王鉴，2006）。燕镇鸿认为从具体的实践来看，教学智慧有两个层面上的含义，它是一种才智和智能，也是一种综合教育教学能力。他认为教学智慧生成来源于教师的教学实践、文化与经验的积淀、教师知识、教学反思与研究、教师专业自主发展等。此外，他认为道德伦理与教学智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道德伦理本身就是一种智慧，智慧总是与道德为伴，道德决定着智慧的方向（燕镇鸿，2010）。杜萍、田慧生认为生成教师教学智慧的基本要素包括教学经验、教学思维力和教学执行力（杜萍、田慧生，2007）。刘旭东认为教学智慧是教师在教学中不断实践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生成和发展起来的。教师的思维方式、反思、行动研究在教学智慧的生成中具有重要作用（刘旭东，2010）。

从上述文献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教学智慧的解释大多都是从"形式"的视角分析的，缺乏内在精神内涵的

解释。虽然在定义中也都提到了教学智慧中包含着德性、自由、美等，但强调的却多是“敏锐”、“迅速”、“准确”、“高效”、“能力”、“灵活”等，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教学智慧在形式上表现出什么特征、怎样生成的、来源有哪些等，并且生成研究有些模糊，来源研究过于宽泛，这也是跟抓住教学智慧的精神内涵有关。实际上，我们对马克斯·范梅南关于教学机智的描述中可以发现，教学机智中充满着深刻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关怀，“虚假机智的动机是为了孩子利益之外的某种别有用心的目的去捉弄和控制孩子”（马克斯·范梅南，2001，181），“机智可以表现为克制、对孩子的经历坦诚以待（对孩子体验的理解）、尊重孩子的主体性、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情境中充满自信，还可以表现为一种临场的天赋”（马克斯·范梅南，2001，196），“机智地行动很大程度上是一件包含整个人的事情: 心灵、情感和身体。”（马克斯·范梅南，2001，270）

## 三、研究方法

### 1. 抽样

本文采取的抽样方法是目的抽样和方便抽样。经过对研究对象要求的思考，我选择了我的一个同学——管老师作为研究对象，他是一位工作了五年时间的非常优秀的高中语文教师，他在五年的职业生涯中就已经达到了一位“老教师”的水平。我在平时与他的交流中已经发现他是一位非常有教育教学智慧的优秀老师。

### 2. 数据收集

收集资料的方法是开放式访谈和实物收集。访谈进行了一次，时间为一个小时，访谈所获得的文字为 4 700 字左右。访谈本来计划做至少三次的，但由于访谈对象的学习和研究工作非常忙，一直没能抽出时间来接受进一步访谈，而我通过对所获得的访谈资料初步分析发现，这些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揭示我研究的问题的内容。除了访谈之外，还使用实物收集法搜集了研究对象的书面文字资料 12 800 字左右，这些文字材料是研究对象对自己的教学反思总结而成的书面材料。

**3. 访谈**

访谈问题：

你能不能举一些你成功解决了的比较重要或棘手的教学中的问题的例子？

你是用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你觉得这个问题解决的怎么样，结果如何？

你是怎么想出这个办法的？

在想这个办法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到一些道德的因素？

访谈提纲并不完全与实际访谈中的提问一致，访谈中的提问主要是根据受访者自己的陈述提出的，但这些问题又跟我的访谈提纲是有关系的。在访谈时，我并没有把自己的访谈提纲强加给对方，只要对方在我的问题范围内，我都会允许对方说自己的话，而一旦与我的问题有直接关系或有当时感到模糊的地方，我会发问。但访谈中把“话语权”交给受访者的一种结果是访谈者可能会被受访者带着走，反而“迷失了”自己的目的，研究者需要在访谈中，不断地在内心穿梭于自我和对方之间，辨明和梳理对方的语脉，明确自己的目的。不过对于初级访谈者而言，听、看、记有时难以同步兼顾。

**4. 实物收集**

本研究收集的实物是研究对象对自己五年的班主任生涯的回顾和反思，文中描述了研究对象自己从刚入职到成为“老教师”的工作和生活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的成长事件和职业生涯的大体心理历程。这些文本为研究教学智慧的发生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资料，同时也证实了访谈中的一些信息，但其中的一些信息与本研究是不太相关的。需要注意的是，自传和传记都是对过去事件的追忆，作者一方面可能对某些细节“记忆”有误，另一方面可能有意“歪曲事实”（陈向明，2000：261）。当然，这种“歪曲”并不一定是真正的主观有意的歪曲，至于本研究搜集的这个文本，整体都透露出了研究对象内涵的真诚，因而是值得信任的。

**5. 成文**

此报告主要使用了四种质性研究文本写作的方式：第一，现实的故事，真实地描述所发生的教育教学事件，真

2. 在下面的行文中这四种“故事”未能很好地体现！

实反映被访者的思想观念和想法，除了有些地方用作者自己的话概括之外，基本上都是使用被访者自己的话语，当然，故事的整体布局安排是作者自己组织的；第二，忏悔的故事，记录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思考和疑问、不足和收获等，反省自己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把自己的先在观念、心理路程、研究过程清晰化，与自己和自己的研究展开对话，获得经验和新认识；第三，印象的故事，主要描述研究者在与被访者的交往过程中对被访者的印象和感受；第四，规范的故事，这是在我试图解释和建立理论时使用的写作方式，理论的建构是尝试使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建构的，当然也必然加入了研究者的思考和理解，并且在解释时受到文献评述的影响，偏重于对其他文献不重视的有关教学智慧的方面进行了重点解释和理论建构。

**6. 效度和推广度**

访谈时并没有明确告诉受访者，我要研究的是教师的诚性与教学智慧之间的关系，只是提到我要研究教学智慧，而没有提到有关“诚”的内容，因而文中所展现的受访者“诚”的方面是比较真实的，是“自然地”呈现出来的，这就排除了一些“人为”因素，因而是有一定效度的。此外，笔者与研究对象是很好的朋友，笔者发现自己对研究对象的了解与文本所呈现出来的研究对象的特点是基本符合，有内在一致性的，通过这种比较也能说明研究是有一定效度的。

本研究做得还很不充分，许多方面都可能影响到研究的效度。第一，研究对象只有一个，而没有实施360度访谈，因而只是“一面之辞”，缺乏更全面的信息搜集。第二，由于整个访谈都是研究对象自己的回忆，因而必然有所失真，但并没有影响到整体资料的效度。第三，被访者可能存在自我美化、回避不好的事情的嫌疑，我想多数人都有这样的倾向，而在资料搜集时，没有研究有关被访者的“不智慧”的教学行为。第四，有些地方解释得不够具体，看似有些牵强，比如在“至诚”、学校的运行逻辑与教学智慧一节中，没能清晰地呈现和具体分析三者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这跟研究资料搜集得不够充分也有很大关系。总体而言，第一、二、三点影响到描述型效度，第三、四点

影响到解释型和理论型效度。

至于推广度的问题，首先，被研究者所表现出的教学智慧与其他研究对于教学智慧的描述是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的，这表明它是有一定普适性的，是有共通性的，当然也不可排除我作为研究者，在研究和解释时会受到其他研究的影响，产生一定的主观取向。此外，即使是此情境中的智慧，并不一定在彼情境中依然是智慧，甚至可能是愚蠢的，所以，研究结果的推广要看具体情况，是存在情境性和特殊性的，可能会给读者启示，但需要读者自己理性的辨识。

**7. 研究伦理问题**

虽然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是朋友关系，但访谈的时候我都会说明访谈不会涉及他的隐私问题，若涉及也会征得他的同意，并且录音与否都会征求对方的同意。虽然对方是一个开朗健谈的人，但他还是非常注重自己的隐私和私人空间，他曾说到，"作为研究对象，就像把自己赤裸裸的暴露在研究者的面前，"所以我想我的研究对他的心理可能会造成一些焦虑或其他不好的影响。此外，本文中提到人名都是化名，以保护相关人的基本隐私权。

3. 关于研究伦理的反思难能可贵。

# 四、研究结果

## （一）教师的"诚"性和教学智慧的内涵

**1. 教师之"诚"性**

**"真性情"**："我觉得老师应是一种真性情，没有必要向学生们掩饰什么。"

"有时候，老师在学校里面表现得是没有性别的，就像我们班，男生喜欢拥抱我，女生也喜欢拥抱我……（笑）。怎么说呢，刚开始我也是很难打开自己，不习惯这样，但后来跟学生接触得多了后，你会觉得人和人是真性情的，没有什么关系，哪怕你哭的那一刻，你让人哭得快乐一点，恸哭出来，都挺好的。"

**"不避讳"**："我不太清楚坏的影响是什么啊。可能我接触到的坏的因素比较少啊。但是我觉得不要避讳，老师做得不好的地方，我可以跟同学们说，老师真的考虑得

没有那么多，是你们提醒了我，老师有时候比较健忘，那你们以后能不能多提醒我呢。这个也要看老教师和新教师，老教师这样叫做亲和力，新教师这样叫无能。我觉得很难辨别的，我自己已经是老教师了嘛，已经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信任。我对遇到的困难都不避讳的。”

“我在和孩子们交流过程中，从不避讳教育、体制和社会中的种种矛盾，不避讳，让孩子们一起思考和理性的分析，因为教育是要培养未来具有健全人格的公民，教育只有在真实中才具有说服力……社会、教育、体制中的种种问题，可能是风霜雷电，可能是垃圾，但是对于希望成长的孩子们来说可以是一种肥料，促进他们成长。我期待我和同学们也有这样的认识。”

**“不欺瞒”**：“我在请他们爸爸妈妈来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清楚，我为什么请他们来，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一般小孩儿都会在（现场），我从来不把小孩放在教室，我跟家长在办公室谈。我教育的问题不是要教育他们的爸爸妈妈，而是小孩，最终是要落到小孩身上的。我们的氛围是好的、善良的，我们不是为了堵这个东西，我们只是来协商，来看怎么样更理性的、更好的处理更好，那最后做一个更好的选择而已。爸爸妈妈是你的监护人，你的爸爸妈妈需要知道，我对你的爸爸妈妈负有责任，如果万一出现事故了，我又没有告诉爸爸妈妈，我会良心上过不去。小孩都会在，不会欺瞒他们。”

**“不隐晦”**：“我是这样跟学生们讲的，从不隐晦。我觉得公开之后，学生会跟你讲很多事情。”……“我们选补课的地方，是家长们一起去选的，而且会拍下照片和视频，让学生们去看，去选择，我会让学生们知道，我们为你们做了很多，让社会的暖流流过每个学生的身边，让他们感知到我们的努力。很多老师做了学生们都不知道，而我们做了一点点，我们都要放大到让你知道。而我们和学生做的一点点，我们都要让家长知道。教育有时候是宣传、舆论的阵地，你不占领谁占领啊。”

同样地，对于如何处理学校和家长之间的矛盾和疑问，管老师认为，“我把它们（学校的教育行动）扒开给你看，扒开闪光的金子，里面的人性啊，感恩行动。学校领导集

体的协作之美，家长的什么之美，学生的什么之美。感动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

由上述资料，我们可以发现，教师的“诚”性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即对自我体现为“真性情”，对他人体现为“不欺瞒”、“不隐晦”，对现实体现为“不避讳”。教师是“真性情”的，因而能发现和发展真实的自我，“打开自己”才会有真诚的交流；教师是“不欺瞒”、“不隐晦”的，因而能引发学生们真诚的表白和理性的思考；教师是“不避讳”现实问题的，因而能发现现实问题之所在，能冷静地分析问题和理性地解决问题，这三个方面也能够反映出教师的“诚”性与教学智慧之间是存在着必然联系的。而“诚”的核心内涵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发现、创造和坚守的态度或品格。“善”和“美”是教育的追求，也是教学智慧本身，当教师的善和美、学生的善和美、家长的善和美都激发出来的时候，许多教育教学的问题就能非常顺利地解决，教育教学活动才能顺利高效地开展和完成。

**2. 教师的教学智慧**

教学智慧大致可以分为教学活动过程中即时生成的教学智慧和日常的教学常规活动中体现出（或隐含着）的教学智慧，二者之间是相互转化、相互支持的。多数研究者对教学智慧的探讨主要涉及第一种类型，而事实上，第二种类型的教学智慧在教学实践中更为常见。

从管老师的教学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其教学智慧中蕴含的几个突出内涵，即注重“整体”、“理性选择”、把握“丰富性”。

**“整体”**：“教育的大智慧是不要盯着几个学生，而是整个大的班级氛围，让那些人无所遁形。班主任要做的事是，我要让整个班级的学习氛围，人与人的冷暖，好的班级是要能把学生善的一面激发出来的，而不是把恶的一面激发出来。老师要做的是这个事情，整体的。那么，这一个两个，你给他一点空间行不行。不要天天去盯着他。在你的疏导下，他们也不会太放松了。”

在我与管老师交流和交往的过程中，我也常常会惊叹他在整体思考、系统把握问题、综合处理问题方面的突出能力，这使得他能非常恰当而有效地处理好许多事情。

**“理性的选择”**：学生早恋问题是班主任工作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对此，管老师是在课堂上直接与学生们展开理性的讨论，并引导学生在情感方面走向理性的思考和选择的。“我说，如果你知道有一个女孩子或男孩子喜欢你，你要非常高兴，因为被人喜欢，有人喜欢，这是世上最美好的事情。但是我会跟他们说，理性的选择会让你更快乐，对吧，我会问他们几个问题……”（见下文“恋爱大讨论”）“我们的氛围是好的、良善的，我们不是为了堵这个东西，我们只是来协商，来看怎么样更理性的、更好的处理更好，那最后做一个更好的选择而已。”（见上文“不欺瞒”）

**“丰富性”**：对于杨思思的早恋问题，“我是这么处理的，整体而不要局部。另外一方面，人生是丰富的，拓展的，让他的生命丰富起来，拓展开来，至于说他后来的选择，那是他理性选择的，老师为什么不支持他呢？”（见下文“杨思思的早恋”）

在谈到处理教师和家长之间的关系时，管老师说，“我觉得，第一个，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窄了，问题的丰富性，我们今天的人看问题容易窄化、简单化。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他非常简单地去处理它。不是的。你要回到复杂性本身。第二个，任何的班级一定是一个系统，学生、家长、老师、社会，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你都要琢磨考虑。学生会教育家长、家长会教育家长、老师会教育家长，好丰富啊，真的。所以要借很多的力去做很多的事情。”

4. 质性材料的呈现与讨论尚欠火候，材料的组织与讨论的交织不太合理，给人过多的访谈引述的感觉，分析与结合理论的探讨不足。

我：但是这个系统是非常复杂的呀，你怎么处理这么复杂的系统呢？

“你建一个QQ群，家长在那儿打点，复杂什么呀。一两个家长去管理就行了。你要做的只是粘上去自己在教学中的发现、感悟，教学的成绩、作品、视频等，就做这些就行了，其他就不要你做了，要做什么呢。”

从受访者的论述中，我们能发现，他的教学智慧是运用整体性教育思维，是做出理性的思考和选择，是把握教学丰富性和条理性，这三个方面包含在上面的每个事例中。由此，我们可以将教学智慧理解为，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教学言行、教学情感、教学方式等方面的选择所体现出的

恰当性或有机契合性以及高效性，它是在整体系统中实现行为的恰当性或有机契合性和高效性，是在“简单”的言行中实现教学的丰富性。但是，这些都是教学智慧在“形式”方面的解释，这些教学智慧的“形式”落实在什么上呢？是落实在学生的善和智慧、生命的意义、家长的善和智慧等方面，是为了这些方面的呈现、发现和实现，这些方面是教学智慧的内核或“内容”。从上述分析可知，教学智慧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即整体、理性、丰富、条理的思维和“良善”、“生命”、“好”，此外，教学的智慧不仅仅是教师的智慧，更有在教师的智慧或引导、或激发、或调动下的学生的智慧、家长的智慧，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教学系统当中。

## （二）“诚”与教学智慧的获得和实现

### 1. 教师与教师之间的“诚”与教学智慧的习得

入职之初的忐忑不安与焦头烂额：“大学里的所学常常理论派不上用场。到了新学校，直接上岗，除了教学本职工作之外，还要承担更多班主任工作，不仅增加了工作难度，还让我们这些新手没有喘息的时间和机会。还有就是高中竞争的环境，其实同事能够帮助自己的人很少。”复杂的工作环境、沉重的工作负担、不熟悉的工作业务使“我”和其他几位新教师常常会感到“害怕”、“狼狈”、“担心”、“恐惧”。面对这样的情景，“我”是如何处理和适应的呢？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和“我的老乡”、“我的师傅”、“我的同事”等人之间的真诚交往是“我”能够快速适应和成长的重要因素。

**“我的老乡”：**

在苦难的处境中，我认识了自己的老乡。那时，她是我们班级的英语任课老师。和她交往，她教给我很多社会的逻辑，和学校中的社会关系网，甚至讲述自己在学校的经历让我体会，慢慢地我会发现听别人讲话要听出其中的声音，校长在表扬某个人的同时，自己慢慢知道这些都是管理的技术而已，家长在你面前夸奖你，也许在背后立马告你一状。那时我的班级管理和语文教学都不是很成熟，班级管理偶尔会失控，而经验不足的自己甚至常常看到问

题却没认为这是个问题。英语科任老师帮我解决班级大小难题，在外面夸我做事认真班级管理很用心。

“我们师徒”：

我更加幸运认识了我的教学师傅。她当时担任年级组长和语文备课组长，并且是我的教学师傅。她曾经是一所学校的校长，为人处世，与人谈话，开会发言，这些能力我在她那里也锻炼了很多。

我也非常感激师傅对我教学水平的提高。师傅开始常常会说今天的课可以不听，但执拗的我一定要去听，不仅听，针对师傅某些课堂好的方面会问问师傅是怎么思考这些问题，怎么做到的。从刚开始的慢慢模仿，蚂蚁搬家，到后来自己懂得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后的不断创造。……其实做徒弟，不仅要学师傅的形，更要学师傅的神，而这些神的获得必须要彼此用语言来言说，来了解。针对某篇文本的解读，常常我要自己跟师傅讲述自己的教学思路和解读文本的方式，师傅也要谈自己解读文本的创建和遇到问题时她会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学生的学习状况分析及其教材的编写情况。

我一直感念那段日子，让我快速成长，受益匪浅。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喜欢听师傅教育我说的很多话：“徒弟，你的知识肯定超过了师傅。学历高，综合素质高，拥有的知识也高于我们。”在吃饭时常常“我徒弟……”，在开会时“我们师徒”，批评我时“如果我是你，我会……”“这么做也行，如果调整一下，这样做怎么样……”我也永远记得师傅的人格魅力。她作为备课组长，常常出月考、期中、期末试卷，因为她是出卷人，所以她的班级从来不带领学生复习。老师、学生、家长、学校，谁不在乎成绩？但是我的师傅却用自己的行为为我诠释着诚实和人品的重要性。

“我的同事”：

真正班主任的提高，得益于我的同事高老师。作为数学老师和7年的老班主任，他思维严密、对学生充满爱心而且做事严谨。我记得那时每天5：30分放学，他都在批作业和学生谈话。我会故意买份盒饭，经常在他身边，听听看看，时不时问问题：高老师，我们班级今天也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情，我是这么处理的，你怎么想？他常常会

讲述好几种做法并且都会分析利弊，这些思路的过程帮助我以后进一步学会分析，变得理性和成熟。这些交流让我在半年之后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班主任，无论班级学习和管理都在年级排名前列打下了基础。

走出那一段（艰难的）时期，（要）真感谢我的同事吴老师。他坐在我的后面，每次他教育学生，学生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面部表情非常高兴，也感觉到了方向。这一点让我非常惊讶，我偷偷准备了一本笔记本，记录他教育学生说的那一番话，结尾常常这样“我为什么要费这么多时间和你聊这么多，自己在办公室看看电脑，喝点茶不好吗？还是心疼你们，看重你们”，“你这是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你对，你什么都对，你怎么不认为某某天天好学都是对的呢？”而这些话常常在我的学生身上不断演练。我也关注吴老师在学生考试时，摆出一些非常萌的姿势，鼓励学生调节气氛。

**2.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诚”与教学智慧的培养**

**“杨思思的早恋”：**

杨思思是“我”所教的班级的一名女生，她和冯正直在“早恋”，他们有几次“竟然在班级门口摸对方的脸”，全班的同学都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许多老师也都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并对此有些意见，“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也不管一管呢？”，“我”没有去“管”，“我觉得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想谈的小孩，你怎么阻止他，他也会谈，不想谈的小孩，你怎么阻止他，他也不会谈”，那么，“我”是怎么做的呢？

“我是直接跟我们班的同学谈这些事（关于恋爱的事），包括我们班的那个女孩（杨思思），很认真的，她最后考上了中国美院。”“杨思思，这个女孩，我发现她很有绘画的天赋，我要让她不把精力都放在这些方面（恋爱），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多面的，也都具有多面的处理能力。我希望让他们也能看到这些。一方面，班级整体搞好了，另外一两个人，你可以找找他的兴趣爱好嘛。杨思思，绘画特别好，她也不会说在高中只是谈恋爱，她也会为自己高中毕业的出路而担心的呀。我说你就去绘画吧，老师支持你绘画，她妈妈就带着她到杭州学画画去了，

她学得很努力。冯正直（她男朋友），有时候会打电话给她，有时候，十二点多了，她还在画画，画到两点多，非常认真啊。小孩，真的，如果他找到了一件他喜欢做的事情，他会非常认真的去做的。冯正直，告诉我，高三了，杨思思，挺努力的，我也想认真。”杨思思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中国美术学院，冯正直只是考上了本地的一所职业大专，但他们仍然保持着恋爱关系。

“我是这么处理的，整体而不要局部。另外一方面，人生是丰富的，拓展的，让他的生命丰富起来，拓展开来，至于说他后来的选择，那是他理性选择的，老师为什么不支持他呢？我让他们爸爸妈妈到学校了，我是从来没有指责过他们的，我会告诉他们，老师是这么想的，你看你们要怎么做，他们自己内部沟通。”

**“恋爱大讨论”：**

“我自己是怎么看的呢，我觉得不能把事情简单地看成是一种早恋，它是由很多事情造成的，高压锅式的学习，社会的浮躁，人生经历的变化，学习成绩的好坏等很多（强调）方面，甚至有的学生是为了逃避学习，还有家庭影响，还有社会的耳濡目染，我个人感觉它很复杂。”

“我觉得一个班，氛围稍微要轻松些，不一定要把那个当成洪水猛兽，有了就有了，但要回答我的这几个问题。”

“我是直接跟我们班的同学谈这些事的……”

“我是这么理解，也是这么跟我的学生讲的，我说，如果你知道有一个女孩子或男孩子喜欢你，你要非常高兴，因为被人喜欢，有人喜欢，这是世上最美好的事情。但是我会跟他们说，理性的选择会让你更快乐，对吧，我会问他们几个问题，第一个，我说，如果一个男孩子喜欢你，但是，你看我说话都是针对的女生，女生好开解，男生脸皮太厚了，所以我一般都从女生入手，这是有点对性别的歧视，但确确实实是用到了一些性别的东西，那么我都在讲女生。我说，如果一个男生牵着你的手在路上走的时候，看到管老师了，立马把手一扔，我说这样的男生千万不要，太没有担当了。其实我说这些话，一方面是我真的想跟他们说的，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他们不要隐瞒我，最后出现问题。然后，我也会问学生，如果女生很好，男生很差，

你们会在一起吗？他们说我们肯定不会在一起的。那我说‘如果男生很好，女生很差，你们会在一起吗？或者两人都差呢？你们会在一起吗？’，‘不会的，不会的，那样生活太痛苦了’，‘那只有什么选择啊？’，‘两人都好就最好了’，‘哦，你们说的啊！你们要怎么怎么样……’”

“我还有个要对学生讲的是，哲学当中有五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你现在在哪里？你现在在干什么？我会说的慢一点，让他们都思考思考。我说，曾经我也和你们一样，憧憬和懵懂过。但是有一次，我爸爸带我到动物园，他跟我说，有时候你要了解动物，你看爸爸看猴子懂得的一个道理是，要矜持，你看母猴子就在最前面，让下面打、打、打、打、打，然后选一个最好的。然后我说，现在我们都看不出谁最优秀，那到大一的时候，也不一定能看出，到大三的时候一定能找到优秀的男生。我是这样跟学生们讲的，从不隐晦。我觉得公开之后，学生会跟你讲很多事情。”

**3.“至诚”、学校运行的逻辑与教学智慧的成熟**

我并不反感这些（教育中的）冲突，因为这肯定是自己对学校运作中某些利害关系把握得不够，一个好的老师，一方面要把握学校各种社会关系的运作，另一方面又要为学生的成长创造最高的教育品质，要借助家长的力量。一个只是爱学生，但是不懂得学校逻辑运作的老师，常常感到受挫，你认为的爱学生和学生心目中的老师形象是否一致，沮丧下的老师又如何成为好老师。一个懂得学校逻辑运作的老师，不懂得爱学生、搞好教学，不会有好的口碑。在中国的校园，口碑也是非常重要的评价。

在我工作的第五年，我做每件事情我都能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平衡：早晨6：30—7：20，我会找学生在班级外面聊天谈话。首先这个学生的确有烦恼，有困惑，对学生的成长有好处。另一方面，校长领导这个时间会出来巡视班级，这个时间谈话，把自己的辛苦和认真直接传递给了领导。再者，自己抓住这段时间处理问题，给自己的工作开始减负，不要把事情积压到办公室解决。

班级的收交作业我一般会放在7：30之后。从学生角度讲，班级只要有一个学生交作业在教室里走动，会影响

其他学生学习，全班都集中精力自习最后收交作业，班级的学习效率较高，还可以培养学生早晨安静的局面。另一个方面，7：30之后，领导不会再巡视班级，班级稍稍混乱，也不受影响。最后全班一齐交作业，每个学生都动起来，一般五分钟就结束，效率较高。最后大家的印象里会说这个班级老师在不在，学生的学习状况都非常良好。班级好的口碑、好的氛围，会让自己的科任老师在本班更加用心。

对于班级的管理工作，我们班级有六个值日班长，培养六个值日班长，因为班级只选一个班长，在开始的一个星期很认真，后来都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另外，一个人做班长事务繁多，也会导致学生以提高学习为名不愿意接受职务。六个班长每人一天不影响学习也有利于提高管理能力。值日班长们会负责每天班级工作的总结，会对同学们提出希望，也会对个别学生提出要求，并且激励全班前进。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天然对立，即使再好的师生关系，教师教育的时候，学生对老师的讲话也有时充满怀疑的。学生指点学生，更有说服力。另外一方面，各种矛盾的问题有值日班长那里解决一步，到老师这里也变得矛盾减少了不少。最后，好的班主任要给自己减压，学校的任务到手上，要分解任务，强化过程管理，放手学生干，学生自主，老师在学生困难时提供帮助。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教师的善良教学目的是需要通过运用教学智慧才能实现的，教学智慧是对于学校教学的各方面关系的协调和平衡，是多方面矛盾的综合化解。这里体现出的教师的教学智慧非常符合于“中庸”之道，这是在日常生活中，使自己的行为在整个社会系统中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能保持系统的和谐与平衡，这也是教师的“诚”发挥之至的结果，这种“至诚”体现在对学校系统及其相关所有主体的真实认识、理解和尊重，以及满足各方面的需要、使各方面都达到最佳状态所做出的自我努力。

### （三）由教师之“诚”到教学智慧的生成原理

教师的“诚”性与教学智慧生成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先从简单分析一些典型的教学故事来看。在处理“杨思思的早恋”事件时，“我要让她不把精力都放在

这些方面（恋爱），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多面的，也都具有多面的处理能力”，这是教师的人生观之一，教师以自己这种人生观影响学生的发展，“她也不会说在高中只是谈恋爱，她也会为自己高中毕业的出路而担心的呀”“人生是丰富的，拓展的，让他的生命丰富起来，拓展开来……”“杨思思，这个女孩，我发现她很有绘画的天赋”，这是教师对这个教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基于这种认识，教师采取的教学行为是“一方面，班级整体搞好了，另外一两个人，你可以找找他的兴趣爱好嘛”，“我说你就去绘画吧，老师支持你绘画，她妈妈就带着她到杭州学画画去了，她学得很努力”，“有时候，十二点多了，她还在画画，画到两点多，非常认真啊。小孩，真的，如果他找到了一件他喜欢做的事情，他会非常认真地去做的。”教师对杨思思去绘画的引导和支持既有效地阻止了她对早恋的沉迷，更重要的是发展了她的天赋能力，拓展和丰富了她的生命，这是教师教学智慧的真正体现。那么，教师的“诚”体现在哪里呢？

实际上，教师如果没有真心为了学生好，没有为了学生的未来生活和生命而担心，他怎么会尽心思考，为学生找出路？教师对学生的真诚和忠诚虽未直白但更深刻，教师对学生的至诚之心在其中矣！再看“恋爱大讨论”，“我是这么理解，也是这么跟我的学生讲的”，这体现了“我”的真诚，“我是直接跟我们班的同学谈这些事的……”，这种行为既体现了教师的真诚，又能激发班级的讨论和理性思考，所以是智慧的行为；“我觉得不能把事情简单地看成是一种早恋，它是由很多事情造成的”，“不一定要把那个（早恋）当成洪水猛兽”，这是“我”的理解和观念，如此才能发现早恋的真实原因，找到合适的处理方式，而不是粗暴地主观对待；“女生好开解，男生脸皮太厚了”，因而“我”都是针对女生说的，都是从女生入手，这是选择教育对象的智慧；“我”对学生的教育更充分地体现出教学的智慧，“我”不是强制打压，而是启发引导，首先“我”肯定恋爱的美好，但“我”会问他们几个问题，由这几个问题真正触动和引发学生的理性思考和抉择，并利用自己的经历形象地告诉学生对于恋爱问题应如何选择，这是“我”

教学智慧的体现，也是学生的智慧生成的过程。“我”的教育教学智慧的获得不是天生的或一蹴而就的，首先是“我”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好的教师，为了这个目标，“我”真诚地向我的老乡、我的师傅、我的同事学习，他们也很真诚地帮助“我”，正是由于这种双方的真诚，“我”从他们那里获得了许多关于教育教学实际的合理认识和有效经验，加上对学校教育教学的实际考察，再加上自己全身心地努力投入、思考和创造以及实践锻炼才逐渐形成了自己智慧地处理教育教学事件的行为模式和行为能力。当教师的“诚”“之至”的时候，就能真实全面地把握学校的教育教学，包括对学生、学校领导、家长、其他教师、学校教学制度、班级管理、教学规律等方面的综合理解和把握，从而使“我”的教学行为能有机地与这些方面接洽融合，实现各方面的协调平衡，赋予“简单的”教育教学行为以丰富的意义，使之实现更大的价值和效用。这体现在“我”把握学校运行逻辑和规律后，“我”对与学生谈话时间的选择、对交作业的时间的选择，以及设立六个值日班长的创造性管理行为，这些使“我”在恰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情，使工作井井有条、游刃有余，同时又实现了对学生的关怀，对领导的尊重，开发学生的能力，提高教学效率，降低工作负担，等等。这些可以说是教学智慧最为充分的体现和实现。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画出一个简单的由“诚”到教学智慧生成的图（见图 1），“诚”贯穿于教学智慧生成过程之始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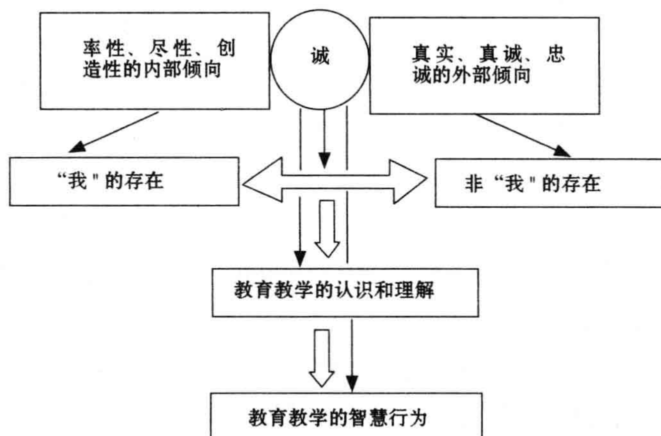



**图 1　教师的“诚”性与教学智慧的生成之内在关系**

5. 全文的理论建构与现有的研究之间缺乏互动，给人留下自说自话的印象。

“诚”：“诚”对主体自我的存在体现为充分发挥自己良善的能力和品性的倾向，即所谓“率性”、“尽性”和“创造性”的内部倾向；“诚”对于“非我”的存在则是面对真实、追求真实、真诚对人、忠诚于事的对外倾向或态度；在内外的倾向中还包含着实质性的内容，即对真、善、美、慧的追求、发现、创造和坚守的倾向，有这些实质性的内容倾向我们才能理解“诚”的内外倾向的真正内涵。“诚”是一切行为、品性、目的、意图实现的必备条件，有“诚”才有“信”，有“信”才有“行”，有“行”才能成事。

“我”的存在：教师作为一个独特的“我”的存在，有其特别的思维、性格、思想和观念，这些构成教师的一个独特的“我”的存在并成为可以与外界互动的主体性存在。在本文中，管老师突出的整体性思维能力、综合的思维方法、理性的思维品质、深刻的生命认识和生活理解、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等构成了他的独特存在，这些存在都参与到了教育教学的思维、理解和决策中。由“诚”指导的“我”的存在是其中的优良品性和能力的充分呈现和发展，这是教育教学智慧发生的基本条件和工具。

“非我”的存在：是指外在于“我”的存在的一切其他人、事、物，包括学生、家长、其他教师、学校领导、教学制度和规范、学校教育制度和规范、社会、文化，等等。由“诚”指导的“我”对“非我”的存在的认识和理解是更为真实和深刻的理解，使“我”能不带偏见的认识人和事，使“我”能够发现人、事、物中的真、善、美，从而知道应避免的、远离的情况和应利用、可利用的信息和资源，这是教育教学行为的基础。

教育教学的认识和理解：“我”的存在与“非我”的存在的相互作用形成教师的教育教学认识，这是教师对于教学目的是什么、教育的意义是什么、学生是什么样子的、好的教学是什么、好的教师是什么样子的、好的班级是什么样子的、当前的教学情境是什么、如何理解这个教学事件、面对的教育教学问题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和问题等问题的解释和理解，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一个教师来说都是非常具体的，是根据他的亲身实践、学习和经历获得的，是直接影响着他的教学行为的思想观念。“诚”

保证教师的教学认识和理解是真实的而不是主观臆断的，是真诚的而不是虚伪的，是具有个性创造性的而不是简单模仿的。

教育教学的智慧行为：教师的教学智慧具有明显的自我特色，可以说是教师好的个性、思维、观念、品性的综合外显，同时教师充分认识了环境中的人、事、物，创造性地将教师自己与教学情境、学生特点、学校系统、家长群体等方面有机地融合起来，使教学言行举止、教学情感表达、教学时间的安排、教学方式组织和选择等体现出的恰当性或有机契合性以及高效性，在整体系统中实现行为的恰当性或有机契合性和高效性，在“简单”的言行中实现教学的丰富性。教学智慧的目的和标志是教学中的真、善、美、慧的充分激发，而“诚”的实质性内涵正是对真、善、美、慧的追求、发现、创造和坚守的倾向，我们可以说，正是有了“诚”，才有了教学智慧的发现和实现。

综合而言，“诚”是对真、善、美、慧的追求、发现、创造和坚守的倾向，“诚”的倾向使教师发现并发挥真的、善的、美的、慧的个性化自我，使教师发现周围人、事、物中的真、善、美、慧的因素，从而形成良好的教育教学认识，找到教育教学的有效路径，最后通过智慧的行动实现教学之真、善、美、慧，实现教师的真、善、美、慧。就本研究而言，管老师成功地解决了杨思思的早恋问题，是因为他发现了杨思思的优良天赋——绘画能力；他成功地解决了不成熟的学生们对恋爱的懵懂，是因为他承认爱情的美好，同时又激发了学生的理性思考；他成功地解除了学生对他的怀疑，是因为他表现了诚实品性的可贵，并激发了学生积极的思维和智慧；他成功地协调了教师、学生、家长、学校之间的关系，是因为他把感动、成功和美传达给了每个相关主体；他的成功是因为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善于整体系统思维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真诚的品格、与人为善的处事风格等优良品性，还因为他积极吸收了他周围人的教学智慧和良好品德。

[ 参考文献 ]

安乐哲、郝大维著，彭国翔译（2011）：《切中伦常〈中庸〉的新诠与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向明（2000）：《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程广文、宋乃庆（2006）：“论教学智慧”，《教育研究》，第 9 期，第 30–36 页。

杜萍、田慧生（2007）：“论教学智慧的内涵、特征与生成要素”，《教育研究》，第 6 期，第 26–30 页。

鲁芳（2004）：《道德的心灵之根：儒家“诚”论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卢风（2005）：“‘诚’与‘真’：论儒家之‘诚’对当代真理论研究的启示”，《伦理学研究》，第 9 期，第 35–4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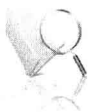
刘旭东（2010）：“问题意识与教师教学智慧的生成”，《课程·教材·教法》，第 5 期，第 104–108 页。

潘俊臣、张家秀（2010）：“诚实是根本的教学智慧”，《教育科学论坛》，第 11 期，第 31 页。

马克斯·范梅南著，李树英译（2001）：《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王鉴（2006）：“教学智慧：内涵、特点与类型”，《课程·教材·教法》，第 6 期，第 23–28 页。

燕镇鸿（2010）：“教学智慧研究的价值、进展与趋势”，《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5 期，第 91–96 页。



## 文末“评”

这是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作者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诚”的概念引入现代教育讨论中，并探讨以“诚”为核心的道德品质与教师教学智慧之间的关系。这种将传统思想范畴中的概念与现代教育问题探讨相结合的研究是一种新鲜的尝试。现代教育学起源于西方，当前我们所熟悉和占主导地位的教育学也是从西方引进，包括本领域中一整套概念体系和学术话语。而作者试图以“诚”的概念为基础解释教师的道德品质与教学智慧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本土文化对西方教育概念体系的解构与重构尝试。然而，作者研究中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给这种解构尝试带来困难和挑战。

研究最大的问题在于研究方法、论据与论点之间的脱节。本文研究问题是教学中的“诚”与教学智慧是否存在以及存在怎样的关系。某种意义上，研究问题的提出方式具有更多的理论辨析的意味，然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作者选取了质性研究的方法，采用访谈法对一位高中语文教师进行了个案研究。这样一种问题与方法的错位，给研究带来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研究问题无法很好地引领研究过程的展开，比如，由于本研究问题提出的首要基础在于作者从中国传统思想中试图引入现代教育讨论中的“诚”这一概念的界定和辨析，而这种辨析可能本来就有必要进行专门的研究。我们看到，由于缺乏这样的理论研究，作者在进行访谈时，不得不避免向参与者提及“诚”这一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导致在后面的分析中，作者关于“诚”与“教学智慧”关系的分析，给人留下较为牵强的印象，也即作者从参与者的谈话中不断地根据自身的需要“解析”出所谓“诚性”的因素，而并非受访者关于这一概念的反思与理解。另一方面，研究论据无法为研究论点提供足够的支撑。作者对于访谈的大量引用，对于我们理解参与者的教学技巧，具有一定的帮助，但对于我们理解“诚”与“教学智慧”之间的关系，却显得不足。读者更多地感到作者不断地把自己关于教学“诚”性的理解附加到对受访教师谈话的诠释之中，而不是真正从访谈材料中得出论点。某种程度上，访谈引用成为作者展开自身论点的装饰性材料，目的不过是使得研究看起来更具有“实证”的意味。

建议作者再考虑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的关系，依据现有的研究问题，建议作者尽可以开展专门的概念辨析和理论探讨，而不必拘泥一定要为研究加入实证维度，对于将传统中国思想概念引入当代教育研究的新鲜尝试，这可能是首要的和更加重要的任务。



## 学生回应

首先，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给予的宝贵意见，其中有些确实切中要害，研究中的许多地方确实做得很不充分。本研究是在学习一门质性研究方法课程的过程中逐步进行的，对于质性研究方法笔者是初次接触，此前并没有了解过、学习过质性研究方法的相关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笔者在学习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使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不易，笔者学习得也非常浅薄，还处于研究的模仿阶段，努力做到“像那么回事儿”，尽管本文可能连像都不像，可谓漏洞百出，弊病随处可指。对于专家给本研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笔者但以几个问题的探讨与专家、读者一起思考商讨。

（1）质性研究方法的陈述语言是否必须是文学性的、文学化的语言？我们一起学习的几个同学曾谈到这样一种共同的想法，即学中文的学生使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或许会更适合、更有优势，这种观点或许有些偏颇，但可能也正反映了质性研究方法在描述时表述的一个特点。本文在行文表述上确实没有非常明晰、生动地把故事和关系呈现出来，依然带有浓重的“思辨习气”。如何进行质性方法的写作和呈现，这是笔者需要进一步深入学习的，但笔者不接受专家所提到的这个观点，即“作者关于“诚”与“教学智慧”关系的分析，给人留下较为牵强的印象，也即作者从参与者的谈话中不断地根据自身的需要“解析”出所谓“诚性”的因素，而并非受访者关于这一概念的反思与理解。”对此，笔者自认为问心无愧，或许在文中有自己的理解，但绝非单纯地根据自身需要解析所谓诚性的因素和概念。

（2）质性研究方法的研究者是否应该在研究中有自己的预设？

反思自己的研究，笔者确实在研究之前和之中都存在着一种预设，即教师的诚性与教学智慧之间是存在联系的，并且更具体地说是存在积极联系的，笔者对于“诚”的理解也有自己的基本理解。但笔者曾“打心眼儿里”自我反省过，笔者确实并未将自己的理解强加给研究对象，或者只是为了利用研究对象的材料来“装饰”自己预设的思想框架。如果说在研究中笔者有自己的思想痕迹的话，那是笔者在研究对象的描述当中兴奋地发现了与自己的理解相一致的地方。但是笔者愚笨，没有用质感的语言和用质性的方法把它们恰当明白地表达出来，而在资料上进行了一顿“抽象的”“思辨”和“拼凑性”的“主观自我”表述，而且很没有表达清楚。但请恕笔者固执，笔者并不认为自己的研究和观点是在牵强附会，如果读者能够认真体会文章的材料和观点的话，我想是可以体会出来的。此外，质性研究方法要不要思辨？要多大

程度上、什么类型的思辨？笔者的理解是质性研究方法似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中观层次上的理论研究和建构，因而一定水平上的抽象性概念还是必要的，否则全是本土话语的白描，那其理论意义何在。

（3）质性研究如何实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对话？在研究成果的呈现上如何体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视域融合？本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做得不够，在实现双方的切实对话和有机融合上做得不太好。目前笔者能够想到的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资料搜集不充分，因而资料之间缺乏足够的、丰满的信息来显现其中蕴藏的联系；二是文章的组织和写作技巧不熟练，不能明晰地呈现文章的意旨和结论。当然，肯定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导致这种问题的存在，笔者或许能在更进一步深入的学习中发现。

不知道以上回应算不算是一种自我辩解，严格而言，本研究是一篇很不完整的质性研究，甚至可能就不是质性研究，望明眼的专家和读者们给予批评和指导。

---

## 点评专家杜亮简介

杜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和兴趣为教育社会学和教育人类学。2008 年毕业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获取教育社会学方向的博士学位。在其毕业论文的基础上，2010 年由美国 Lexingdon Books 出版社出版了个人专著 Learning to Be Chinese Americans: Community, Education, and Identity. 该书运用人类学方法，重点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中产阶级华人社区中的教育理解和实践，及其与变化中的中观及宏观经济、政治、文化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近年来，围绕全球化、教育即社会变迁等议题，杜亮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杂志期刊及重要学术会议上发表了一系列相关学术成果，包括 The Urban Review, AERA, ECER, 以及《教育学报》《比较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等期刊、会议，探讨了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认同、民族身份建构、阶层变迁及教育平等等重大学术议题。

# ××开放大学（总部）教师角色扮演及互动个案研究

文／张遐[1]
评／贺晓星

［摘要］本文选择某开放大学总部3位教师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她们角色扮演及互动的现状、特征、影响因素等。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综合采用访谈、观察、实物收集等方法，借助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理论流派的角色理论，结合资料，形成某开放大学总部教师角色扮演及互动的扎根理论。通过对资料采用类属分析，得出“某开放大学总部教师角色扮演现状、特征、影响因素；角色互动现状、特征、影响因素；自我角色认知、他人角色认知、学校组织因素”等方面的结论。

［关键词］开放大学　教师　角色扮演　互动

［1］张遐，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兴趣：远程教育教师职业与角色。

文中“点”

1. 这是问题意识，似乎重在让读者知道差异。

2. 想要研究的问题，和“转型”有关系吗？

3. 此段点明了三个关键词：角色扮演、角色互动、影响因素。有没有说明为什么是“总部”的研究？仅仅是因为作者是“总部”的教师？

4. 属于教师角色研究。又有“远程教育”的个性。

5. 不知本文是什么性质的论文，一般论文会对文献介绍做更为详细的展开。如果是课程论文，篇幅要求不多，倒也可以。

## 一、研究问题及源起

笔者在 ×× 广播电视大学（现已更名为 ×× 开放大学）工作近十年，深深感受到该校教师的角色扮演及互动和普通高校教师有显著差异，体现在其角色职责纷繁复杂，角色扮演需要与“合作高校专家、同事（含管理人员、教师）、分部教师、学生”等开展多层级、多方位、现实和虚拟结合的互动，角色扮演及互动效果会受到“教师个人、互动他人、学校、社会环境及技术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在广播电视大学向开放大学转型的阶段，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开放大学教师角色扮演及其互动的现状、特点，揭示影响教师角色扮演及互动的若干因素，为教师在学校转型过程中更好地扮演角色和开展互动提供启示和借鉴。

本研究拟选取 ×× 开放大学总部 3 位教师为案例，从社会学符号互动论角色理论视角出发，研究“×× 开放大学总部教师角色扮演、互动的现状、特点及影响因素”。具体回答如下问题：① ×× 开放大学总部教师角色扮演的现状和特点如何？② ×× 开放大学总部教师角色互动的现状和特点如何？③影响 ×× 开放大学总部教师角色扮演及互动的因素是什么？

## 二、文献综述

经查阅相关文献，教师角色研究是一个较热门和庞杂的话题，涉及“角色知觉与认同、角色交往、角色困顿与校正、角色冲突、角色转变”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远程教育教师角色既有大学教师角色共性，又有其自身特性，例如：教师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导学、助学、支持与管理”等方面；教师角色由个体工作向群体协作转变；教师“作为资源的提供者、设计者和导航员；作为学生自主学习的指导者、学生建构知识的帮助者、学生获得有效学习资源的指引者；负责网络导学与交互、媒体设计；承担资讯顾问和辅导”等。远程教育教师角色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师知识和能力研究 (Mishra and Koehler, 2006)、（陈丽、冯晓英，2012）、（李爽、陈丽，2004），教师角色行为分析（翁朱华，2012），教师角色定位研究（倪玉兴，2008），信

息技术与教师角色转换研究（林生传，2007）、（邹立森，2006）等领域。

关于远程教育教师角色的已有研究，学科视角不甚明晰，多从远程教育的特征、远程教育理论（教与学理论）、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与网络辅助教学环境等出发，探索远程教育教师角色和传统学校教育中教师角色之间的差异，探讨远程教育教师角色的应然状态，是借用角色理论的一些有关角色的术语开展的简单经验总结式研究。从研究方法上来考察，已有研究多属于经验总结式和简单思辨式研究，只有少数明确利用质性研究方法或量化实证研究法得出研究结论。

##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研究“××开放大学总部教师角色扮演、互动的现状、特征及影响因素”，尝试通过对研究个案角色扮演、互动的现状和特征的分析，找出影响其扮演和互动的因素。

本研究根据目的性随机抽样原则，选择××开放大学总部3位教师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简况如下：

| 研究对象 | 年　龄 | 职　称 | 性　别 | 专　业 | 现是否承担行政职务或其他社会工作 |
|---|---|---|---|---|---|
| 教师A | 59岁 | 副教授 | 女 | 中文 | 否 |
| 教师B | 47岁 | 副教授 | 女 | 教育学 | 否 |
| 教师C | 39岁 | 副教授 | 女 | 医学 | 是 |

研究者在进入研究情境时，寻求局内人的支持（征求学校人事处负责人关于抽取哪些教师作为研究对象的意见），在征得每位研究对象同意后进行访谈（设计访谈提纲）、整理访谈资料（反馈给对方，征求意见），观察研究对象工作，收集和研究对象相关的实物资料，整理与分析资料，根据研究视角解释资料，成文后反馈给研究对象确认并修改。

6. 以下两处呈现的是本文的具体调查内容。

采用开放型和半开放型访谈，设计简要的访谈提纲，访谈××开放大学总部老、中、青共3名教师（各访谈一次）对“角色扮演现状、感受、角色互动体会、扮演及互动中的问题、自我对角色的认知、对学校相关环境因素的认识”等。

采用参与型观察，观察 ×× 开放大学总部某系（教师 B 和研究者本人所在的系）4 位教师（在同一个办公室）从事的教学工作及互动情况并做记录。具体观察“做了哪些业务工作、相互间开展了哪些交流、教师的表情及流露出的情感表现、办公室人员流动、办公室工作环境”等。共计观察三次，每次一小时左右（工作日上午 9–10 点）。观察过程如有必要随时加以询问和讨论，以求确认。观察同时或事后做记录，每次观察完之后撰写小结。

围绕观察和访谈的对象，收集其教学工作相关实物资料，如“教师组织编写的文字教材、网络课程、个人教学反思、年终总结”，为分析其角色卷入程度、角色自我认知、学校影响因素等提供参照；围绕学校对教师的角色定位，收集学校有关教师队伍建设的文件、与教学和教师管理相关规章制度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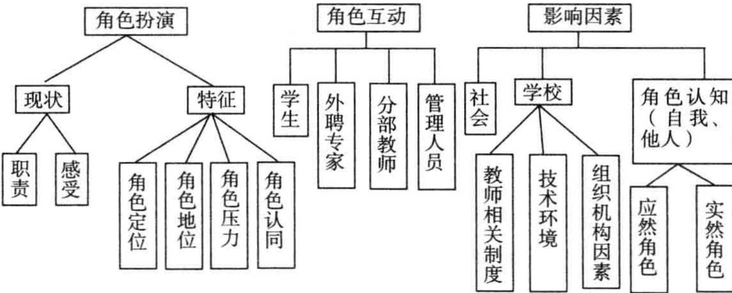
## 四、资料分析与解释

### （一）资料分析

对整理的访谈资料进行三级编码，编码图如下。在每一个编码中寻找和提取本土概念、建构概念及相互关系，形成扎根理论（陈向明，2000：332）。

7. 总的来说，扎根理论不是理论而是分析方法。如果本文的分析主要采用的是扎根理论的方法，可考虑在研究方法部分对扎根理论作更详细的介绍。

8. 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有时候图表越复杂，越影响阅读。




对资料分析主要采用类属分析，按照“角色扮演”、“角色互动”、“影响因素”等类属分析，“角色扮演”分析其“角色扮演现状”和“角色扮演特征”。“角色互动”分析其“与学生、合作高校专家、学校管理人员、同事或分部的教师”互动的现状及特征。分析“学校组织对教师的角色定位、评价机制等”学校组织因素、“自我角色认知、态度、评价”、“他者对教师的角色认知、态度、评价”、社会环境等对

教师角色扮演及互动的影响。

以下是资料分析的维度：

## 第一部分　角色扮演及互动

表 A–1　角色扮演现状及特征

| 研究对象 | 角色扮演现状（本土概念） | 角色扮演特征（本土概念） | 影响因素[1] |
|---|---|---|---|
| 教师 A | 服务型 | 1. 技术应用压力和困难；2. 编写的教材和学生实际有脱节情况；3. 创造性开展工作受限；4. 缺乏与学生直接互动 | 1. 年龄因素；2. 技术应用的难度；3. 资源建设缺乏学情调研；4. 聘请主编主讲缺乏对学情了解 5. 学校严格工作流程和规范对教师工作创造性的限制；6. 学校定位总部教师并不直接面向学生 |
| 教师 B | 打杂、万能胶、眉毛胡子一把抓、忙忙碌碌、有求于人、失落 | 1. 跨学科、专业性差、知识学习压力大；2. 上下沟通犯怵；3. 某些工作要求无法落实；4. 工作头绪多、行政性事务多、主要精力没放在专业发展上；5. 工作处于胜任而非胜出状态；6. 很少和其他教师开展协作 | 1. 学校要求教师负责多门课程（而这些课程又不一定全属于某一个学科专业群）；2. 太多的管理部门带来沟通协调工作多、性格因素；3. 系统分级办学体制导致总部不直接面对学生；4. 教师精力分散、校方对教师专业发展支持不够 ;5. 课程项目管理制 |
| 教师 C | 茫然、跨学科、自己先学习、四分五裂、小职员、配角、紧迫感 | 1. 角色模糊、迷失、困惑、身份认同危机和无助感，角色支持有限；2. 职业惯性和角色转换间的冲突；3. 角色多而乱、精力分散、无主干成长方向；4. 角色地位低、属于执行性角色；5. 跨学科学习压力大；6. 如何在有限学时开展有效教学的困惑；7. 管理角色和教师角色间冲突；8. 尴尬而挑战的管理角色 | 1. 学校对教师的角色适应性教育不够、对远程教师职业特点研究和宣讲不够；2. 校方没理清教师的定位、校方重行政而轻教学；3. 教师成长的主导方向不明显；4. 教师人员数量和承担的工作量不成比例，双肩挑教师职责超载；5. 基层管理者所得赋权甚少 |

[1] 分析影响因素时时根据访谈文本、结合实物资料（课程标准、课程资源建设规定、教学过程管理规定等）、结合本人经验，总结出可能的原因。

角色互动资料分析结果请详见结论部分“表 R–2 角色互动现状及特征”。

### 第二部分 角色扮演、互动的影响因素

角色扮演及互动受到自我角色认知、他人角色认知与确认、学校整体定位及对教师的定位、学校规章制度、工作设计、课程资源建设机制、课程管理机制、教师评价机制等的影响（“教师的自我角色认知”资料分析结果详见结论部分表 R–3、“他人的角色认知及回应”资料分析结果详见表 R–4）。

9. 这好像是研究结论，位置应该放在后面去。

整理的访谈资料中，访谈对象对“社会环境”对教师角色扮演及互动的影响谈及较少，这里不做系统分析。但访谈对象在分析角色扮演的困难或问题时，都谈到了对学校组织本身的许多看法，见表 A–2。结合上文分析，可以说影响教师角色扮演和互动的因素有：分级办学体制导致的系统间职责分工、官僚制（行政性）机构设置、学校组织定位、行政管理教学的权力架构、课程项目管理制度、教学管理制度、资源建设机制、学校师资配备和对教师的工作量要求、学校对教师角色的规划与定位（职责、义务规定）、工作流程与工作设计、校方角色支持、角色适应性教育、教师评价机制、教师自主权限、教师相关的制度等，都对教师角色扮演及互动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10. 在罗列因素。

**表 A–2 学校因素**

| 研究对象 | 对学校的体认 |
| --- | --- |
| 教师 A | 管理系统强大；对教师制定限制性规定、惩罚性规定；主要依靠外请专家；注重前端资源开发；制定严格的工作流程和规范；不直接面对学生 |
| 教师 B | 部门要求不统一，需作大量沟通联络工作；和普通高校教师不一样的教师定位；教师定位模糊不清；教师角色地位低；有些“教师职责和义务”规定不现实、没法实现；课程项目管理制阻碍教师分工协作；教师评价重资源建设忽视对学生的教学影响 |
| 教师 C | 管理型大学，为教师服务的意识不强；缺乏对教师角色的规划、定位不清晰、随意性大；资源建设机构和人才培养机构的距离；对教师的定位没有从育人层面出发；教师极度模块化、标准化工作；技术应用要求不明晰；教师教学自主权少；对教师有虚设门槛 |
| 与教师 A 合作的普通高校教师 H | 开放大学应建设自己的教师队伍，给自己的教师成长的机会；如果以聘请兼职教师为主，不利于教师队伍稳定，工作没有保证 |

### （二）资料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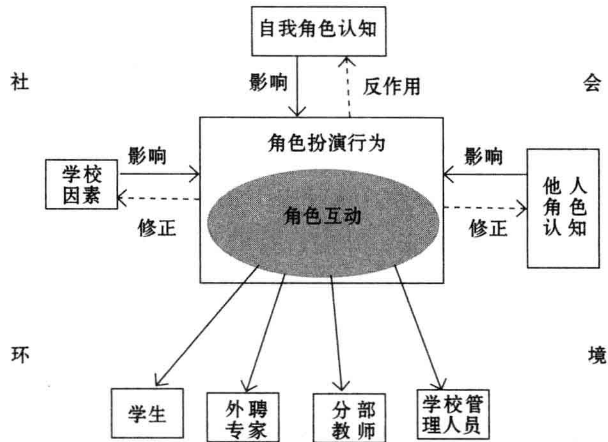
根据社会学的角色理论，尤其是特纳的角色理论（邱泽奇、张茂元，2006:366–368），角色倾向于随预设角色行动或行动环境的持续改变而改变的趋势（即角色调整和校正）。行动者趋于努力减轻由于角色矛盾、冲突和角色不适而引起的角色紧张，并提升对重要角色的满足感。

11. 这段话应该是有语境的，用在这里不妥。

符号互动论认为，个体与角色期望的关系已从封闭的或固定的变为“开放的”或“松弛的”；角色扮演者的性质已从被动的变为“较主动的”或“并非仅仅是被动的”；对角色扮演者的要求也已从必须符合角色规定推进到必须“创造”角色。

根据符号互动论的角色理论，角色是互动的框架，互动是角色领会和扮演的连接点。互动就是角色领会和建构。互动的产生和维持有赖于自我与他人角色的形成与确认（确认过程有内、外部标准）。当角色和自我认知（尤其是应然角色）相一致时，引发角色扮演行为，当角色和自我角色认知不一致时，导致角色远离（突破），或者创造新角色。外部标准包括重要人物、相关群体、或者一般认同标准对角色的评价。自我角色一定程度上是对他人角色的适应和领会。行动者角色履行的充分程度，决定了他人对其的反应和回应程度。如果在互动中得不到他人确认，则影响行动者之间持续互动，有可能会出现角色校正。

根据符号互动论的角色理论，再结合远程教育教师角色扮演、互动的相关对象，建构出“远程教育教师角色扮演、互动及影响因素模型”如下图：即角色扮演离不开角色互动，× 开放大学总部教师主要与“合作的普通高校教师、分部教师、总部同事含学校管理人员、学生等”开展角色互动。教师的角色扮演及互动受到“自我的角色认知、他人角色认知、学校组织等”相关因素影响，同时角色扮演（及互动）反作用于“自我角色认知、他人的角色认知、学校对教师的角色定位及相关组织因素”，必要时起到修正角色认知和学校角色定位的作用。并且“自我角色认知”、“他人角色认知”、“学校角色定位”等相互影响。




教师角色扮演、互动及影响因素模型图

### 1. 角色互动与回应

| | 与他人角色互动及他人的回应 |
|---|---|
| 教师 A | **合作高校专家**：尊重合作专家、虚心向专家请教，与其进行学术、生活等沟通，双方合作较愉快。高校合作专家乐于**帮助**、**指导**其统稿、帮助其对学术内容把关。<br>**分部教师**：喜欢和分部教师接触，分部教师向其**反馈**对教材的意见和学员实际情况，从分部教师那里学到许多知识，和分部教师建立朋友般关系。 |
| 教师 B | **合作高校专家**：和合作高校专家沟通不是学科内容联系，而是人际关系联系，感觉地位很不对等。<br>**学校管理人员**：需要与管理部门进行沟通协调，沟通中受委屈，感觉跑来跑去解决不了问题，把许多精力浪费在无谓的行政性事务上。<br>**分部教师**：对分部教师不了解、不常沟通，想沟通时找不到人。尤其是学生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分部教师往往以“没有学生、需要再往下沟通”为托词，婉转拒绝其倡议。于是一些工作常常得不到落实。<br>**学生**：学生不是基于工作困惑和问题来学习，而是任务驱动学习，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把前面同学的帖子转过来充数，教师也只能应付式回答，感觉很失落。 |
| 教师 C | **合作高校专家**：与高校专家充分沟通、确认，合理分配工作量，使主编、主讲教师不忙、不乱，有备而来、满意而走。<br>**同事**：和老教师经验交流，试图找到自我角色定位。她承担管理职责后，发现同事间是一种挑拣式伙伴关系，而自己随时还要迎接许多上级的命令和指示，感到角色尴尬和挑战，是一种带着困惑的敢于承担。<br>**学生**：到某开放大学教学点担任兼职教师，了解到学生最关注通过考试。随着学员学历层次提升，慢慢提出了学习要求。兼职教学使其找到自己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工作出发点。 |

### 2. 角色距离与调适

（1）教师 B 感受到的角色距离

根据符号互动论的角色理论，互动就是角色领会和建构。互动的产生和维持有赖于自我与他人角色的形成与确

认（确认过程有内、外部标准）。扮演一个与自我观念（角色自我认知）不相符合的角色时，行动者会感到角色距离，会显得有些生疏和鄙视。

例如，教师B认为“这种跑来跑去、上下联络根本就没有意义和价值；教师既要做教师，还要编制教学文件、做会计、出纳，还要安排会晤，觉得根本就不像教师职业”，于是她对此角色比较抗拒，对其冠以“不是纯粹的教师、太能干了、万能胶”等本土概念，并且也表达了自己对这种角色的不满。教师B还谈到了学校要求教师保证网络课程的点击率、监控学生完成作业，自己由于不直接面对学生，需要通过分部教师来向学生提出要求，感觉很为难，无法落实。再者，她比较了自己先后在不同学校任职的经历，谈到了心理的落差、距离感。此外，她对成为“远程、学科双料专家”的角色定位表示太理想化，设想如果给她们简化行政事务，在实践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倒还有可能。

我们需要编制教学文件、和相关学科专家打交道，和纯粹的教师职业不是一回事（编码：角色—自我认知）。我们不仅开会要起草通知、上报，还涉及安排会议、酬金都要自己做，感觉我不仅是教师，还是会计、出纳什么都要管。有时候觉得我们特别“能干”，可能了，像“万能胶”，什么都能干！忙着干这些跟专业无关的工作……

学校要求网络课程点击率，要求学生在上面做作业，要我们了解学生的反馈，可我控制不了，我给分部老师提出要求（如要求学生上网学习），但他们可以婉转拒绝我的要求（分部教师说他们目前没有直接的学生，他们需要再往下沟通，于是不能落实），我觉得很有压力、困难……

我对工作总体评价不满意。过去我很大满意和肯定，来自于学习者。现在跟学生分割，现在我如何肯定自己？靠做的课得个什么奖！但这种机会较少。过去所在的大学，学生下课喜欢到我家里聊天。学生功底好，练习三笔字，表现突出，学生是佼佼者，我自己很有成就感。现在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就是“提问题、回答”，而且问题就是应付式的，感觉很失落……

做“远程专家、学科专家”双料专家的提法比较理想化，绝大多数教师不可能。绝大多数只是在胜任的层面，不是

12. 字体不一样是表示这些都是访谈记录的原话么？这些原话很重要，是研究结论的重要论据。质性研究的一个很重要技能就是看会不会把“原话”（当然也可以是别的原始资料）当作论据来用，这显示研究者的学术功底。

胜出层面。远程教育专家，我们不是学技术出身，不占有优势。学科上我们也不占优势，有的甚至跨学科，能成为专家难度很大，尤其一人同时负责很多门课程……

说了很多困惑、无奈。这些行政事情是否能够给我们简化一点，虽然我们不一定能成为高校专家，但也许我们会在实践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可以和专家相得益彰、互相补充。现在我们花的很多精力不在此方面（专业实践），把时间放在完成课程附带的工作。任务驱动型表现得比较明显……

（2）教师 C 感受到的角色距离与调适

角色确认的外部标准包括重要人物、相关群体、或者一般认同标准对角色的评价（即他人角色认知与确认）。教师的重要相关群体，学生、同事、合作伙伴等对我们的要求和评价，会影响自我角色确认和调适。

教师 C 还谈到了在与学生互动过程中，当大部分学生的学习动机只为了通过考试时，师生间交互仅限于“学习重、难点辅导”层次，她感到比较累、困惑；随着学员学历层次提升，开始有一些同学想学东西了，于是她决定针对这些学生的特点开展适应性的教学。并且在面授教学过程中，在与学生交互过程中，C 越发发现育人目标比单纯的资源建设目标更重要。

教师 C 在面授教学实践体会中，通过与学生互动，逐渐认识到“总部教师不直接面对学生，不了解学生学情”，“只注重资源开发，不注重对学生人才培养效果”，“只注重对学生学习重难点辅导，不注重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引导”的功利式工作定位是有问题的，产生了角色困惑，表现溢出于角色之外的新增的自我特征，并努力进行自我角色调适和对学校角色定位的反思。教师 C 在访谈中谈到了角色突破，虽然强调了角色突破和角色惯性的矛盾、角色突破的迷茫和找不准突破口等，但这毕竟代表了她对现有角色扮演问题进行的反思、超越构想。

2006 年我去系统某个办学点锻炼，担任一线教师的教学工作，感觉课时少、和同学的交互仅限于（学习重难点）辅导层次，比较累，也比较困惑，短时间内讲解什么最适合？怕误人子弟。我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发放问卷，问他们需

要讲什么内容，是“传统章节、提炼重点、还是针对性辅导（试题）”？同学回答：通过考试！后来慢慢随着生源层次提升，他们逐步提出一些学习要求：不仅仅要求通过考试，而且也想学一些东西。通过和学生交流过程我逐步思考应如何针对学生的岗位需求来开展教学和制作资源……

学校认为我们就做好课程资源建设层面的工作就行了，做好课程资源设计者、制作者就行了，做好前端的一个模块就行了，没提升到育人层面，而其实培养什么样的人、育人目标是很重要的。普通高校全职教师身份也是综合性的，不是极度模块式的工作，也是围绕某专业的课群在做工作，所以用简单课程分割式的思路来划分教师的功能和角色是不现实的，教师工作应该是多元化、综合的，应该给教师一个选择的空间。

转型期存在一个大学教师身份的正身、认同问题，感觉自己过去不像教师，像个小职员，但时不时还想有角色突破，所以就会有困惑。学校应该把更多发展的权利和空间给教师，让其在锻炼中成长（担任主编、主讲）……我们的学校应该从管理型模式提升到真正大学模式。

13. 像这样的访谈材料，跟学校的“转型”是不是能够联系起来讨论？跟“总部”是不是能够联系起来讨论？

经历 5、10 年可能会需要一个角色校正过程。一直在思考“我是什么样的教师、我能成为什么样的老师、我想成为什么样的教师”问题。感觉自我陷入一个角色怪圈，感觉越来越错综复杂，随波逐流，理不清楚了，不清晰了，再次突破的点没找准。

## 五、结论

### （一）××开放大学总部教师角色扮演现状、特征及影响因素

表 R-1 角色扮演

| | 角色扮演 |
|---|---|
| 现状 | 为分部师生提供服务；常常需要跨学科开展教学工作；借助于合作高校专家完成资源建设任务（有求于人、像专家秘书）；行政性事务（上下沟通）较多、属于执行性角色；工作头绪多、杂乱（打杂的、四分五裂、万能胶）、忙忙碌碌工作。 |

续表

| | 角色扮演 |
|---|---|
| 特征 | • 知识和能力因素导致如下特征：<br>1. 技术应用压力和困难；2. 跨学科、专业性差、知识学习压力大（二人次提到）；3. 上下沟通犯怵；4. 职业惯性和角色转换间的冲突<br>• 工作体制、机制导致如下特征：<br>1. 编写的教材和学生实际有脱节；2. 缺乏与学生直接互动；3. 某些工作要求无法落实；4. 如何在有限学时开展有效教学的困惑；5. 很少和其他教师开展协作；6. 行政性事务多、主要精力没放在学科和专业发展上；7. 管理角色和教师角色间冲突；8. 工作处于胜任而非胜出状态<br>• 工作权限导致如下特征：<br>1. 角色地位低、属于执行性角色；2. 创造性开展资源建设和教学工作受限；3. 尴尬而挑战的管理角色<br>• 校方角色定位和环境导致如下特征：<br>1. 角色模糊、迷失、困惑、身份认同危机和无助感，角色支持有限；2. 角色多而乱、精力分散、无主干成长方向 |
| 影响因素 | 知识、能力、年龄、个性；分级办学体制、官僚制（行政性）机构设置、行政管理教学的权力架构；资源建设工作机制、课程项目管理机制、工作流程和规章制度；学校对教师的师资配备和工作量要求、角色定位、校方角色支持、角色适应性教育。 |

## （二）××开放大学总部教师角色互动现状、特征及影响因素

**表 R–2　角色互动**

| | 高校专家 | 分部教师 | 学生 | 管理人员 |
|---|---|---|---|---|
| 互动现状 | 合作带来伙伴意识和进步意识；更多人际关系联系、非学科内容联系为主；优势地位——整合和秘书地位；主要是“沟通——说服——理解——接受”机制 | “宏观设计、具体设计”的职责划分；以知识和情感互动为主、为其提供服务和帮助；同事和朋友关系；共同参与课程教学团队带动个体成长 | 指导学生自主学习；大部分交互仅限于“答疑和重难点辅导”层次；针对想学东西的同学，开展适应性教学 | 教师进行上下沟通协调、沟通中受委屈、跑来跑去解决不了问题 |
| 互动特征 | 学术地位（工作地位）不平等、心理不对等、有求于人 | 沟通效果不好；有时候想找人帮忙找不着 | 学生拿学历、文凭应付；教师据猜测提供资源；学生应付式提问——教师被动地回答 | 教学和行政力量冲突、地位不对等、专业教学自主权限缺失、沟通事务消耗教师大量精力 |

续表

| | 高校专家 | 分部教师 | 学生 | 管理人员 |
|---|---|---|---|---|
| 影响因素 | 资源建设机制；开放大学教师和普通高校学术水平的差异；高校专家和开放大学教师工作立场的差异 | 总部和分部学校关系松散度、双方职责和义务清晰度；沟通机制和激励机制；分部教师角色现状 | 社会人才评价机制；学生的工学矛盾、生存状态；学校考核学生参与性学习的制度；教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程度；教师主动性和责任意识 | 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原型、管理机构强势 |

## （三）其他相关影响因素

### 1. 研究对象的自我角色认知

**表 R-3　自我角色认知**

| “现实自我”（实然角色） | “理想自我”（应然角色） |
|---|---|
| **1. 角色主要职责认识**：编教材和建资源基本称职；工作杂，像万能胶；主要精力放在整合、沟通、协调（“跑来跑去”）上，而非专业发展上<br>**2. 角色地位认识**：角色弱小、角色地位低，被动扮演“小职员”、“秘书”等执行化角色、无主动性发挥空间<br>**3. 角色缺陷认识**：对学科发展前沿把握不够，没有学科话语权<br>**4. 角色价值认识**：角色价值低、对角色扮演现状不满意<br>**5. 角色适应及校正认识**：角色摸索、失误在所难免，角色发挥有轻重之分，在规范不明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责任心和效价 | **1. 角色能力条件认识**：具备学科发展能力、终身学习能力、新媒体学习和指导能力、组织沟通协调能力、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亲和力、服务意识<br>**2. 角色定位认识**：不可能成为学科和远程教育双料专家；应有所侧重和选择<br>**3. 角色分工认识**：结合自身能力特征参与分工、协作，而不是生硬地管理某几门课程<br>**4. 角色职责认识**：从繁重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从注重资源建设、技术教学应用到注重教师本人的教育、育人作用 |

### 2. 他人的角色认知

合作高校专家对以教师 A 为代表的开放大学教师的认知（认识、评价、情感、态度）如表 R-4 所示。分部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学生等对某开放大学总部教师角色的认知，目前没有收集到详细的资料，拟在后续研究中强化。

**表 R-4　他人角色认知、态度、回应**

| 访谈对象 | 与教师 A 合作的普通高校教师 H |
| --- | --- |
| 对开放大学教师总体认识 | 和普通高校教师不一样，角色多样、组织者角色更突出，学术主导权很少，主要是沟通协调工作。教师没法专业、角色很困难。她们主要跟专家打交道，向专家反映学员要求，但她们不直接接触学员，工作层级多。学员很不整齐，中间人（分部教师）多种多样，她们协调各方关系特别复杂，是很难的事情。她们很不容易、挺难的 |
| 对教师 A 角色扮演现状的认知（含评价） | A 老师工作上进、要强，谦虚好学、很努力，对学科有兴趣，是不错的老师。但是她挺难的，弄好几个学科，学科知识有欠缺，这么多年学科仍拿不起来，当面对不同的学术观点常常很茫然，出题很死，她从她身上，可以看出你们这个工作挺不好做 |
| 对教师 A 角色互动现状的认知（含评价） | A 老师有时候谈到跟有的专家打交道很头疼、困难，虽然很困难但她必须去说服和尽量争取。<br>A 老师很努力协调多方关系。A 教师做得还不错，她跟分部教师关系还不错，还能带回来一些信息、反馈意见 |
| 对教师 A 角色扮演及互动的感受（情感、态度） | 我见过 A 老师失落，跑去外地录课也没录成。我**同情**她的工作。<br>跟 A 老师打交道，她很客气、尊重我，跟我其他方面（情感、生活）的沟通较多。跟她合作**感觉挺好**，感觉她很不容易（重复）、她非常努力。<br>有的方面我**不高兴**，因为她们出题很死，分部教师业务不行，所以只能很“死”地设计 |
| 对教师 A 角色扮演及互动的回应 | 面对各位参编者写的草稿，A 老师因为不搞专业，所以挺为难、不敢随意改动。到最后她特别着急（都是眼泪），我想都是为了工作，既然她这么难，于是我**尽力帮她** |

### 3. 影响角色扮演及互动的组织因素

影响角色扮演及互动的组织因素主要有：分级办学体制导致的系统间职责分工、官僚制（行政性）机构设置、学校组织定位、行政管理教学的权力架构、课程项目管理制度、教学管理制度、资源建设机制、学校师资配备和对教师的工作量要求、学校对教师角色的规划与定位（职责、义务规定）、工作流程与工作设计、校方角色支持、角色适应性教育、教师评价机制、教师自主权限、教师相关的制度等。同时角色扮演及互动也会反作用于学校环境，为我们思考学校外部环境的改善、改进角色扮演和互动，提供思路。

# 六、反思

## （一）研究方法反思

### 1. 研究对象抽样反思

这几位研究对象在性别、个性、工作成效等方面具较强的同质性，都属于女性、较内敛、在教学岗位取得较多成绩的教师。并且教师A为退休教师，只能根据对其本人和相关人员的访谈、已有的工作成果和实物来获取信息，无法实施现时的观察。随着研究推进，后续拟再在总部按照分层目的抽样原则抽取多样化的教师，抽取相关的管理和行政人员参与研究。抽样中注重关键个案、强度抽样、最大差异抽样原则，抽取“理想”状态下的“关键性”个案，抽取具有较高信息密度和强度的个案，使抽样尽量兼顾最大差异抽样，使教师在年龄、职称、个性、性别、工作取向等方面尽量呈现丰富的类型。

14. 作者只对方法进行反思，是因为本论文是质性研究课的课程论文，重点在学习方法？

### 2. 访谈反思

由于时间关系，只对教师A、B、C进行了一次访谈，应该就第一次访谈中某些重要问题进行半开放型的再次访谈；后续拟访谈和研究对象B、C互动的合作高校专家、分部教师、同事（教师和管理人员等）、学生等。以期对角色扮演及互动现状、特征有更丰富的认识。

### 3. 观察反思

目前的观察还不够，拟打算在一年时间内持续观察教师B所在系的教师工作状况，每周两次，每次一小时左右。着重关注教师B角色扮演及互动的相关活动，采用参与型观察，观察同时或事后做记录。拟观察教师C去某开放大学教学点兼职授课的场景（一学期中选择3次有代表性的课堂开展观察）。

## （二）研究内容和结论反思

学校管理人员、分部教师、学生等对××开放大学教师角色的认知，由于时间原因，目前没有收集到更详细的资料，拟在后续研究中强化。对于角色互动的内容，资料收集和挖掘都很有限。

[ 参考文献 ]

陈向明（2000）：《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陈丽、冯晓英（2012）："网络导学中辅导教师角色能力条件的研究"，《中国电化教育》，第 7 期，第 58–62 页。

李爽、陈丽（2004）："中国远程教育专业人员能力模型研究"，《中国电化教育》，第 3 期，第 62–68 页。

林生传（2007）："信息社会中的教师角色研究"，《教育学术汇刊》（台湾），第 1 期，第 1–14 页。

倪玉兴（2008）："简析现代远程教育教师的角色功能"，《科技创新导报》，第 34 期，第 135–136 页。

Punya, M. and M. J. Koehler (2006):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 Framework for Teacher Knowledge."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Vol. 108, No. 6, pp. 1017 - 1054.

乔纳森 · H. 特纳著，邱泽奇、张茂元等译（2006）：《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北京：华夏出版社。

翁朱华（2012）："我国远程教育教师角色与专业发展"，《开放教育研究》，第 1 期，第 98–104 页。

邹立森（2006）：《网络辅助教学环境下教师角色及其教学行为策略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 文末“评”

本文作者是开放大学有近10年工作经验的老师，研究的问题是教师的角色扮演、角色互动以及影响因素，采用的方法是质性研究法，尤其是其中的访谈法和观察法，应该说，这是一个“局内人”所做的一份调查报告（或曰研究论文）。局内人来做质性研究，有长短两面。辩证地说，有时“长”也就是“短”。比如本文，作者应该非常了解、熟悉自己工作了近十年的开放大学的教师角色扮演、角色互动以及影响因素的情况，这本是研究的优势所在，可以有助于思考如何进一步对问题作深入的挖掘。不过这个优势有时一不小心会变成劣势，也正因为太熟悉，在研究之前结论已然早有，只不过是需要借一个质性研究的壳，把它看似学术性地表述出来而已。

作者在介绍或者讨论质性研究的方法论或者是本研究的具体研究方法时，对这一点应该有一个较清醒的认识，想象如何使得自己的优势能够得以更好的发挥，在文章的分析中得以体现。

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本来是很有意思的，但作者似乎没有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让许多本应是研究结论的东西变成了不证自明。

再更具体地谈几点：

1. 本文行文的方式有两点特色，但都比较忌讳。一是大量的图表，影响了阅读。大量图表的行文方式总的来说是定量研究的写法，而本文是质性研究，有明显的矛盾。二是许多研究结论早早地做了交代，这种倒叙式的写法值得商榷，尤其是后面没有扎实的论证分析支撑的时候。比如本文的许多主要研究结论（影响因素什么的），都被作者早早地以一张表的形式放在了论文很开头的部分，大有不用论证我也知道之感。

2. 学术性论文不是重在告诉读者研究结论是什么，而是重在告诉读者，此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文章需要用访谈材料、观察笔记等，去论证比如“万能胶、小配角”这样的研究结论的成立。

3. 第二部分的开头第一句，本来这应该是论文的一个重要研究结论，但却被作者作了极为草率的处理。“可以说影响教师角色扮演和互动的因素有”之后的一大串，可以说列的越多，论文就越缺少学术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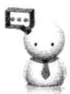
4. 社会学（包括符号互动论）对于角色的论述没有作者想的那么简单，有些论述是有语境的，不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角色问题的讨论上的。

5. 重视原始材料（比如访谈文本）的呈现，不仅要呈现而且要分析。这是质性研究做得水平如何的一个重要标志。

6. 对于一个好的研究来说，问题意识很重要，社会学研究更是如此。社

会学的想象力重点体现在作者的问题意识上。如果把所要讨论的教师角色扮演、角色互动等问题更为有机地与“转型”“总部”等关键词联系起来，让读者了解“转型”对于电大、对于远程教育意味着什么，“总部”对于一般教师，尤其是对于那几个个案教师又意味着什么，质性研究最后的讨论部分就能写得更有深度。

---



## 学生回应

1. 为什么选择总部教师作研究对象：最初是为了研究方便，因为作者是总部的教师；再者，总部教师和分部、学院、学习中心的教师目前在职责分工、角色扮演上有一定的差异，因此，限于研究精力，先选择研究总部教师的角色扮演及互动。

2. 文章初稿中的确有更详细的文献综述，鉴于篇幅，所以删减了许多。

3. 本文研究方法部分只谈及了抽样原则、访谈和观察的操作等，没谈到形成扎根理论、建构理论模式的方法的运用（正文在资料分析中谈及扎根理论），这的确是应该完善的部分。扎根理论强调从资料中逐级编码（一级、二级、三级），从资料中确定理论的内涵与外延，强调将初步理论返回到原始资料进行验证，同时不断地优化现有理论，使之变得更加精细。扎根理论可以先对理论进行陈述，将所掌握的资料、概念类属、类属的特性以及概念类属之间的关系一层层地描述出来，作为对研究问题的回答。

4. 三级编码图中的确没有明确 3 位研究对象所扮演的角色现状是什么，按照专家的意思，是否应该把从 3 位研究对象访谈资料中提取的本土概念如“服务型、万能型、茫然和配角型”作为一级编码，而非把等抽象术语（如“角色扮演职责、感受”）作为一级编码呢？作者认为三级编码图中呈现的应该是类属（如“角色扮演的职责、感受”），而非更低一级的码号（如“服务型、万能型、茫然和配角型”）。

5. “角色扮演现状和特征”表中的本土概念既包括了访谈对象在谈及角色扮演现状的一些表述，如“万能胶、打杂的、小职员、服务人员”，也包括了研究者从访谈对象谈话中总结出的其角色扮演特征。难道说本土概念不能是研究者总结提炼的她们角色扮演的特征吗？

6. 个人也感觉自己没有把“资料分析”、“资料解释”和“研究结论”

分清楚，可能是因为初次涉猎，不知道该怎样写作“资料分析”吧。反思自己的行文，其实应该避免用表格的形式直接呈现结果（这的确丧失了质性研究的鲜活性、过程性和可读性），而是应该用类属分析的方式，分别对三位个案在“角色扮演现状、特征、影响因素”等类属进行阐述和分析，对资料中关键码号及相关话语作摘要，尝试分析个案角色扮演的共性与差异性，分析个案（教师与互动者）话语间的联系等，这样可能更符合质性研究资料分析和写作的思路，并且还可以具体将类属的下级码号、类属间的关系做简单明了的图示，这样专家质问的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状，就都呈现出来了。最后，在研究结论部分用文字呈现那几个表格的主要内容作为结论。等有完整时间时，拟打算重写资料分析和结论部分。

7. 专家质疑文中图表过多，可能是因为质性研究收集的资料很多，作者想把这些资料用概览的形式给读者展现出来，所以把本土概念、相关话语从语境中抽出来，做成图表形式，有点干瘪、臃肿、没重点、去细节的感觉，这的确需要改进，仅保留必备的图表，图表中体现重点，其他用类属分析的文字来阐述。

8. 资料解释部分，应该运用理论视角进行解释，专家建议结合“转型、总部教师定位”等来解释，此外，专家认为作者对符号互动论的认识没到位。

9. 除了对研究方法进行反思之外，没有对研究内容和视角开展反思，因为自己对社会学符号互动论的理解也很粗浅，使得成文有理论和实践两张皮的感觉；不知道该如何反思，也没有对研究的效度进行反思（如“解释效度”：调查与其互动的人了解被访谈者所谈内容的真实性；多种研究方法综合使用的三角检验；返回给被访者让其确认等），这的确应该加上。

衷心感谢贺老师的点评！作为一个质性研究新手，在没有完全消化质性研究精神、没认真研究质性研究论文写法的情况下，这篇作业确实幼稚和粗糙，暴露了很多认识和实践中的问题。通过此次作业，深感质性研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需要不断从理论视角和方法层面不断完善。质性研究收集资料相对容易一些，难点在如何分析和解释资料，如何得出有深度的结论。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做质性研究，但我会努力，争取下次做得更好！

## 点评专家贺晓星简介

贺晓星：1980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1982年公派留学日本，在广岛大学教育学部，先后获得教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3年5月起，任教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1996年9月至同年12月日本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部访问学者；1997年9月至1998年8月英国华威大学教育与发展评估中心访问学者。2001—2007年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并任南京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匡亚明学院副院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教育学报》《南京大学学报》《台湾教育社会学研究》《教育社会学研究》（日本）以及 Higher Education(Kluwer) 等杂志上发表中英日文学术论文40余篇。

# 他为什么评不上教授：

## 研究型大学社科副教授的职称晋升个案调查

文／屈廖健[1]
评／黄盈盈

[摘要] 本研究通过访谈、观察等研究方法对国内研究型大学社科副教授职称晋升问题进行个案研究。研究采用校标抽样选择研究对象，对访谈与观察资料进行分析发现被研究者对教学的重视，坚持自己的学术信仰，热衷于充当“知识贩子”的角色，承担大量社会培训都对其职称晋升起到阻碍作用。

[关键词] 研究型大学　社科专业　职称晋升　知识生产

---

[1] 屈廖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比较教育学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高等教育。

文中“点”

1. 对于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是研究问题的重要来源。这里的“研究现象”也可称为本文的“引子”。

2. 研究问题是一个研究试图要回答的问题，具有提纲挈领的核心作用；这里的表述应该更加清晰。结合标题，似乎应该是探讨“研究型大学社科副教授的职称晋升”的原因/影响因素？此外，研究问题不仅需要体现现实意义，还需要蕴含一定的理论意义。这里，理论意义的表述不够。

## 一、问题的提出

### 1. 研究现象

来到E大学后，我发现身边有好几位优秀的教师都是副教授。他们的年龄大都在45岁上下，评上副教授职称至少已有10年。这些老师现在大多为自己学院的副院长或者系主任，在学术圈内也担任着较为重要的职务。但是为什么这些老师评不上教授呢？我查阅相关条例得知大学教师在评上副教授职称五年后即可申请评定教授职称，这些老师已经超过了规定年限五年以上了。通过对身边这个学者群体的关注以及对他们职称评定道路上的坎坷经历的疑惑使我产生了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兴趣。

### 2. 研究问题

985大学群包含了中国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这39所大学吸纳了中国最优质的本科生源，一半以上的博士学位由其授予。21世纪的大学拥有三项使命，即教学、研究与公共服务。研究型大学承担了大部分的国家课题，是研究与公共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同时，面对着最优秀的生源，研究型大学的教学使命不容忽视。如今的研究型大学在进行职称评定时非常强调晋升职称者的科研成果情况，或者更直接的则是所拥有的科研项目的等级以及科研经费的数量情况。在这一情况下，一个研究型大学社科副教授的职称晋升个案调查便成为了本文研究的问题。

概念定义方面，这个研究问题主要包含几个概念。第一为研究型大学，美国有著名的卡耐基分类，按照博士学位授予数量、涉及专业门类、研究经费总额、研究经费涉及专业等标准确立研究型大学。中国并无明确标准，“985工程”是中国政府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实施的高等教育建设工程，现共包括39所大学。本文把这39所大学定位为中国的研究型大学。社科专业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等。本文主要研究研究型大学社科教师的职称评定，聚焦点则在副教授晋升教授阶段上。此外，教授也是一个关键的概念，教授是一种职称，多指在大学或社区学院中执教的资深教师与研究员。但教授与研究员是

有区别的，教授有教课的任务，而研究员则没有。教授为大学教师职称的最高级别。

## 二、研究背景

英国高等教育学者纽曼提出大学的使命是教学。德国的洪堡则认为大学的使命是教学与研究。20 世纪中期以来，公共服务成为又一项大学的使命。当下，教学、研究与公共服务成为了众多大学的三项使命（金耀基，2008：3–8）。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各个主要国家都提出了兴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政策，中国政府提出了“985 工程”与“211 工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一流研究型大学，努力提高大学的科研创新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众多研究型大学的教师职称评定标准开始向科学研究倾斜。1999 年以来，高校扩招，中国大学的本科生教学质量受到社会质疑，社会上有一种强烈的声音即是向科学研究倾斜的研究型大学教师职称评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教师对教学的重视程度，进而影响本科教学质量。

3. 本部分更确切地说是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目前我国对大学教师职称评定研究主要可分为以下几个维度：根据研究题目，把文献综述的关键词定位高校或大学教师职称评定上；通过对 CNKI 上的期刊以及硕、博士论文的查看，发现目前学界在大学教师职称评定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块。从研究内容上来看，首先，目前国内有较多关于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定改革发展的研究。其次，高校教师职称评定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当前研究关注的热点。再次，一些文章就当下职称评定对教学质量以及学术论文质量等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分析。最后，国内研究者对国外大学教师职称评定相关的政策、标准进行了研究。从研究方法与研究层面上来看，我国目前关于高校教师职称评定的研究大多为思辨研究，缺乏实证研究。研究层面多定格在政策等宏观层面，缺乏中观乃至微观层面的研究。最后，现有研究对象即为中国大学教师职称评定，缺乏对某一类型或某一层次大学的专门研究，更缺乏对某种类型大学里某一种教师群体职称评定的研究。

4. 文献回顾过于简略与泛化，而且缺乏索引。文后的文献在正文中也没有相应的索引。

5. 最好通过分段或者小标题的形式，对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文献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这样，文章结构与表述会更加清晰；也能为后面的讨论（本研究与已有文献、已有知识的对话）打下基础。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大学教师职称评定研究

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缺乏学科视角与研究方法的支撑。我认为有必要对大学教师职称评定问题继续深入研究下去。我就读于一所研究型大学的社科专业，身处其中发现有一群学者一直不能逾越副教授与教授之间的分割线。因此本研究针对研究型大学社科专业副教授这个群体展开研究，通过个案研究探寻“资深副教授”晋升教授的“坎坷历程”。

## 三、研究方法

### （一）抽样

本研究采用效标抽样进行研究对象的选择。选择 E 大学是因为我目前就读于此，进行研究较为方便。我把研究对象的选择限定在 E 大学的一个社科学科学院里。此外，我还对研究对象进行了条件要求，年龄为 45 岁至 55 岁之间已获得副教授职称十年及以上的教师。通过同学的帮助，我获得了选定学院所有教学老师的个人资料，其中包含教师年龄、职称状况、评定时间等信息。我从中选择了评上副教授时间最长的三名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两名男教师、一名女教师。

6. 建议把抽样改为对象选择；“抽样”常见于定量调查。

7. 效标抽样似乎不是质性研究的通用说法。需要说明。

### （二）进入现场与保持关系

我选择了电子邮件的方式与这三名教师进行联系沟通。在邮件中阐明研究意图，征求教师的同意。邮件得到两位教师的回复，一位教师因最近身体不好婉言拒绝，另一名男性教师欣然答应。这名男教师在后面的研究陈述中简称为 × 教师。我马上给 × 老师回了信，表明了对他进行访谈的意图并由他来决定访谈时间与地点。× 教师在第二天早晨七点半钟给我回了第二封信，告知我他今天上午在办公室有时间接受访谈。于是我第一次正式进入现场开始了对 × 老师评定教授职称问题的研究。访谈是在 × 教师的办公室里进行的，时长约为 50 分钟。此外，在随后的研究中我又对 × 教师进行了一次追加访谈，时长约为 30 分钟。研究从 11 月份初开始进行，一直持续到 12 月底，时长为一个半月。在这一个半月里，我与研究对象一直保持着联系。在此期间我主要通过电子邮件与研究对象约定访谈时间并对他进行了两次访谈。此外，我在征得 × 教师

8. 进入现场通常是田野调查的时候用到；至于一般的访谈，什么是现场？不如直接说：建立与保持关系。

9. 此部分对于研究过程的介绍比较详细、清晰。

的同意后对他所教授的一门本科生公共课程进行了课堂观察，课下与 × 教师进行交流。最后，× 教师拥有一个点击率非常高的博客。我通过此博客以访客留言的方式与 × 教师进行联系。

### （三）搜集资料

本研究搜集资料的方式可以归为三类：

第一类为文献搜集。这一类搜集的资料包括 E 大学教授评定政策，研究对象的个人情况以及 × 教师博客上的访客评价。在研究政策上，我对 E 大学 2009 年公布的《E 大学教师岗位聘用条例》进行了梳理。副教授晋升为教授的硬性条件为博士学位以及 50 万元的科研经费。我通过百度百科掌握了 × 教师的基本情况，在 × 教师所在院系的网站上核对了相关信息，此外，我还通过 CNKI 以及 E 大学图书馆等网络平台对 × 教师的学术论文以及学术专著情况进行了了解。

10. 资料搜集部分介绍得比较详细。选择的方法也比较合适。

第二类为访谈。对质性研究来说，访谈是最重要的资料收集技巧。访谈可以对研究者观察到的和体验到的东西进行解释并将其放进一个更大的框架内（大卫·费特曼，2007：30）。我对 × 教师进行了两次访谈。第一次访谈是在他的办公室里，那天 × 教师穿着西装在办公室备课。× 教师的办公室不大，大概 10 平方米左右。办公室里有两个书柜，里面堆满了书。有一台电脑和一个小沙发，我们的访谈就是在沙发上进行的。× 教师是一个非常“配合”的研究对象。在我做完自我介绍并表明研究主题和研究目的后，× 教师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我想这跟他从事教师这个职业有很大关系。这次访谈我主要是想听一下他对研究型大学教师职称评定这个问题的看法，从这个问题入手，然后展开针对 × 教师自身职称晋升的访谈。在访谈的过程中大部分是 × 教师在说话。他边说边比划着，说着就拿出他的工作记录本给我看他满满的全国各地讲课工作安排。访谈过程中 × 教师还打开了他的博客给我看访客给他的留言。其中一个访客是听了他做的讲座后特意来看他的博客，在博客里留言对那次讲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教师非常自豪地把这一条留言朗读给我听。此外，× 教师在访谈过

11. 访谈是否有录音，如何记录？

12. 访谈的时候有策略吗？是互动式对话为主，还是以倾听为主？有追问吗？有话题转化吗？

程中找出了他发表的期刊与所写专著，并对一些专著进行了介绍，介绍的时候语气明显硬朗，声音洪亮，语速也很快。第二次访谈则是在对 × 教师的课堂观察之后，这次访谈是在对 × 教师第一次访谈记录资料的整理上进行的。可能是刚上完课的缘故，这天 × 教师看起来非常疲劳，因此我只做了 30 分钟左右的访谈。此外，我还对 × 教师的学生进行了访谈，了解了学生们对 × 教师授课情况的反馈。

13. 观察是很重要的资料搜集方法之一。但是需要进一步说明观察的目的；分析这部分的观察内容与研究问题之间的关系。

第三类为观察。我通过第一次访谈的机会对 × 教师的办公环境进行了观察。× 教师的办公室呈长条形，地方很窄，面积也不大。办公室非常的杂乱，东西堆得到处都是，屋子被一个小门隔为前后两块，前面是一个衣帽间以及书柜存放处，后面则是 × 教师会客和办公的地方，有一张小沙发、一个电脑桌、一台电脑和一个写字台。在征得 × 教师的同意后，我对他的一堂本科生公共课程进行了课堂观察。观察之前我列出了观察提纲。教室有 182 个座位，上课的学生约为 162 人。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中间。课程时长为 2 小时。课堂气氛很活跃，× 教师不停地走到同学中间与同学进行互动，对同学提出问题。× 教师语言风趣幽默，动作夸张，课上同学都听得聚精会神。叙兹曼和斯特劳斯将现场观察笔录分成四个部分：（1）“实地笔记”，专门用来记录观察者看到和听到的事实性内容；（2）“个人笔记”，用来记录观察者个人在实地观察时的感受和想法；（3）“方法笔记”，记录观察者所使用的具体方法及其作用；（4）“理论笔记”，用于记录观察者对观察资料进行的初步理论分析（陈向明，2000：247）。以下是依据此分类对观察资料的一个记录。

14. 方法部分还缺乏对于“分析策略”的介绍。

| 实地笔记 | 个人笔记 | 方法笔记 | 理论笔记 |
| --- | --- | --- | --- |
| 17:45，离正式开课还有15分钟。182个座位的教室里还有20多个空位 | 我感觉大家来得都比较早，而且选的人很多，这个课应该挺不错的 | 我数了教室的排数和列数，数字较为准确 | 听课人数的多少以及来的时间的早晚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课程质量 |
| 18:30，×老师叫大家回答问题，以专业为单位派代表回答。一片一片的同学互相地推让 | 可以看出，同专业的同学大多坐在一起 | 根据推选回答问题者的规则以及同学们的反映可以看出 | 在上这种混合专业的公共课时，本专业的同学还是坐在一起 |
| 19:20，×老师走到他左手边的过道，挨个问坐在过道边的学生喜欢老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 坐在边上的同学跟老师进行互动 | 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的中间位置，很清楚地看到×老师的行走轨迹以及与学生们的互动情况 | 坐在前排过道边的同学获得更多与老师互动的机会，学生的学习动机应该与他选择坐的位置有关系 |

15. 这里提到×教师2000年攻读博士学位，是在职还是脱产？后文提到被访者对于在职念博士的不屑。表述得不清晰，容易让读者感到疑惑。这里作者提到被访者有很多著作与文章，后文提到没有时间写论文，科研重视不够，这之间的关系（甚至是矛盾）缺乏进一步分析。

## 四、研究结果

### （一）背景介绍

×教师是E大学Y研究所的副主任，男性，今年47岁。×教师是E大学的“土著”。90年本科毕业后即留校担任本科生的教学工作。90年初在美国某所较为著名的学院学习一年。回国后在E大学跟自己专业领域的权威学者进行硕士学习并取得学位。2000年师从另一位业界学术名师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至今没有完成博士论文从而没有拿到博士学位。×教师2000年被评为副教授，现为硕士生导师。他担任多门本校本科生专业课程，并连续三年获得E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教师每年保持着至少一篇的CSSCI论文发表量，至今已出版16本专著。×教师担任所在专业全国专业学会的常务理事，长期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的高水平培训教师一职。此外，×教师拥有自己的博客，博客点击率高，影响较大。

E大学Y研究所的学术声誉在国内首屈一指，目前共有9名教师。其中教授3名。该研究所占据所在学院大楼的一个楼层，走近这栋学院大楼即看到了大厅海报张贴处挂出的一张学术讲座海报，海报内容即为Y研究所邀请的外国专家的学术讲座。Y研究所拥有硕士点和博士点，楼

层幽静素雅，拥有自己的行政办公室与办公人员，对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起到较好的支持作用。

E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为国家“211”，“985”工程重点支持大学。该大学今年刚迎来110周年华诞。E大学拥有全日制在校生22 000人，本科8 800余人，研究生11 000余人。学校现拥有本科专业57个、硕士学位授予点153个、博士学位授予点108个、博士后流动站25个。该校教育学、心理学以及中国语言文学3个一级学科长期排名全国第一，15个学科排名全国前十。E大学现有院士19人，长江学者19人，国家杰出青年31人。是一所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要特色的研究型大学，同时，作为一所担负着师范生培养的大学，教学一直是它所强调的方面。校园里经常可以看到各个院系乃至全校范围内学生教学以及中青年教师教学比赛的海报。此外，学校里经常张贴着中小学乃至高校等用人单位的招聘信息。

### （二）升教授难的原因

× 教师2000年评上副教授职称，至今已有12个年头。按照2009年公布的《E大学教师岗位聘用条例》规定，教师在获得副教授职称5年后即可申请评定教授职称。因此 × 教师已经错过了7次评定教授的机会。× 教师2000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至今没有完成博士论文，因此尚未获得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是2009版E大学教师岗位聘用条例中对参与教授职称评定者的硬性规定。我通过对 × 教师的两次访谈以及对他学生的一次访谈，再结合对 × 教师课堂的观察、工作日志的查看以及博客内容、博客访客留言的记录，探索 × 教师升教授难的深层原因。主要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找到答案。

16. 这里的“原因”偏向于被访者 × 教师的自我表述，还是作者的综合分析？应该是作者的分析，但是感觉缺乏对于访谈材料及其他材料的深层思考与综合分析，而几乎是把 × 教师的自我表述混同于作者的分析，甚至把被访者的表述简单地作为某种“事实”对待。“深层分析”的“深层”体现在哪里？

首先，× 教师是学校的教学名师并且自己深深地认为教学是大学之本。因为教学能力出色，× 教师获得了许多荣誉。因此他决定对教学质量绝不松懈，坚持完成自己的教学数量，在教学上花费大量的精力，这就导致他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写博士论文。

× 教师在E大学给本科生讲授7门课程，在1998、1999年的时候最多讲过9门课程。× 教师担任所在专业全

校的公共课，每学期再加上3门专业课，一个学期是4门课程。× 教师在访谈中说自己每次讲课都会花比上课时间更多的时间去备课，半天的课经常要花一整天的时间去准备。在访谈的当天 × 教师下午有课，他早上7点就来到了办公室备课并在7点30分回复了我的邮件。

“每一次的讲课我都要把讲稿从头到尾过一遍，有课的那一天一般早晨5点就起来了。我认为自己比较愚钝，课并不是上完了就了事了。我会去反思自己的课程，思考这节课的成功与不成功，在以后的备课中还应该注意哪些地方。我一直坚持给学生改期末作业，这是对其教学成果的一种检验，弄清自己的教育效果对今后自己教学进行至关重要。”

× 教师所教公共课程班级共有162人，一份试卷批改10分钟，那么独自一人批改全班学生的试卷所花费的时间是巨大的。教学是一个无底洞。× 教师的同事说他“傻”，教这么多课对评职称也没有帮助。× 教师在访谈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17. 虽然，质性研究很重视被访者的主体表述与感受，但是并不表示不需要研究者在对“个案”的整体性理解的基础上的综合分析。

“我认为，一个教师来大学不教书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在大学工作吗？好意思说自己是教师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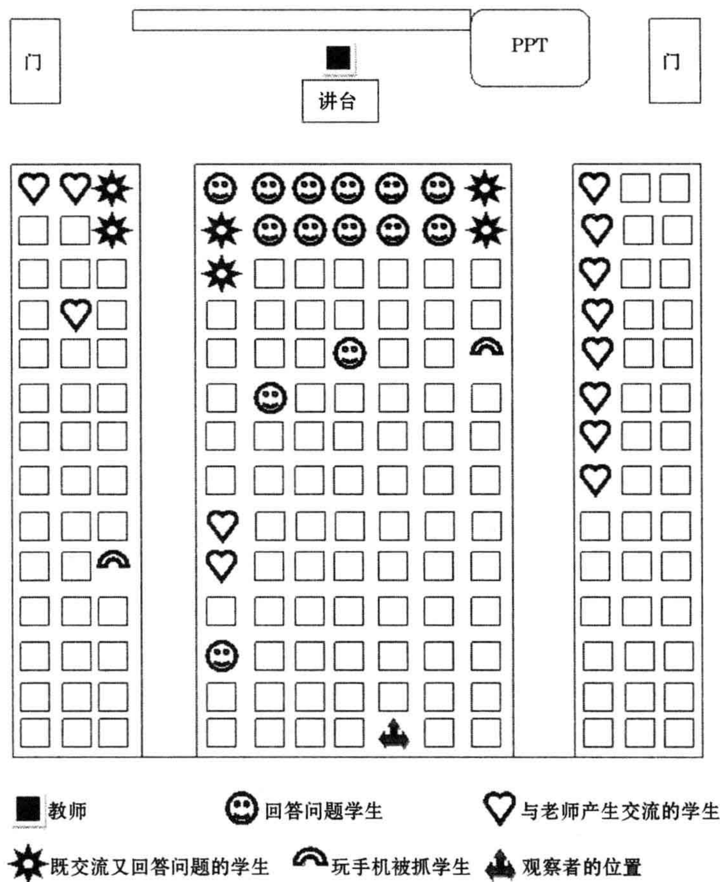
这就是他的理念。在访谈中我问 × 教师为什么一直没有完成博士论文。× 教师说他根本分不开时间去写博士论文。

“如果分开时间去认真地戳写博士论文那么就是对付学生。我的良心过意不去。教师是一个良心行业。教学也有评价。学校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三次获得E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一次二等奖。我还获得了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E大学教学名师里有我的名字。自己脱离了教学都不好意思。自己是教学名师，占着坑不上课是不行的。教学名师、师德标兵、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使得我必须把教学搞好。马已经上路了，应该马不停蹄地前进。我是不用坐班的，但是有课的时候到办公室来备课才能静下来。在办公室里，学生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我。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我选择了现在的生活方式。要是心一黑，课不教了一定能把这个博士论文做下来。”

18. 结合访谈资料来论述是很好的写作方式，使得论文能够有血有肉。

我对 × 教师的一节162人的公共课程进行了观察。课

堂上，× 教师讲课语气抑扬顿挫，言语配合肢体动作使得学生们听得聚精会神。他经常走到同学中间向大家抛出问题。课堂气氛活跃而热烈，学生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下面的图是我根据观察的课堂而画的，可以直观地展现 × 教师所教课程课堂的状况。




其二，× 教师不愿意通过在职博士的方式较易的获得博士学位，拥有自己的学术信仰。

在对 × 教师的第二次访谈中，我向 × 教师问起了这样一个问题："您为什么不读一个在职的博士呢，这样的学位应该是比较好拿的。" × 教师的回答是："这种事情我是不会做的，让人瞧不起。"

"好多在职的博士都是人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了，让人瞧不起。自己拿的东西（博士学位）不像样，玷污了自己的学术。自己可能别的方面做得挺好，但是这件事情却让自己丢人。通过读在职博士拿到学位玷污了学术是一件丢人的事情。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学位没什么，至

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如果通过在职博士或者凑合写出一篇博士论文交上去获得学位，即使评上教授也会被别人搓指头。我宁肯当一个硬朗的副教授，我非常自豪地讲我是称职的副教授，是硬朗的副教授，自己无愧副教授的称号。但是如果通过凑合的方式获得博士学位乃至最后评上教授心里是不踏实的。我发了很多文章也写了很多书，都是自己真正感兴趣觉得有用的东西。”

说着 × 教师起身从桌子上拿出一摞期刊（不是严格的学术期刊），给我看了他最近写的文章，并读了一些别人对他的专访内容。他觉得这样的东西比写一些学术文章更有价值 × 教师马上又表示自己也经常在高水平的学术期刊上发文章，说着就拉着我往办公室外面隔间的书柜走去。

“我们又不傻又不笨，只不过看自己愿意走哪个方向。这是我去年写的一套儿童发展的书，这一层全是我的著作。很多都是心理学的书，这本书已经卖到 50 000 本，成为畅销书了。我还写了别人看不懂的书，这是一本盲文书。还有这本医学专业专用教材也是我写的。”

× 教师满脸自豪地说。我扫了一眼书脊，发现大部分书都是 × 教师所著而非编著。× 教师又拿起一本书给我看，这本书有他所在专业的两位泰斗级人物分别作序与封面题词。

其三，× 教师的发展路径在纯学术之外，相比知识生产更喜欢做一个“知识贩子”，对社会大众产生影响，而不是写只有专业人士才看的学术论文。

从与 × 教师的访谈接触中以及对 × 教师日程的安排可以看出，× 教师不是一个专心做纯学术的学者。

“能否发表学术论文并不是那么单纯的依赖于文章质量，而自己也并不看重那种只有专业人士才看的学术文章的发表。现在大家都处于一个功利的社会，追求的是科研成果。现在的文章写出来发表都要做“公关”，要做很多学术以外的事情。好多杂志发的文章最终是没有人看的，写文章就是和一些专业人员在一起阳春白雪。后来我给自己定位为教书传承文化。我自称为“知识贩子”，把别人读不懂的书读懂了说给大众听，这样的方式能影响更多的人。我给本院的本科生、研究生上专业课，给全校的学生

上公共课，给社会上的人进行培训以及写博客都是为了影响更多的人，把知识传递给他们。我经常把写的东西放到博客上去，发表在发行量比较大的期刊上。但是自己评职称时这些都不算。不过不算无所谓，要的是自己的思想能够被人所接受，声音被人所听到。”

说着，× 教师打开了他的博客，指着 160 万点击量的数字给我看，自豪的表情毫无掩饰地表现在脸上。他饶有兴致地跟我念起来一位妈妈给他的留言：“从 JACK 出生到现在一共四个月，第一次离开他 5 个小时，就是为了听 × 教授的讲座，太值得了，我受益匪浅，坚定了做一个全职妈妈,打算在宝宝三岁的时候再一次投入职场,太幸运了，我没有错过宝宝成长的最近时期，谢谢 × 教授深情并茂的演讲，您辛苦了，希望您再来重庆。”× 教师不无得意地说在博客里或者演讲现场大家都称呼他为教授。他认为通过这些东西可以看到社会对自己的看法。

“一个人同行对你的看法固然很重要，但是你最终所有的学问是为什么呢，一定是为社会服务，你要推动社会进步，推动人类发展，这才是人的终极价值，给我多少钱并不重要。因为我的存在，众多家长能够从中受益，再好的学术论文我相信也不会被人读 100 万次，我的理想是在退休之前博客点击量达到 1 000 万。”

在这次访谈结束后，× 教师送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上面赫然印着他的博客地址。我在访谈结束后登陆了他的博客。× 教师的博客是中国网建立的，中国网是专门的专家网，在上面开设博客的大多为各个领域的专家。博客上都是他的一些外出演讲整理稿。下面有很多的访客留言，大多是赞赏 × 教师博客的思想和理念，也有一些人向 × 教师提出了一些问题，× 教师挑选了一些进行回复。

其四，大量的社会培训任务占据了太多的时间，花费了太多的精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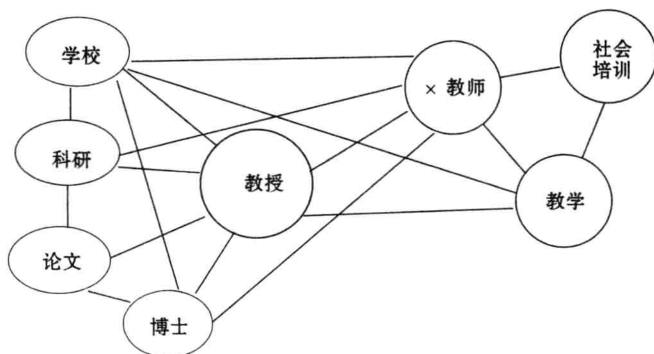
× 教师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兼职教授，同时还是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讲座教授。这些头衔意味着 × 教师定期要去以上大学做相关的培训与讲座。教学一直是 × 教师的强项，× 教师称自己是所在专业为数不多能在清华与北大站得住脚的教师。他每年在清华与北大拿到

的工资差不多有10万。我查看了 × 教师2012年的工作日程安排本，每个月都写满了去往各个学校做培训的日程安排，培训的城市遍布全国各地，天南海北。

“去清华与北大做一次不难，但是能够长期进行讲课则不容易。清华北大有严格的课程质量评估系统，如果讲得不好下次则不请你来了。以清华为例，在培训教师讲完课后继续教育学院给每个学生发一个二尺宽的条，上面写着今后A—请，B—不请。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学生选择了A，则下次接着上，低于百分之八十人家就通知你下次不要来了，不请你了。如果你觉得自己讲得特别好，那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还没过百分之八十，那就终生不要再去了。”

面对这么苛刻的评估制度，× 教师在培训教学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清华、北大高额的教师培训费用是非常吸引人的。其次，× 教师自己非常享受给别人传递知识的感觉。但是可以看到，× 教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在培训课程的备课，培训交通路程以及讲课上面。而这种以自己为行为发出主体的社会服务是不被学校所接受的。换句话说，学校的职称评定并不把这种个人社会服务内容列入评比之中。

下图是我基于以上四点的分析对学校、科研、论文、博士、教授、教学、× 教师以及社会培训之间远近关系的一个描述。从图中可以看出，学校最需要的是科研。教授的评定看重科研、论文以及博士学位，与教学的关系则要远一些，与社会培训则没有直接的联系。× 教师则与教学、社会培训等词离得近，与科研、论文、博士等词离得远。这也导致 × 教师迟迟不能得到教授职称。



19. 扎根于材料，对四个方面的内容有一个综述与小结，很有必要。如果能结合“晋升”有关的其他材料，对“原因”有进一步的综合，文章会更有深度。

20. 这里的引文是 × 教授的原话吗？出现“他”第三人称；后面又是“我”。回应前面提到的，访谈材料是根据录音资料整理的，还是事后靠记忆整理？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在前面方法部分需要说明清楚。

21. 大段的引文，没有分析。除非作者觉得引文特别精彩且浓缩地表述了想要表述的内容，再多说一句都是累赘，否则一般后面都需要作者对于材料的分析。

最后，× 教授表示很多学校都挖过他。这些学校评定教授对博士学位没有硬性要求。但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 E 大学人，× 教师已经对 E 大学产生了强烈的依恋与归属感。他说自己在这栋楼的四层待了很多年。虽然早已不用坐班，但自己每天都要到办公室来坐一坐，静一静，这样才能继续把学问做好。

### （三）没有评上教授的想法

× 教师评上副教授职称已经有 12 年了，但一直没有得到教授职称。

“现在动不动就提研究型大学。他有一个自己的观点就是现在的大学都不务正业。大学最核心的任务应该是教学。但是现在教师的心思都放在研究上忽视了人才培养，导致了现在大学声誉下降，主要原因是有些办学思想出了问题。教授是要做研究，但是把所有的教师都用研究衡量尤其是评职称这块完全按科研衡量，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大学教育质量的下降和声誉的滑坡。大学里面教师晋升职称还是要有所区分。大学现在有两种，一种是科研为重，一种是教学为重。这样就应该有所分开，比如教学为重的就应该是七分教学三分科研。如果你要是科研为重就不要评教授直接评研究员得了。那就是七分的研究三分教学。而现在就一个标准（科研）。我也想评教授，都当了十几年副教授早当够了。我对现在某些评上教授的人的水平并不认同。自己走的是教学的路线，而现在社会认可科研成果。现在很多评上教授职称的教师的文章和课题质量怎么样都不好说，圈子里的人都懂的。大家发展的方向不一样，自己没评上教授并不表示就比那些靠科研评上教授的人差，各自都是凭着良心干活。在我的脑子里，教授这个称呼是崇高的。教授应该像我的硕士生导师与博士生导师那样，是非常沉甸甸的。我虽然是副教授，但是对一些教授的水平并不认同。对于我来说，教授已经是一个荣誉的称号而不是对我学术水平的评价。我希望退休之前获得这个荣誉。”

### （四）后面的打算

× 教师今年 47 岁，距离退休还有 13 年。E 大学对教师评定教授职称有博士学位的硬性要求，因此 × 教师一直

没有参加教授职称评定的资格。目前 × 教师的博士生导师已经调到北京的另外一所大学。当我问 × 教师是否会把这个博士读完时，× 教师沉思了一会，一脸平静地说："可能不会读了，确实没有时间去作一篇博士论文。"他表示如果自己的博士生导师没有调走说不定还有可能坚持下去。过一会儿，× 教师又说如果所里有一年没有招满硕士研究生,那么他会空出一年不带学生去尝试着把博士论文写完。在第二次访谈的最后，× 教师跟我说 E 大学有一个教授职称评定的惯例，即对一部分 55 岁以上的教师降低教授职称评定的要求。他想等到 55 岁以后也顺着这个惯例破例评一个教授。

## 五、讨论

综合以上收集到的资料，可以得出 × 教师一直没有评上教授的原因有四个。第一个原因是 × 教师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教学上面。× 教师认为教学是大学最基本的功用并且坚定地认为在大学里应该有一部分教师是以教学为主的。他非常热衷并擅长教学，获得了很多荣誉。× 教师一直坚持每个学期都给本科生上 3 到 4 门课程。基于课程的数量以及对教学的认真态度，× 教师为教授这些课程的时间以及课下准备时间花费了大量精力。我们可以从对 × 教师的访谈、对学生的访谈以及课堂观察中得到答案。当然学校颁发给 × 教师的教学奖项足以证明 × 教师在教学上取得的成就和花费的精力。第二个原因是 × 教师拥有对学术的一份信仰,不愿意读一个轻易能拿到学位的在职博士。× 教师所在院系即有在职博士点，× 教师想要读一个在职博士应该说是轻而易举的。但是 × 教师认为那样的博士没意思，不能达到自己对学术的要求，同时也会被同行看不起。所以他觉得与其做一个被人看低的教授，不如当一个有底气的副教授。第三个原因是 × 教师并不热衷搞纯学术，而是愿意当一个"知识贩子"讲课、培训，对社会大众产生影响，这就使得他与学术科研渐行渐远，阻碍了博士论文的完成，也与当下的教授评定标准背道而驰。× 教师认为现在的纯学术文章发表并不靠实力而靠关系，文章质量

22. 讨论部分总结了正文的相关内容，论述比较清晰。但是，缺乏对于正文的进一步综合分析，尤其缺乏与已有文献的进一步对话。这与开头文献部分的不足与理论意识的缺乏都是有关的。

参差不齐。此外，他认为这些阳春白雪的东西产生的社会影响太有限。与其这样还不如做一个“知识贩子”讲课、培训、开微博对社会大众产生影响，更能体现个人价值。从中可以看出 × 教师对目前的学术研究缺乏一种认同感。第四个原因是大量的培训任务占据 × 教师太多的精力，导致他没有时间完成博士论文，利用持续的时间进行科研活动。× 教师每年都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全国各地进行培训与演讲。这些培训每年给 × 教师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和社会名望。这样导致 × 教师没有时间与精力去完成他的博士论文，只能做一个“知识贩子”而离“知识生产者”越来越远。以上就是对 × 教师评不上副教授的四点结论。总结而说，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本研究对一些问题的深层挖掘还不够。比如 × 教师热衷教学而对科研心存冷漠，而为什么有些教师却形成了对学术的一种良好认同。× 教师究竟如何对学术研究失去了热情值得深挖。其次，× 教师一直提到教学与科研是对立的。教学与科研是对立关系吗？为什么不能相互促进呢？我们可以从研究对象那里深挖答案。其三，现在的研究型大学都提出知识生产这个说法，而 × 教师却坚持做一个“知识贩子”。这里面的原因也值得深挖。本次研究结果如此肤浅有很多原因。一是因为研究对象工作事务繁忙，为不过多地打扰研究对象的工作我仅进行了两次访谈。二是因为我所研究的教师职称晋升问题非常的敏感，出于研究伦理的考虑，我没有对研究对象的领导和同事进行访谈，也没有深入地询问 × 教师学生一些敏感的问题。三是我自身的原因。这是我第一次正式地进行质性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留下了一些遗憾。如没有注意到一些突破点或没有及时抓住本土概念进行追踪访谈等。

23. 作者对个案本身有所描述与分析，但是对于个案延伸的意义与蕴含的社会关系、结构层面的分析缺乏论述。

24. 这里需要分段论述。下面的内容属于“本文的不足”部分，应该单列。

本研究效度需要进一步提高。首先研究的访谈次数偏少，而且时间比较集中。访谈次数偏少导致研究资料不够全面和丰富。访谈时间比较集中导致研究者在没有充分分析已有研究资料的时候就进行了下一次访谈，这样的访谈缺乏针对性和深入性。此外，我所获得的大多数研究资料都来自 × 教师和他的学生。因为研究问题非常敏感，出于研究伦理考虑我没有对 × 教师的领导和同事进行访谈。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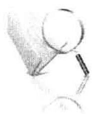
导致我的研究资料没有形成三角佐证或者说形成一个 360 度的信息圈。这都降低了本研究的效度。

本研究是一个案研究，我并没有奢望研究具有多大的推广度。通过对论文选题的聚焦以及研究的步步进行，我的研究对象越来越清晰，即为研究型大学社会科学专业里一位没有获得博士学位，教学与社会培训都非常出色但对纯粹的学术研究失去兴趣的中年教师。研究问题即是 × 教师为什么一直评不上教授。在当下的研究型大学里，像 × 教师一样的教师不在少数。他们热衷教学并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凭着自己的实力以及所在大学的名气长期奔波于各个城市进行培训。随着年纪的增大他们慢慢地失去获取博士学位的信心，并且与学术研究渐行渐远。最关键的是他们评上副教授已有十多年仍没有获得教授职称。因此，我认为本研究可以给针对上述这个教师群体进行的研究提供支持。最后阐述本研究的伦理道德问题。由于研究问题敏感，稍有不慎即会对研究对象造成伤害。因此我在进行研究时本着透明、坦诚、谨慎的原则进行研究。在第一次与研究对象接洽时我便表明了研究意图。此外，在访谈与观察过程中我征得研究对象同意才进行录音。最后，基于研究伦理考虑我放弃了对 × 教师的同事与领导进行访谈。

25. 作者确实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有自己的一些思考。但是，有些重要内容至少应该在论文中尝试着去论述。有些“不足”已经严重影响到论文的深度与个案的完整性。甚至挑战了研究问题的适合性与可行性；或者说，作者的研究设计，所采取的方法是否能够回答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多大程度上能够回答研究问题？

**［参考文献］**

陈向明（2000）：《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陈向明（1996）："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了：一位辍学生的个案调查教育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第 1 期，第 35–45 页。
大卫·费特曼（2007）：《民族志：步步深入》，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金耀基（2008）：《大学之理念》（第 2 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潘懋元（2003）："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高等教育研究》，第 6 期，第 1–5 页。



## 文末“评”

作为一篇课堂作业，作者给我们展现了质性研究的基本功与认真的科研态度。研究问题源于生活，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论文结构清晰，研究过程与方法的表述比较详细，访谈材料的呈现也比较细致、充分，有血有肉。作者扎根于经验材料，从被研究者 X 教师的角度，比较完整地展现了“为什么不能晋升为教授”的若干直接原因。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优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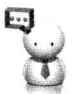
如果从质性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评述这篇论文，作者在以下方面还可以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1）质性研究的设计上，研究问题的理论意义需要进一步论述。文献回顾需要更加详细，在此基础上论述论文选题的创新性，也能为后期的分析与写作奠定对话的基础。

（2）收集资料，特别是访谈技巧方面，作者可以进一步提升自己追问的能力，即便是倾听，也是主动的倾听。访谈的结果，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互动的产物；互动得好，能够得到更多的细节，能够刺激被访者去思考、进行进一步的表述。研究者需要尊重被研究者的主体表述，但是不能完全被被访者牵着鼻子走，不能把其言论简单的作为“事实”来看待，不加质疑与追问。

（3）质性材料的分析方面，需要加强对于“访谈材料”本身进行叙述分析（区别于简单的事实分析）方面的策略，加强联系多方材料进行综合分析（甚至是批判式分析）的能力。扎根于经验材料的基础上，还需要结合已有文献知识与理论知识对材料进行“提炼”及进一步讨论。最后这点，也是质性研究最难的一点。

最后，诚如作者自己提到的，这个“晋升”个案的研究，只涉及了对于 X 教师这个当事人的访谈，缺乏对于个案其他相关人员与事件的了解；原因的探讨局限于 X 教师的个人层面及记载在规章中的表层晋升规则，而对于“晋升”所蕴含的复杂的人际权力关系与结构制度层面的公正、合理等问题缺乏分析与反思。这些，影响的是个案研究所需的“整体性”原则，以及对于个案的深层理解与深度分析。



## 学生回应

感谢黄盈盈老师精彩、细致、中肯的文中“点”与文末“评”。在这里我结合自己此次研究的感悟以及老师的点评做出回应。首先，文献分析部分做得过于简略。因为相关文献数量较多且同质性较大，因此，我在文中采用了“过分概括”的分类。其二，收集资料方面书写不够准确和细致。黄老师在文中点评中对我的一些专业词语的使用给出意见，我认为老师的看法非常恰当，如“抽样”改为“对象选择”，“进入现场”改为“建立关系”等。此外，正如点评老师所说，在写资料收集部分的时候，我在成文的过程中没有明确地写清楚访谈资料整理的依据以及引用的方式、访谈策略、访谈追问与话题转换的过程，这都是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注意的。其三，资料分析不深入。我深感自己的分析没有理论支撑，缺乏深入分析，更多是对被研究者访谈资料的罗列。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本人理论积淀以及分析资料收集丰富程度有关。此外，我本想采访被研究者的学生、领导、同事甚至家人，但因考虑到访谈会对被研究者造成不利，因此放弃了访谈计划。当然，这不是资料维度单一的理由，在今后的研究中我遇到此类问题会尝试运用变通的方法去获得完整全面的资料。质性研究的研究工具即研究者本身，我会在后面的时间里不断提高自身的各项能力，使自己具备进行深入质性研究的能力。

### 点评专家黄盈盈简介

黄盈盈：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性社会学、身体研究、艾滋病的社会因素、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等，著有《身体、性、性感：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日常生活研究》《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第二作者），《性社会学》（第二作者）等论著，及多篇社会调查研究方法领域的论文。

# 如何看待研究生培养与科研项目挂钩：

## 对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分博士研究生的调查

文／卢威[1]
评／刘云杉

[摘要] 以科研项目培养研究生，即所谓“课题制”是当前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访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部分博士生，发现他们对承担科研任务目的不明晰，承担科研项目并不必然使研究对象找到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研究对象对当前的“课题制”持批判态度。

[关键词] “课题制”　科研任务　研究生培养

---

[1] 卢威，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高等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学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文中“点”

1. 这一段表述，将科研项目与研究生培养“硬”拉在一起；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科研项目不是为“研究生教育”而创生。这是进入问题时的简单化，且简单之后有一个强的预设，即这是一项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需要思考：这是有意图、有计划的改革吗？还是被动的适应，或仅是一个合法化的说辞？或者是意料之外的“后果”？

2. 这一个问题应该有展开，即传统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是什么？新的机制的内涵究竟是什么？“科研项目”主导制与新培养机制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两个概念是不匹配的，是否以偏概全，或者仅是虚假的表象？

3. 什么是意义类问题？其特征是什么？其相对概念是什么？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的规模迅速扩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速度开始加快。规模的逐渐扩大，一方面，使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利益相关者急剧增多，进而使之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传统的研究生培养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一些旧存的制度框架、培养模式与新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于是，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就被提上了日程，并在近年来成为热点话题。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纷纷出台培养机制改革方案并付诸实施。那么，几年的改革过去了，新的研究生培养机制实施起来效果如何？我们有必要听一听改革的最大利益相关者——研究生们对此抱有何种认识和态度。本文即意在就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研究生培养与科研项目挂钩”进行研究。

## 一、问题的提出

在有关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诸多研究成果和政策文件中，我们多见的是决策者的声音，是管理者的见解，也多见“导师论导”，但是，作为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最大的利益相关者，研究生这个群体是如何认识和看待现在这个培养机制的，目前有很少的表达，即使有一些表达，也显得相对缺乏“分量”。但事实上，尊重研究生的话语权，探知其真实感受和认识，对我们全面了解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十分重要，这也将关系到改革的下一步走向以及改革的最终成败。正是基于此，笔者决定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本文的研究现象确定为：“博士生眼中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

那么具体的研究问题是什么？“寻找研究问题是一个不断聚焦的过程，从开始一个比较宽泛的视野，逐步缩小关注的范围，最后集中到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或数个问题上。”（陈向明，2000：78）基于研究条件和精力限制，笔者将研究问题进一步确定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是如何看待将研究生的招生、培养与导师的科研项目挂钩（研究生培养“课题制”，以下简称“课题制”）这一制度的？”该问题属于“意义类问题”。在本研究中，

主要包括两个研究维度，一是理解实然制度——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是如何理解研究生招生和培养的“课题制”的，他们有何经历和感受；二是评价实然制度——他们对这个制度有什么看法。

## 二、研究的背景

“课题制”是研究中的核心概念。笔者根据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有关研究生培养单位出台的文件，对这里的“课题制”作如下定义：所谓“课题制”，是指目前高校在研究生招生、培养过程中，以招生导师主持的课题为依据分配招生名额，并通过课题研究过程对研究生进行培养的制度。

4. 在具体的案例院校如何实施？从哪一年开始实施？实施之后，与之前有什么变化，这既是背景，也是问题，不容忽略。

目前，理论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很多研究建议已经转化为现实的政策规定。如有学者提出，“为了进一步发挥研究生教育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加强培养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社会实践能力和开拓创业精神，切实加强我国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的管理，鼓励在校研究生积极参加各种创新和创业科研活动，引导研究生选择创新性强及富有挑战性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课题”（神会存、梁纪凤，2012）。也有学者认为，“研究生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研究，是培养研究生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目前研究生开展科研活动，存在着选题不科学、参与科研积极性不高、科研经费不足和导师指导比较少等方面的问题。要加强研究生的科研选题管理，搭建研究生创新平台，为研究生营造良好的科研氛围，提高导师的素质，实现以导师科研项目为核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体系”（黄勇荣，2011）。总的来看，学界的很多研究都是大力提倡本文所定义的这种“课题制”的，均进行深刻反思的并不多。

5. 这样的判断空且大，要具体。

上述学术主张自然在政策层面有所反映。教育部已多次出台政策，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有关培养单位正在实施这些政策。中国人民大学从 2008 年研究生招生开始，“在保证人文学科和理工学科必要的招生名额的基础上，研究生的招生名额向重点学科、特色学科和一

些社会需求大的学科作适当倾斜，向研究水平高、科研项目多的导师作适当倾斜”（吴晓求、宋东霞、安志伟，2009）。《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办法（试行）〉的通知》（师校发〔2008〕20号）规定：“以科学研究为导向，将研究生培养与学科发展和科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研究生的招生名额、尤其是博士生招生名额要与导师的科研项目、科研经费挂钩。”“没有科研项目的博士生导师一般不得招收博士生。”“学校鼓励围绕重大科研项目以导师团队形式开展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招生和培养。”本研究正是在当前我国大力实施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将研究生培养与科研项目和经费挂钩的背景下开展的。

## 三、研究的方法

本研究主要应用以下研究方法：

### （一）访谈法

出于研究的便利，笔者选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部分博士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并主要通过访谈的形式来获知其看法，进行分析。

①抽样。研究对象的选择来自分层目的型抽样。这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虽然教育学部各专业都与教育学紧密相关，但是，各专业、各亚学科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别。而不同专业之间的差异，对能否采用“课题制”，或者说是否适合采用“课题制”，可能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笔者以“所属专业”或“所属亚学科”作为研究对象的划分标准，了解不同专业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面的适切性。为此，笔者选择的研究对象分别来自比较教育学专业（偏重人文社会科学，授予教育学博士学位）、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偏重人文社会科学，授予管理学博士学位）、教育技术学专业（偏重自然科学，授予教育学或理学博士学位）。

6. 三个学科之间的差异这个概括还是太泛，应有更详细的介绍。需要真正进入访谈对象的情境，理解他们具体的学术与培养生态。

②材料收集。在收集材料的方法上，主要是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访谈，根据预先拟定访谈提纲，向研究对象提问，但提问视现场情境而定，并可进行追问，不局限于提纲所

列内容。访谈问题尽可能中立，尽可能不向研究对象透露出笔者对某个问题的态度和看法。访谈活动须遵循一定的伦理道德原则，遵守双方约定。

### （二）文本分析法

除进行访谈外，笔者还通过登陆教育部门户网站、北京师范大学信息门户，收集到了政府和学校出台的有关文件，以备研究、分析之用。

由于笔者是在第3次听课时就确定了这个研究问题，因此，本研究报告是在前期准备材料的基础上整理成文的。

## 四、研究的结果

笔者在拟定“研究问题备忘录”、“关于研究对象、研究者个人身份及与研究者关系的备忘录”，对进入研究现场等环节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后，从2012年11月7日开始，先后对研究对象进行了3场访谈。在访谈之前，笔者写出了访谈提纲，大致规划了打算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大致分为分配给科研任务的时间、科研任务与个人研究计划的关联、来自科研任务的学习压力、对以课题培养研究生的态度与评价等方面，这就包括了我们研究的两个维度：即探明他们有何经历和感受，并了解其对这个制度的看法。部分访谈过程用手机进行了录像。

7. 这个访谈基本信息饱和了吗？

### （一）背景介绍

北京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该校的教育学一级学科是国家重点学科，在多次排名中均名列全国第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具有学士、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目前正在实施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本研究的对象即是来自教育学部不同专业的4位博士研究生。

研究对象A同学是女生，来自教育学部的比较教育学专业。先前她在某个单位工作，目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在职攻读博士学位。B同学是男生，来自教育学部的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其研究方向偏重于教育管理学，该同学尚未参加工作，属于非定向培养的博士研究生。B同学思维活跃，

热心参与活动，组织能力、表达能力都很强。C同学是女生，也来自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并也属于非定向培养，C同学平时爱说爱笑，比较乐于表达自己的意见。D同学来自教育学部的教育技术学专业，曾经在某高校工作几年，此次是辞职后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D同学平时热爱哲学，说话也有几分哲学意味，最有特色的口头禅是“没有什么是对的，也没有什么是错的”。所有研究对象，无论是否在职学习，其年龄均与笔者相仿。

在几次访谈进入现场时，笔者开门见山，直接暴露，向研究对象表明自己的来意。所有访谈活动全部在告知其来意并征得研究对象同意后进行，且承诺对其身份等信息作严格的保密。笔者主持的第1次访谈，时间在2012年11月7日（星期三）的下午四点多，出于双方便利，地点选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公寓学二楼E座511室。当天，笔者所在的课程学习小组本来已经约定访谈几位外国留学生，访谈的主题也不是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但由于留学生改变了想法，小组临时更换研究对象和访谈主题。经商定，由笔者对部分同学进行访谈，主题就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对将研究生的招生、培养与导师的科研项目挂钩（“课题制”）这一制度的看法”。A同学和B同学同时在场参加了访谈。笔者主持的第2次和第3次访谈，时间定在2013年1月4日（星期五）晚上，先单独访谈的是C同学，之后又单独访谈了D同学，地点同上。限于时间，笔者从访谈提纲中选择了一部分主要问题，同时根据情境需要进行了适当的追问和调整。

### （二）学习时间怎样分配：读书还是做课题

学习习惯对于一个人的学业成就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与中小学生和本专科生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能够自主学习，在学习中自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对此，养成自学的习惯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来说，自学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大量阅读。因此，笔者将阅读学术著作视为博士研究生应养成的重要学习习惯，是实现博士生“自我培养”的有效途径。这一部分问题旨在了

8. 这一问题与整个问题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应有一个总括性的解释，问题从以下哪几个方面展开，其内在逻辑是什么？

解博士生的学习时间中，承担科研项目占据多大比例，是否影响到了读书。以下，是笔者就此问题对 D 同学的访谈情况：

问：“你平时的学习习惯是怎样的？”

D：“我一般是上午精力充沛，所以都是早上学。”

问：“我不是说你的学习时间在几点，我是说——比如，你是否喜欢通过大量阅读来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D：“我不喜欢大量阅读。”

问：“那你认为阅读专业著作对自己的研究影响如何，有没有帮助，效果多大？”

D：“读书也没啥帮助，也没有觉得有啥效果。”

可见，就 D 同学而言，他似乎并不是十分认同读书对于专业学习的重要性。此外，从现实上看，D 同学也认为给他自己留出的读书时间不多，上课和承担科研任务已经挤压了他的读书时间：

“这学期主要是上课的门数多，做的活儿也较多，看书时间较少。”“没有学习，课太多，这学期没学到东西。”

9. 应该有一个学习周的时间表。

相比之下，B 同学似乎有一定的读书时间，并已经“制度化”。

问：“现在读书时间多不多？”

B：“我们有读书会，每周都要进行，一般是三周读一本书。”

那么，几位同学对学习时间是如何安排的呢？

问：“你一般每天学习多少时间，所有时间是怎么分配的？”

D：“每天……用于学习的时间是 3 到 4 个小时，然后每天睡觉 10 个小时，锻炼 1 个小时，然后就是玩儿，看电影、打游戏。……”

笔者分别在对 A 同学、C 同学和 D 同学的访谈中，发现两位同学在学习和处理其他事务、日常生活方面的时间分配上存在较大的差别。由于 A 同学是在职学习，所以她更多的时间基本用在了其他的事情上，相比之下，D 同学感觉学业上的负担较重。

问：“你是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的？每天用于学习的时间有多少？”

A：“时间不算太多。因为我是在职的嘛，要处理很多工作上的事情。一般……中午有两个小时，晚上，那个有两个小时用于学习，这是说工作日。周末两天中可以有一天时间来学习。”

问：“这些学习时间如果可以分为自主读书时间，完成承担科研任务时间，包括撰写导师布置的论文等材料，自己写论文的时间，上课时间，等等。那么，你觉得这些时间在你这里一般是如何分配的？”

10. 粗浅的访谈内容表示，博士生读书时间更多与学生的学习状态、学习习惯、学习动机、学习风格相关，科研侵占时间的议题在这几个案例学生上并不突出。

A：“老师知道我是在职的，所以也没给我布置什么活儿。我平时都是自主学习，如上课什么的。科研任务负担不重。”

### （三）如何看待科研任务与个人研究计划的联系

经过访谈，发现所有被问及的研究对象几乎都在承担着一定的科研任务。

问：“你是否已经开始参与导师主持的课题研究或其他科研任务？”

B：“是，正在承担导师主持的一个横向课题。”

问：“你在其中承担了什么任务，比如是对有关问题展开研究，还是做一些纯粹的“打杂”性工作，或是两者兼有？”

11. 这样的提问有诱导嫌疑。

B：“我们的课题是大家一起做，有我们上届的同学参加。老师在这里基本上就是一个“顾问”的角色，起着引导我们的作用，我们就是对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当然其他工作也很多。”

问：“也就是说，有一些“打杂”性质的工作？”

B：“是的，琐碎的也有，深入的也有。”

问：“你承担导师布置的课题和其他任务，导师经常就这些任务找你吗？”

B：“主要是我去找他，他找我的时候也有。”

D 同学也表示承担了科研任务，并对承担科研任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目前我已经参与科研任务，而且是挑大梁的角色，主要是做软件设计开发的。现在痛苦得要死，做课题是否都很痛苦？我不想做课题了，没思想。”D 同学在说到“做

课题是否都很痛苦？”脸上流露出一丝苦笑。

那么，参与导师布置的科研任务，对博士研究生本人的研究计划和研究思路的形成，有多大关联？这些课题对他们自己的科学研究能力培养有多大的作用？质言之，对课题任务的关心是否意味着直接有助于提高博士生的科研能力，并找准自己的方向，制定出自己的研究计划？对课题任务的关心能否等同于对博士生自己研究计划的关心？我们来听一听几位研究对象的看法。

问：“这些任务对你今后的研究计划或研究设想影响有多大？”

B：“我的科研任务与自己的研究计划有关联。我的研究计划就是从承担的任务中确定的。”

问：“你是否认真思考过自己未来的研究计划，目前有没有形成设想？”

B：“这些设想还不是很正式的。”

问：“你的导师就研究设想问题主动找过你吗？师生之间曾经就你未来的研究计划多次讨论过吗？”

B：“倒没有，不过老师很关心我们的生活，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

相比之下，D同学的导师看来很关注D同学的未来研究计划：

问：“你考虑过自己博士学习期间的研究计划吗？”

D：“没认真考虑过。导师让干什么活儿我就干啥。但是我考虑过毕业后干啥。不过导师就个人的研究计划找过我，而且多次讨论过。”

问：“那课题呢？导师经常找你吗？”

D：“导师就课题的事情倒是很少找我。我的任务还算少，但是一个大任务，这个大任务下面，分为两三个子任务，这些子任务之间的关联是一系列的。”

问：“你觉得这些任务和自己未来的研究关联怎样？”

D：“任务就是任务，还要完成。完成任务后发展自己的想法。导师让你干活儿，即使你自己不明白，但导师应该有其用意，要理解他们。”

看来，导师给学生布置的科研任务，对B同学未来的研究计划的形成以至于个人学术思想的形成还是有帮助的。

B同学的学术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脱胎于导师的思想。也就是说，通过参与导师安排的科研任务。B同学逐步实现了对导师学术思想的传承。尽管B同学表示，到目前为止，自己的导师尚未就研究计划问题专门找过他，但是，在一定程度上，B同学的研究计划在参与课题研究中逐步形成。而在D同学那里，导师很关心学生的研究计划，并对此多次交流。这种反差体现出两位导师指导风格的不同。D同学对科研任务与自己研究计划的助益抱有乐观态度，但他似乎对未来的研究计划缺乏主动的构思，在科研任务中显得有些被动。

12."传承" 这个用词需要再斟酌。

### （四）如何看待来自科研任务的学习压力

在学习压力方面，凡是被问到相关问题的研究对象普遍反映，觉得自己面临学习压力，但对压力的程度反应不同。有的同学认为压力较大，而有的同学则不持此观点。

以下是笔者与同学的交谈：

问："你觉得你的学习压力大不大？你觉得目前承受的压力的程度对你的研究影响如何，是压力过大、压力不大，还是适中？"

D："压力……有点压力，但是感觉不大。从自我实现看压力不大；但从外在的角度看，有压力，比如发论文。"

问："这些压力更多来自哪些方面？压力主要来自哪里，是自己还是导师，还是来自其他方面？"

D："压力主要来自制度，毕竟导师也是制度的产物嘛！"

13. 这样正确但不直接的归因意义不大。

再来看看C同学的回答：

"我们个个都被逼抗高度压力的。""我们都是可怜的牛啊。""说实话我不理解为啥要给学生那么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也许这是一种训练，要求把我们练成钢铁。……我们就像钢铁那样被熬练……几十年以后就用得上我们现在所熬过的苦。"

### （五）对以课题培养研究生的态度与评价

笔者认为，当前这种以科研项目来决定研究生培养的制度背后，事实上存在着这么一种动力机制——强烈的绩效至上主义。新管理主义的话语已经严重渗透进了大学。

因此在访谈中，笔者向D同学提了一个问题：“你对当前学界流行的一种趋势‘不发表就出局’，以及以课题来决定研究生招生培养的制度是如何看的？”D同学很干脆地回答说：“强烈反对！那还不使导师变成资本家了！不发表就淘汰，都是垃圾。这哪能培养什么学术？哪有思想？”

### （六）小结

在访谈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被问及的研究对象都在承担着一定的科研任务。但不同的研究对象所承担科研任务的多少和难度存在不同。他们面临的压力程度也不尽相同，同时，压力的来源也是多方面的，尽管这都是学业上的压力。此外，一些研究对象虽然正在承担一定的导师安排的科研任务，但对自己承担这些任务的目的，以及这些任务与自己未来研究计划的契合性、连贯性等问题，尚未形成明确的认识，另外，一位受访者对当前的“课题制”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态度。从其表态上看，他似乎不认同当前以课题培养研究生的方式，认为这不能培养人的思想。

一些研究对象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漫无目的”做课题，这些课题被当做所谓的“活儿”对待，而所谓的“活儿”则表明一种态度，即这是外在的、强加的。事实上，本研究也正是将“活儿”认定为本土概念。而有的同学则在承担的科研任务中找到了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这说明，做课题并不必然有利于研究生找到自己的研究目标和计划。对部分研究对象而言，师生之间就科研任务的目的尚需要进一步磋商。对导师来说，应该明确让学生承担科研任务的目的——做课题不是为了单纯地产出成果，更不能在师生之间形成利益关系，其首要目的是培养人；对博士生来说，要与导师做好沟通，而且要主动思考自己的研究方向。本研究的另一本土概念就是“体制”。正如有一位研究对象所言，“导师也是体制的产物”。“体制”一词，事实上将我们从事物的表象导入了对深层次根源的思考。也许，正是现象背后庞大的体制力量，才造成了如今的局面。

虽然上面这些都是研究对象的看法，并不必然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从研究生的视角折射出当前研究生培养方面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普遍存在的话，则正是理论界和实践者需要关注和解决的。当前这种

研究生培养“课题制”，某种程度上源自知识生产模式的变迁和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根据迈克尔·吉本斯等学者的研究，当前知识生产模式发生了变迁，即从模式 1 转向模式 1 和模式 2 并存的时代。相对于模式 1，模式 2 知识生产具有强调实用性、跨学科性和科研评价标准注重实用价值等特点。模式 2 的知识生产具有社会弥散性等特征——大学与社会的边界日益模糊。研究者产出科研成果，很大程度上并非来自“闲逸的好奇”，而是实用的需要。正如《高等教育哲学》一书的作者布鲁贝克所认为的，当前高等教育哲学正由认识论转向政治论。大学由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的时候，其社会责任便日益得到强调。大学日益受制于民族国家和市场，而我们所谓的纵向课题与横向课题正是外部施加影响并通过大学达到自身目的的工具，同时，外部还一并为大学提供资金。于是，大学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科研任务。另外，新管理主义的渗透，使得大学日益强调绩效至上，“不发表就出局”。于是，发论文、做课题就成为一股难以遏制的趋势。

这股趋势显然得到了公共政策的推动。以我国 2012 年上半年出台的《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简称“2011 计划”）为例，该意见强调，“紧密围绕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需求，通过协同创新，重点研究和解决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科学技术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以及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公益性问题。”对大学社会责任和学术绩效的强调，使得大学承担了大量的科研项目，于是，几乎所有具有研究能力的人都被吸收到科研项目中来。这是笔者认为当前以课题培养研究生的一个根源。

从实际情况看，伴随着学术资本主义的发展，研究生也确实出现了雇员化的趋势。这实际上并不利于研究生的培养。加之导师需要向学校交纳“培养费”，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剧。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以科研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资助制可能会引发一些相反的效应。其中之一就是“导师也有可能为了挽回“损失”，拼命给学生增加任务，使师生关系变为事实上的‘雇佣关系’”（罗向阳，支希哲，2010）。

14. 该校的政策中是否包括这一条？这在前面的背景中应有交待。

# 五、讨论与反思

## （一）推广问题

本研究的问题定位在北师大博士生是如何看待研究生培养与科研项目挂钩这一问题的。需说明的是，由于本研究的对象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部分博士研究生，因此，研究的结论仅出自这部分研究对象的个人经历、感知和认识，并不必然揭示出我国研究生对将研究生的招生、培养与导师的科研项目挂钩这一制度的整体看法和评价。例如，我们仅选取了4位研究对象，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就各不相同，那么，如果研究对象更多一些的话，可能还存在着更多的看法。也就是说，研究的结论并不能无限地推广，因此只能说是“管窥”而不得见全貌。同时，我们可以从访谈中了解这部分人的所思所想，从这个角度说，读者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获知当前研究生培养中的一些现状。正如陈向明教授在其论文《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了——一位辍学生的个案调查》中所说的，“虽然对王小刚的调查只是一个个案，其真实性只限制于他一人，可是对他辍学情况的深入剖析可以使很多处于类似情形的人得到一种认同，他们在读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迪和共鸣”（陈向明，1996）。

## （二）研究收获

如果说让笔者略感满意之处，就在于这一研究能够从研究生本人的视角出发，而不是在重复官方话语。作为研究生培养的真正对象和参与者，研究生们却被当成“他者”，几乎被排斥有关决策程序之外，他们的声音得不到有效的表达，他们的诉求也得不到应有的聆听，这不仅是我们在实施改革的决策程序上缺乏民主参与的体现，而且也难以使我们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作出正确的判断。因此，我们迫切想知道研究生的所思所想。这种想法，是难以通过数理研究方法获得的，毕竟，人的思想不能被“量化”。而质性研究则为我们获知这些想法搭建了桥梁。

## （三）研究不足

同时，本研究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一是研究的问题设

计得不够科学合理，发问方式也存在问题。通过访谈和撰写本文，笔者发现，并未全部获得自己想知晓的全部东西；在访谈后，笔者将访谈资料分为上文所列示的几个维度。难道就没有其他的维度吗？另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背后存在着这一想法，即研究生应该自主地大量阅读积累，而不是直接地参与课题研究，只出成果但不做积淀往往导致低水平重复。但是，这个想法合理吗？比如，如果导师布置的科研任务较少，甚至不去布置科研任务，这些研究生就一定会去读书吗？进一步说，他们能从读书中找到自己的研究方向吗？换言之，如果笔者认为当前以科研任务培养研究生的做法不合理，那么笔者自己的设想是否就相对合理呢？由于自己的想法可能不完善，所以据此设计的问题也不够合理。同时，由于所提出的问题比较少，也制约了笔者获知研究对象的一些想法。在发问方式上，如笔者问道，"你平时的学习习惯是怎样的？"就造成了歧义。笔者当时本想知道的是对方是否喜欢读书，但这种提问，却让对方理解为自己每天几点学习，显然是不合理的。

二是对每一位研究对象访谈时间相对短暂。访谈时间过短就导致了无法详细地了解研究对象的观点、态度，从而影响了研究质量。在访谈过程中，笔者与每一位研究对象的对话也就持续在 20 分钟左右，这样短暂的时间，恐怕无法使访谈深入下去，因为刚开始步入正题，谈话就快要结束了。事实上，笔者认为，就自己的研究问题，要想获得丰富的信息，访谈时间至少要持续半小时以上。导致访谈时间过短的主要原因,第一个方面是笔者性格偏于内向，自己总是害怕过多地给别人添麻烦。特别是看到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需要做的时候，笔者有意设计了较少的问题，并在提问的时候尽可能删繁就简。这样一来，就影响了信息的获取。第二个方面是自己的学业负担问题，毕竟自己也是作为一名博士生，承担着沉重的科研任务，现实中需要在多个不同的学习任务中协调，没有集中精力去做好这件事情。

三是访谈的准备工作不够充分。比如，没能对全部访谈过程实行录音、录像。在整个访谈过程中，笔者一边与研究对象交谈，一边自己记录，这无疑影响了访谈记录的

质量。因为“自问自记”往往会导致记录不够仔细，一些细节没能被记录下来，在研究对象语速较快，或者一次表达内容较多时，有时只能记下其大意，而难以逐字逐句地详细记录下来。此外，这还导致了另一问题，即虽然记载了研究对象的一些表情和肢体动作等非言语行为，但是记录得还不够细致。一个较好的做法，是征得研究对象同意后进行全程录像，不仅记录下交谈双方的言论内容和语气，还能记录下双方的表情和肢体动作等非言语行为。待取得详细记录后，在访谈结束后进行仔细整理，这样获得的资料才更全面、更细致。这些需要在以后的学习中不断反思和改进。

### （四）研究认识

总之，笔者认为，对此项研究来说，质性研究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非常常见的是量化研究方法的运用。特别是在科学主义话语霸权下，量化研究方法很受欢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一篇稿件运用了量化研究方法将大大提高其在学术期刊上的录用机会。笔者不否认量化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贡献，但相对而言，量化研究方法并不能解释一切。毕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对“人”的研究而不是对“物”的研究。关于“人”和“社会”的规律不可能被精确的计算和测度，也不存在纯粹的“客观”。我们有必要深入到“人”的中间，去了解它们的所思所想，理解意义并加以解释。

## [参考文献]

北京师范大学（2008）：《北京师范大学关于印发〈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办法（试行）〉的通知》（师校发〔2008〕20号），5月12日，北京。

陈向明（2000）：《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陈向明(1996):“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了：一位辍学生的个案调查”,《教育研究与实验》，第1期，第35–45页。

黄勇荣(2011):“论基于科研项目为核心的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118–120页。

罗向阳、支希哲(2010)：“以科研为主导的导师负责制和资助制的制度困境及其对策”，《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第2期，第16–20页。

神会存，梁纪凤（2012）：“基于产学研合作培养的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管理的研究”，《中国校外教育》，第18期，第49，20页。

吴晓求、宋东霞、安志伟：“以提高培养质量为核心全面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第4期，第7–10页。



## 文末“评”

关于选题：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成为研究问题？我们说，研究的问题应该有意思，有味道，有纵深度，有可以生成的概念，有可以对话的理论与传统。什么样的问题适宜于质性研究？这一问题应是一个“社会事实”，即它应有复杂性，有模糊性、有敏锐性，它应可以勾连制度、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又通过细微的主体意义显现出来。但是，从目前常见的学生论文选题来看，常见两个问题：第一，选题为个人问题，局限且仅局限在个人困境、情绪或者困惑中，多数研究停在表面，停在个人的诉苦、抱怨甚至控诉之中；第二，选题为片面的经验事实，即仅抓住一个小浪花，或者说有一个枝节的小线索，但却不能顺藤摸瓜，触摸到浪花后的河流，细节后更大、更复杂的真实。因此，长于深挖、且触角敏锐的质性研究，却常有以偏概全，或停在表面。

本研究的选题，有第二种失误。研究者希望探究的问题是：绩效制的管理下，对高校教师与博士生在治学、科研与人才培养上的影响。研究入手处是：课题制与博士培养；需要讨论的是：要深入地理解什么是课题？哪些课题是合理的？哪些课题是溢出学术研究之外的？课题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不同学科、不同院系、不同年资与状态的导师中，情形不同。在进入问题时，作者对课题制与博士生指导勾连这一制度，其由来与演变，其合理与不合理，其正当与不正当的边界或说阈限，需要做出仔细的考察，并提出相关的研究问题。即有明确的研究问题，构成一个悖论的问题，而不是停在一个现象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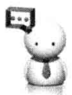
关于案例：在确定研究问题后，需要选择合适的研究对象，在此研究中是访谈对象。什么是合适的对象？一定是与研究问题有紧密联系的人或事，或者说这些人有足够的体验、足够的复杂性值得去做纵深的探究。遗憾的是，研究者仅是方便原则，找到身边的愿意接受访谈的人，在访谈过程与结果中，三位主要的访谈者均未深刻体会到课题与研究的冲突。因此，从三位的情况来看，有的是学习动机不足，学习难以进入积极状态；有的是学习工作难以兼顾，课题与探究的冲突这个问题一直就是研究者的问题，而不是研究对象的问题。

质性研究中选择案例是一个非常重要且艰苦的过程，但多数学生甚至学者以方便出发，且懒于方便，认为任何一个日常情境均可作出有意涵的研究，这是一个误识，更是一种懒惰。

落实到该研究，应从积极投入学习的博士生中寻找，即进入学习状态的学生中寻找。要兼顾不同的学科，譬如，课题制发端于工科，因此工科博士

生以及应用类学科博士生，如何看这里导师课题与自我探究的冲突，雇工与劳力的伦理冲突等；在人文学科，课题制在教师层面有很强的抵制，传统的人文学科（中文、历史、哲学等）的师生如何评价学校这一制度的实施？社科（譬如教育学部）鉴于两者之间，与每位博导的知识取向、每个博士点的知识特征有很大相关，有的偏实践，有的重理论，情况有不同。

研究者与研究问题、研究对象的关系：因为问题意识不清楚，对象不合宜，作者在整个研究中如醉汉行走，东扶西倒，研究问题一直是自己的问题，且一直没成为一个可以深入的学术问题；在访谈中，能看到常是作者将问题抛出去，访谈对象顺着提问的思路走，顺着提问的逻辑走。最后提出的"绩效主义"管理体制下，学术生态的变化，也看不出是研究过程中浮现出来的，而是作者突兀提出，研究对象点头承认。



## 学生回应

首先，非常感谢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刘云杉教授对文章进行的中肯点评与认真指导。

坦率地说，我之所以选这个题做研究，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个人的读博经历。从自己入学以来所从事的学习和研究看，大量时间被各种"科研任务"占据，这些"科研任务"主题分散，且过于强调产出而非积累。我认为，作为人文社科领域的博士生，必须坚持大量阅读、勤于思考，方能结出累累的学术硕果，此即所谓"厚积而薄发"；若沦为"学术生产机器"，没有阅读和思考、没有对某一研究领域和话题深入地长期关注与钻研，必然有损培养质量。我的文章，本身就是在这些繁多且未必有多大价值的"科研任务"重压下确定的选题，也是在这些重压下仓促完成的产物。当然，我并不想将这些客观条件的局限作为辩解理由。以上文字，意在为选题缘起及个人想法略作交代。

我认为，点评意见敏锐抓住了文章存在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在进行研究时所没有意识到的。我当时只是隐隐约约有一种似乎该说的没说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之感，但要说出这些没说全的内容，却又不清楚到底说什么、怎样说。当拿到这份反馈意见时，我方恍然大悟。仅就自己一点想法而

言，在研究对象选择上，我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方便”目的，文中提到“出于研究的便利，笔者选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部分博士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这就影响了研究对象选取的合理性。但仅就我为何“没有兼顾不同的学科”而论，这又不都是出于“方便”。这就涉及我的文章还存在的一个问题，即文中并未清楚交代：实际上，我是希望对作为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学学科（或领域）中的博士生对“课题制”的看法。晚近以来，虽“两种文化”的争辩始终未能画上“休止符”，但科学主义已经取得话语霸权是不争的事实。甚至我们一提起“科学”，往往无意识地将之等同于自然科学。科学主义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全面渗透，一些传统的人文社科领域正在迅速地“科学化”，例如，历史学在传统上属于人文学科，但计量史学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就使历史学带上了“科学”的色彩。教育学究竟属于哪一类，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还是综合学科尚存争议。我认为，包括教育学在内的一大批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科学主义影响和渗透下，正处于转型之中。回到我的研究，正是由于“课题制”发端于工科，我的兴趣才着眼于这一制度对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学学科（或领域）博士生培养的适切性问题。

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我需要进行深入地学习和持续地反思。

---

**点评专家刘云杉简介**

刘云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与人类发展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教授“教育导论”、“教育社会学”等课程。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工作18年，专业方向为教育社会学，研究领域为微观教育社会（教师与学生发展、课程与教学、学校文化与学校改革）。拥有九年从事高等教育的研究经验，九年从事中国农村与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研究的经验，特别是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田野研究，两年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方面的研究经验。

# “在家上学”现象动因窥探

文／李文静[1]
评／罗燕

[摘要]“在家上学”是近年来社会比较关注的热点问题。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部分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家长进行深度访谈，寻求“在家上学”生成的意义和内涵，并从教育权、主体教育理念、学校教育存在问题及现代网络信息方面揭示“在家上学”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在家上学” 内涵 动因

[1] 李文静，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政策学与教育法学专业 2012 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法与教育政策。

##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各地"在家上学"不断涌现，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关注这一现象。2006年上海"孟母堂事件"，将"在家上学"推向一个新阶段，"在家上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进入人们的视线。从已有研究来看，学者们主要从权利视角关注"在家上学"，不同学者从合法性和合理性论述自己的观点。由于"在家上学"与现行《义务教育法》中"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的规定相冲突，"在家上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这一争议引发公众和政府的诸多关注。

在教育民主化、多元化的背景下，所有的儿童和青少年依循同样的课程、统一的教材、整齐划一的进度，企图达成相同的教育目标，却忽略学生的天生能力、气质倾向和喜好差异，"在家上学"无疑对学校教育提出质疑。那么，"在家上学"是以学生的个性发展为基础和归宿的教育。它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形式，内涵是什么，根本动因何在，它的产生和发展折射出学校教育哪些弊端和不足……这些问题引发研究者进行思考。

近年来，北京、广州、上海成为"在家上学"最活跃的地区。其中，北京地区"在家上学"的现象更具有代表性。一方面，北京地区集中了大量文化水平高、父母自身素质好的家庭，能够为儿童"在家上学"提供良好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家长对学校教育的不满，选择个性化的教育和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在应试教育唯分数是从的当下，小升初、择校热带来的经济和升学压力，家长们为此逃出升学压力追求个性化的教育和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因此，以北京市为代表，对我国"在家上学"的根本动因进行研究有其必要性。

## 二、研究目的

①深入研究"在家上学"这一现象，对其现象背后的内容进行深挖，厘清"在家上学"的内涵，明确"在家上学"的对象、内容和方式，促进政府、公众等不同群体对"在

**文中"点"**

1. 质性研究报告的问题提出部分一般都是对"现象"的初描，非常忌讳在深描现象主体的"意识"以及基于该"意识"而形成的互动和行为模式之前，研究者先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出发对现象的性质加以判断或作出评论。

家上学”的正确认识。

②对“在家上学”的动因进行深入分析，探究“在家上学”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为它的合理性寻找依据，同时对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反思，以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 三、核心概念界定

随着欧美国家“在家上学”的不断发展，“在家上学”的理念也在不断更新，形式呈现多种多样，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界定。从国内相关文献来看，学者们对“在家上学”的内涵见仁见智。

学者申素平认为“在家上学”主要是指处于学龄阶段的儿童，不去公立或私立学校，而是选择在家，主要由其父亲或母亲进行教育和管理，接受其父母认为最适宜的教育。学者罗建河认为“在家上学”主要是学生不到学校接受一定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时间，而以家庭为中心，并由父母依需要对儿童进行教导的一种教育方式。台湾学者Chen Jui-Kuei认为，所谓“在家上学”，顾名思义，是指学生排除了到学校进行体制教育（有一定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时间）的受教方式，改为由家长依照其需要，自行在家给予孩子教导的另一种教育方式。学者孟四清认为“在家上学”，又称“在家自行教育”，是指在家长的安排下，由符合条件的专门人员，对学生进行有目的、有步骤的教育，以完成基础教育任务的教育活动。它包括传递知识、发展能力、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与心理品质等。

从学者们对“在家上学”的观点来看，“在家上学”有几个明显的特征：从“在家上学”的实施者来看，父母是“在家上学”的主要实施者，父母不仅是课程的设计者，教学过程的安排者，还是教学目标的制定者。此外，“在家上学”的实施者还包括家庭教师、学堂和教育机构等；从“在家上学”的场所来看，主要指除公立学校外，家庭、教育机构、学堂和私塾等多种形式。从“在家上学”的教学内容来看，“在家上学”是父母及其监护人为子女提供的教育，不仅限于国家课程，还有自发课程、网络课程、

2. 质性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一种范式，其目的在于把“现象”主体的“意识”体系——主体意识的内容、主体意识之间的结构和关系，作为一种“事实”呈现出来。因此在质性研究中，现象和现象的动因是不可分的整体。这与量化研究把现象“概念化”，然后寻求其他概念建立关系模型以此来探求现象的动因，二者在方法论上是完全不同的。

3. 作为现象的“在家上学”，无须作为“概念”来界定。核心概念界定在量化研究中是必须步骤——服务于概念的操作化，但在质性研究中这不仅是多余的，而且和质性研究方法的认识论相违背。

借鉴国外课程等。从教育的对象来看，主要是指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主要包括小学和初中适龄儿童。

这里，我们认为"在家上学"是指处于学龄阶段的儿童，不选择去学校上学，而主要在家或者其他场所，由父母及其监护人提供的符合孩子身心特点的教育。"在家上学"这一现象背后所揭示的不仅仅是由学校到家庭的学习场所的时空转换，而是父母教育权和国家教育权的让渡，以及受教育选择权的体现。

## 四、研究方法

### （一）进入现场的方式

由于"在家上学"群体相对隐蔽，对他们进行动态的关注比较困难。通过"在家上学"联盟，在家上学群，直接联系到"在家上学"的家长，对一些家长当面或电话进行访谈，从而了解"在家上学"这一群体的真实情况。此外，研究者加入"在家上学"QQ群，并成为其中的一员。通过每天对北京在家上学群、北京家学成长群、在家上学北京群进行浏览，与群成员互动交流，为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研究者观察了每个群主要关注的问题，如孩子的读书内容，兴趣培养，时间安排，学校教育的问题，体制教育的弊端，在家上学的主要问题等。此外，家长们还谈论孩子教育之外的事情，如婚姻、交通等日常生活问题。由于群里讨论内容繁多，研究者会根据他们谈论的内容进行适时切入，进行适当的引导，进而观察家长们对"在家上学"不同问题的看法，以保证材料的真实性。

4. 进入现场的方式对于读者判断质性研究数据的可信度非常重要。

由于联系方式的特殊性，研究者进入现场的方式也较为特殊。对于访谈对象的受访，研究者采用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的方式，向访谈对象说明自己的研究目的，征得对方同意后进行访谈。访谈采用开放式访谈和半开放式访谈。当然，访谈提纲是事先设计的，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尽量避免预先假设的摄入，抛出问题后，客观记录被访者对"在家上学"的看法，并进行适当引导和纠偏，对受访者关于"在家上学"的意义建构进行倾听、理解和解释。

## （二）收集资料

“在家上学”对象牵涉众多，有家长、学生、教师、教育机构、地方和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研究的需要，研究对象主要选取“在家上学”的家长。家长是“在家上学”的主要实施者，他们对“在家上学”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具有发言权，对他们进行访谈能够获取“在家上学”的详实资料，从而正确认识“在家上学”的内涵，揭示“在家上学”的根本动因。根据研究问题，采取滚雪球抽样和目的性抽样，对北京市各区学龄儿童“在家上学”中的家长进行访谈。由于研究条件有限，选取其中两位具有代表性的家长做访谈。这些家长定期参加“在家上学”活动，所以有机会接触到他们。每位家长每次访谈时间约 1.5 ~ 2 小时，一共访谈 2 次，第一次是在 2012 年 11 月 30 日，第二次是 2013 年 2 月 27 日。访谈从类型上来说分为两种：正式的结构性（或半结构性）访谈和非正式的无结构访谈。本文主要采用结构式（或半结构性）访谈，事先设计访谈提纲，通过访谈提纲对被访者进行访问。此外，两位家长还提供每一期“在家上学”的活动图片，共有 20 张；“在家上学”研讨会资料 3 份；儿童“在家上学”日记 2 册；这些实物也为本研究提供了资料来源。

5. 在质性研究报告的研究方法部分，一般需要对研究的数据种类及其取得方式进行介绍。如果使用了访谈法，就需要说明被访谈者是如何选取的。与量化研究不同的是，研究的“代表性”不是通过被试数来保证的，也就是说并不是被访谈者越多就越具有代表性。质性研究的被访谈对象是通过对现象深入挖掘后，根据现象主体的范围和种类来确定的。因此，一个质性研究最终需要多少被访谈者在研究的最初是无法确定的。有经验的质性研究者不断深入现象，发现更多的访谈只带来重复的信息时，一般表明已触摸到现象“边界”，即可确定不再需要更多的被访谈者。

**访谈一 坚定信念选择“在家上学”**

赵程，12 岁，现住北京海淀区，是一名六年级“在家上学”的儿童。谈起孩子“在家上学”的原因，赵程妈妈说：“因为孩子视力不好，所以被迫‘在家上学’。”在家上学以来，赵程妈妈对孩子的培养主要在学习能力方面，但更多的是引导。她认为：“小学的语文、数学、英语对孩子来讲非常容易学，孩子自己有潜在的能力，是需要家长不断挖掘和开发的。学习是感悟、发现而不是死记硬背。而且有时候孩子的学习能力比自己都突出。”赵程妈妈坦言很多时候是孩子从生活上到学习上教自己，自己有时候也依赖孩子。当然，对孩子的教育不是散养，任其自由发展，妈妈需要不断地学习，多读书，要有更多更好的理念。赵程“在家上学”后，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回到学校参加考试在班级里的排名很高。此外，孩子还爱好朗诵和音乐，多次参加比赛取得名次，获得很多荣誉。孩子的这些兴趣是在

生活中自己用心发现的，而在学校老师们不能做到因材施教，孩子的兴趣在一定程度被抹杀了。事实证明，赵程妈妈的教育是成功的，这也坚定了她在家教育的信念。更因为自身是佛门弟子，在了解生命教育以后，对于生命是什么有了自己的价值体系。同时，她不断发现自己的内心并去修正，形成固定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形成自己的判断标准。可以说，内心坚定是赵程妈妈让孩子在家上学的强大动力。正如她所言。"孩子的一生不是为学习的，学习对于赵程来讲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具备了基本的学习技能后，能够在社会上立足，寻找自己的定位最为重要。学习要和生活结合一起，没有生活就没有学习，没有孩子的未来。"

对于高考，妈妈认为最重要的是尊重孩子的意见，让孩子学会做决定，学会判断，学会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孩子的未来不一定要高考，只要专注做自己的事，哪怕是一件小事，只要自己喜欢都可以支持孩子做下去。赵程妈妈还讲了一个发生在孩子爸爸身上的事情。赵程爸爸有一天看见一个 60 岁的白发老人在夕阳下静坐，他想到了自己的以后，安于现状的生活带来的最多不过是房子大一点，生活好一点，最终老的时候就会像老人一样叹岁月蹉跎。为什么不趁着还年轻做些自己喜欢做、有意义的事呢？于是，赵程爸爸放弃安稳的工作，下海经商，按照自己的兴趣，现在已经小有成就。丈夫的事情启发了妻子，她认为孩子是有潜能的，在某一个时期是会爆发的。社会标准对一个孩子是否是好孩子并不能说明什么。做好自己，能够实现个人的价值也是为国家作贡献。当然，坚定"在家上学"的信念需要抵住来自外界的压力，尤其是社会主流对"在家上学"的质疑。赵程妈妈也感到自己的责任很大，需要不断地学习。她认为很多孩子走在教育的边缘被忽视。孩子是一个生命体，需要被关注，需要关爱。同时，孩子的生活又离不开群体，在家上学的孩子并不孤单。赵程妈妈经常带孩子做义工，参加各种活动。如在社区学习佛学，很多小朋友来自北京各个区都来参加，因为兴趣一致，所以大家凑在一起。群体的力量帮助孩子找到很多组织，参加各种活动，一天都很忙。很多家长羡慕这种在家上学的孩子，但是由于没有精力和时间，只能将孩子送往公立学校。

6. 质性研究的数据呈现一般有两种形式：1) 如果现象主体较完整地呈现了"类型"特征时，即可使用案例陈述的方式；2) 如果现象主体虽有类型特征，但在现象的发生机制上却有共同的规律，这时可根据提炼出的解释框架对不同主体数据进行横向切割并加以比较分析。当研究者需要在研究报告中呈现访谈的原文时，它应该和研究者的思辨相结合，最好不要不加分析地将访谈原文堆砌在报告的正文中。

**访谈二 观望中的“在家上学”**

毛毛，今年9岁，现住北京市东城区，小学二年级。毛毛的妈妈赵女士前几年因身体原因，辞去工作，在家教育孩子。（方便起见将访谈者和受访者简称为“Q”与“A”。）

Q: 您最初决定让孩子留在家里学习的原因是什么？

A: 说来话长。儿子到学龄送入学校一段时间后，回来说话话语里带脏字，我很奇怪。后来有一次去学校听课，我发现教师用语不文明，这引起了我的不满。孩子还小，和什么人在一起就会学什么，老师作为引领者，不单单是要教会孩子如何学习，更应该教育孩子如何懂规矩，知礼仪。更重要的是，经过孩子在校的学习观察，我发现学校教育教学内容简单，作业重复，占用了孩子大部分时间，孩子没有时间来玩耍和锻炼身体。更过分的是，有些学校为了避免学生受伤，课间休息时间不允许学生上厕所，或者上厕所还要经过批准。作为母亲，我不能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摧残，我想给孩子自由发展的环境，而不是去管制他。由于身体原因，我辞去工作，于是选择“在家上学”。

Q: 您如何看待“在家上学”？

A: “在家上学”现在是受争议的。我孩子“在家上学”后，许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担心我把孩子的前程毁了，让我把孩子送回体制学校。我顶着很大的压力，还是坚持“在家上学”，我知道这需要付出很多。从经济上来讲，我不出去工作意味着家里少了一份收入，再者需要花费很大的人力和财力。孩子在家上学要请家教和参加各种特长班，开销会较大。尽管这样，“在家上学”我能够有充足的时间来观察孩子的兴趣、特点，找到合适孩子学习的方式，而学校的应试教育做不到对每一个孩子进行个性化的教育。学校教育缺乏道德，没有道德教育。传统文化缺失，教育中人性的东西没有了，孩子缺乏创造性。作为学校的老师应该包容、关爱和帮助每一个孩子，但是现实中老师很难做到关注每一个学生。老师有自己的准则，老师也是利己者，他们更加注重分数，注重考试和结果，培养出来的都是产品，缺乏对如何把学生培养成人的教育。可以说学校教育缺乏道德层面，没有道德教育。

Q: 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

A:“在家上学”的家长是需要学习的，需要持证上岗的，只有不断学习，才能给孩子提供更多更好的建议。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就上岗是不称职的。当妈妈是一个未来的新型职业，应该予以尊重。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属品，家长不应该为孩子做决定，而是为孩子创造环境，让孩子自己做出选择。

Q: 那您孩子每天的学习怎样安排?

A: 我们有一个课程表原来是早上8点起床开始学习，吃完午饭睡觉，下午他可以弹钢琴、看书，晚上听我讲课，一般是文史和英语，偶尔也讲数学。主要是我来辅导，但并不是那么严格，有时候会多让他玩一会。

Q: 您孩子现在的状况如何?

A: 毛毛去学校参加过考试，现在的知识水平大概和同年级的学生差不多。作为男孩子，我多鼓励他做一些户外运动。他喜欢踢足球，参加过几次比赛，表现尤其出色，教练也很看好。我打算继续培养他这方面的兴趣，发挥这方面的优势。学习成绩只要能跟上就可以了。现在给他找了一家私立学校，孩子觉得比较好，就让他先学一段时间。

Q: 您不担心孩子没有学籍不能高考?

A: 没有学籍可以参加成人自考啊。高考对于孩子来说不是唯一的出路。再说我们孩子前几年上过学校，一直还保留学籍呢。学校说想回来随时回来。

Q: 您为何又选择让孩子回到学校?

A: 孩子的童年生活是需要一个群体的，在学校当中他能学习如何与同学发展友谊、解决冲突和矛盾，在群体中他能学到更多。我希望能给他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而且孩子也喜欢现在的学校，他们学校是私立学校，班级人数比较少，相对宽松和自由，没有那么多的考试和作业，孩子愿意去就尊重他的意见。

Q: 您不担心孩子再受到身体和心理的不良影响?

A: 我相信一个好的老师是负责任的。老师也有良心，选个好老师是可以对孩子负责的，我现在选学校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在看由什么样的老师来教我的孩子。如果教得不好，我会让孩子退出的。但是也要尊重孩子的意见。

Q: 如果学校从德育到智育都比较好，您还会送孩子去

学校么？

A: 当然。“在家上学”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迫不得已的。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财力。中国的体制教育存在问题不是一天能解决的，但是若能在课程方面和育人方面做出一些改革，学校能够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能够因材施教，关注每一个孩子。我们还是会选择回到学校。现在一些私立学校做得比较好，我还是愿意让孩子试试，如果不合适，还会让孩子退出，而现在还在观望中。

### （三）分析资料

资料分析主要采用类属分析和情景分析的方法。在“在家上学”的认识方面，研究主要根据已有研究将“在家上学”分为在家上学主体、对象、目的、方式几个维度，对其进行编码归类。“在家上学”的根本动因方面，主要从学校教育的弊端和“在家上学”的优势两个方面进行编码归类。在材料分析的过程中，我本着向原始资料“投降”的态度，将自己的前设和价值判断悬置起来，客观的分析资料呈现的内容和价值。

7. 在质性研究中，数据分析的形式和所能取得的深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自身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深度。而这正是质性研究在学术中独具魅力的原因所在。

①“在家上学”本土概念。在我访谈的过程中，我听到了“在家上学”、“在家学习”、“在家教育”、“家庭教育”等词，但多次听到了“在家上学”这个词，不同被访者对于“在家上学”的理解各不相同。有家长认为“在家上学”就是“在家里上学”，给孩子每天安排固定的学习时间，固定的学习内容。与学校不同的是，根据孩子自身发展的特点进行教育，重视对孩子兴趣的培养。同时还注重孩子情感和行为层面的教育。他们更多采用的词是“因材施教”、“兴趣”、“适合孩子的教育”、“创造性”、“潜力”、“潜能”、“喜欢做”、“专注”等，这些词的背后隐射家长的教育理念，因兴趣不同而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学习方式，而这些方式的选择是建立在尊重孩子的选择基础之上。家长只是提供了不同的教育方式供孩子参考，而真正做出选择的是孩子自身。尊重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在家上学”的内在要求。还有家长认为“在家上学”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其实质上还是家庭教育的模式和方法，对孩子更加注重德育和传统文化的教授。这种看法

更多见的词是"知礼仪"、"关爱"、"包容"、"帮助"等。

"在家上学"在本研究中与学者们所界定的"在家上学"有所不同。从对象上来看，"在家上学"的儿童不仅包括学龄阶段，而且包括学前教育阶段。从研究内容来看，西方国家确定了"在家上学"的合法性，对"在家上学"的内容、形式、主体进行立法规范。美国规定"在家上学"是在家进行的正式教育。而我的研究中，家长们对"在家上学"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家庭教育的特点，具有随意性和灵活性。家长根据自己孩子的兴趣安排课程，更加注重孩子兴趣的培养和个人修养层面的教育。从教育的方法来看，避免学校教育的统一化，教材的选取、教学方法的实施都是根据家长自身的经验和孩子的反馈进行调试的。"在家上学"体现家长对个性化教育的追求。这种个性化教育的追求是以儿童为中心，注重孩子个体的发展，以孩子的兴趣为基本出发点，重在培养儿童的人格和自我发展。这样一种教育理念追根溯源是主体教育观的体现。

②在家上学的动因。在对"在家上学"的原因理解上，被访者的目的并不一致。"提供适合孩子的教育"、"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校弊端太多了，不想去学校"、"培养孩子的兴趣和特长大于学习本身"、"让孩子在生活中学习"，等等，这些都成为"在家上学"的原因。

从"在家上学"本身来看，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多关注因材施教，孩子的兴趣培养，良好的习惯和品格，重视孩子个性的发展，适合孩子的教育。这些因素成为"在家上学"的主要原因。深入分析受访者的意义建构，我发现家长们之所以对"在家上学"如此青睐，源自于他们自身的教育理念。孩子的学习不仅仅是学习文化和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兴趣、学习能力、情感行为层面。脱离体制教育，追求适合孩子的教育是家长们追求的教育方式。家长教育观念的多元化和教育行为的多样化，使家庭教育的功能不断扩大。它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养育的功能，并逐渐扩大为传递知识、培养良好的个性及开发潜能，即担负起学校教育的某些职能。"在家上学"的家长在孩子教育过程中的介入越来越多，家庭教育在儿童义务教育阶段的作用也引起关注。

在谈及学校教育时，家长们对学校教育的斥责声不断。作业多、重视分数，教学方法落后，不能因材施教，缺乏德育，忽视对学生身心健康的关注成为家长否定学校教育的主要原因。学校教育的弊端固然很多，但根本上是学校教育理念使然。教育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在学校教育中也日渐盛行。一些公立学校为自身利益打着素质教育的幌子，一心为应试教育而努力挣扎，关注好学生为学校取得的利益而牺牲了大部分学生的培养。以考试为唯一评价机制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和学习兴趣。在分数至上的指挥棒下，教师的功利心滋生，责任缺失。对于学校教育，有些家长已经成为"惊弓之鸟"，唯恐自己的孩子被当作产品来生产，家长们对学校教育处于观望的状态中。学校对"在家上学"的儿童亦是处于默认或无视状态。家长们只要向学校申请，即可同意。并没有哪所学校强迫学生不得离校，家长们可以充分选择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和场所。至于高考，通过成人自考的形式，也可以获得学历。这些因素也成为"在家上学"的原因。

## 五、研究结论

### （一）"在家上学"是社会转型时期"要上学"到"上好学"的教育权利诉求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初，学界掀起了教育本质大讨论的热潮。先后出现"教育上层建筑说"、"教育经济基础说"、"教育特殊学说"等。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逐渐苏醒。教育的目的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教育的终极价值是实现人的价值，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自由发展的人，为社会政治服务只是实现人的价值的组成部分。国家有对国民进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义务教育作为基础教育，是对儿童受教育权的基本保障，它的价值更多在于"能上学"，而"上好学"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上好学"不是去最好的学校，而是根据孩子的身心特点选择最好的教育方式。父母作为儿童的监护者，更有权利和义务为儿童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选择适合其自

身发展的教育方式。“在家上学”体现国家教育权向父母教育权的让渡。

### （二）主体教育理念为“在家上学”提供内在动力

教育的功能是将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科学知识和经验“内化”为个体的精神财富，发展和提高他们的主体性，造就未来社会的行为主体。主体教育观是人们把受教育者培养和发展成为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的实践活动的认识。主体教育观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发展学生的主体能力，塑造学生的主体人格。儿童的发展是一个由他律到自律，主体性日益强化的过程，通过激发儿童的主体意识，培养儿童的主体能力和主体人格，才会使儿童由“自在”主体转向“自为”主体。此外，主体教育观还将非理性的发展看作学生身心发展的重要内容。不仅要重视儿童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智力发展，而且要重视培养学生的情感、灵感、直觉等非理性因素，即塑造学生的主体人格。

受传统教育思想的束缚，我国教育目的在价值取向上，注重社会本位，忽视个人本位；重视国家政治取向，忽视个人发展。传统教育观以社会为本位，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重视将受教育者培养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在教育过程中，把儿童看作教育的对象和客体，重传授而非引导，抹杀了儿童在学习过程中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在家上学”是主体教育理念使然，是对传统教育观的反思。在主体教育观影响下，家长关注孩子的主体发展，把培养孩子的主体意识、主体能力和主体人格作为教育的宗旨。培养孩子的兴趣和爱好，给孩子以心灵的教育和洗涤，关注孩子的身心发展，让孩子学会自主选择，还原孩子的生活世界，让他们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是主体教育观的体现。

### （三）学校教育问题重重，直接触发规模“在家上学”

“在家上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学校教育的挑战。学校教育现存的一些问题值得反思。学校教育的问题表现在:

①校园环境不容乐观。校车事故、低俗文化泛滥、校园暴力事件不断增多导致学生的身心发展受到不良影响，

这些校园安全问题成为很多家长选择在家上学的原因。

②应试教育分数至上，忽视儿童德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目前学校教育以应试为导向，学校成为一个以成绩论英雄的地方，而分数作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将孩子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试卷和考试中。学生的学习压力大，作业多，教课方式比较单一，注重分数，没有做到让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应试教育还增加了学生的心理压力和学习负担，甚至还使学生出现了与此有关的心理问题，如考试焦虑、厌学等，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

③学校教育功利化倾向。学校教育功利化的价值取向体现在学校教育中。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往往忽视学生的个体发展，助长了应试教育的风潮。以分数至上，以高考为指挥棒，以学校名誉和地方政绩为重的功利思想无时无刻不存在于学校教育过程中。重视部分好学生的发展带来的利益而忽视对绝大多数学生的关注和重视。一些家长因不满学校中的不良风气而选择“在家上学”。

学校教育弱的时候，正是家庭教育强的时候。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并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相互补充,相互影响。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不能退出教育舞台，而应该在儿童受教育过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家上学”恰好是反映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家庭教育介入学校教育的必要性。

### （四）现代网络科技为“在家上学”提供了便利条件

从“在家上学”的外部环境来看，现代网络科技的进步为“在家上学”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一些家长们可以通过网络获得更多更高质量的教育信息，选择适合孩子的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好学”成为一部分人关注的热点。作为受教育者的监护人，“在家上学”的家长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能够提供给孩子更好的环境，有利于孩子更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陈桂生（2003）：“也谈在家上学”，《当代教育论坛》，第 8 期，第 34–35 页。

罗建河（2003）：“试论在家教育与教育机会均等”，《上海教育研究》，第 7 期，第 21–23 页。

蒙冰峰、廉永杰（2010）：“主体性到主体间性：道德人格教育的应然转向”，《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3 期，第 52–54 页。

申素平（2008）：“在家教育的法理分析——从我国在家教育第一案说起”，《中国教育学刊》，第 7 期，第 28–30 页。

余若峡（2010）：“自然法视角下的国家教育权”，《教育发展研究》，第 11 期，第 59–62 页。

张庆林（1998）：“试论主体教育”，《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2 期，第 44–46 页。

张婷（2007）：“从教育权的演变史看我国的国家教育权问题”，《吉林教育教科研版》，第 8 期，第 1–3 页。

孟四清（2002）：“关于在家上学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上海教育科研》，第 2 期，第 53–55 页。

林祖鈖（2010）：“‘入学’不是保障受教育权的唯一途径：从“孟母堂”事件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缺陷”，《教育论坛》，第 5 期，第 3–5 页。

王海燕（2002）：“文化的多元与共生：美国‘在家上学’运动述评”，《苏州大学学报》，第 3 期，第 133–134 页。



## 文末“评”

自从20世纪80年代美国各州陆续制定相关法律确认“在家上学”的合法地位并出台相应支撑体系之后，美国“在家上学”(homeschooling) 的儿童数量便不断增长。据统计，美国2011—2012年期间在家上学的5～17岁的儿童已接近200万。近年来我国也开始出现“在家上学”的儿童，并且逐渐产生支持该教育实践的公共声音和公共资源平台。本文的研究者能够及时捕捉该现象，并尝试系统性地使用质性研究方法对该“现象”进行深描，研究在选题上具有新意，在方法论上具有恰当性。研究者使用结构和半结构访谈法从主体意识、活动、制度环境三个层次来呈现“在家上学”现象中最主要的主体（家长）对“在家上学”现象的诠释，访谈问题设计贴切、有效，研究发现丰富、生动，研究得出了清晰的结论，显示出研究者具有较好的研究能力。

不过，作为一个质性研究，本研究也有比较明显的缺陷：首先，本来应该深描的“现象”却在研究之初便以概念进行了界定，因此没能展现出现象学认识论对质性研究方法论的贡献，即质性研究的深描特点、优势在本研究中没有得到发挥。其次，研究不够深入，这突出表现为研究对其他主体（例如，在家上学的孩子）的意识、行为以及和制度环境的嵌入缺乏触及，因此极大地削弱了对“在家上学”现象的深描性。此外，虽然研究得出了清晰的结论，但数据的呈现和研究者的思辨分析以及结论的得出之间，彼此是分离的。这也影响到了研究的有效性。

虽然什么是好的质性研究在学术界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为研究者所普遍接受的一个认识是，好的质性研究应该具有整体性（holistic）——不仅不同主体各自的视角能够得到深入剖析和呈现，而且不同主体视角所具有的意识、活动乃至和制度环境的嵌入性彼此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也应该在研究中得到深刻呈现。研究的数据和分析应该是相互糅合、彼此支撑的。结论则是在这样条分缕析的过程中被推导出来的。如果研究者的写作风格还能生动有趣，便足以称得上一个好的质性研究。



## 学生回应

一个月的等待充满了期待和不安。我想说，罗老师对本研究的回评让我内心充满感激之情。罗老师在百忙中能够两次对我的研究进行深入而细致的评论，这样认真负责的态度、精益求精的精神让我深深为之感动。对本研究的评论使我对自己的研究以及质性研究有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认识，深深感到自己研究的不足和诸多需要继续学习的地方。对于罗老师的点评，我从以下几点做出回应：

1. 对于本研究的问题提出，我主要遵循自己的学科逻辑，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描述并加入主观的认识，并没有完全理解质性研究这一方法。质性研究可能更多层面是从现象学入手，而这种现象学是基于一定情境中的描述，并不需要明确提出自己的研究假设（研究预设），本研究的问题提出，在我现在看来，恰恰是对研究材料的概括和抽象，这是值得警醒的。

2. 就我的研究而言，如果说我的“在家上学”概念是以定量的方法进行界定，显然我不能苟同。我所界定的概念更多是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我对前人的理论进行梳理和总结，又带有一定的学科逻辑，对其进行深入挖掘，而非注重与其他的观念以及建立模型。当然，我也醒悟到，如果单纯从概念上来讲，质性研究的概念抽取很大意义上是从本土上提取，我也有意在寻找“在家上学”在情景中的内容，但由于前期的概念界定，将我对“在家上学”的认识锁定在一定的范围中，影响到我对“在家上学”的内涵的理解。

3. 对于数据的呈现和研究者的思辨分析以及结论的得出之间的关系而言，可能更重要的是处理研究者、前人的研究和文本呈现三者的关系。本研究开始将前人的研究进行梳理，对概念进行了界定，将前人的研究作为自己的概念的基础，然后根据已获得的数据资料进行解释、构建以及思辨分析，从而建构“在家上学”的概念，并根据文本资料反映的事实揭示它产生的动因。在研究过程中，我对数据的编码、处理没有在研究中做详细说明，并对资料进行的理论分析和解释还不够，我将进一步对本研究进行改进和完善。

我还想说，一学期的质性课程的学习，为我开启了做研究的另一片天空。研究方法是做研究的基础和法宝。质性研究无疑是诸多方法当中的一路，它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和体系。它注重以实践为依托，将价值中立（悬置），寻求被研究对象的意义世界及其所在的文化环境中的影响，从中寻求理论解释以及建构理论，最终关照现实。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方法的采取是以研究问题的性质和需要为依据，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适合同一种方法，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的适切性尤为关键，而采取何种方法嵌入自己的研究问题需要研究者进行深思熟虑。当然，有时候还需要研究者走回头路。

## 点评专家罗燕简介

罗燕，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部专家，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先后在教育学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等杂志发表文章20余篇。

# 教育学研究生专业认同的个案研究

文／张建[1]
评／裴森

[摘要] 学生专业认同研究，是指学习者对所学专业的接受与认可，并愿意以积极的态度和主动的行为去学习与探究。已有研究者大多以一所学校或多所学校的某一专业学生为对象，进行定量的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但是真正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学生的个案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北京某高校教育学研究生为例，从专业认同的三个维度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有以下两个方面：（1）教育学研究生外部因素影响专业认同，主要表现在本科专业、研究生就读专业、就读学校及学科实力、社会对教育学专业的评价、同伴群体对专业的认知、导师影响程度、专业就业状况等八种因素。（2）教育学研究生内部因素影响专业认同，主要表现在个人性格、考研动机、学习适应性和职业意愿等四种因素。文章还对上述内外部多个影响因素如何增进教育学研究生专业认同的意义和策略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教育学研究生　专业认同　个案研究

---

[1] 张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教育政策。

文中“点”

1. 这个判断需要有文献做支持，仅以北京师范大学一所学校为例似乎有些薄弱了。

2. 有数据论证吗？

## 一、研究缘起

近年来，在国家研究生教育培养机制改革和招生规模不断扩张的背景下，作为国家 13 个大学科门类之一的教育学学科，也在学科体系与招生规模上实现了自身的增容与扩展。在学科体系方面，教育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已经从最初的教育学原理、教育史和课程、教材、教法等仅有的几个传统学科，逐渐发展成为当前较为全面、系统的 13 个二级学科的教育学学科群。正是这一系统化学科体系的形成，使得教育学各个二级学科所招录和培养的研究生规模达到历史之最。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一级学科为例，2012 年招收硕士研究生 240 余人，博士研究生招生 70 余人。然而，在教育学学科的空前发展和招生人数不断攀升的同时，由于教育学学科自身专业性不强，以及教育学本科生生源有限，使得教育学研究生相对于其他学科较容易考取，并呈现出教育学研究生的生源十分复杂和广泛的现象，既有来自文科学科中的中文、法律、外语、政治等学科，还有来自于理科中的数学、物理、生物等，甚至还有来自于工科的学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教育学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教育学专业的认知、态度、学习适应性、教育研究以及未来从事教育工作的意愿如何，直接反映出教育学研究生对自己所学专业认同的状况。本研究选取部分教育学研究生作为个案，运用访谈法，对教育学研究生专业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以期为增进教育学研究生的专业认同、提高教育学研究生的学习兴趣、研究能力和提升教育学研究生培养质量提供有益的方向和指导。

## 二、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自弗洛伊德最早提出认同（identity）和埃里克森首次提出专业认同的概念后，有关专业认同研究便成为国内外研究的重要问题。目前，国内外学者都开始关注高校学生的专业认同问题。国外主要围绕专业认同的主要价值、影响因素、影响力等方面进行研究。其中，埃里克森认为专业认同是自我认同和自发发展的重要内容，与青少年对职

业领域的认同探寻过程有关，即要选择一项职业（Jonathon D. Brow n.，2004：72–91）。还有研究者经过研究，认为专业认同对学业成功、学习动机、专业发展都有积极影响（Thomas, L.，2002；Kuh, G.，2001：17–23）。国内关于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认同以及对学科专业认同的研究也较为广泛。一方面，对专业认同概念的界定已经取得基本一致。有研究者认为专业认同指学习者对所学专业的接受与认可，并愿意以积极的态度和主动的行为去学习与探究，表现为学习者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与特长，在诸多专业中将某一专业视为与自我同一的，而将其他专业视为他者，甚至希望自己成为与该专业杰出者一样的人的反应（王顶明、刘永存，2007：18）。专业认同包括对自己将会拥有或已经拥有某一专业群体成员身份的明确认识；对所学专业，所述群体的态度和情感以及相应的行为表现（黄涛，2008：5）。另一方面，关于学科专业的认同也是成为近年来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热点话题。比如，上海师范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地区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问卷的编制及相关研究》（黄涛，2008）、华东师范大学的《教育经济与管理硕士研究生的专业认同研究》（柳叶，2011）、苏州大学的《教育学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周三，2012）、《高等院校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研究》（周靖一，2012）等。这类硕士论文，大多都是通过对选取的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对搜集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得出结论。

3. 这一段作为文献综述太薄弱了。对核心概念的界定（对文献梳理后本研究的定义）、相关研究的梳理、分类、描述和判断等都比较薄弱，即便是有非常简洁的论述，也没有层次，读起来比较困难。

上述这些研究给予本研究的价值在于：一是对于专业认同的概念界定及其维度分类，对本研究问题的维度划分及其访谈提纲的制定都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二是上述这些硕士论文的定量研究数据及其结论，都给予本研究很多有价值的启发与反思。

## 三、研究方法

### （一）研究对象选择

本研究根据研究目的和质性研究对研究对象抽样的标准和策略，选取 Y 和 P 两位研究对象，其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所选取个案的基本信息

| 研究对象 | 性　别 | 学校层次 | 本科专业 | 是否工作 | 入学方式 |
|---|---|---|---|---|---|
| Y | 男 | 重点高校 | 数学 | 是 | 统考 |
| P | 男 | 重点高校 | 教育学 | 否 | 统考 |

如表 1 所示，所选取的研究对象 Y 和 P 的特征如下：

（1）研究对象 Y：① Y 同学本科就读数学专业，经过四年的本科学习，毕业后到我国南方一个经济发达城市的普通中学里，做一名中学数学教师，由于对一线教师工作的厌倦，在工作三年后，决定通过考研以改变现有工作与生活状态，并希望在研究生毕业后从事教育研究工作。因此，在工作的第三年，一边工作一边复习考研。最终成功考取全国教育学科重点院校。② Y 同学在就读研究生阶段，学习态度端正、勤奋刻苦，对自己专业知识的学习、教育研究的理解和实践、专业就业情况等都有着清晰的认识和了解。③ Y 同学有着明确的个人发展目标，也进行了清晰的职业生涯规划设计。不过这些特征是研究者和 Y 同学的简单接触后所了解到的一些粗浅认识。

（2）研究对象 P：① P 同学本科就读于我国中部省份一所普通本科院校的小学教育专业，其学校的教育学专业水平一般，在大学四年级时，通过努力考取北京的一所专业型重点院校的教育学院，也是当时本科同学中考取研究生的为数不多几个人之一。② P 同学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学习勤奋刻苦，并成为院长的一名学生，在参与导师的课题研究中，积极撰写论文并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上。七年的教育学专业学习，使其对教育学学科专业、专业学习对自己的影响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感悟。③ P 同学在学习过程中，对专业比较执著，并考取了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其对自己的专业发展和个人职业发展都已经有了初步规划。这些信息是研究者在与之简单交流中获得的，正是由于其表现出以上特征，所以选取其作为本研究的另一个案。

4. 应该不是因为研究对象有了这样的特征就选择，而是作为研究者我们对研究对象有一定的筛选指标，符合条件的才成为研究对象。

### （二）资料搜集方法

5. 这里没有论证为什么选择访谈法作为资料分析的方法。

访谈就是研究者“寻访”、“访问”被研究者并且进行“交谈”和“询问”的一种活动。“访谈”是一种研究

性交谈，是研究者通过口头谈话的方式从被研究者那里收集（或者说“建构”）第一手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陈向明，2000：165）。本研究探讨教育学研究生的专业认同，在选取质性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背景下，采用具体的访谈法，去获得被研究者对自己专业的认知、态度、情感、适应程度以及个人发展等不同方面的资料进行获取，通过访谈获取上述资源的过程中，对于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追问和探究，以便能够获取更多的关于被研究者内在的认识和看法。

首先，本研究采用了结构型访谈。也就是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按照事先设计好的、具有固定结构的访谈提纲，对访谈者进行既定问题的访谈，同时，为了更好地搜集和整理访谈资料，也在征求被访者的同意后，对访谈内容进行了录音。

其次，也对研究个案进行了无结构型的非正式访谈。这主要是在茶余饭后一同闲聊时，对于研究者的某一个重要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目的是在更为宽松、不受专业访谈氛围影响的情况下，了解被研究者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以及原因，了解他们对访谈中的某些内容较为详细的解释，也对被研究者所用到的本土概念的意义、内涵和指向进行探究。研究者在前期几次正式的结构型访谈的基础上，针对其中的个别问题，又不定时的对研究者进行了多次非正式访谈，每一次大概持续 20 分钟，这种访谈大多表现为具有主题性的闲聊，在每一次这样非正式问题探讨式访谈后，我便开始通过回忆畅谈内容，撰写一些主要观点的笔记，并在旁边撰写备忘录。最后发现，在这些非正式、问题式探讨中，获得了研究对象关于专业问题大量的、此前没有谈及的重要信息，甚至还说到一些问题背后的信息或故事。

## 四、研究结论

### （一）“较为冷门与专业性不强”

教育学研究生都有本科学习经历，但是不同本科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则表现出对教育学专业不同的看法。通过对研究生 Y 和 P 同学的访谈，发现他们对教育学专业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在对 Y 同学访谈中，谈及本科专业时，

6. 似乎只是对资料的初步分析和罗列，没有逻辑的梳理这些小点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与专业认同发生怎样的关联。没有给出两位研究对象的专业认同的整体概念。另外，分析过程也只是对数据进行呈现，很少看到作为研究者的解读，更没有跟理论和以往研究任何的关联。

Y 同学认为："我本科学的是数学，数学专业虽然学习起来比较单调，因为整天跟数字打交道，就是在算啊，算啊。但是如果要是适应的话，数学专业硕士毕业的话，就业很受欢迎的。我们班有的继续读数学研究生，他们毕业很受欢迎，尤其是各个省市的重点高中，当然由于数学是基础学科，也有很多同学选择考取金融、经济、会计等热门专业，因为考研究生有数学优势，这些专业就业也非常好。像我本科学数学考教育学的不是太多，教育学专业不如我本科数学专业，还是算比较冷门的专业。"

从 Y 同学的话中，可以明显感受到，Y 同学对数学专业学习的单调性有非常深刻的感触，但是其也对数学专业具有社会需求性强的特点有着清楚的认识，同时也看到数学专业在跨考金融等经济类研究生的专业优势。这也说明，Y 同学既看到数学专业在学习过程中的特点，也看到数学专业在就业和考研时的优势。事实上，这也是对数学专业的专业性和实用性的肯定，换言之，其对数学专业的实用价值有着清醒的了解。尽管 Y 同学没有对自己所学的硕士专业进行多少评价，但是从其所说的"很少有人考取教育学"，以及对数学专业的肯定态度来看，教育学没有数学专业性强和比较冷门的意思也是蕴含其中的。

而 P 同学在谈及本科专业时，也表达了对本科教育学专业的认识：

"我本科专业就是小学教育，不过这个专业不是我高考时报考的专业，是被调剂到这个专业的，这主要是当年高考成绩不够高，报考的经济学专业录取分数太高，被随机调到小学教育专业，当时，我们班有很多像我这样，被调剂到我们专业。从专业名称就知道个大概，就是毕业后到小学当老师。大学开学时，我们专业主要学习一些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小学课程与教学论方面的专业课。我们学习的知识比较泛，当时学院对我们专业的培养目标就是要培养具有全科型的小学老师。当时，我们班一些同学毕业时，也确实有不少去小学当老师了，尽管我们没有什么学科背景，不过小学对于学科要求不是太高，因为小学知识就那么多，像我们这样本科生知识体系肯定不是问题，人家小学也主要看个人的综合素质和教学技能。而像

我最后考研的就几个人，我之所以选择继续考教育学研究生，主要是受当时我们系一个学术颇有成就的老师影响的，他算是我学习教育学的启蒙老师了。尽管教育学本身专业性不强，但是如果持续学习下去，也会做出一些成果的。”

由此，看以看出，P 同学对自己本科专业的了解是由一个大概了解到深入了解的过程，对专业的适用性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也就是到小学对口就业。尽管对自己专业的劣势有着一定的认识，但是其也认为，只要经过自己努力，也会取得不错的成绩。这说明，P 同学在接触和学习教育学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和了解教育学的优势与不足，只要努力也会取得成功。

### （二）“实力强、资源多”、“传统学科”

由于教育学一级学科下有 13 个二级学科和其他一些自设学科，这些学科本身的研究内容、领域、学科属性都存在很大不同。不同学科的教育学研究生也表现出一些不同的认识。在对 Y 同学进行访谈时，当我问及现在就读什么专业时，Y 给我详细介绍了自己所学的专业：

“我学的是比较教育专业，当时我选择这个就是因为北师大教育学比较教育专业是国家重点学科，其不仅学科实力强，还有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当然，还有比较教育专业的学术期刊——《比较教育研究》，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我对高等教育感兴趣，想读比较高等教育方向，但是，我在入学选导师时，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恰恰给我分到研究基础教育的老师。”

从 Y 同学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其对北师大教育学各个二级学科是有一定了解的，尤其是对比较教育专业的优势也有着自己的分析看法。从 Y 的上述言语中，笔者可以深深的感到，其选择比较教育专业是经过仔细的分析和慎重的考虑的，如果考取比较教育专业的研究生，其在导师选择、研究内容上都会有一个理想的选择。不过在入学选择导师时，没有能如愿，也打乱了其研究生学习和研究的内容。总之，Y 同学经过慎重考虑报考比较教育专业，说明其认为比较教育专业在教育学专业里面是相对比较好的。如果考取，对于自己的学习和发展必定有一定的好处。

而P同学在这个问题也给出他的观点：

“我硕士就读专业是教育原理，由于我当时对教育学专业不是很了解，只是知道教育学原理学科开设比较早，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传统学科，很多学校都有教育原理专业。但是，在研究生学习过程中，才发现教育原理是一门基础性的理论学科，偏向于理论思辨，导师经常让我们读一些哲学、教育哲学方面的经典书籍，以提高自己看问题的深度。在整个教育学专业里，教育原理的应用性不强，硕士就业也随之比较困难。”

从P同学的话中，可以看出，其认为教育原理专业属于基础理论学科，专业知识主要在于知识的理论思辨与拓展，就业方面相对于其他应用性专业较差。从这些对专业的认识中，可以看出其对教育原理的专业性和应用性认同度不高，也对自己专业培养的学生的出路表现出一丝担忧。

从上述两位的访谈中，可以看出，两位受访者分别就读比较教育和教育原理专业，他们对两种专业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和认识，对专业较为了解的Y则对自己所学专业认同度较高，而对自己专业不太了解的P同学对专业认同则较为模糊或不高。

### （三）“优势大、就业好”，“学校好、起点高”

研究生就读教育学的学校及学科实力的高低对教育学研究生专业认同产生一定的影响。研究者在对Y同学进行访谈时，在谈及研究生所就读学校时，Y同学则这样介绍自己学校的教育学院：

“由于不想在中学当老师了，但又想从事教育行业，想想只有考教育学研究生，以后毕业能从事教育研究的工作，所以就决定考教育学研究生。由于师大的教育学是全国最好的，考上的话，毕业找工作时，必然就会有很大优势，所以就选择报考了师大。”

Y同学很自信地表达了其对师大教育学学科雄厚实力的认同，这种全国最好的教育学学科对自己的发展有帮助，尤其是在找工作上会有很大帮助。在Y同学谈及这些过程中，研究者也发现其非常的自信，这也说明其对师大教育学实力水平的认同，而这种认同也加强了其对自己专业的

认同。

而在谈及这个问题时，P 同学也向研究者这样表达了其个人的看法："由于我本科学习的是教育学，想考北京的高校，当时也想报考师大，但是我也查了历年师大教育学研究生的报名人数和分数线，知道竞争很激烈，所以就选了一所非师范大学的教育学，尽管学校教育学实力一般，但是学校的层次较高，如果考上的话，其实也是挺不错的。在研究生学习过程中，我在知识学习和研究中，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从 P 同学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其对地方和学校的看重，专业则次之。其分析了自己考研院校的选择策略，学校较之专业更为重要。学习在于个人，而不在于外在的条件。而事实也证明其这种选择的正确性，学校较好，起点高，就能够为其提供良好的学习平台。专业知识的积累和专业能力的提升，都在乎自己的努力，P 同学比较满意自己的研究生学习。

### （四）"别人看不上、影响力小"

教育学作为 13 个大学科门类之一，社会对这些学科也有一个认识和评判。社会上的这些对教育学的认可与否、评价好坏也对教育学研究生专业认同产生一些影响。比如在研究者对 Y 同学访谈中，Y 同学提到的这样一个事件：

"其实人家其他学科看不上教育学的，别看咱们学校教育学自己认为自己很强，但是别人倒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咱们学校心理学也说是全国最强的学科，但是跟心理学相比，咱们就相差很多。如果在外面，别人知道你是博士，就问你什么专业的博士，你说是教育学，别人就没有反应，如果你要说你是心理学博士，别人就会对你很崇拜。这不是我瞎说的，这是我的亲身体验啊。一次我坐火车回家时，和车上人聊天，也是一位知识分子，知道我学教育学，别人说不知道。"

Y 同学提到的这个事件反映出其对教育学学科的看法，受到外界评价的影响，也许正是由于 Y 同学的这个亲身感受，使其知道教育学在外人眼中的地位没有咱们自己专业的人想象的那么高。这也看出 Y 同学在对教育学专业认知

的过程中，既有自己作为教育学学习者的认识，也有受到外界认识的影响的认识。而且这种外界对于教育学专业不看好的态度,也弱化了其原先对于教育学专业的正面认识。所以，外界对于教育学专业看法的好坏，也深深地影响着教育学研究生原有的认知和态度。

### （五）“确实没有学科性、文章比较烂”

同伴群体对教育学研究生的专业认同也有很大的影响，同伴群体对专业的评价直接影响着研究生对自己专业的认同。这里的同伴群体主要包括同学、师兄、师姐等。研究者在对访谈中问及身边人认为教育学学科性较差，这种看法对你有影响吗？Y 同学则这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别人的这种说法确实对我有影响，因为同学之间会互相辩论，你学什么，我学什么，就会得出两句话。一个是比较教育没有学科性、第二句就是比较教育杂志上的文章都比较烂，全是描述性的，没有讨论分析。其实我自己也认同这种看法。无论是在复试之前也看看杂志，包括进入学校看一些杂志，确实能去比较教育做深入分析的真的很少，我也有自己的看法，为什么呢？这东西很难，你粗浅的陈述一件事情，那很简单，但是你要能深入的做比较，需要你真切的去过那个地方，你如果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你只是一手、二手、三手、八手的文献，那你再怎么做，都不太真实。再怎么分析，都很水的（质量都不高）。”

Y 同学明确表明，身边的师兄、师姐、同学对于教育学专业性的看法对自己影响较大，而且他们还对教育学学科性差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得出两句话的结论。当然，Y 同学也对大家的讨论进行了自己的反思，并对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从 Y 同学的上述看法中，可以看到同伴群体对教育学专业的看法和认识，对身在同伴群体中的个体来说影响是无时不在的，而且这种耳濡目染的影响往往是深刻的，不过 Y 同学也针对同伴群体对这个问题的谈论结果进行思考，也给出了一些简要的例证，以证明大家经过探讨得出的结论。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 Y 同学自己的专业问题，并不是人云亦云，而是会去分析问题是否存在，其原因是什么。

## （六）“有效指导专业学习、课题研究”

研究生导师是教育学研究生在学术道路上的领路人，其在知识传授、课题研究、学术指导等方面也对教育学研究生的专业认同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影响。研究者在访谈中谈及导师对自己的影响方面的问题时，被访者也表达了自己的见解。比如，Y 同学认为：

“研究生刚入学时，我导师说，我本科学数学的，有两个难度，一个就是从数学跨到教育学，就是从理科生的思维方式调整到文科生的思维方式，这是一个跨越。第二个就是我们比较教育专业，我们对外语要求很高。你要时时刻刻的准备，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我们当时学比较教育，没有别的事情，整天就是翻译。就是中翻英，英翻中，最有趣的事情是当时我们老师和英国的一个教授联合搞了一个项目，我没有参与到项目，我只是做过一些数据分析。老师可能觉得我是理科生，让我做数据分析，就看那个师姐就是先写中文稿，老师看过以后，翻译成英文稿，给外国教授看，外国教授看过以后，再翻译成中文稿，再给中国教授看。比较教育研究，有时候就是翻译。”

Y 同学说，导师提出自己的不足和今后重点努力的方向，一个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另一个是英语水平的提高。这使得其在学习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多看书来转变其思考问题的方式，另一方面就是通过翻译来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从这些可以看出，导师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清晰的，也让 Y 认识到比较教育专业学习的需求和重点，这些也指导着 Y 重视这些方面的学习，以提高这些基本功。事实上，这些也一定程度上加深了 Y 对专业的认识。在谈及是否跟导师做课题时，Y 同学也谈到：

“由于我们导师是比较传统的，强调专业基础知识，一年级都是上课、看书，帮她分析一些数据。因为我们导师以前很少做，都是拿一些现成的过来，做一些描述。后来她就做了一些问卷。然后我就帮他们录问卷，分析数据。后来到二年级时，就是翻译一些报告，英国政府的一些文件、白皮书。到二年级下学期了，她感觉我们可以开始做一些事情了，就跟她做了一个项目。选取的地点就是北京、山西和四川。”

Y 同学也承担着导师课题的一些任务，也加深了其对比较教育专业课题研究的内容、方法的了解，也使得其在知识学习过程中，初步具有做研究的一些基本素质和技能。可以看出，导师逐步让学生参与课题研究，使得学生的专业素养和能力得到了锻炼，也使得 Y 同学对于自己的专业认同有一定的加深。

### （七）“第一选择、就业广泛”

专业就业情况的好差也直接影响着研究生的专业认同。如果以往就业形势非常好，则会增强研究生的专业认同，专业就业难则会降低研究生对自己的专业认同。研究者在对被访者进行访谈时，发现专业就业的高低影响着教育学研究生对专业的认同。比如，在谈及专业就业问题时，Y 同学认为：

“我们专业就业情况我也了解一些，当时可能觉得比较教育可能没有教育经济好，但是，在北京的话，比较教育比教育经济还要好一些。这个我最后分析了一下，人家要是要比较教育的，人家肯定要北师大的，可以进中央教科所、北京教科院，但是你要是学教育经济的话，人家肯定先要北大教育学院的，再要北师大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人家是专业搞经济的，有去出版社，还有一个师姐还去中国银行了，做人力资源。我以后想做教育研究，原本是想进高校的，但是现在了解高校教师比较苦。”

从 Y 同学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其对比较教育专业就业状况是有一定了解的，尤其是通过以前师兄、师姐的就业结果来看，还是不错的，因为其有英语优势，毕竟在研究生阶段英语水平还是得到锻炼的。Y 同学还分析比较教育学和教育经济学就业的优势之所在。这又一次体现出，Y 同学对比较教育学和教育经济学的各种优势的了解程度，尤其是在北京，比较教育学相比教育经济学的优势。这主要体现在北师大比较教育学在北京是无可争议的老大地位，就业单位在招聘比较教育学时，北师大比较教育学就是其首选，而不像教育经济学，成为人家的第三选择。由此可以看出，专业在就业上的优势，也可以加深研究生对专业的认同。

### （八）“有能力、不愁找工作”

个人性格主要是指内向与外向之分，研究生个人性格不同，表现出不同的专业认同度。在对 Y 同学进行正式访谈时，在谈及专业对于个人发展时，Y 同学这样表达了其观点：

“尽管整个教育学专业的专业性、就业方面，不如数学、英语、经济等其他专业，但是我认为这个不是最重要的，能否找到好工作，能否在专业上有发展，都在乎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只要好好学习、发展自己的专业能力，不愁找不到工作的，个人的前途不是由专业决定的，而是由自己的努力程度决定的。所以，像咱们这些教育学研究生，还是好好努力学习、跟着导师好好做研究，多出成果，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给写好，这个对你以后的工作和发展影响很大。”

从 Y 同学话语中看出，其对于个人发展需要什么，有很清楚的认识。他承认教育学专业相对其他专业有弱势的地方，但是其认为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恰恰专业相对弱势，更需要个人的努力，个人的努力和能力才是最重要的。由此不难看出，Y 同学是一个乐观又具有敏锐洞察力的学生，其始终乐观地看待专业的问题，可以看出其对专业的认同还是不错的。而在对 P 同学进行访谈时，其也是兴致不高的说了这样的观点：

“教育学专业跟其他专业相比，肯定不如其他专业，尤其是像我们教育原理专业，是一个比较清贫的专业，跟哲学专业差不多，属于基础理论研究。”

尽管 P 同学没有对自己专业谈的过多，但是也可以看出其对专业没有太高的期望。

性格外向的研究生对专业的好坏不是太看重，而看重的是在专业学习上，个人能力是否有较大的提高，如果个人能力得到提高，必然会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这说明性格外向的研究生对专业认同可能会高一些。对专业认同度较高，他们认为专业不是最重要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不管读什么专业，只要能够使素质提升和能力增强，就是好专业，这就使得性格外向的研究生专业认同要高于性格内向的研究生。性格内向可能过多的抱怨专业的冷与热。

### （九）“攻读博士、做大学老师”

考研动机的不同，也会影响教育学研究生专业认同。通过访谈发现，立志于考取教育学研究生并攻博的研究生来说，其对专业认同度较高。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Y 同学这样表达了其考教育学研究生的动机：

“我当时考师大研究生，就是看中师大教育学的实力很强，老师很多，读博士的机会较多，因为我想进大学当老师，也知道硕士基本不可能，所以当时决定放弃工作，考研的时候，就已经决定继续攻读博士，当我一年级的时候了解到师大硕博连读的机会较多时，我就做好了准备，我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把学分全部修完了，准备开题的事情，因为硕博连读申请需要完成规定的全部学分，还要求学位论文开题评为优秀。”

Y 同学的这些想法和打算，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这或许是其较为长远的个人职业发展规划让我敬佩的缘故。由于其知道当前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在高校有难度的情况，就下决心读博，说明其认为教育学专业博士还是能够让自己有一个良好发展的基础。这也说明其对教育学专业有着较大的心理认同，否则，其肯定希望硕士赶紧毕业找工作，会有读博士没有前途的想法了。

### （十）“一年完成两年的任务”

通过研究发现，研究生期间学习适应性如何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专业认同。研究者在对 Y 同学进行访谈时，谈及研究生阶段学习感觉如何的问题上，其谈到：

“我自从进入研究生学习后，由于导师说我跨专业的，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和学习英语，所以我一年级就整天泡在图书馆看书，又加上刚进学校，选课学习，新鲜性很强，因为有三年不在学校了，在图书馆读了很多书。读了各种各样的书，专业的还有非专业的。不仅有教育的，还有政治、哲学的。”

这说明 Y 同学工作的缘故和对研究生学习充满好奇的缘故，就是在一入学就投入到读书学习的过程中，又加上其有志于攻读博士学位，而这又有修课和论文的要求，所以其在一年级就基本上完成了普通学生两年完成的任务。

由此可以看出，其在研究生阶段学习还是很有成效和顺利的。或许，正是学习上的高效快捷，使得其对自己专业认同度得到了增强。而就目前教育学研究生群体来说，在教育学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对教育学产生兴趣并积极参与课题研究，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是会增强其对自己的专业认同度的。

### （十一）“做大学老师、进教育研究机构”

专业情感是指研究生对专业的热爱。这里主要表现在是否希望今后从事教育相关的工作。在访谈中谈及今后想从事何种工作时，Y 同学则这样描述了其今后的打算：

“我刚才说了，我考研就是不想在一线当中学老师了，而是想从事教育研究工作，比如到大学当老师，但是也知道硕士已经基本不可能进大学当老师了。所以在入学时得知，每年都有硕博连读的机会，我就在努力学习，积极争取。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实现我当初放弃当中学老师而树立的目标。当然，如果能够进教育研究机构也不错。”

从 Y 同学的话语中，可以看出，Y 同学对于教育研究工作的热爱，这种热情和目标促使其在学习过程中一直保持踏实勤奋学习态度和不懈追求的精神状态，尽管这种目标的实现需要付出许许多多的汗水和五六年的时间成本。这也反映出其对教育学专业和教育工作的热爱，当然也反映出其对自己专业的极大认同，因为，如果没有这种专业认同和对教育研究工作的热情，其是不会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

## 五、分析与讨论

### （一）专业实力、导师、同伴群体影响教育学研究生的专业认同

学校教育学学科实力雄厚或者发展很快，能够促进研究生的专业认同，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方面发展得较好，能够使学生学习到教育学的各种成功经验，或者说，能够使学生的个人素质得到增强，能力得到提升。因此，学院在教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研究生培养模式和方法上能够不断地进行创新性的改革，真正地做到以改革促发展。

研究生专业兴趣的培养、专业能力的锻炼与提升，都直接受到导师的影响。如果导师能够善于发现研究生的特长和需求，就能够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给予学生必要的指导或点拨，也就能够促进研究生的学习兴趣和意愿的产生。同时，让学生参与自己课题研究的机会，就能够在研究过程中促进其专业研究能力的提升和专业热情的增长。

无论是宿舍群体，还是班级群体，抑或是导师研究团队下的同门师兄弟（姐妹）群体，这些同伴群体的学习氛围、态度和专业热情都对身在其中的研究生产生很大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群体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是每一个群体成员的共识的结论。因此，需要在同伴群体中树立勤奋好学的群体价值观念，使身处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得到良好的发展。

### （二）研究生性格、学习适应性影响教育学研究生专业认同

个人性格的内向与外向，会影响研究生本人的专业认同和个人发展。性格内向的人，或许只是看到了教育学学科专业性不强的一面，甚至紧紧地盯住了这个方面，而忽视发展自己的专业能力和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就会使其看不到发展的方向，总是处于悲观失望的状态。而性格外向的人，则不会悲观地看待专业性不强的问题，他们会认为个人的发展更多的在于个人，而不是外在因素的好坏，他们会在研究生学习过程中，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最终成为一名优秀的研究生，其个人发展的方向就会呈现多元化。因此，教育学研究生需要转变对专业的认识,注重专业能力的提升，使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

7. 这里的讨论跟前文的数据没有任何联系，为什么从专业认同又转向专业认同的影响因素呢？为什么又这样的所谓结论，论据何在？

学习适应性是研究生专业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学习适应性好的学生往往对专业认同度较高。因此，需要研究生本人端正学习态度，在知识学习、研究能力和个人素质方面都有所发展，使其在学习过程中感觉轻松、愉悦，增强其专业认同，提高其专业能力。

## [参考文献]


陈向明（2000）：《质的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傅蕾（2010）：“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的研究”，《皖西学院学报》，第 10 期，第 141–144 页。

胡涤非、陈海勇、孙亚莉（2012）：“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研究：基于暨南大学的调查”，《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第 4 期，第 53–57 页。

黄涛（2008）：《上海地区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的问卷编制及其相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上海师范大学。

王顶明、刘永存：“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调查”，《中国高教研究》，第 8 期，第 18–22 页。

周三（2012）：《教育学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苏州大学。

周靖一（2012）：《高等院校硕士研究生专业认同》，硕士学位论文，苏州：苏州大学。



## 文末"评"

该研究从选题上看比较笼统，直接导致了文献综述、数据梳理和相应解读的脱节；另外，从博士论文训练的水平衡量，选题所涉及的维度也比较单一，就是一个关键概念，应该考虑另一个相关概念，以及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而确定一个选题。

文献综述部分非常薄弱，也没有分层，更谈不上逻辑关系，没有依据文献的梳理发现需要解决的、并且是可操作的针对选题的具体的研究问题。

研究设计部分没有论证从课题的角度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数据呈现部分很凌乱，看不到论点之间的联系，更看不到论点与研究主题之间的逻辑关系，或者说数据的解读如何帮助到选题的解答。

分析讨论部分，跟研究选题不甚相关，而且论述得也有些像"空中楼阁"，不知道所谓的这些论述从何而发，而且也没看到最后的结论部分。



## 学生回应

感谢裴森老师上述各点的批评指正，不仅使我更明确的发现本研究的诸多不足，也促使我对未来的研究产生深刻启发，尤其是对即将进行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问题的选取、设计和研究，有着明确的、关键性的指导。以下对裴老师的上述点评做一简要回应。

本文选题确实存在较为笼统的问题，当时在确定研究问题时，也想到过把研究对象进一步聚焦到教育学博士研究生的专业认同，但是疏于跟朱老师进行探讨和更改。事实上，本研究所选取的两个研究对象都是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博士论文选题确实是需要从两个概念的逻辑关系中进行研究，这样才便于建构理论模型，增强研究的张力，而本文只是定位于一个质性研究方法课程作业，更多的是注重对质性研究方法的一系列步骤的训练，因此研究问题表征出小型化、维度单一性。

就文献综述而言，确实存在着文献薄弱、层次性不够、逻辑性不强等问题，这一点是需要在以后的学习中深入思考、反思和改进。

可能是我的表述方面不够明确，才使得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选取原因

不够清楚，同时，研究主题和研究问题的逻辑性也有待加强，不然就会出现研究的严谨性、逻辑性缺失。

分析讨论部分，我主要是对以上专业认同的影响因素进行的，也即本研究的主要问题。这里存在着跟前文研究的衔接性不够的问题，也是我今后学习和研究中所要注意的问题。

再次感谢裴老师非常详细、中肯、独到的批评指正！

### 点评专家裴淼简介

裴淼：香港大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第二语言学习、教师认知和教师发展、质性研究方法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 20 余篇，主持和研究 10 余项合作课题。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研究所（2007—2008）和教育学部课程与教学研究院工作（2008—2011），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问学者（2011），受美国外语教学学会邀请赴纽约总部考察（2010）等。

# 课堂情境中职业学校教师实践性知识的个案研究

文／周瑛仪[1]
评／齐学红

[摘要]本研究中，研究者以助教的身份进入某中等职业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杨老师的课堂，通过课堂观察及教师访谈收集资料。根据教师实践性知识及职教领域工作过程知识的相关研究，从两个方面：关于自我的知识，关于学生的知识，关于科目的知识，关于教学情境的知识及引导行动的知识，解释行动的知识和反思行动的知识对资料进行分析，提取本土概念“加分”，总结出课堂情境下杨老师的实践性知识及其作用机制，即杨老师关于学生的知识（学习情况、性格特征、年龄特征、成长背景、学生群体之间的竞争及互助），关于网页设计与制作的工作过程知识，关于教学的信念（不能让一个人掉队、每个学生都是不一样的、“做中学”）共同作用，使她创造出以“加分”为激励机制的教学设计和实施过程，该过程也体现伴随她教学信念的体现和对学生的情感投入。

[关键词]课堂情境　教师实践性知识

---

[1]周瑛仪，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职业能力测评。

# 一、研究基础

## （一）研究缘起

从20世纪80年代起，针对职教领域课程脱离生产实践的问题，我国相继引进德国的学习领域课程、北美的能力模块课程、英国的证书课程以及澳大利亚的“学习包”课程（黄尧，2009：208-209），自上而下，开展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教育改革倾向于倡导政策和教学大纲的革新，并强制它们付诸实施。然而，包含于政策和大纲中的理论、哲学和意识形态并不能自动转化成课堂教学实践，并从而转化成学生的学习。要把关于教和学的理论与教和学的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有必要对教师的知识及工作的专业知识场景进行研究（康纳利、克兰迪宁，1996）。

## （二）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述评

陈向明（2011：58-63）在梳理、比较国内外关于“教师实践性知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深入中小学课堂和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对教师的实践性知识进行描述和分析，他们将“教师实践性知识”定义为“教师对自己的教育教学经验进行反思和提炼后形成的，并通过自己的行动做出来的（enacted）对教育教学的认识。”包括教师关于自我的知识，关于教学科目的知识，关于学生的知识，关于教育情境的知识四个方面。

陈向明(2011：58-63)将教师实践性知识理解为一种信念和认识，并将它与“能力”进行比较，指出两者的区别和联系：能力表现在教师的具体做法、策略和手段中，展现的是“技术”的一面，是教师具体实施教育教学活动所必须掌握的素质；实践性知识作为一种信念，不仅包含教师的理性和智慧，而且还蕴含着教师的审美特质、价值观和情感倾向。教师实践性知识仍是一种“知识”（被教师确证为“真”的信念），“能力化”只是它的一种属性。教师在采取一个行动后，如果发现行动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如果在调整自己行动的同时，反思并改变自己的信念，那么整体变化将会更加彻底、深刻、持久。

在分析实践性知识是什么后，陈向明(2011：79-102;

文中“点”

1. 标题中“职业学校”可省略

149–178) 的研究借鉴肖恩（Schon）的反思性实践理论，提出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生成机制：在面对新的问题情境时，教师原有的实践性知识被显性化后，经过行动中的反思，生成新的实践性知识，并且因其运用所取得的效果而被确认为“有用”、“真实”。教师实践性知识生成的载体是问题情境，问题的创造性解决就是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形成过程。

陈向明从定义、内容类型、表征形式、构成要素及生成机制、生成媒介等方面，对教师实践性知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尤其是对生成机制的研究，对教师教育具有指导作用。但是，在他们的研究中，教师实践性知识依然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一方面，他们将教师实践性知识定义为一种“信念”，包含教师的认同及责任感等在内。尽管“信念”在教师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作用不容忽视，采用这种比较宽泛、上位的概念界定，不仅难以把握其内涵，而且难以了解它如何引导教师的教育教学行动。另一方面，陈向明认为教师实践性知识四种类型之间存在关系，但是对于它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以引导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没有进行说明。

### （三）职教领域对工作过程知识的研究

在职业教育领域中，最先提出“工作过程知识”的是Kruse（1986），他想表述那种有经验的技术工人所特有的与生产过程相关的知识，包含工作经验与理论反思之间的特定关系。研究发现，技术领域的工作过程知识是企业经验与专业理论知识相结合的产物，其结合的紧密程度与工作者个体和工作任务的复杂程度有关。工作过程知识很少作为技术标准或者实证研究的结果被保留下来。

Rauner（2007）认为，工作过程知识是“引导行动的知识（know that）”，“解释行动的知识（know how）”，“反思行动的知识（know why）”的交集，如图 1 所示。

2.“教师实践性知识”与“工作过程知识”二者是何种关系？究竟以哪个概念作为论文的分析框架？与第二部分内容之间有何关联？




**图 1　工作过程知识的构成**

通过实证研究，他进一步总结出工作过程知识的六个特征：

（1）敏感性，即随着经验的增加，逐渐具备对典型工作情境中细微差别的感知和评价能力。

（2）背景性，即随着职业实践共同体成员工作经验的增多，可建立起相似的行动模式和价值观，可以实现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沟通与理解。

（3）情境性，即只有了解起源，才可以主观感知工作情境。由经验得出的假设、观点和期望，终将汇入到已有的情境性行动中，并设计具有细微差别的行动方案。

（4）范式性，即只有那些针对新问题，对原有行动方案和行为方式提出质疑并能产生新方案的工作任务，才是具有“范式”意义的“发展性任务”。

（5）可交流性，即在实践共同体中交流的事物，具有高度一致的主观意愿。只有共同体内成员才能理解与情境相关的语言并进行有效交流。

（6）前瞻性，即完成不可预知结果的任务的基础是不完整的知识（知识缺陷），并由此发展“元能力”，从而完成没有标准答案的任务。

本研究聚焦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专业《网页设计与制作》的课堂现场，通过课堂上教师及学生活动的观察，课堂后对教师及学生进行针对性的访谈，研究职业学校教师在课堂情境中的实践性知识。

## 二、课堂中发生着什么

### （一）概况

3. 第二部分的课堂概况、学生活动、教师活动三部分内容显然是基于课堂观察获得的，课堂观察是如何实施的？观察者的位置？课堂观察表、观察的次数、频率等研究过程需要做出交待。

首次去学校找杨老师时，就在校园里迷了路。幸亏遇到了要去上杨老师课的4个女同学，才避免了第一次去听课就迟到的尴尬，也因此知道了杨老师的一个绰号“咩咩老师”。当被问及为什么给老师起了这样一个绰号时，一个女同学立即辩解说，“这不是绰号，是昵称。要问为什么，你看了就知道了。”

杨老师今年35岁，从外形到性格，都不像内蒙古人，反倒是像江南女子，娇小玲珑，温婉细腻。她2001年计算机专业本科毕业后从内蒙古来到北京，就一直在某校计算机专业工作，当时该校还是中专，后来并校后升格为大专。她曾在职读取工程硕士学位，现为计算机与会计专业教研室主任，一直负责带全国计算机竞赛（中职组），获得“优秀指导教师”称号。出版了教材《多媒体技术》、《网页设计与制作案例教程》。“是学校一个优秀，而且资历深的青年教师。”

听课的班级是10级计算机网络专业中职班，班里总共22名学生，7名女生，15名男生。每个学生有着自身的特点。根据课堂参与程度，可以将他们划分为三个群体：课堂参与者、边缘参与者、旁观者。其中，课堂参与者有18人，他们在课上积极完成学习任务，与老师或同学就遇到的问题产生交互；边缘参与者3人，他们不会主动完成学习任务，在教师的督促下，偶尔会参与到部分学习任务中。旁观者1人，无论何种情况，从未打开过计算机，进机房后把椅子拼好，躺下，玩手机（附录1）。

听课课程为《网页设计与制作》。在2012年11月29日首次听课之前，学生已经学习过建立站点、表格、表单、插入链接、插入多媒体、CSS等知识点，并结合小项目上机练习。已学习过PS，本学期同时在学习FLASH，具备一定的图片处理和动画制作基础。此后，按照杨老师的教学计划，他们开始完成复杂程度递增的两个综合性学习任务：模仿制作红楼梦网站、模仿制作当当网网站。最后，每人利用4节课的时间，选择感兴趣的主题，自主设计一个网

站（附录2）。

开始综合性学习任务后，杨老师不再集中讲解。每节课，她绕着机房巡回指导。当有学生发问时，依次走到发问的学生身边，帮助他们解决完成学习任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当没有学生发问时，杨老师也没有停下来，依然绕着机房巡回，观察学生，帮助他们指出问题（附录3）。

### （二）学生的活动

课堂上，学生主要是完成学习任务，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摩擦、集体起哄等。

**1. 对教师的“呼唤”（向教师寻求技术支持）**

在完成任务过程中上，当遇到问题的时候，课堂参与者会呼唤老师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有的很急促地叫“老师，老师，这里有问题。”有的说“老师，您帮我看看。”等不及的时候，有的学生会说：“老师，怎么还不来。”个别学生还会抱怨：“老师，怎么又去谁谁那里了。”

**2. 学生之间的互助**

课堂观察发现，每节课学生选择的位置会发生变化，但是B与C、F与E、H与I、J与K、 N与O、T与U，始终是同桌。他们选择对方作为同桌，或因为来自同一宿舍或因为个人关系比较好。同桌的两人之间会发生互助，如B、F、H、J程度相对较好，会较多地帮助C、E、I、K解决完成任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反过来，在一些问题上，后者也会为前者提供帮助。N与O两人均是中等程度，T与U两人程度都很好，他们之间也会互助，而且比较均衡。

在最后根据兴趣选择主题，自主设计网站时，上述同桌之间体现出明显的合作式互助，同桌两人选择类似的主题，如N和O，对网站的构思和布局等虽然均不相同，但基本素材需求类似，因此N和O分工，N完成图片搜集，O完成图片修饰，然后将素材应用于网站设计，提高了效率。

**3. 学生之间的竞争**

T与H是班里程度最好的两个男生，除了私下里评论对方制作的网站，在课堂上，当杨老师以T制作的网站为优秀作品进行分析，全班都在听老师分析时，H像平时起哄一样，大声说：“老师，干吗拿他的讲呀，我做的比他好，

讲我的吧。”T 回应了一句：“嗐。”

G 和 F 是班里程度最好的两个女生，一次下课后，其他人都走了，G 跑去看老师的日记本，看到 F 和自己一样，上次作业得了 5 分，对杨老师说：“老师，F 的作业怎么能得 5 分呢？”杨老师回应说“她做得不错啊！”“如果她也得 5 分，那最高分就没意义了。”

在班里的女生中，B 程度中等，C 程度较弱，在指导下，也难以完成学习任务。有两次课，她们都是同桌，B 对 C 说：“我也不是很熟，自己还做不完呢，没法教你。”当 C 跟着 B 一步一步地做时，B 说“你不要跟我做的一模一样。”

相对 K、J 程度较好，K 是重复“我教他的。”这时，J 每次都回应说“他教我的。”但是 J 更关注细节，会在 K 教他的基础上，略作改善，当老师说 J 做得好时，K 就在旁边嘟囔“都是跟我学的，我不想费事罢了。”

**4. 学生之间发生的摩擦**

L 与 Q 之间的争执是从宿舍蔓延到了机房。起因并不清楚，上课铃刚响，L 拿起椅子，要去砸 Q。Q 本来还在嬉笑，看 L 拿起椅子，要砸自己，也站了起来，做好了要打架的准备。这时 D 跑过去，抱住了 L。杨老师和 F 走过来，拉住了 Q，F 顺势抢走了 Q 手里的椅子。被拦下后，Q 还很激动，对着 L 喊“有种出去打。”L 没有回应，坐了下来。

**5. 关注分数**

学生们都会关心自己得了多少分，每次下课后，都不约而同地围在讲台旁，想要看老师的日记本，连边缘参与的那三个同学，也会关注自己得了多少分，并尽可能地和老师争取加分。

D 每次都会在上课前到机房，然后问杨老师，“老师，老师，我上次打了几分。”“老师，我上次做也能打 5 分（满分）吧。”如果事先知道了分数，而且不是 5 分，D 都会跟杨老师磨一会，“给 5 分吧。”

得知自己因为违反纪律，又没有好好完成任务，杨老师要打 0 分的时候，R 请求我跟老师求情，别打 0 分。和他同桌的 S 每次都会问“老师，我能不能及格。”

**6. 集体起哄**

当 L 和 Q 发生争执的时候，班里的几个男生没有去劝

架，而是打起了口哨，喊着“加油，加油，打死一个。”

一个学生要求加分的时候，班里的男生也会应和着，要求老师加分。

课堂上有一个男生讲句话，就有其他男生一个接一个地搭话茬，边做边应和。

4. 对课堂概况、学生活动、教师活动等材料的呈现缺少分析。

### （三）教师的活动

#### 1. 对教学秩序的维持

开始上课的时候，老师会点名。当某个学生行为举止或言语过激时，杨老师会以一种比较柔和的方式指出来：“谁谁，要文明一点啊，腿不能放到桌子上。”，“某某，你要含蓄一点啊！”

#### 2. 对“呼唤”的回应及主动指导

课堂上，杨老师对学生的指导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学生“呼唤”老师指导；另一种是在行进过程中，如果暂时没有学生“呼唤”，杨老师会就恰好看到的某个学生在制作网站时遇到的问题进行指导。对每个学生的指导时间最长不超过一分半钟。

在听课的过程中，杨老师一直按照图中所示环形路线行进，同一轮内，一个学生只能按照次序获得一次指导，本轮未结束时，已经获得指导的学生即使“呼唤”杨老师，也要等到下一轮杨老师再次走到他 / 她旁边时，才能获得指导。

当多个学生同时呼唤时，为了不让学生着急，或者等着不做事情，杨老师会回应：“待会就到你旁边了，别着急，先把会做的做了。”，“或者谁谁，你先帮他解决，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帮助同学可以加分”，“马上就到你旁边了”。

杨老师的指导不是告诉学生如何做，她会引导学生思考，鼓励学生探索。“为什么用样式呢？因为很多大型网站，像当当和淘宝，顾客已经习惯了他们的页面布局，如果他们的页面突然有了很大的改动，顾客们找东西不方便，可能就不愿意再用，这样会造成客源流失。网站的布局通常不会有很大的变动，如果有改变，也是一点一点的。”，“有几种方法可以做到鼠标经过后，文字颜色改变的，你试试。”

当当网制作涉及插入 FLASH 的内容，学生们没有学习过。程度比较好，做得快的学生先做到这里，“呼唤”杨

老师的支持，杨老师提示他们，跟插入图片有些不同，要改一下代码，让他们先自己试试，看能不能做出来。过了一会，当班里大多数人做到这部分内容时，杨老师让大家暂停，她要集体示范一下，杨老师采用“广播”模式，她一边示范，一边说明 FLASH 插入与图片插入在操作上的异同。完毕后，从讲台走下来，继续巡回指导。

**3. 点评学生的优秀作品**

每次课程刚开始时，杨老师都会对上节课的优秀作品进行点评，也鼓励学生进行点评，告诉学生做到满分的标准是什么。

**4. 对学生间摩擦或争执的处理**

因为老师拿 T 制作的网站做优秀案例进行分析， H 和 T 之间杠上了，两人当堂互相嗔怪。杨老师当即停下来，让 H 和 T 互相评价对方制作的网站，并请班里其他同学也参与评价。

L 与 Q 之间的争执被拦下之后，杨老师并没有立即回应，而是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分别和两人谈话。对 L 说：“你们这个年纪，大家都喜欢开玩笑，不要太当真。同学之间，相互要让一下。”对 Q 说：“和同学开玩笑，但是玩笑不能开过了。”

**5. 学生要求加分的回应**

杨老师指出，她会根据之前说好的规矩加分，并指出，帮助同学，并得到同学的认可，可以加分。

**6. 对不愿学习的学生的关注和劝导**

对于 R、Q、S，每次课，杨老师都会走到他们旁边，劝他们学习，当他们找出各种借口，提出各种困难影响学习时，杨老师都会帮他们解决，然后督促他们学习。

**7. 几个小事件**

在做指导时，杨老师总是把手轻轻地放在学生的肩膀上。学生将垃圾放在桌面上时，杨老师走过看到，会帮他们起来收到讲台旁边的垃圾桶里。因为快到元旦，课间的时候，几个女生走到讲台上，跟杨老师“撒娇”，要她参加元旦晚会表演。

上课前，患有疾病的小女孩跟老师说，“老师，我担心下午做不完。”，“不用担心，你肯定做得完的，我看

了你的作业，上节课已经完成大部分内容了”。“做不完的。”，“不信你试试，我相信你做得完。”

## 三、教师的认识

### （一）对教学的认识

**1.“职业教育要让学生动起来，从做中学。”**

“我们的学生可能和大学的不太一样，大学的老师讲就行了，我们的，要让他们动手做，不然他们一会儿就不听了，老师在上面讲，他们就在下面玩手机，那样什么也学不到，做的话，不管做得好还是不好，至少能学点东西。”

**2. 一点一点地教，学生学到一点是一点，多重复几次，最终学生会学会的；个别化教学：每个学生的问题都不一样；为了学生学会，我辛苦一点没关系**

首次听课（红楼梦网站制作）时，谈到逐个学生进行个别辅导，老师很辛苦时，杨老师说：“我都习惯了，课一直是这么上的，这样上比以前教师在上面讲效果好。刚开始可能比较辛苦一些，这些东西他们都学过，但是忘了，得一个一个地教，不过毕竟我们之前学过也练过一遍，他们还有些印象。每个学生的问题不一样，必须得一个一个地说。我一点一点地教他们，做网站的东西就那些，很多东西，说一次，学生就记住了。有些比较复杂，一遍说完，下次就忘了，多说几遍，他们就记了。我之前也上这门课，往后会越来越好。到后期，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个别的还有一些小问题。”“到后期，我就会比较轻松。”自主选题设计网站的后两个课时，问问题的学生果然很少，我惊奇于“杨老师真是料事如神”，但是她仍然没有停下来，他们的问题越来越少。“之前的，你像红楼那个，是比较简单的，他们的问题就少一些，当当网，问的人多，也比较正常，因为当当网那个很复杂，经过两轮，他们现在都差不多了，只有个别学生做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基本上都能完成自己的网站设计。”

**3. 教学内容安排要循序渐进，通过巩固和挑战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目标是学生能够自己设计制作网站**

“之前这些知识点我们都学过，也练过，要找一些综

5.“教师的认识”这部分材料是如何获得的？访谈是如何实施的？

合性的项目，让学生用，不然的话，一个是时间长，他们学过就忘了，因为知识点什么本来就碎，通过做东西，才能把它们给串起来。另一个，之前学了（知识点或技能点），但是学生不知道做网站时候怎么用，毕竟做网站是一个综合的（项目）。所以讲完之后，我们先练了'红楼梦'，这个相对比较简单，刚开始给他们难的，他们也做不好，困难太大，就不想做了，所以先做一个容易的，这样才愿意做下去。当当网就复杂了，有新东西，但是大部分还是做红楼梦时练过的，再巩固巩固，当当里边插入 FLASH 那一个，之前没有讲过，之前学过插入图片，但是估计学生们可能做不出来，待会我要集体讲一下。下面还会安排学生自己设计网站，期中的时候，也给他们设计过网站，但是那次做得不是很好，这次应该不错。过了元旦，他们要实习两周了，实习跟现在的形式差不多，也是学生自己做。"

**4. 越不会学生越不愿意学，会一点，他们就有兴趣，就可能坚持下来；不能让后进生掉队，不能不管他们，让他们学到一点算一点；学习需要教师和学生的配合**

"不能让他们掉队，越不会越不愿意学，拉一把，让他们赶上。但是这个也跟学生有关，他非要不学，你也没办法，像一直躺着的那个男孩。这个班里，就今天下午差点打架的那两个学生（L 和 Q），他们两个都是从后半段开始学习的。之前都不做，打了一排 0，11 月份的时候，我找他们俩说，跟他们俩约定往后开始做作业，做一次，划掉一个 0，换成 5 分，后来两个人都开始学了，0 也全部都划掉了。但是最近 Q 又不学了，L 一直坚持下来，你看他今天自己设计的网站，还是很不错的。Q 最近不学，但是之前基本的内容已经掌握了，就是不愿意好好做。"

**5. 他山之石如何**

"听说广州那边的职业教育做得很好，他们是怎么上课的？"

**6. 教学组织形式：小组或个人**

谈到小组合作学习时，杨老师说，"他们有小组，小组内成员可以互相帮助，但是每个学生还是要自己做一遍。小组学习也存在问题，以前把任务分给小组，干活的总是那几个人。"

### （二）对学生的认识

#### 1. 学生不“乖”，但是不能跟他们生气

“他们这个年纪，嘴碎，他们有时候就是为了让你注意，说脏话，不去管就好了，不去管，他们觉得没意思，也就不说了。”

“不能跟他们一样，跟他们一样，课就没法上下去了。”

“就是喜欢说，其实也没有什么，话多的就是那几个，他们说的时候也不会耽误做。”

“他们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就是控制不住。总说他们，他们会烦，也说不过来。”

#### 2. 学生喜欢动手做

“他们喜欢做，要是光让他们听，一会不是睡觉，就是去玩手机了。”

“看着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他们也会有成就感，你看，这个是我做的，就愿意去学习。”

#### 3. 就业大多与专业不对口，但依然希望不虚度光阴，学点东西

“中职毕业后，如果找到工作，他们就工作，不再继续读高职了。一般一届里一半多点的学生会出去工作，北京这边大学多，公司要求的层次高，他们出去找的工作一般跟专业都不对口。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来了学校，（我）希望他们能在学校里学点东西，多少有点技术，不浪费了这段时间。”

#### 4. 学生关注分数

“他们会关注分数，因为会影响到他们期末及格不及格，他们也不愿意重修。”

#### 5. 学生们之间存在竞争

“成绩好的学生之间存在竞争，政府奖学金是根据他们的成绩评的。成绩一般的，也存在竞争，每个人都有上进心。”

#### 6. 学生之间存在互助

“班里有一些程度好的，他们能帮助一般的。”

“一般是同桌之间相互帮助，也有学生之间关系好的，串着帮。”

**7. 程度较好的学生**

“这个班里学得好的不是很多，学生之间相互帮助没有我教的另外一个班明显，不过这个班人数少，按比例算的话，两个班（学得好的学生的比例）差不多。”

“这个班里，女生学得好的，就是他们班的班长，还有这次课没有来，个头小小的齐刘海那个女生；男生里边，戴眼镜，穿红色羽绒服那个，还有那个老爱接话茬，个头高高的那个，刚才最先做完，非让给他6分那个也不错。”

### （三）对教学/学习内容的认识

**1. 学习内容各部分之间关系并列**

“还好网页制作这个内容，并列的比较多，学生这部分某一点不会，不影响他做另外一部分，这样他们就能先做别的，等着我到他们旁边的时候再帮他们。”

**2. 网页制作本身比较有意思**

谈到这门课上，学生参与很积极，没有人睡觉，杨老师说，“这应该跟这门课有关，相比专业其他的课程，这门课本身就比较有意思。”

**3. 学习内容关联的知识**

“他们上学期学过Photoshop，这学期正在学Flash。”

## 四、对教师实践性知识的分析

### （一）本土概念的提取——加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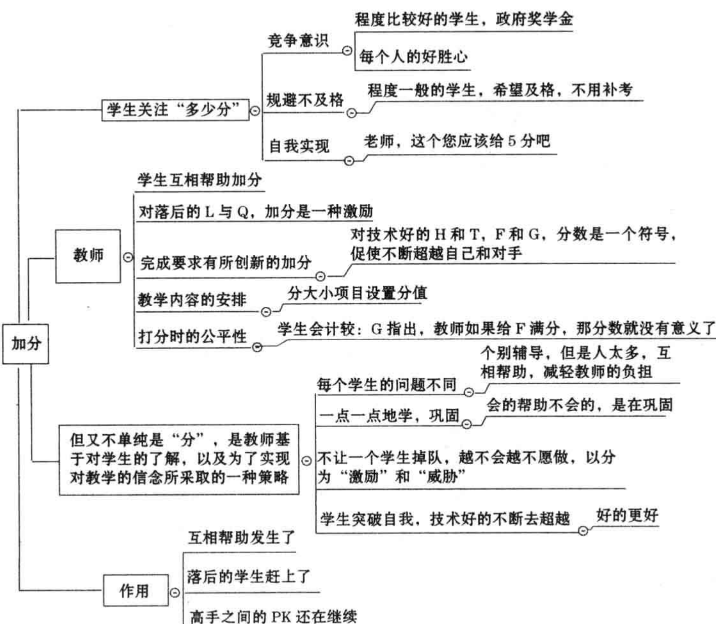



图2　本土概念——加分

“加分”是教师激励学生学习的方法。学生对分数非常关注，基于对学生和教学内容的了解，教师制定了“加分”的规则，以公平为主，灵活地应用。促进了学生通过竞争和互助进行学习，也帮助教师解决了学生多、教师少，难以实施个别化教学中的难题。

“学生们都关注分，不及格的想要及格，好的想要分高一些。分数高低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他们学习。”

“会的帮助不会的，我会给加分的，一般一次加 1—2 分，这样到期末折算后，有的可以加十几分，不及格的话，这样就及格了。但是他们帮助，必须得到被帮助人的认可，才能加分。”

“另外这样也能减轻一些我的负担，班里二十多个人，有时候有问题的学生多，我顾不过来，这样课上会比较乱。会的教不会的，他们自己也能够巩固，其实现在用的这些东西，之前他们都学过，但是现在很多都忘了，多练几次，熟了之后就不会那么容易忘了。”

### （二）班级社会学的视角：对学生间关系和师生间关系的解读

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把社会划分为三种：一种是重视竞争的社会；一种是重视协同的社会；一种是两者都不重视的社会。但是不论哪种社会，都存在着竞争性的人际关系和协同性的人际关系。人们往往从这些不同的人际关系中，寻找出自己成长的契机。

就竞争性的人际关系来说，一种是排他性竞争或零和竞争，即不是你吃掉我便是我吃掉你，把对手踢下台去以保证自己得以长存的竞争。但这种竞争也可以转化为累积式竞争或非零和竞争，这种竞争是指一种为实现既定目标，自己战胜自己，积累努力的成果与培养克己的精神。从排他式竞争到积累式竞争，意味着从由于受到竞争对手的刺激而被动地朝着目标努力，到自觉地朝着既定目标努力的转化。协同性的人际关系中，人们首先学到的应该是相互扶助的精神，由于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彼此能够相互协助，这是最为功利性的协同。但一般地，从这种初级的协同中，会产生出与他人的共感和对集体的忠诚，即集体配合意识，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协同（片冈德雄，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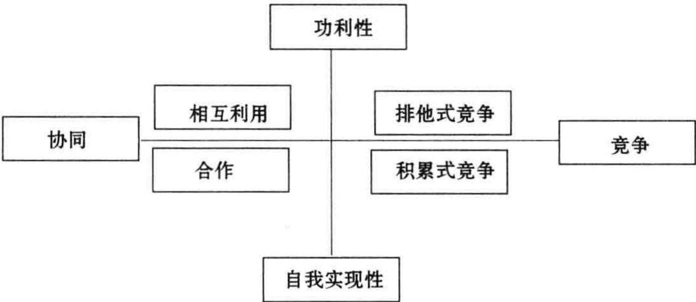



**图 3　成长和人际关系**

在该班级的课堂上，参与课堂的学生之间同时存在协同和竞争。程度好的学生之间为争夺第一，存在排他性竞争。程度一般的学生之间出于好胜心等，也存在排他性竞争。此外，每个学生都处在受外部刺激影响的积累式竞争中。学生之间的协同既有因“加分”而促成，也有两者之间因形成稳定的同桌关系而促进。

基于对学生之间协同和竞争的认识，师生之间的关系体现为教师对学生学习的支持，以及教师对学生之间协同和竞争的处理。一方面，教师自身积极投入，进行个别化辅导；另一方面，通过“加分”机制和“激将法”等，促进学生之间的竞争和互助，以及它们由功利性向自我实现性的转化。

### （三）课堂情境中的教师实践性知识

根据帕尔默（2004，转引自陈向明，2011）的观点，好教师能够将自己所教的学科和他们的学生编织成一个复杂的关系网，以便学生能够学会去编织他们自己的世界。教学无论好坏都是发自内心的，教师其实是将自己的灵魂状态、自己的学科以及与学生共同生存的方式投射到学生的心灵上。

在《网页设计与制作》的教学中，受到自身教学信念，关于学生的知识，关于职业工作过程的知识共同作用，杨老师设计教学并实施，该过程也伴随着她对学生的情感投入。

认识到职业教育要从“做中学”，结合自身关于网页设计与制作的工作过程知识，杨老师设计复杂程度递增的学习任务并合理分配分值（每个 20 分），对任务进行适当分割。通过“一点一点地做”，反复训练，使学生熟练掌

握网页设计与制作的技能。在此基础上，让学生根据兴趣自主设计网站。由技能训练到能力培养，不断为学生提供“最近发展区”，促进能力的发展。

基于对学生之间协同和竞争的认识，一方面，教师自身积极投入，进行个别化辅导；另一方面，通过“加分”机制和“激将法”等，促进学生之间的竞争和互助，以及它们由功利性向自我实现性的转化。

每个学生有不同的学习情况、性格特征、年龄特征和成长背景，从而造成了班级中22个个体所构成的学生群体内的差异性。意识到这种差异性，杨老师认为“每个学生的问题不同，需个别化地辅导”。也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了学生之间的协同与竞争，使“加分”这一激励机制可能发挥作用。反过来，“加分”机制推动了学生之间的互助，减轻了教师的负担，使得在学生多教师少的情况下，个别化辅导得以实现。同时，出于“不让一个学生掉队”的信念和“落后者越不会，越不愿意学”的认识，对于不愿意学习的学生，杨老师知道他们规避“不及格”的需求，也利用“加分”激励他们学习。

在个别化辅导的过程中，杨老师坚持依次巡回指导，每个发问的学生都有同样的机会得到老师的指导，这种“公平”使每个人愿意发问。同时，打分的公平以及杨老师对学生的“情感投入”，师生之间建立起信赖关系，这不仅使学生愿意参与到课堂学习中，也使得学生愿意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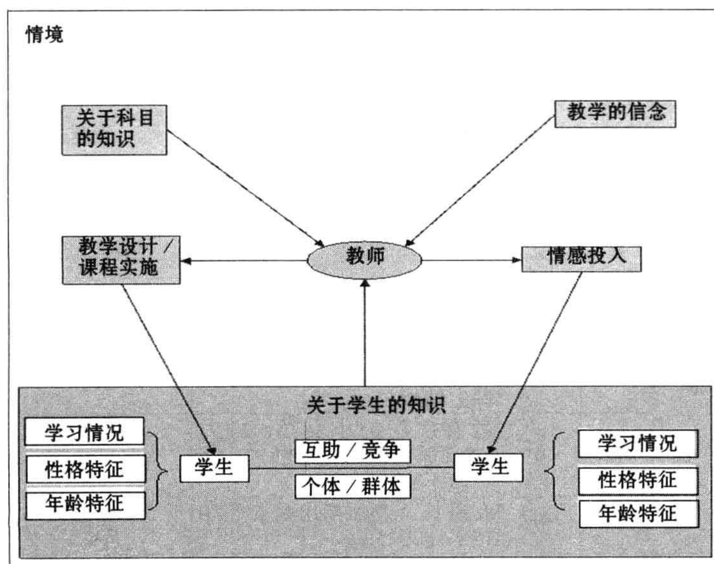



图4　课堂情境中的职业学校教师实践性知识

## 五、对研究的反思

### （一）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距离

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距离远，一方面，研究者不具备教学经验，接触范围仅限于课堂。而工作过程知识本身具备“敏感性”、“情境性”等特征，对研究者来说，难以把握。另一方面，研究时间段很短，难以保证解释是否合适或者教师的行为是否具有一贯性。

### （二）对质性研究的认识

质性研究是研究者获得对研究对象理解的过程，这种理解本身是个体化的，它能否推广到更大的群体中，不仅受研究对象代表性的影响，也受到研究者代表性的影响，因为研究者在获得对研究对象的理解时，无可避免地将自己卷入其中。

### （三）关于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理解

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区别在于是否“去情境化”，量化研究的过程试图“去情境化”，从具体中抽象出一般，得到一般化规律后，应用时情境化，但是只能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推广。因为“人不可能趟过同一条河”。而质性研究是“情境化”的，在情境中获得对研究对象的理解。

## 附录

1. 班级中的 22 名学生

| 类别 | 编号 | 性别 | 特　征 | 自主设计的主题 |
| --- | --- | --- | --- | --- |
| 课堂参与者 | A | 女 | 黑黑的，大眼睛，第一次上课时一直在发短信 | 圣诞 |
| | B | 女 | 第一节课上充当小帮手的角色，课后安排同学值日 | 圣诞 |
| | C | 女 | 做得比较慢，个子小小的女生 | 哆啦A梦 |
| | D | 男 | 听课期间，每次上课前，问老师，我多少分的大个子男孩。隔一周缺一次课的男孩，留下来打扫卫生，最后一次课上劝架 | 介绍武器 |
| | E | 女 | 患有疾病的小女孩，11 月 29 日那次课，跟老师说，担心做不完 | 北京小吃 |
| | F | 女 | 女班长，老师指出是女生中技术比较好的 | 圣诞 |

续表

| 类别 | 编号 | 性别 | 特　征 | 自主设计的主题 |
|---|---|---|---|---|
| 课堂参与者 | G | 女 | 齐刘海，对老师抱怨给谁5分，那分数就没意义了，老师指出是女生中技术比较好的，最后一次课去参加学校元旦晚会排练 | 缺席 |
| | H | 男 | 参加中职组技能竞赛，爱接话茬，老师指出是男生中技术比较好的，因不服老师拿“眼镜王蛇”的作业为优秀作品代表举例，课堂上直接说出“他的算什么呀，我做得比他好”，导致和“眼镜王蛇”语言冲突 | 歌星王力宏 |
| | I | 男 | 听课期间，一直是H的同桌，最后一次课被老师提醒，如果不好好努力，就要落后了。 | 歌星陈冠希 |
| | J | 男 | 爱接话茬，要贫嘴的小男孩，最先完成自主设计网站，要求老师一定要给6分(及格)，评价了另一同学的网站设计，总说帮了K | 网络游戏中的武器装备 |
| | K | 男 | 和J坐在一起，总是承认J帮助他的那个小孩 | 球星 |
| | L | 男 | 一直比较沉默的小男孩。最后一节课拿起凳子要打Q，事后老师分析时，说“他可以骂我，但是不能侮辱我的人格”。老师指出，“他是从后半程开始学习的，前半程的作业都没有做，留下一串0，后来找他谈话，告诉他，这样期末会不及格，如果开始做，做一次取消一个0，现在0已经全部换成了5分。一直坚持学习到现在，做得不错”。 | 圣诞 |
| | M | 男 | 班级里岁数小，戴眼镜的那个小孩，自信 | 珍稀动物介绍 |
| | N | 男 | 头很小，和O一个宿舍，听课期间，两人一直坐一起，最后一次课和O做同一主题的网站，两人合作，一人搜集下载图片，一人PS | 网路游戏中的人物 |
| | O | 男 | 听课期间，一直是N的同桌 | 网络游戏中的人物 |
| | T | 男 | 外号“眼镜蛇王”，老师指出是男生中技术好的。11月29日没有来，之前一次课上已经完成了红楼梦网站制作，和H有过语言上的冲突 | NBA球星 |
| | U | 男 | 自来卷，和眼镜蛇王坐一起，两人第一节课没有来，据同学说是技术高手。问我多大了 | 球星科比 |
| | V | 女 | 胖胖的小姑娘，最后一节课“呼唤”老师最频繁的那个 | 圣诞 |

续表

| 类别 | 编号 | 性别 | 特　征 | 自主设计的主题 |
|---|---|---|---|---|
| 课堂边缘参与者 | Q | 男 | 听课期间，经常挑起口角的一个小男生。差一点被L打。惹过U和L一样，被老师同时找去，“是从后半程开始学习的，0已经全部换成了5分，没有坚持下来，基本的技术已经掌握，就是不好好做。” | 无 |
| | R | 男 | 失恋的那个小男孩，课上什么也不做。最后一节课，老师把别人的素材给他，他大声说，“C，你的素材太幼稚了”，被C骂。最后一次课，因为大声接电话，引起学生起哄，被老师提醒要扣分后，央求我跟老师说情。 | 无 |
| | S | 男 | 听课期间，和失恋小男孩在一起。跟我说，从下学期开始好好学，这学期不行，想赶也赶不上了，快期末了。 | 无 |
| 课堂旁观者 | P | 男 | 听课期间，一直没有开过机，到教室之后，把凳子拼起来，各种姿势躺。12月6日那次课上，躺着露出了肚子，老师过来拉衣服帮他盖住，冲老师喊“干嘛，你闲的！” | 无 |

## 2. 学习内容

| 听课时间 | 任务主题 | 任务内容 | 任务要求 | 备　注 |
|---|---|---|---|---|
| 2012年11月29日 | 模仿制作红楼梦网站 | 涉及的技术点：简单CSS（导航及页面布局）、链接。页面布局的设计较为简单，链接以文字为主 | 教师提供网站制作的所有素材及网站的样图，学生模仿制作。中期课程考试内容与该任务相似 | 该内容共安排4个课时，本次是后2个课时 |
| 2012年12月6日 | 模仿制作当当网网站 | 涉及的技术点：简单CSS（导航及页面布局）、链接、多媒体插入、表单。与红楼梦网站相比，页面布局复杂，需运用新技术多媒体插入及表单 | 教师提供网站制作的所有素材及网站的样图，学生模仿制作 | 该内容共安排4个课时，本次是前2个课时 |
| 2012年12月27日 | 自主设计网站 | |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主题，自己搜集材料，综合运用所学技术，设计制作网站 | 该内容共安排4个课时，本次是后两个课时 |

### 3. 学习空间及空间中个体的位移

说明：

①符号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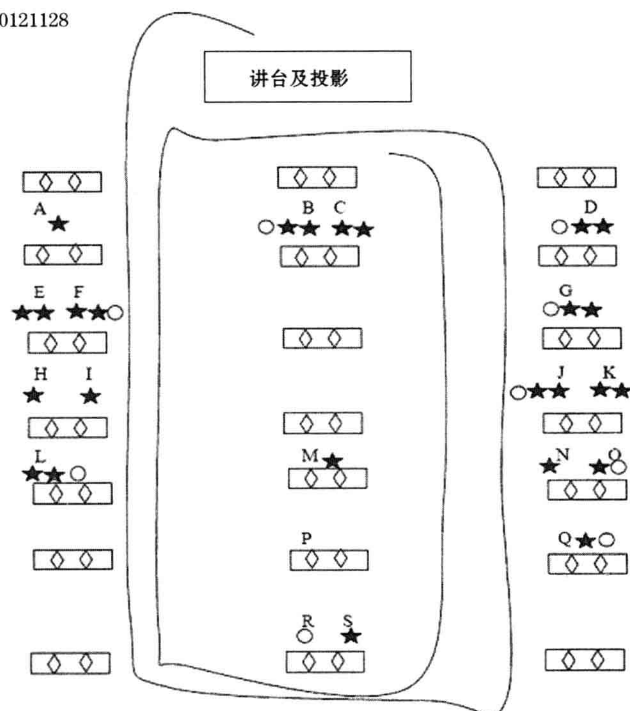
AB… 班级中的学生

⌒ 练习时教师巡回的路线  讲解演示时教师的位置

○ 教师停留指导的位置，个数代表频率（一个圆代表1-2次，两个圆代表3-4次）。教师巡回时，看到学生的问题进行的指导；

★ 教师停留指导的位置，个数代表频率（一颗星代表1-2次，两颗星代表3-4次）。学生“呼唤”，教师进行指导。

②教师指导过程中，研究者跟随教师，近距离观察她对学生的指导



［参考文献］

陈向明(2011):《搭建实践与理论之桥: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黄尧（2009）：《职业教育学：原理及应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康纳利、克兰迪宁（1996）：“专业知识场景中的教师个人实践知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2期，第5–16页。

Kruse, W. (1986). "Von der Notwendigkeit des Arbeitsprozeβ-wissens." pp. 188–193 in *Bildung für eine menschliche Zukunft*, edited by Jochen Schweitzer. Weinheim, Basle: Juventa Drücken.

片冈德雄著，贺晓星译（1993）：《班级社会学》，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

Rauner, F. (2007).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Occupational Compet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Vocational Training*, No.40, pp. 52–66.



## 文末"评"

论文选取一位职业学校女教师作为个案，对其课堂教学进行深入观察，通过再现其课堂教学情境，归纳总结出该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本土概念及其具体表现，并试图做出理解性的解释。论文研究思路清晰，研究设计合理，研究方法的使用恰切，其中，对于观察性资料的分类、编码科学规范，有可取之处。论文还存在如下不足之处：

1. 论文标题中的"职业学校"可省略，因为论文探讨的是"教师实践性知识"这一具有普适性的问题，而不存在"职业学校教师实践性知识"这一特殊问题类型。

2. 作为一项个案研究，论文缺少对于个案选取理由以及个案具体情况的全面介绍，个案的典型性、代表性问题将直接影响对教师实践性知识这一研究主题的把握和深入理解，导致研究结论的说服力不够。

3. 论文的理论基础部分，重点介绍了"实践性知识、工作过程知识"两个关键词，而对于二者间的关系，以及何者构成论文的分析框架并没有做出说明，只有看了下文才知道。建议对两个概念加以分析说明。

4. 论文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关联性不够，如第一部分"研究基础"与第二部分"课堂中发生了什么"之间的关联，对课堂概况、学生的活动、教师的活动的描述，与第三部分"教师的认识"内容的关联，第四部分中教师实践性知识与班级社会学理论中对师生关系的解读内容的关联，都缺少深入的分析，有简单罗列、材料堆积之嫌。

5. 论文缺少对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的具体说明，如个案选择的理由，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信任关系的建立，课堂观察的实施（次数、频率、观察者的位置等），访谈的过程，资料的分析归纳，以及本土概念的提取等，都缺少必要的交待，进而影响了质性研究的可信度。

6. 研究总结和反思部分：主要侧重了对研究方法的反思，但是比较空泛，缺少具体研究资料的佐证，尤其是对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的比较不够深入，放在这里也不合适；研究结论中缺少了对研究主题"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深入分析，导致研究结论比较单薄，深入的课堂观察没有发挥深化、细化研究结论的作用。

7. 建议将附录表格中的内容，如设计思路、资料获取的方式（课堂观察表的生成方式）、本土概念的生成方式等，以文字描述的方式在正文中加以呈现，而不仅仅作为补充材料出现在论文最后。



## 学生回应

1. 标题中“职业学校”可省略。

听课教师为某职业学校计算机专业教师，授课对象为中职二年级学生，课程内容为《网页设计与制作》。受到学校自身资源、学生职业能力水平和教师自身对教学认识的影响，在教学过程中，并未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与普通教育信息技术课或高等教育计算机专业《网页设计与制作》教学方式类似。同意略去标题中“职业学校”。

2.“教师实践性知识”与“工作过程知识”二者是何种关系？究竟以哪个概念作为论文的分析框架？与第二部分内容之间有何关联？

“工作过程知识”为职业科学研究内容，“教师实践性知识”属于工作过程知识的范畴，可以说是教师这个职业的“工作过程知识”。之所以加入职教领域工作过程知识的相关研究，是因为通过分析现有的，关于“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研究及概念界定，作者认为现有研究存在概念界定过于抽象、对实践性知识各种类型之间关系未作说明（在第一部分已有研究述评中已做说明）等问题；教师实践性知识多属于隐性知识，作者本人没有教学经验，难以挖掘出教师的实践性知识，而工作过程知识的相关研究指出工作过程知识具备敏感性、情境性等特征，而且工作过程知识界定为“引导行动的知识（know that）”，“解释行动的知识（know how）”，“反思行动的知识（know why）”的交集，更具有操作性。

教师实践性知识的类型作为第三部分教师认识及第四部分理论总结时的维度。工作过程知识的应用体现在第二部分教室发生着什么与第三部分教师认识之间的逻辑联系，即教师行动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行动。

3. 第二部分的课堂概况、学生活动、教师活动三部分内容显然是基于课堂观察获得的，课堂观察是如何实施的？观察者的位置？课堂观察表、观察的次数、频率等研究过程需要做出交待。

该部分内容在附录 2 中有做说明。作者作为助教跟随授课教师一起在班级活动，观察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互以及学生的活动。没有采用固定的课堂观察表，而是尽量客观地、全景式地记录及课堂环境、教师活动和学生活动，在课堂上，作者做简要记录，结束后立即整理记录，以录音辅助记录。

4. 对课堂概况、学生活动、教师活动等材料的呈现缺少分析。

在如何成文这个问题上，作者一直不是很清晰，导致了成文后，各部分之间逻辑关系不够明晰。

根据质性研究课教师讲授，客观呈现资料—解释资料—总结理论。该部

分内容作者意图客观地呈现资料，在文章第三部分：教师的认识中，作者意图通过对教师的访谈，分析教师对课堂环境、学生活动及教师活动的认识，即让教师自己来解释为什么这样教。而不是作者来解释“课堂概况、学生活动、教师活动”为什么是这样的。但是，对教师的访谈，带有作者解释资料的视角。

陈向明老师在《搭建实践与理论之桥——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采用边呈现材料边分析解释的方式，对教师为什么这样教进行解释，像答题一样，点出题眼。但是作者认为，课堂上教师的某一活动与教师的某一认识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教师的某一活动受多方面教师认识的影响。“题眼”难以一对一地解释。所以选择课堂实际情况分点呈现，教师认识分点呈现。

5.“教师的认识”这部分材料是如何获得的？访谈是如何实施的？

对教师进行介绍时，提到过教师的实际情况，由于教学任务重及照顾家庭的原因，教师并没有专门时间接受访谈，因此作者在提前到教室、课间及和授课教师一起吃午餐、乘车等时间，见缝扎针地根据课堂上观察到的师生活动，对教师进行询问和交流，并及时整理资料。

总的来说，作者认为齐老师的点评正好抓住了本人在成文中遇到的疑惑：①质性研究如何逐步呈现研究过程，将各部分内容条理清晰地呈现出来，使文章前后有一种浑然一体的逻辑性。是“感性”地娓娓道来，增加文章的易读性？还是按照量化研究的方式，对研究设计等做严格的报告？初次写作质性研究的文章，作者觉得不容易把握，最后成文时自己都有种“画虎不成反类猫”的感觉。②尽管收集大量资料，但是文章最后在做分析的时候，没有回到关于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深入讨论，使得结论单薄。其实，作者对于课堂情境下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总结体现在文章最后一幅图中，但缺乏必要的说明。另外，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作者确实感到大量资料相当难以驾驭，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不出来，想“吐”却“吐”不出来，所以相当“不快”。本来投入大量精力进行课堂观察、资料分析整理等，但是在成文的时候，却没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反思原因可能在于：①作者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定位，课堂观察者评价者，还是研究者？事实上，在成文的过程中，作者还没有从课堂观察者评价者的身份转换到研究者的身份（而且从情境中脱离出来，进行理论的思考对于作者来说很难，当时也很纠结），因此，文章缺乏逻辑上的连贯性和理论深度。②作者本身对于质性研究方法及教师实践性知识的认识还不够清晰。

## 点评专家齐学红简介

齐学红：教育学博士，教授。2003年进入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教育系工作，现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江苏省教育学会班主任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专业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近几年主要从事道德教育社会学、质的研究方法、教育人类学、教育改革社会学研究，以及班主任专业化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先后在《华东师大学报》《教育理论与实践》《全球教育展望》《上海教育科研》《南京师大学报》《教育科学》《中国成人教育》《教育科学研究》《班主任》等杂志发表论文几十篇，出版个人学术专著两部：《走在回家的路上——教学生活中的个人知识》（获江苏省高校2006年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学校生活中的教师和学生》。先后被评为南京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后，南京师范大学“青蓝工程”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

# 流动儿童家长参加读书会的个案研究

文／刘羽[1]
评／陶传进

[摘要] 本研究对一位流动儿童的妈妈参加家长读书会的过程进行了个案分析，采用了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进行数据收集，对家长原生态的教养方式及其在参与读书会过程中的改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家长通过参加家长读书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他们的育儿观念和育儿行为。

[关键词] 流动儿童　家长读书会　家长　游戏小组

[1] 刘羽，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学前教育学专业 2012 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儿童艺术教育。

文中“点”

## 一、问题的提出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以社区为依托的面向流动儿童家长开展的读书会对于流动儿童家长育儿能力所产生的影响，希望通过这个研究探索对于流动儿童家长来说较为适宜的教育支持策略。本研究以一位参与流动儿童家长读书会的家长G妈妈为个案，研究她参与读书会的原因；家长读书会给她及其他家长带来了什么改变；流动儿童家长读书会是如何对家长产生影响的等问题。本研究中采用的是王放关于“流动儿童”的定义，即“流动儿童”是指年龄在14周岁及以下，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居住的流动人口的子女。本研究中的“流动儿童”和“流动儿童家长”特指参与到四环游戏小组中的流动儿童及其家长。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①流动儿童是当前在游戏小组参与活动或已经毕业的儿童和未来还有可能参与到游戏小组活动中来的儿童，年龄大致在3到10岁之间。②流动儿童家长为四环市场上的摊商或者社区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关于读书会目前没有统一的界定，卡兰德（N.D Kurland）以瑞典的读书会为例，指出读书会的特性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小团体研读；参与者因共同的兴趣结合在一起；领导者主要功能在刺激讨论，而非扮演一般教师的角色；参与者通过相互讨论彼此帮助；目的在于理解和相互启发；纯粹自愿参与；聚会时间地点以参与者方便为原则。本研究对读书会的界定采用台湾学者邱天助在《读书会手册》一书中对读书会的界定，“读书会是一个自主、自由、自愿的非正规学习团体，通过成员阅读共同的材料、分享心得与讨论观点，以吸收新的知识，激发新的思考，扩大生命的空间”(邱天助，1997：23)。

## 二、研究背景

### （一）处境不利儿童家庭教育的支持

处境不利儿童是在社会发展、调节和竞争中处于困难和痛苦境地的一类儿童。由于各国的实际情况不同，处境不利流动儿童的诸多问题在我国多有研究，而在国外，对处境不利儿童的研究视角多集中于对低收入家庭儿童、特

殊儿童、离异家庭儿童等，但对本研究同样有借鉴作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多从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研究人口流动、迁移的相关问题，90 年代以后，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快，流动人口从最初的单身外出转变为举家迁徙。关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学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的区域性调查研究，在学前教育阶段，针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研究较少，且集中在现状调查和对策研究。自 1965 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一直专门拿出相当一部分教育资金，用于支持少数民族和低收入家庭改善教育环境，包括免费为这些家庭提供成人教育、家长教育和儿童教育等，保障了那些低收入家庭的家长有可能参与到子女的教育中去。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先行教育计划。先行教育计划项目始于 1964 年的一个社区行动方案，它为儿童及家长提供多重服务，提供大量家长参与的机会。先行计划还动用了社区的大部分资源，如健康、医疗等，为这些儿童与他们的父母服务，通过支持整个家庭使儿童获得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以期获得良好的教育环境。

1997 年，英国政府推出以家庭为切入口、以社区为依托，面向早期儿童及其父母的综合服务计划，称确保开端项目（Sure Start），也是一个非正规学前教育中补偿家庭教育的典范。家长在这个项目中既是直接受益者，更是项目的设计、管理和运行实施者。其权利和能力都得到了尊重和重视。由于该项目强调整个社区的积极参与，所以有着丰富的成员组成，包括志愿者、社区组织、教育者、保健工作者、地方政府以及家长，可以说调动了社区中一切能够调动的力量，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为家长更好的养育孩子提供支持。

在我国，对家庭教育提供支持的最早实践要追溯到清末时期，清末的蒙养院是幼儿家庭教育向社会化教育转化的产物，但幼儿教育仍主要在家庭中进行，蒙养院是辅助家庭教育的组织。蒙养院训练保姆的教材，也要每家散给一本，以供家庭教育孩子使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社会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这反应在幼教领域便是在正规幼教

机构蓬勃发展之外，各种各样的非正规教育形式也适时的发展起来。但是，客观的讲，相比较国外，我国利用社区资源实施对家庭教育的支援项目相对缺乏。

2004 年以来，北京师范大学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研究中心在四环游戏小组开展非正规学前教育的实践有八年多的时间，为四环社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改进进行了多方面的行动研究。如在四环游戏小组开展亲子读书活动，通过图书借阅、组织家长和孩子去社区图书馆读书、每天睡前十分钟的亲子阅读等，从最简单的讲故事开始鼓励家长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来。在家长开始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基础上，四环游戏小组又开展了面向流动儿童家长培训的"家长学堂"，针对流动儿童家长的特点探索适合的培训方式，对流动儿童家长赋权增能，使其参与到非正规的学前教育中来。

### （二）流动人口及其社区公共生活

外来务工人员生活在城市，他们辛勤的劳作已经为城市的建设和市民的生活所不可或缺，但是他们被城市人接纳的程度还很低，张利军通过对不同代际的农民工社区融合进行分析，指出虽然农民工融入社区的状况存在差异，但总体上面临社区融入难的问题。以四环市场为例，外来务工人员多以业缘和地缘的关系生活在一起，生活的圈子仍是流动人口，如此长期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处于隔绝的生活状态，很少走出去参与到社区生活中，和谐社会的建设不是一句空话，需要有实际的内容和措施。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关注，许多学者也在尝试探索帮助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融入社区公共生活的道路。如张燕在《从北京市户籍居民眼中的农民工看城乡融合的艰巨性——有关非正规教育社会外部因素的社会学考查》的研究中提出了促进城乡融合的三条意见：首先是克服观念障碍转变政策倾向性，注重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其次要因势利导，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创造条件；最后要变管理为服务，消除制度性歧视。金德琅在《外来务工人员教育培训的政府投入与社区介入》（2010）中指出，政府要给予各方面投入，以实现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培

训，积极发挥所在社区的作用，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倪毅、毛煜焕在《社区加强外来务工子女的家庭教育与和谐杭州的建构》（2008）中，以杭州地区为例，分析了外来务工子女家庭及家庭教育的现状，并指出社区要发挥积极作用，在掌握外来务工子女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对外来务工子女的家长进行指导，帮助外来务工人员及家庭更好的融入暂住地区。李相禹在《非正规学前教育对农民工家长社区融合的影响——以四环游戏小组为例》（2011）的研究中，以非正规学前教育组织为媒介，探索非正规学前教育对农民工家长的社区融合的影响因素。

##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是目的性抽样，即根据研究目的选择为研究问题提供最大信息量的样本。选择四环游戏小组的流动儿童家长读书会的原因是，我作为这个非正规组织中的一位志愿者长期参与四环游戏小组的日常活动，对于游戏小组所在的四环社区中的流动儿童家长比较熟悉，便于进行观察和访谈。此研究之所以选择以G妈妈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一是因为，G妈妈从本学期初刚刚开始参加家长读书会，对于了解她参与读书会的动机及观察她因参与读书会而产生的变化等都较为有利；二是因为，G妈妈参加读书会的主观意愿很强烈，参与的频率较高；三是因为，G妈妈能够根据读书会上讨论的内容在生活中做出行为上的调整，并愿意将这个过程记录下来。

收集资料的方法采用了开放式访谈、非正式交谈、现场观察和实物收集。开放式访谈的时间每次大约一个小时，地点是四环游戏小组的活动室或院子。访谈时对被访者的语言、表情和肢体动作做了记录，其中包括自己对方法的反省。包括G妈妈在内，我访谈了3个参加读书会的家长。在参与游戏小组日常活动的过程中，因为参加读书会的家长跟我比较熟，常常会跟我进行非正式的谈话。谈话的内容包括他们自己家的事、与孩子互动的事及对其他家长的一些评价，我会在之后凭记忆将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在游戏小组的日常活动和大型活动中我观察G妈妈、G及G

的姐姐的行为方式和互动方式，在过程中或过后进行文字整理和反思。此外，我收集了家长读书会的讨论记录（12次）、家长写的育儿日记（19篇）。

## 四、研究结果

### （一）背景介绍

2004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师生来到四环农贸市场调研，发现市场上很多孩子浑身上下脏兮兮的满市场疯跑玩耍，无人看管和照料。在调查了四环市场3～6岁的流动儿童家长的需求后，主持调研的张燕老师和她的研究生们创办了针对流动儿童学前教育的育儿互助组织——"四环游戏小组"。游戏小组能够容纳30多个孩子，由参与活动的家长轮流值班当老师，而来自北师大的学前专业的学生作为志愿者为家长提供教育支持。为了使家长们关注自己孩子的教育，提升育儿信心，游戏小组的志愿者们在行动中做研究，开展了很多与家长成长、读书相关的活动，但家长和志愿者并没有深入讨论教育问题的平台。2011年9月参与游戏小组活动的家长中有十几位家长越来越感到自己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需要学习，便与志愿者商量开始开展流动儿童家长读书会。读书会于每周五晚饭后在游戏小组的活动室开展活动，有两三个志愿者和十几位家长参加，以读书为核心，配合一些经典的教育电影，家长和志愿者们根据书中或电影中的内容，结合自己在与孩子互动过程中的经验展开讨论，志愿者还会鼓励家长们记育儿日记，并在自愿的前提下与其他家长分享。经过了三个学期的读书会，家长们共读了《正面管教》《家庭教育》《为孩子立界线》三本书及《地球上的小星星》《放牛班的春天》《音乐之声》《成长的秘密》几部影片。有余力的家长还进行了一些延伸阅读，如《游戏力》《窗边的小豆豆》《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等。G妈妈38岁，是个全职妈妈，有两个孩子：大女儿7岁多，上小学二年级，小儿子G有3岁多了，2012年夏天开始参与四环游戏小组的活动，自2012年9月起，G妈妈开始参与到游戏小组的流动儿童家长读书会中。

### （二）参加读书会的原因

2012年9月14日，G妈妈第一次参加了家长读书会，由于这一次读书会也是这一学期第一次活动，几个之前一直参加读书会的家长向新晋的家长介绍读书会中参与者需要遵守的规则。如当一个人发言的时候，其他的人要认真听，若有不同意见需等他说完了自己再说；大家在读书会中分享的事可能涉及隐私，不可以到处传播；当某位家长在分享个体经验的过程中若表现出伤心、愤怒、激烈的情绪时，倾听者要尽量理解和接纳；每位参与读书会的家长都要记育儿日记，并享有均等的发言权等。在这个过程中，家长们不断的提出关于“为什么读书”“为什么参加读书会”的看法，如H爸爸说：“我觉得不光是为了看书，要将书中的技巧用到实际中。光学不能改变自己，改变孩子是不现实的，看再多也没用。”而X爸爸认为“我读过《好妈妈胜过好老师》这本书，有点知识的家长才能够用书中介绍的方法。他（书中的孩子）的妈妈是大学教授，好些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的。”P妈妈则认为自己在书中学会了如何控制孩子看电视的方法，在解决教育孩子的具体问题上，看书还是有帮助的。G妈妈大概是因为第一次参加读书会，时间过去大半了她都没有说话，在分享读了《为孩子立界线》这本书序后的感受时，她说：“当我看到第一段的时候我都要掉眼泪了。我觉得（书中写的）就是自己。我从来没为自己活过，都是为他们奋斗。他什么都不干，连被子都不叠。我家所有的事都是我自己干。我家孩子上二年级，我不盯着她，她就不写（作业）。我还要帮她检查，（写错的地方）帮她擦了。在家我就是保姆，我管他仨人。天天都急。我每天晚上12点才睡，早上5点多就起来，每天干不完的活，可是他们仨每天都在（责）骂我，说我这不好那不好，我很痛苦。”在之后我对G妈妈进行访谈的过程中，问及她为什么愿意参加家长读书会时，她说：“我只有小学六年级的水平，读书会上可以学习，学习总是好事。”在访谈中，她也不断地向我倾述她在教育两个孩子上遇到的各种“头疼的事”，她说希望志愿者老师能够帮助她解决她遇到的“问题”，改掉孩子们身上的“毛病”。

在与流动儿童家长们讨论如何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经

常听到家长使用“毛病”来形容自己发现的孩子身上的各种“问题”，同时，家长们也以“教育孩子的方法（或技巧）”来说明他们期望自己获得的一种能力，并将能够解决孩子身上的“问题”或能改掉“毛病”的教育方法、技巧看做是褒义的，并愿意积极地学习和运用这些“方法或技巧”。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认为，作为教育专业的志愿者，我们期望教给家长的正是“教育孩子的方法（或技巧）”来帮助家长应对孩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从没有想过自己对“毛病”和“方法”这两个词的认识与家长对这些词的理解之间有什么差异。

在一次读书会上，我听到H爸爸神采奕奕的分享着自己对付儿子不好好睡午觉时所使用的“方法和技巧”。他发现自己的儿子H最近总是不能自觉地睡午觉，决心帮助儿子改掉这个“毛病”。一天中午，他强行将因不能入睡而在床上“捣乱”的儿子拉到门外，并以训诫的口吻警告他：“如果不好好睡觉，那就在外面站着，你自己选择！”孩子被训斥了一顿之后，乖乖的回到床上，不久便进入梦乡。这位父亲很骄傲的与其他家长分享自己的经验，并相信自己的儿子以后都会自觉地去睡午觉了。由于家长读书会上正在读《为孩子立界线》这本书，这位父亲在举例说明自己所用的“方法”是在给儿子立界线了，并且因为自己获得了“胜利”，而颇有成就感。这时我开始意识到，家长们所理解的“毛病”和“方法或技巧”似乎与我的理解有些不同。于是我问他，如果过一段时间，他（儿子）又不好好睡午觉了，你还要用这个方法么？这位父亲愣了一下，似乎不相信自己的“方法”还有失效的可能性，想了想，还是不知如何回答。之后又有一位W妈妈向大家寻求帮助，说自己的女儿每天晚上都要喝奶，如果不给喝奶就大哭，并拒绝睡觉，希望大家给她出出主意，如何帮助女儿改掉这个“毛病”。

不断地有家长分享自己孩子身上的“毛病”，并希望从其他家长、志愿者、书本中找寻到能够除掉自己孩子的“毛病”的有效“方法或技巧”。这些“毛病”包括孩子爱哭、不爱睡觉、不爱吃饭、学习成绩差、脾气大、拒绝写作业、调皮捣蛋、攻击他人、不听话，等等。经过几个星期家长

读书会上家长们的举例和与家长们的讨论，我终于理解了家长们口中的“毛病”与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技巧”与我所理解之不同所在。我意识到，流动儿童家长们所说的“毛病”指的是孩子经常出现的某种不受自己掌控的、与自己的意愿相违背的行为表现，他们认为这些行为是可以被一种绝对正确的教育“方法或技巧”所解决，而这些“方法”与“毛病”之间是有一一对应关系的，但“方法”与“方法”之间是相对独立的。而我所理解的所谓孩子的“毛病”是出于其特定的年龄特点和心理原因的，这些“毛病”并非是真问题也并非永远存在，也不是特定的“教育方法或技巧”能够解决的，而需要成人在理解了幼儿行为背后的原因后，发现适宜的教育方法尝试解决，而这些方法也不是一劳永逸的。简单的说，教育的核心基于对孩子的理解而非对孩子的掌控。

随着与G妈妈及其他家长的深入讨论与观察，我逐渐认识到家长们参加读书会的原因主要出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认为读书是为了“有用”，他们所说的“有用”是指能够解决自己孩子身上“问题”的具体“方法”的有效性，认为所读的是“使用孩子的说明书”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二是认为“学习总是好事”，这里包含着一种默认的常理，即读书=学习，而自己受教育程度低，如果有机会就要好好学习，而读书会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三是家长倾向于将自己的孩子置于与自己对立的角色中，他们期望通过读书及与志愿者的讨论获得更强的控制自己孩子的能力。这一点看似与第一种原因相似，而实质却不同，第一个原因潜在的观念是认为孩子是有其发展特点的，家长需要了解这些特点才能够“有效使用”孩子，而这一原因背后潜在的观念是默认自己的一贯正确性，主要的动力是“控制”。

## （三）读书会给G妈妈带来的改变

### 1.“成功”的尝试

最初加入家长读书会的G妈妈似乎忽然发现了另一个世界，每一次参加读书会时，脸上都充满认真的表情，认真思考、认真记录、认真问问题，其他家长也被G妈妈的

这股认真劲儿打动了，纷纷给她提出各种改变生活现状的建议。G 妈妈认为家中主要的问题总是来自她的大女儿，并且问题集中于女儿的学习上。她说："我家女儿写作业，到 9 点写不完。后来我把她弄到图书馆了，第一天很新鲜，第二天就不愿意了，摔书什么的，最后写到 7 点半。第三天也是，第四天到 5 点，但是有一个要求，我得给她一块钱。我说可以，那天就给了。后来又不行了。每天有时候写着写着就发脾气，就是不写。每天写不完作业，没有玩。每天就是边写边玩。我打她，她就不说话。她就是说我不爱她。如果给她买点什么东西，就说爱我。"有的家长说做作业是孩子自己的事儿，G 妈妈不应越俎代庖，替女儿承担责任；有的家长认为孩子不愿意学习可能有其他原因，比如孩子玩的时间太少，所以总是在写作业的过程中找机会玩；还有的家长认为母女俩的关系有点问题，两个人总是对抗着，似乎没有亲密的时候，便建议 G 妈妈要陪着孩子玩、抱一抱孩子或是找机会表扬孩子。

G 妈妈听了其他家长的话，似乎感到很震惊，她说："我已经很久没有抱过女儿了，我觉得她这么大了，我更应该抱她弟弟才对，她已经不需要抱了。"在家长们和志愿者的建议下，她答应回去试着抱一抱大女儿。一周后的家长读书会上，G 妈妈分享了她在尝试之后的效果："上次说的拥抱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抱过我女儿，我就抱抱她，她特别高兴。"我问她自己有什么感觉，她说："挺幸福的，好久没有抱她了。生了我儿子之后，就没有抱过她了，她叫我抱，我也不抱了。这几天，我抱她，她可高兴了。"我问她有没有发现孩子的变化，她说："这个星期，我也生过气，但是，发现她更多的优点，以前从来没有发现她好的地方。她回家以后折纸，折得挺好的。以前 2 岁半就去上学了，我曾经给她幼儿园老师写过信，但是没有回我。我女儿从来都没有像我儿子这样，给我讲故事、唱歌。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家庭，都有进步。以前都觉得没有时间写育儿日志，现在愿意写了。今天她爸还不让我来，我坚持要来。她爸说小孩子就爱玩，不用搭理她。"

在 G 妈妈参与家长读书会后的两周内，她就获得了一些"成功"的体验，这里所说的"成功"是她对自己改善

现状的一种认可，发现自己在与孩子互动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些调整后，得到了满意的效果。在我看来G妈妈的“成功”似乎比起其他家长来得更快也更加强烈，与她所具有的个人特质是不无关系的，这些特质包括：G妈妈认定自己是来学习的，总是能够很虚心的听取其他家长或志愿者提出的建议；她还非常愿意将获得的新认识落实在行为上，能够打破原有的亲子互动模式，修正的能力比较强。

**2.“翻天覆地”的改变**

在G妈妈参加读书会一个半月的过程中，她非常乐于将自己的思考、收获及两个孩子的变化等记下来，虽然她总是强调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但在记录中所表达出的真情实感，让其他家长和志愿者都很感动。2012年10月28日，G妈妈站在英东学术会堂的讲台上，与300多位从事流动儿童教育工作的人分享了自己一个多月以来的收获：没有参加读书会以前，我把家里的所有的活全干了，什么都不让他们做，那孩子们做什么呢？我女儿就到处调皮，比如：在人家的肥皂上钉两个钉子；看人家在洗澡就把门给人家挂上；把人家的东西给人家藏起来；拿着改锥给人家把门上的钉子卸下来，等等。反正都是让你想不到的，人家就来告状，我就会打她，发脾气，大吵大叫，还会唠叨不停。现在参加家长读书会了，让我明白了，不是我女儿不对，是自己不好，没有做好榜样，很惭愧，也很内疚，我错了，真的很后悔呀！回家后，我女儿还没有睡着，我怀着一颗愧疚的心去抱了抱我女儿，我女儿好高兴，还说：“妈妈，我爱你”，当时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却什么也说不出来，现在我女儿越来越懂事了。中午吃完饭我问他们：“你们愿意帮妈妈洗碗吗？”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我愿意”，说完就忙活起来。女儿用一个盆洗第一遍，儿子用另一个盆洗第二遍，他们有说有笑好高兴，我也好高兴，我没有再去管他们，他们虽然弄了一地水，却没有打碎一个碗，他们干得很起劲，很快洗完了，没有我以前想象的那么糟糕，还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好幸福。其实我女儿不笨，也很聪明，爱劳动，有爱心，有时候也很知道心疼人，我最近发现原来自己有这么可爱一个女儿，现在两个孩子都很懂事，也都帮妈妈干家务了，我们一起干，一边干，他们还会说：“妈

妈，我们好幸福。”我坚信自己能认真参加读书会，自己先学好了，再用耐心和爱心去影响孩子，以前都是我自己不好，却怪孩子，还老打孩子，打我女儿是最多的，现在我也不乱发脾气了，家庭也和睦了，我要好好学习，做一个称职的妈妈。

看起来G妈妈在这一个多月内，她的内心、她的行为、她家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而这些改变也是包括志愿者、研究者期望看到的。然而在之后的家长会上，当志愿者请她分享感受的时候，G妈妈说“我没什么好说的”，这让我意识到她第一次站在大众面前表达自己真实的生活后，她的内心似乎受了伤害。于是在这一次家长读书会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就这个问题跟G妈妈和其他家长进行一次沟通。

原来，在那天的大会上，五位家长们分享了自己参加游戏小组的感受之后，因为G妈妈说得非常感人，就有几个媒体的记者盯上了她，声称自己已经跟M老师（游戏小组的志愿者负责人）沟通过了，说可以采访G妈妈，于是她迷迷糊糊的就回答了一些问题，比如她的女儿在哪里上学、交了什么样的朋友、家里是做什么生意的等有关她家庭的隐私，G妈妈很担心自己的高调给自己的儿女引来不必要的麻烦，用她的话说是“不想抛头露面，只想安安静静地生活”。虽然G妈妈回答了记者的问题，也对某些敏感问题表示了拒绝，但她仍然感到很委屈。之后她找到M老师询问，才知道那些记者并没有跟M老师沟通过，她顿时觉得自己被欺骗了，感到非常难过，一晚上都没有睡着。G妈妈说，直到跟Q妈妈哭了一个上午，自己的情绪才好多了。在与G妈妈沟通的过程中，P妈妈、Q妈妈、C妈妈也都参与了讨论，因为她们参与游戏小组的时间都比较长了，对于类似的问题也有一些防范的经验了，但她们仍然想不清楚自己拒绝的“界线”究竟在哪里？

然而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我们这些志愿者与G妈妈这样的流动儿童家长之间看似平等，事实上他们却被一种潜在的、温柔的“强权”所压迫——她的“成长”究竟是在为谁服务？她的变化是否需要这样被“引诱”着在更多人面前展示？当我们“告知”她们所应该拥有的权利的同时，

似乎将自己的意图用“善意”伪装了起来，隐隐的证明着自己的强大。

**3. 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

之后的两个月，虽然表面上看起来，G 妈妈在 10 月 28 日展示活动上所受的伤已渐渐平复，而志愿者们心里仍然认为她是家长读书会中的成功案例。可是，我观察到她在家长读书会中的发言明显少了很多，提的问题也多是有关“亲戚家的孩子”，说到自家的两个孩子时，G 妈妈还是一再的为女儿“考了倒数第一名”而焦虑不已，并且用羞辱女儿的方式激励她要好好学习。对儿子 G 倒是没什么担心的，说“儿子各方面的发展都比女儿要好”，“女儿 6 岁的时候还不会拿筷子呢，儿子现在还不到 4 岁就用得很好了”。在游戏小组日常的活动中，她也降低着自己的存在感，总是默默的坐在角落，看着儿子 G 自己玩，脸上泛着淡淡的微笑。

一位志愿者对我说起 G 妈妈的大女儿在“游后海”的时候自己拿粉笔在地上写了“笨蛋”两个字，问她为什么写“笨蛋”呢，她恶狠狠的说：“因为你们都是笨蛋！”然后就跑开了。我不禁想到 G 妈妈的大女儿在游戏小组玩的时候也常常表现出“恶狠狠”的表情，无论是对自己的弟弟 G 还是对其他的孩子或是志愿者老师都很漠然，从不与人主动打招呼或是一同游戏，似乎与 7 岁儿童常有的快乐离得很遥远。元旦时，游戏小组开展了“新年游园会”活动，孩子和家长们一起来参加亲子游戏，G 妈妈也带着两个孩子来玩了，只是 G 妈妈一直陪着 G，姐姐就一直在不同的活动室间穿梭，不说话，脸上也没有表情，离开游戏小组时，G 妈妈一边不停的夸着 G 在游戏中的表现，一边给儿子包上厚厚的衣服，而大女儿却一个人躲在阅读室翻书，任凭 G 妈妈叫了好久也不答应，直到我跟她说该走了，她才面无表情的离开。

原本以为 G 妈妈参加读书会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这些改变包括 G 妈妈能够将原本属于孩子的责任交还给孩子自己承担；能够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放在优先地位，先照顾好自己的内心再去照顾家人；能够将自己的关爱尽量均分给两个孩子，让因为有了弟弟而倍感失宠的大

女儿重新获得被爱的感受；能够降低对女儿学业成绩的焦虑，尽量用正面的期待和强化来激发女儿自主学习的愿望；能够在老公提出自己不认可的要求时表示拒绝或不给予积极回应；等等。然而，经过这一阶段的观察和记录，我发现 G 妈妈的教育观念、行为及生活状态似乎又都回到了原点，冲突还是那些冲突，问题还是那些问题，孩子也还是那两个孩子，哪有所谓的“翻天覆地”呢？

## 五、讨论与反思

### （一）人的可改变性

大概是受到我先前经验的影响，本研究还是基于批判主义的理论，期望通过本人及志愿者们与 G 妈妈等流动儿童家长之间的对话和互动来超越他们对“教育孩子”的无知与误解,唤醒他们在自己成长过程中被压抑的真实意识，逐步解除那些给他们带来痛苦和挣扎的偏见，提出新的问题和看问题的角度。在研究的中间阶段，G 妈妈的一些显性的表现表明她已经比未参加读书会时拥有了自知和自我反思的能力，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都变得更加自主、更加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了,认为在教育两个孩子的过程中，原本认为的都是“女儿不好”转变为“是自己不好”，并愿意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在面对强权时表现出一些抗拒的力量。然而，在本研究进行的后半段时间内，G 妈妈及她的两个孩子在显性表现上似乎又重新回到旧的问题中去，使我不得不反思，我们期望给被研究者带来的“改变”究竟是在何种层面发生？我们这些占有较多社会优质资源的研究者，在被研究者面前似乎充当了一种隐性的“强权”，将主流价值观认可的因素强加给被研究者，“威逼利诱”得使她们改变，从这个角度看，这些“改变”的真正动力又来自哪里？是研究者研究的需要，还是被研究者生存的需要？或许人的改变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为时半年的研究尚不能对“人的可改变性”这个问题给出定论，然而改变的动力、方向、目标、节奏等问题需是研究者所自省的因素。

### （二）研究者的倾向对研究的影响

在本研究进行的过程中，我不断地做着各种记录，也将一些随机的感想写下来，在记录时我一直努力描述客观的事实，然而在成文后重新整理这些文字资料时，我发现自己常常想当然的下结论，自顾自的“奔向”所谓“好”的结果，然而什么是好的结果呢？又完全是站在自己的视角，有时甚至是强求G妈妈与我期望的情况相配。此外，我作为流动儿童家长读书会的参与者、研究者，与参与读书会的G妈妈及其他家长之间似乎一直存在一条深深的鸿沟，G妈妈也曾对我说过“你一来我就不敢多说话”，从其他家长的眼神、表现中也能够发现类似的情绪，有的家长会开玩笑说：“我要和博士坐在一起”，却会在表达完自己的观点后看看我。尤其是在我给家长提出改进建议时，或是在家长与我的意见不一致时，我常常能感受到家长们内心那种“反正也说不过你”的想法。对于“局内人”与“局外人”这两种身份的理解与把握也常困扰着我，我想这一方面和局内与局外的角色调整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做研究基于的理论基础冲突有关——作为参与者我期望尽快“改善”流动儿童家长们的育儿观念与行为（批判主义理论），而作为研究者我期望解释性的理解G妈妈为主的流动儿童家长参加读书会的内部变化（建构主义理论）。有时我会搞不清自己是在改造被研究者的生态，还是在解释性理解被研究者的生态呢？

### （三）再说推广度问题

本研究使用的是目的抽样，对G妈妈进行的个案研究结果不能像量性研究那样当然地推广到所有流动儿童家长中。但是由于我所参与的志愿者团队在做与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相关的教育项目推广的工作，而有类似经验的流动儿童家长或面向流动儿童的幼教机构，在观摩中发现流动儿童家长读书会能够给家长带来较大的“改变”后，都非常认同流动儿童家长读书会这种方式，并期望在自己的教育机构或组织中推广。然而在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这所谓的“推广”中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这种推广常常止于学习“现象”的层面，如家长读书会的形式、所读的书、参与的人数、

持续的时间、开展活动的频率等，而读书会中的隐性因素也是相对“实质性”的因素，如读书会的规则、接纳与理解的氛围、对家长育儿的支持等却是很难学习与推广的；二是推广的动力问题，四环游戏小组的家长读书会是根据家长对教育的认识程度与需求，由家长和志愿者讨论生成的一种形式，其目的是流动儿童家长增强育儿的能力，以读书为契机思考与教育相关的问题，并与其他家长分享育儿的经验等，也就是说读书会的立足点是家长的成长，而期望在自己的组织中推广读书会的人更多是组织的管理者，他们大多是因为看到家长读书会使得家长能够非常认同机构的教育，因而期望通过读书会来解决家长与幼儿园之间的各种冲突，立足点不同的同一形式当然不能够称之为“推广”。

［参考文献］

安春芳（2005）：《在读书行动中实现家长的参与》，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韩嘉玲（2002）："关于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以北京市为例"，《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1期，第25–27页。

何晓夏（2007）：《简明中国学前教育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姜学清（1991）："国外对社会处境不利儿童的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第3期，第49–5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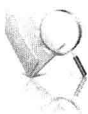
李相禹（2010）：《非正规学前教育对农民工家长社区融合的影响——以四环游戏小组为例》，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邱天助（1997）：《读书会专业手册》，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放（2005）："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中国青年研究》，第9期，第27–31页。

王璐（2005）："每个孩子都重要：英国全面关注处境不利儿童的健康发展"，《比较教育研究》，第10期，第23–28页。

张燕（2010）：《非正规学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基于四环游戏小组的探索》，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文末“评”

1. 案例研究的优势在于通过一个案例的深入分析，看到一些有益的道理。所以，首先要明白本案例给我们打造出来的道理是什么。可以选择的答案有以下几种，但一定要陈述明确，不要模糊或几种混在一起。

人的改变很难；

在 ×× 条件不具备时，人的改变很难；

作为母亲，改变其对待孩子的不正确态度很难，而目前，这种不正确态度又是教育领域的最大问题；

目前对待孩子的不正确态度很难改变，除非具体 ×× 条件；

整个教育领域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问题，就在于传统的那一套教育孩子的观念根深蒂固；

……

2. 要把这种通过案例看到的答案放到一定的理论背景下考察，使其进入到理论表述的轨道。而不再是“×× 母亲的改变很难”这样的事实层面的陈述。

3. 具体到问题的提出层面，也需要进入到具有理论背景的轨道，而不再是课堂作业的形式。

4. 研究背景（既有研究）部分要与这里要研究的问题结合起来，而本文的文献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看不到关于“母亲对孩子教育的态度变化”的有关研究。

最后，整个案例的陈述围绕着要打造的结论走，减少随意性。



## 学生回应

老师给予的评价的确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我在研究及报告成文过程中一直纠结的问题“人究竟能够改变么？”基于本研究，流动儿童 G 妈妈在参加了家长读书会后，开始反思并调整自己的育儿观念与策略，并在现实中获得了一些效果。然而，G 妈妈“现实的改变”与研究者“预期的改变”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不同。G 妈妈“现实的改变”较多的出现在短期行为上，较多的关注教育方法的改变，较多的围绕小儿子而改变，而研究者“预期的改变”更多地关注长期的、观念上的、家庭系统中的改变。也正因为如此，研究者对人的“可改变性”产生了疑问。

经过对这个问题的重新思考，我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人是不能够被改变的，但是人会受到环境的影响。这里所说的改变，强调的是外部因素强加给主体的改变，动力主要来自于外部，而主体只能被动接受。在本研究中即研究者作为动力源，期望改变家长育儿中的种种“错误”，家长只能“被改变”，在研究的过程中也能够看到家长为此而感到的压力。而“影响”与“改变”不同，影响是一种外部因素，它需要通过主体的内因而起作用。在本研究中，每位家长在参加家长读书会的过程中获得的收获、改变是不同的，而家长读书会正是一个能够影响人的“环境”，家长是否改变、在哪些方面改变、什么时候改变等，都是由每个家长自己决定的，而非来自研究者统一的评价标准。因此，当我们把“改变”界定为某种统一的标准时，就很难发现那些“标准”之外的改变正在悄悄发生。我想这才是我在研究过程中找到的那个“答案”。

我同意老师提出的，要把这种通过案例看到的答案放到一定的理论背景下考察，使其进入理论表述的轨道，而不再是“××母亲的改变很难”这样的事实层面的陈述。具体到问题的提出层面，也需要进入具有理论背景的轨道，并需要在研究综述部分增添关于“母亲对孩子教育的态度变化”的有关研究。然而，这种提升并非能够一蹴而就，还需要研究者进行扩展阅读和深入的思考才能够达到。

我对于老师提出的“整个案例的陈述围绕着要打造的结论走，减少随意性”持保留态度。我认为，在质性研究中，研究所获得的结论并非全受研究者掌控，如果我们在撰写论文时心中总是怀着一个确定的结论而去，就很容易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与“打造的结论”相悖的信息排除在外。我认为所谓的“结论”事实上是研究者与读者共同建构的，只有当研究者对质性研究的结论抱有开放的心态，才能够较为客观的去陈述研究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随意性”是需要尽量避免的，也是我在研究及撰写论文中做得不够的地方，常常沉浸在“局内人”的角色中，很难抉择究竟哪些事需要描述，哪些事不需要描述，这也是我作为研究者需要继续修炼的部分。

---

**点评专家陶传进简介**

陶传进：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非营利组织管理、社会公益等，先后出版或合作出版著（译）作6部，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主持或参与完成科研项目20余项。近年来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学位基础课和专业选修课，受到学生普遍好评。

# 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教室互动研究：

## 以教八楼113教室为例

文／杨阳[1]
评／王熙

[摘要]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根据对北京师范大学2012年秋季学期选择教育政策课程，在教八楼113教室上课的留学生的观察，通过笔录、绘图、录音和录像，以及对其中4位同学的访谈，来对留学生的教室互动进行分析和研究。本研究认为，留学生在教室里，更喜欢与自己熟悉的、英语流利的以及经历丰富的同学交流，同时他们更喜欢学术水平高、英语流利和上课有效率的老师，他们还喜欢老师以自己切身经历举例的授课方法。

[关键词] 留学生　教室互动

[1] 杨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历史与文化研究院，中国教育史专业2011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教育。

文中"点"

我国自古就有接纳留学生的传统。从唐至清，我国对留学生的态度，整体上是十分友好的。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不复唐时"万邦朝元正"的盛况，但来我国学习的外国学生，也是日渐增多。近年来，我国非中国籍学生的招生规模迅速扩大，针对留学生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速度开始加快。规模的逐渐扩大，一方面，使学校与留学生教育的利益相关者急剧增多，进而使留学生问题日益成为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我国传统的研究生培养机制中存在的不适合留学生的问题也开始逐渐显现出来。于是，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的各类异事，便在校园网上流传开来。那么，真实的留学生课堂是什么样子？留学生在教室里的互动是否存在问题？有哪些值得我们改进的地方？引起了笔者的思考。

## 一、问题提出

随着来北京师范大学就读的留学生人数越来越多，留学生的学习和互动问题，也日渐引起了大家的关注。我校的留学生教育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迅速，经历了认识—重视—加强的过程。由于文化背景、生活习惯、学习方法的不同，留学生的各类故事也在校园里广泛传播。笔者在多次听闻教授们为留学生上课的经历后，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把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作为研究的他者。

那么具体的研究问题是什么？笔者基于以下方面：一是出于对留学生隐私的尊重，宿舍等休息空间不做探访；二是考虑到研究问题的关注人数，跨文化交流等关注度较高的问题也不研究；三是针对研究条件，比如笔者能找到的可靠的把关人以及个人的研究精力是否充分等因素，最终将研究问题确定为"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教室互动研究——以教八 113 教室为例"。

## 二、研究设计

### （一）研究内容

本研究通过观察与访谈，来谈论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在教室的互动情况。从 2012 年 10 月开始到 2012 年 12 月，

笔者进入教八楼 113 教室旁听留学生课程“教育政策”，分别在课程的初期，中期，末期三个阶段进行学生访谈，并对访谈内容进行分析整理，探索留学生在课程中的互动变化，以及这些互动在课程的不同阶段有何差异。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①哪位学生在何时，与何人发生互动？

②为何发生互动（或互动内容是什么）？

③互动结果如何？

### （二）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教八楼（数学楼）113 教室学习朱志勇老师“教育政策”课程的留学生。

①必须进入 113 教室。

②必须为非中国国籍。

③必须是学生。

④必须取得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籍。

⑤必须在该教室至少上过 3 次课（含 3 次）以上。

### （三）关键概念

教室互动：发生在教室里的特定人群的人际交往。一旦他者离开教室，或者他者的动作不是人际交往，或者进入教室的人物不在特定人群内，都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该课程有一个讲座课，不在 113 教室。但是，由于研究对象全部转移到小会议室，并且为讲座的主体听众。因此，该会议室也被视为教室，该会议室发生的互动也在研究范围内。

###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法。主要通过个案研究，根据对北京师范大学 2012 年秋季学期选择教育政策课程，在教八楼 113 教室上课的留学生的观察，通过笔录、绘图、录音和录像，以及对其中 4 位同学的访谈，来对留学生的教室互动进行分析和研究。

（1）观察法：在最后一排靠左或靠右的位置，能够看到教室里所有人员的互动情况。

①绘图：按照教室讲台和座位的情况，绘出教室的简略平面图，并标出相关人员的位置。方框表示男生，半圆

表示女生。用带箭头的线来表示人员移动情况，用圆圈圈起讨论小组，用不同颜色的笔来表示互动参与的人员。基本上每隔半个小时画一张图。

②笔录：记录在绘图的下方、角落或背面。包括本页图开始记录的时间，他者互动的时间，教室内的一些活动以及笔者认为应该注意的事件。部分记录直接写在绘图中标示某人的方框内或旁边。

③录音：进行了全程录音的有：具有代表性的讲座课、最后一课，以及人数较多、来不及笔录的课程。

④录像：分组讨论时，为每个组都进行了简短的录像。同时，因为讲座中的互动也很有意思，故也录制了一个片段。

（2）访谈法：考虑到研究的便利，笔者选择的研究对象，都是在前 3 次课的观察中，看起来能够交流的他者。有些特别的人，比如某男生，在前 3 次大约 10 个小时的课程中，总共说了不到 5 句话。这样的人不列入访谈对象。此外，笔者还欢迎对于笔者的研究感兴趣，主动接受访谈的同学。

①抽样：把 14 位留学生简单分成 3 个群体：积极学习、比较积极、表现一般。在每个群体中，访谈英语相对较好的那位同学。分群标准为：

◆积极学习者相对爱讨论、爱提问，对作业比较认真。

◆比较积极者会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也参与讨论甚至说话很多，但是，上课爱玩，有时候会开小差。

◆表现一般者会缺课，听课的注意力不是很集中，多数情况下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②材料收集：预先拟定访谈提纲，在课后或课间，在他者比较放松的情况下，进行开放式访谈。在访谈时，尊重他者的意见，选择是否录音或录像。

（3）文本分析法：除进行观察和访谈外，笔者还收集了老师在课堂上发放的讨论资料以及同学们在教室里展示的作业，以备研究、分析之用。

## 三、研究过程

### （一）场景进入

在任课老师的允许下，进入教室旁听。在第二次课引起大家注意，在第三次课与大家分享饼干时，才被接纳。

### （二）研究参与者

（1）教师：主讲教授和辅导老师，既是把关人，也是笔者在研究中要观察的对象。因为，学生与他俩的互动也很多。

（2）学生：笔者的主要研究对象。为了方便记录以及保护他们的权益，笔者为他们全部起了绰号。

沉默女和沉默男从来不说话（事实证明，整个下午 3 个小时的课程，他俩从未发言，即使和同学说话，也不超过 1 分钟）。

发夹女的发夹绝对不是中国饰品、不是日本饰品、不是韩国饰品、不是英国饰品，虽然造型简单，但是有特点。事实上，她的配饰都很特别。

上网男除了编程，基本上不停地在登录各种网页查找老师的问题。他的电脑从不离身。

发言女总是第一个发言，并且说得很多，除非被老师打断。

凤爪男发言时爱做手势，他只用到了拇指、食指和中指，剩下的手指头蜷缩，左右手都是同样的情况，很像凤爪。

粉红女粉红色的配色居多，是整节课唯一一个看到用橡皮的人。橡皮为浅粉色。

指环女的指环很亮，不爱说话，爱秀指环。

单手男在课上，绝大情况下用右手活动，左手始终戴手套。

多动男从上课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小动作，包括玩自己的手指和玩电脑按键（非上网，纯粹玩）。

爱心女很愿意在其他人发言时给予帮助。

红手套从头到尾都双手戴着红手套，即使是用电脑和做笔记，也绝不摘下来。

职业女爱穿套装，很有上班的感觉。她在后几次课才

出现在教室。

家庭女也同样在后几次课才出现在教室。她比其他女生有更多的“家庭主妇”的气息。

（3）其他人：了解笔者的研究对象，并为笔者提供信息的其他人。比如，笔者的同事，曾与多动男合租一套房子，他告诉笔者多动男喜欢 party，爱学老北京话……这些信息便利了笔者的访谈和观察。

### （三）访谈提纲

为了让交流更友好，笔者的问题很少，更多的时候是聆听他者的发言。在访谈中，主要问的问题有：

①你是否喜欢这门课？为什么？

②你在这间教室里最喜欢和谁聊天？聊什么呢？（可以拒绝后一个问题）

③你对哪个同学的或者他的哪个文化体系比较感兴趣？

④你喜欢回应老师的问题吗？为什么？

⑤你还喜欢在上课时做一些什么事情？比如分享饼干，听中文歌……

### （四）访谈对象

按照前述的抽样条件，笔者选择了积极学习的上网男、比较积极的发言女，以及表现一般的多动男作为访谈对象。红手套对笔者的问题比较感兴趣，同时因为他与多动男的关系较好，因此二人一同接受了笔者的访谈。

上网男来自发展中国家，喜欢穿“我爱中国”的文化衫，总是积极向老师请教问题。他有中文名，有以中文名申请的邮箱。他还很有中国式“恭维上司”的风格，会说“厉害厉害”、“佩服佩服”、“跟老师多接触接触嘛”。也许是他母国的环境原因，他很有股“向上爬”的劲儿。

发言女来自比较富裕的国家。中文和英文都很棒。她一方面对课堂讨论表现得很积极，很爱发言，但另一方面却对课堂表现得很“无所谓”，经常玩手机。当然，她是在听课的同时玩手机，能够一心二用，给人“智商很高”的感觉。她的朋友很多，经常说：“某某国的朋友如何如何”，“我有一个某国的朋友，他……”她对北京和上海都比较熟悉。

多动男上课的小动作最多。他喜欢中国特色的小东西，比如老北京布鞋。他不是很喜欢上课，经常偷偷玩。令人意外的是，他的发言往往慢条斯理，与他的动作给人的印象几乎截然不同。他可能是班上对中国文化了解最深的一个同学，知道四书五经，到过新疆、陕西等很多大陆地区。

红手套来自东南亚某国。可能因为害怕干燥的原因，他无论做什么都戴着红手套，或者红黑相间的手套。他很喜欢运动，经常带着球拍；他也很喜欢音乐，会谱曲和弹吉他。他和发夹女一同为这门课程写了一首歌，并在最后一节课带着同学们一起唱。

### （五）收集数据

（1）访谈数据收集：所有的访谈由笔者一人完成。在征询了他者的意见后，只做笔录，未录音。

第一次访谈为40分钟，访问对象为多动男和红手套。时间安排在课后，多动男边吃晚餐边回答问题，红手套则端正地坐着，不吃不喝地陪伴他一齐接受访谈。

第二次访谈对象为上网男，访谈时间为20分钟。时间安排在讲座课的课前。

第三次访谈对象为发言女，访谈时间20分钟。时间安排在讨论课的课间。

（2）观察数据收集：笔者从10月到12月参加的所有课都有绘图和笔录。这些记录能看出互动的对象以及互动次数的多少。讨论课和讲座课有录像。讲座课、讨论课和最后一课有录音。这些数据能看出他者在互动中的情绪好坏，有些能直接反映互动效果。

### （六）分析数据

（1）提炼核心观点：笔者归纳、提炼每次访谈的核心观点，结合他者的语气，尽可能用中文恰当地表述出他者的观点。核心观点尽量翻译他者的原话。

对于观察资料，会根据笔录和绘图进行要点提炼，对于笔录不清楚或表述不当的地方，参照录音和录像进行修改。

（2）交叉分析：对于三次访谈的数据进行交叉分析，对于相同的话题进行归类。

（3）审核：得出结果后，再结合背景资料，以及录音和录像提供的信息，进行核查。尽可能缩小理解偏差。

## 四、研究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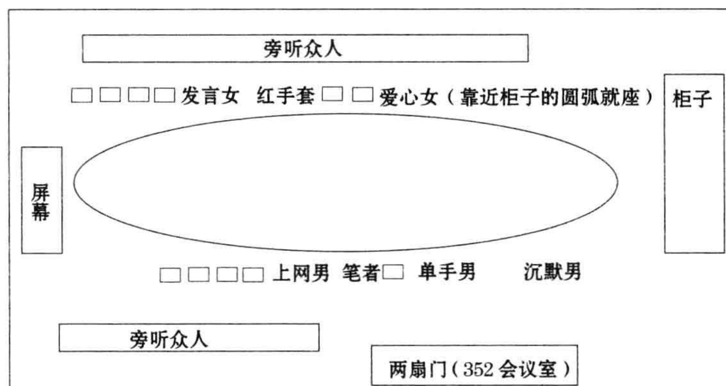
通过数据收集和分析，笔者从以下三方面整理出了自己的研究结果。

### （一）与选课同学的互动

**1. 多数同学更愿意与熟悉的人互动**

从绘图和笔录的整理结果来看，多数同学更愿意选择自己觉得熟悉的人来交流。比如表现为两个极端的人，最不爱说话的沉默男和最爱说话的发言女，都是如此。特别是在换了新环境的时候。以 11 月 30 日的讲座课记录为例，此时众人由熟悉的 113 教室转移到 352 会议室。

讲座课上，研究对象围绕圆桌而坐。笔录和绘图显示（□代表其他同学）：




沉默男一开始是坐在笔者旁边的，但是，他很快收拾东西转移了位置，坐在熟悉的同学身边。

13:46 沉默男从我的旁边转移到单手男的旁边，但是未与他右手边的爱心女交流。

……

14:34 众人多数开始记笔记。爱心女与旁边的人低声交流，但是沉默男只是点头，没说一句话。家庭女开始摸头发。发夹女始终在做笔记。

……

16:07 爱心女与家庭女交谈后相视而笑。爱心女又与旁

边的沉默男交谈，沉默男始终是只听不说。

……

16:30 沉默男开始收拾，此时，指环女已经收拾好了。

以上是沉默男这次课仅有的 4 次记录，这已经是他动作表情比较多的一节课了。

发言女和红手套的祖国距离很近，两人性格都比较开朗。他们一到会议室就选择了坐在一起，交流也非常多。笔录显示：

13:49 众人聊天。

……

14:56 发言女为红手套解释什么是“第一节课”，此时，教授的 PPT 展示的是中学的作息时间表。

……

15:31 上网男关于“policy”再度提问。教授的回复被发言女与红手套小声交谈后记录。

15:53 发夹女提问。此时，发言女与红手套小声交流。随后红手套又与多动男小声谈话。

……

15:59 红手套与发言女继续交流。

……

16:13 红手套继续与发言女交流。他们的交谈低声而快速，即使是录音笔的记录也不是很清晰。

……

16:20 红手套与发言女继续交流。

……

16:27 发言女与发夹女以及红手套交流。发夹女开始收拾东西，爱心女也开始收拾东西。

实际上，红手套与他熟悉的多动男交流也很多。这里只是截取了红手套和发言女的互动情况作为例子进行分析。

**2. 多数同学更愿意与英语流利的人互动**

英语作为交流的工具，理所当然地，对这个工具运用越好的人，互动的机会越多。但是，分析显示，并非发音标准或用词准确的人互动的机会就越多，而是英语说得流利的人，互动的机会会很多。

发言女的英语既流利又标准，所以，她在教室里左右

逢源，很受欢迎。沉默女的发音相对很标准，发夹女的语法相对比较准确，但是，她们的互动都比较少。在所有的研究对象中，上网男和凤爪男的英语口音最重，但由于他们说得都很流利，所以，他们和同学或他们与老师的互动都非常多。甚至连恶作剧的互动，都会比较多。以下列记录为例：

113 教室上课平面图（2012 年 10 月 26 日下午第二节课）

主讲老师

讲台

| | | | | | | | | |
|---|---|---|---|---|---|---|---|---|
| | 多动男 | | | | | | 辅导老师 | |
| | | | | | | | 沉默女 | 发夹女 |
| | 爱心女 | | | | | | 上网男 | |
| 沉默男 | 红手套 | | 粉红女 | 凤爪男位置 2 | 凤爪男位置 1 | | | ME |
| | | | | 指环女 | 单手男 | | 发言女 | |

13:39 凤爪男迟到。单手男用自己的鞋子碰触凤爪男的椅子底下，稍后，用手推凤爪男的椅子背。

……

14:39 多动男带来的朋友在课间离开。多动男人缘不错，他拿出饼干和酱料，与大家分享。

发言女人缘更好，她在课间与大多数人打招呼，吃多动男的饼干，并把手搭在红手套的肩膀上。

单手男与凤爪男聊天。

……

15:15 单手男趁老师不注意，用手挠凤爪男的背部。

……

15:56 凤爪男向粉红女方向移动了一个位置，他的桌子在第二节课，才摆上了一些学习用品。移动可能性一：看粉红女的课本。移动可能性二：被单手男骚扰得不开心。

……

此外，由于语言流利，发言女和爱心女经常在回答问题时彼此呼应，甚至帮助老师和同学进行翻译，受到大家的欢迎。而凤爪男和上网男，也因为语言的流利，经常向同学提出问题，引起了大家的思考和争论。

**3. 多数同学更愿意与经历丰富的人互动**

观察显示，拥有众多朋友的发言女和走过众多地区的多动男与同学的互动次数较多。他们与大家交流的时间也比较长。主动找他俩的同学也比较多。

比如，这个班上的两个 party，多动男的生日 party 和圣诞 party，就是由他俩宣布的。当多动男宣布自己的生日 party 的时间和地点时，大家都很认真地在听，没法去的同学都向多动男表示歉意。当发言女宣布圣诞 party 的时间和地点时，更是在课堂上引来了大家小小的欢呼。

多动男由于走过的地方比较多，他对自身经验的分享，总是让很多同学静静地聆听。这让他无形中拥有了一种“老大范”，以至于在讨论课快结束时，他旁若无人的低声吟唱 2012 春晚的流行歌曲《因为爱情》，大家都没有表示反感，甚至有人跟着学唱。

发言女则把自己朋友的经历和自身对于中国的体验在课间进行分享。她还和多动男商议“puppy 俱乐部”的成立事宜。她也是访谈中大家都喜欢交往的对象。

### （二）与教师的互动

与教师的互动，更多地体现在大家对于课程的意见上。观察记录显示，大家更关注主讲老师的观点，对于辅导老师的发言，很多同学则不予回应。最为严重的情形出现在 12 月 7 日的记录中。

这天下午的第二节课从 15:21 开始。辅导老师接着她在第一节课讲述的内容，继续站在讲台上。她的语言明显没有主讲老师流利。笔录显示：

15:29 几乎所有人走神，只有家庭女和上网男抬头听。

15:31 辅导老师继续“A case study of policy evaluation”的讲述。

15:34 辅导老师为 PPT 没有拷贝全而道歉。主讲老师

坐在教室第二排接着讲。

15:34 主讲老师举各省例子，众人抬头听。

15:36 辅导老师拷贝好表格。

15:39 辅导老师继续在讲台上讲，众人只有家庭女、发夹女、粉红女、上网男听课。

15:47 辅导老师与主讲老师互动。

15:49 主讲老师提出大家的反应不对，告诉大家要“尊师重教”。引起了红手套与发言女的回应。

随后，主讲老师可能有些生气，他告诉大家“每个老师都认真准备了课件”，主讲老师希望大家对老师的讲课表示尊重。之后，他让大家对课程发表建议。此时，发言女把她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说的话，用更委婉的方式加以了重复。之后，课堂才又恢复了往日的活跃。这个小插曲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它带来影响，可能持续了两次课。记录显示 12 月 28 日 13:38，辅导老师换椅子。但是，没有同学来帮忙。这个小插曲，其实并不意外。它在访谈中，就已经隐隐露出一角。

**1. 同学们更喜欢学术水平高、英语流利的老师**

在访谈中，上网男、多动男都用了“喜欢与之交流”的句式，来表达对主讲老师的尊重。四位被访谈的同学，都没有提到辅导老师。但是，红手套在讲述“task 不明确”时，提到了辅导老师交代作业时不明确，用词不准确。

通过笔者追问，红手套所理解的“task”，不仅仅有中文“任务”的含义，他认为“作业”、“分组讨论”、“论文”等也都属于“task”。这得到了多动男的认同。由此衍生出的观点，比如“教授要给出明确的评价，是 A、B 还是 C”；“任务的表述要清楚”；“布置的时候要分清楚人”；等等。都表明了，学术水平高（能够准确评价学生作业）、英语流利（能顺畅不结巴地准确布置作业）的老师，更受大家的欢迎。

上网男还特意表示，他自己的研究课题，得到了主讲老师的很多指点。他特别喜欢在课前向主讲老师请教。

发言女在访谈中也说，她喜欢提问，喜欢鼓励同学提问的老师。

**2. 同学们更喜欢老师以切身经验所举的例子**

访谈中，有三位同学提到了主讲老师上课举到的例子。观察记录也表明，当主讲老师以北京的现状、以自身的薪资水平、以自己的出差故事为例子时，大家几乎都抬头盯着主讲老师认真地听。

记录也显示，当辅导老师以主讲老师为例子时，甚至引起了大家的笑声。

发言女和多动男在访谈中，都表示喜欢类似的“talk”。

**3. 课堂效率高的老师更受欢迎**

在交叉分析中，所有访谈对象都提到的词有两个，一个是“疲倦（tired）”，另一个是“效率（efficient）”。他们认为，拖堂让学生觉得很疲倦并且效率低下。同时，不能在每节课前安排好这节课的授课内容，效率比较低下。

### （三）与其他人的互动

10 月 26 日的教室有两位陌生的旁听者，与他们旁边的多动男打了个招呼，在课间休息时离开。11 月 2 日下午也有一位旁听者，也在课间休息时离开。这三位都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11 月 9 日下午，上网男旁边坐了一位女士，疑是他的妻子。这位女士听课很认真，她分享了大家传过来的饼干。

基本上，教室的“常住人口”对陌生的旁听者都持“接纳进入教室，但是不打招呼”的态度。

## 五、讨论

### （一）数据处理问题

由于本研究的访谈部分，相对于观察资料来说很少，并且访谈问题也不是很多。所以，在数据处理时，没有进行编码，而是直接提炼核心观点。

在文本转录时，由于一些同学的英语发音口音较重，或者声音较低，或者因为教室边的割草机噪音过大而听不清楚，这些内容会更注重笔录而非录音。

### （二）研究伦理问题

笔者在进入研究场景后，不仅由老师介绍了身份，笔者也自带了名片送给大家，但是，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笔者曾经在访谈时郑重地向多动男介绍了自己的研究。但是，几个星期后，当多动男看到笔者在上课时的观察笔录和绘图后，却很生气，认为笔者观察得太详细。经过笔者一再保证和解释，他才用中文说“没事没事”，允许了笔者的继续观察。也许，多动男认为，自己作为访谈对象，不应该是观察对象，一旦作为观察对象，就会在某种程度上侵犯到自己的隐私权。笔者不认同这个观点，但是在以后的研究中，笔者会根据具体的情况，决定是否多次告知他者笔者的研究者身份。

### （三）环境融入问题

在研究中，笔者发现，参与式观察的最大优点与它的最大缺点，可能是一样的——融入他者的环境。

融入，意味着他者对于观察者的接纳，能够得到更多更真实的访谈信息。同时，融入也意味着后续的观察研究，会遇到更小的阻力和得到更多的助力。

融入，也意味着偏见与主观性的加强。当真正与他者接触后，被他者感染后，研究的客观性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融入，也同时意味着观察者有可能在一些情景下影响他者的反应，进而使他者改变行为，从而改变了研究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比如，在访谈中，红手套批评某同学的英语不流利，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但是，这位同学与笔者相处得很好，笔者对他的印象也很好。再加上笔者的笔录是由英文翻译而来的。因此，在记述红手套对该同学的评价时，遣词用句，可能就不是特别客观了。

### （四）对“质性研究”的认识

经过上述的实践与反思，笔者认为，质性研究是一种非量化的研究方法。它需要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相互动，在自然情境下收集资料。它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是对特定的人或社会现象的整体性研究。它通过对收集资料的整理来形成理论，并对研究对象的行为或意义进行建构，进而获得解释性的理解。

## [参考文献]

陈向明(2008)：“质性研究的新发展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教育研究与实验》,第2期，第14–18页。

陈向明（2008）：“从‘范式’的视角看质的研究之定位”，《教育研究》，第5期，第30–35页。

Hoshmand, L. and L. S. Tsoi (1989): “Alternate Research Paradigms: A Review and Teaching Proposal.”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Vol. 17, No. 1, pp. 3–79.

Patton, M.Q. (1990):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Newbury Park, C.A.:Sage.

徐建平、张厚粲：“质性研究中编码者信度的多种方法考察”，《心理科学》，第6期，第1430–1432页。



## 文末“评”

这项研究在选题、收集资料与处理研究关系等方面基本体现了质性研究的要求，但仔细推敲，以下三点有待改进。

（1）这项研究的研究问题不够明确。在第 1 页末段，有关研究问题的表述是“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教室互动研究 —— 以教八 113 教室为例”。这一概括性陈述简单重复了论文的题目，它没有提出具体的问题，而更像是划定一个宽泛的研究现象。当然，仅将这种问题表述改成疑问句的形式（“北京师范大学留学生如何在教室中进行互动”）也是不够的，研究者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明确“教室互动”这一概念。一般来讲，从划定研究现象到提出研究问题是一个不断聚焦的过程，比如，研究者到底是要探究师生互动还是生生互动，是关注知识建构还是人际交往？如果这些方面都要涉及，那么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涉及？要阐明这些内容，研究者需要对自己感兴趣的现象进行初步思考，并在文献综述中考察所要涉及的概念，给予其初步定义。尽管研究者在研究设计中谈到了“关键概念”，但对其界定不够深入，比如什么样的动作是“人际交往”？为什么要将互动界定为人际交往？这些问题都没有交代清楚。在表述研究问题时，研究者还需思考适合的问题类型，如描述性问题、解释性问题、意义类问题、情境类问题等，这一选择过程也要建立在研究者对核心概念理解的基础上。

之所以要提出明确、聚焦，且类型适合的研究问题，是因为它能帮助研究者把握研究方向，使整个研究都围绕着重点来展开，知道自己该重点观察什么，访谈什么，分析什么，而不至于在收集和处理资料时陷入茫然。尽管质性研究强调研究过程的开放与灵活，研究问题往往会在研究开始后进一步明确，但这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或“两眼一抹黑”地启动研究，研究者必须把严谨的思考过程与理解的建构过程呈现给读者。这对于质性研究的初学者来说尤为重要。此外，研究问题的提出应该是基于一定的研究兴趣，或因研究者要解决什么问题，但作者在第 1 页末段列出的三点考虑基本上都处于研究条件，给人感觉是为研究方便才提出的研究问题，略有“应付作业”的感觉。

（2）这项研究主要考察教室互动，观察能够对互动进行过程性描述，访谈能够解释人们为什么进行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互动。这两种方法的选择十分适合研究问题，不过，当我们关注细节时就会发现，资料收集与分析的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瑕疵。最重要的问题是：研究者在观察时到底看了什么，在分析观察资料（绘图与录音等）时重点去捕捉什么，分析时重点抓住什么，

等等。这些问题在研究中都没有明确交代。从后文的资料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研究者似乎较多地记录谁和谁在什么时间做了什么动作，大致交谈的内容是什么。我们不禁质疑：对解决研究问题来讲，他所捕捉的信息是否充分，能否为读者呈现出生动的互动画面，他的观察与描述是否主观性过强？要提高描述的效度，研究者需提供一定的观察与分析提纲。尽管质性研究强调不要因预设多强而封闭视野，但“看”的过程必然是有所聚焦的，因为观察者会因自己的经验或兴趣而对特定细节十分敏感，而对另一些却“视而不见”。研究者一方面要将这种主观的因素透明化，让读者明晰知识建构的过程；另一方面要参考已有研究的经验，借鉴他们的观察提纲去提示自己有意识地去看某些细节，以免遗漏。例如，Hymes & Gumperz (1972) 提出的“SPEAKING MODEL”就提出了交流民族志所必须关注的八个细节，有些细节就被这项研究遗漏了。这项研究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还是因为前期对“教室互动”这一关键概念的分析不够，没有仔细阅读相关文献，也没有提出具体、明确的研究问题。质性研究是一个整体，当前面的工作没有做好时，后面也难免会出现问题。如果我们在收集资料时有不知所措的时候（比如，不知道该看什么，看得到不到位），我们首先应反思是不是研究问题聚焦不够，或是概念框架没有搭好。

（3）这项研究虽然关注到研究伦理问题，但有些做法仍值得商榷，问题较突出的一点是为研究对象起绰号。研究者谈到，他起绰号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研究对象的隐私权，但是这些绰号很多是基于研究对象的某种外貌特征，比如“红手套”、“粉红女”和“指环女”等，这反而使他们的身份更容易暴露。此外，有一些绰号带有些许戏虐的色彩，比如“凤爪男”、“多动男”、“家庭女”等。试想，如果这些研究对象读到自己的这些绰号，他们心中多少会产生不满。所以我们在使用代号指称研究对象时，一定要慎重考虑，不要让代号起到相反的作用。

总之，质性研究是开放的，具有弹性的，但它不是任意的、盲目的。要做好质性研究，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地提出研究问题，搭建理论框架，设计研究方法，并处理好这三者的融贯性。



## 学生回应

在阅读王老师的点评后，笔者获益良多。王老师犀利地看到了本研究的软肋，精准地指出了研究中的不足，可谓目光如炬。针对王老师的点评，笔者有以下几点回应：

（1）研究现象可以是研究问题。的确，很多教科书都教导我们，从大量的研究现象中，可以提炼出恰当的研究问题。但是，这并不能否认，研究现象就不可以是研究问题。类似物理学中的电子云，还有天文学中的黑洞，还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把这些现象能研究清楚了，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现象”，本身就可以成为重要的命题或问题。基于这样的思考，在该研究中，才没有把“人际互动”或“人际交往”作为问题。同时，研究者认为，单纯的“人际交往”或“人际互动”的概念，并不能更完整地展现笔者要研究的问题，也会对观察产生过度限制。当然，笔者对“教室互动”这个概念，阐述不明，界定不清，没有把它所包含的内涵清晰地呈现出来，是本研究的不足。也许，正是这一点，给王老师留下“随心所欲”启动研究的印象。

在王老师的点评后，笔者会尝试厘清构成关键概念的几个要素，并更加清晰地梳理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在修改后有“聚焦感”。

（2）质性研究应该保有适度的客观性。王老师在点评中发现“研究者较多地记录谁和谁在什么时间做了什么动作，大致交谈的内容是什么”。笔者这样做的目的，正是希望给读者呈现一个理性客观的研究报告，尽可能保证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此外，王老师在点评中质疑这样做“能否为读者呈现出生动的互动画面”，紧接着就是“观察与描述是否主观性过强？”，这让笔者产生了疑惑。“是否主观性过强”可以说是需要加强客观性，但是“生动的互动画面”（很多情况下，越生动的描述，带有的主观性越多吧）又好像要求本研究需要加强主观性。一份研究要在加强主观性的同时加强客观性，笔者觉得有些矛盾。关于质性研究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争论，似乎从未停止。笔者在此不做过多阐述，只是认为，在“教室互动”研究中，在这样一个不是很大的圈子里做研究，越客观的研究，可能越不生动。

此外，透过点评的字句，笔者感觉王老师很像一台“扫描仪”，本研究确实遗漏了部分 “交流民族志所必须关注的八个细节”。同时，王老师也很像“透视镜”，本研究对相关文献的阅读和整理，是粗疏的。如果把本研究比作一个不健康的病人，王老师无疑是位标本兼治的良医。

（3）研究伦理不应泛化，研究伦理会受到研究条件的限制。笔者同意，我们要在研究中最大限度地尊重他者的隐私，尽自己的可能，按照研究伦理

的要求去做。但是，不能过度地用伦理道德标准来衡量一份研究。首先，本研究为同学们起的绰号，是需要一些条件，才可能暴露他者的身份的。比如，必须是长期在 113 教室学习，必须在周五下午 13:30 到 16:30 这个时段，排除其他表征更明显的女同学，才会发现“指环女”是谁。毕竟，一个教室、一座教学楼、一所学校，戴指环的女孩子，是数不胜数。其次，本研究起绰号的初衷，绝对没有“戏谑”的成分，只是把某人在某个环境中的一些特征展示给读者。如果真的是存心不良，就会用“鸡爪男”，而非“凤爪男”。同时，演讲时的“凤爪手势”也并不罕见。事实上，笔者是非常欣赏“凤爪男”的发言风格的。此外，这些绰号也是为了研究需要，因为在初期，笔者很难记住那么多的人，特别是在一些不被允许拍摄的场合做记录。因为研究伦理，不能拍摄，不能详细描述，于是采用编号或绰号记录，于是被指责违背研究伦理。这让笔者想到了“饥饿的苏丹”——新闻记者卡特该不该在第一时间放下相机，先救孩子？笔者面临的问题远比卡特要微小，但依然牵涉研究伦理，着实觉得为难。因此，笔者认为，研究伦理也会受一定条件的限制。

总之，笔者非常认同王老师的观点，“质性研究是开放的，具有弹性的”。同时，笔者也会在具体的研究情境中，具体参考王老师的建议，力争使“提出研究问题，搭建理论框架，设计研究方法”这三者的连贯，更为圆融。

---

### 点评专家王熙简介

王熙：哲学博士，2009 年 1 月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论文主要采用批判话语分析的方法探究学校参与者的文化身份建构过程。博士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继续从事批判话语分析和教育社会学的相关研究。2010 年 9 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管理学院，担任讲师，并于 2010 年 11 月起在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担任秘书职务。目前的研究兴趣包括国际理解教育，学校管理和质性研究方法，特别是批判话语分析，已在《教育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教育学报》和《全球教育展望》等国内核心期刊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of Education”等国外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

# 教育学部在职高校女教师的博士生学习适应问题：

## N大学在职博士生M的个案研究

文／管贤强[1]
评／魏曼华

［摘要］本研究对某高校在职女教师进行个案分析，采用了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进行数据收集，通过研究进一步了解了高校女教师面对社会、职场、家庭、个人要求的发展困境、她们特有的博士学习方式、及其博士学习的过程图式。

［关键词］高校在职女教师　博士学习　适应

[1] 管贤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文教育研究所，课程与教学论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语文教育史、行动研究。

文中“点”

## 一、研究缘起

在教育学部质性研究课上，老师问有多少人有过工作经验，教室里只有三个人举手。一些举手的同学仍然是高校在职教师，这其中还有一些同学是高校在职女教师，作为教育学部的少数人群,他们是如何转入博士生的学习的?这样的问题慢慢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加上自己也来自基础教育一线，是高校博士生中的少数人群，这样的身份不断推动我继续深入思考。我不是仅仅思考我的伙伴，也思考自己的未来，更有一种期许，希望通过理性的思考为自己的学习适应找到一些清晰的道路，也更是想为以后更多的职后有实践经验的同学提供一些可以参考的经验。

## 二、文献综述

文献检索是本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当我把研究对象聚焦在在职高校女教师在博士学习中如何学习适应的时候，我分别以“在职高校女教师”、“适应”（角色适应）、“大学博士学习”作为关键词，对国内相关研究进行了细致整理基础上，进而建构“在职高校女教师博士学习适应”的模式。

在职高校女教师学习的内在过程及其在职高校女教师在学习中与环境的不断互动过程，她们在这两个过程的互动中不断适应着博士生的学习。建立在在职高校女教师成人学习特点上的学习，是发生在个体身上的学习过程的结果，学习也可以是个体的心智过程，学习更是个体与学习材料和环境不断互动的过程。

克努兹对于成人学习研究是基于学习理论的基础上。他把学习分为两个过程、三个维度、四个种类。两个过程分别指：①个体与所处环境的不断互动过程；②心理的获得过程,这是内部心智获得与处理的过程。三个阶段分别为:①内容维度通常关注的是知识、理解与技能；②动机维度包含动力、情感和意志;③互动维度包含活动、对话和合作。学习的四个种类为:①累积学习;②同化学习;③顺应学习;④变构学习。（孙玫璐，2009；王红艳，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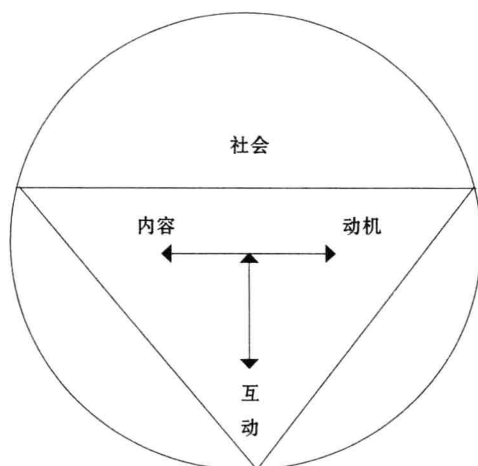



**图 1　学习的三个维度（克努兹）**

在对克努兹学习理论的把握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界定高校女教师成人的学习。从高校女教师的动机来看，成人学习，基本上是选择性的，高校女教师的高学历也带来她们的高动机和自我效能意识（常永才，2005)；从外部环境看，在职女教师的博士学习也存在着多样化的生活项目和生活导向，例如，工作、家庭和兴趣（李亚杰，2009；牛利娜，2004；姚远峰，2001）。它们控制着学习，高校女教师的日常生活、博士学习生活、工作生活、家庭生活等都构成了高校女教师成人学习的外部环境(张建奇，1997，1999，2005；曹爱华，2008；荆建华,2009；方琼华，2001；马宇宁，2011；张佩秋、陈亚轩，2012；杨宇辰、王伟，2012；周红伟，2012；杨丽，2012）；从内容角度看，博士学习的知识技能、创新、国际竞争力、非智力因素等都构成了博士阶段学习的重要内容层面(沈文钦，2009）。而本篇论文将从个案的角度针对高校在职女教师的博士学习进行进一步探讨其中的内在机制和环境互动的关系。外界环境对被研究者有什么影响，被研究者个体如何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参与博士学习转换？被研究者是如何适应博士学习？她们是如何被社会群体所认可的？通过个案研究，我相信对她们内在学习心智过程和个体与环境的互动方面会有更深厚的理解和认识。

## 三、研究过程

这一部分主要是来说明我研究具体的实施过程，包括研究方法的选择、访谈对象的选取和资料的搜集过程以及我在研究过程中的思考。

### （一）研究问题的澄清和研究概念的界定

查阅相关文献，偶尔和研究对象的聊天，结合我自己的现实境况，渐渐地问题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教育学部在职高校女教师们她们是如何进入博士生角色的？

包括以下几个子问题：

她们如何理解“博士生学习”？她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向博士生学习转变？她们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取得成功的因素是什么？她们遇到了什么困难？有关各方面采取了什么对策？解决了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

几个重要概念的界定如下：

◆高校在职女教师：作为当代知识女性的一部分，她们是职业女性中素质较好、就业层次较高、社会地位较为突出的一个群体。她们身兼多个角色，在高教事业中社会角色是教师，在家庭角色中是母亲、妻子、女儿。本篇论文中在进行博士学习的高校在职女教师还具有学生的角色。

◆博士学习：博士学习是针对博士生的知识能力情感等要求，进而博士学习是发生在博士个体身上的学习过程的结果。博士学习也可以是博士生个体的心智过程，博士学习更是博士个体与学习材料和环境不断互动的过程。

◆适应（角色适应）：角色是在社会中实现和形成的，人们根据自己的角色来对自我进行认同。每个人都是角色扮演者，通过角色来实现自我目的、自我价值。社会也是通过角色培养各色成员，维持社会的稳定需求。每一个成员在角色中活着，都是内在主体和外在要求的有机结合。

### （二）研究对象的选取

研究对象选择在职高校女教师这一个群体，一方面因为研究的便利，在我的身边就有一位；另一方面是他们在高校属于更少数的一个群体。根据厦门大学王蔚虹（2008）

1.并非并列关系，而且不清楚你身边指的是哪里？下面的课堂里的算不算？

通过对四所高校的调查研究发现，被调查的大部分博士生为全日制博士，占 94.2%，非全日制仅占 7.6%。我的研究借助课堂之便而选取研究对象，当然不是目的抽样，而是方便抽样。但幸运的是，质性研究课堂上的这位研究者有我在上面提到过的有工作经验，处于博士生的少数人群，正在进行着博士生学习，和我一样是新生。

2. 有几个人？

基于上述的考虑，我选择了这位研究对象：大学 M 老师，她是 N 大学教育学的硕士毕业生，毕业后一直在北京某所大学就职，从事一定的教学和管理工作，经过 2011 年考博失利之后，2012 年备考充分，顺利考上了教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 （三）研究方法的选择

研究方法一般有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两种。质性研究重视理解，如果一个学者需要理解人们的行动，也希望理解人们行动的所有事实，就必须要用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去看待世界。深入理解，就是要深入到研究对象的主观意识内部去，要从当事人本身立场，而不是从局外人的立场出发描述事物。可是，理解他人是需要一系列意义建构过程。别人的意识运作过程在研究者的脑海里重现出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不能真正进入研究对象的意识中。我必须要有相同的经验，还需要反省的时候需要有同样的反省过程，还需要有相同的注意过程，反言之，我必须客观，尽量成为他人。

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并没有孰优孰劣。因为我的关切点在于高校女教师博士学习的角色适应问题，这涉及研究对象内在的心智过程和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从这个研究问题来看，质性研究更加能够有利解决我的论题。

质性研究的方法是归纳式的。我通过访谈、观察法来搜集资料，不断探索、不断反思的过程，对所搜集资料不断归纳，进而建构起新的意义。

### （四）资料的搜集

访谈共进行了两次。第一次在 10 月 2 日下午 5：30 分，我们做了一次预访谈。访谈主要是了解 M 同学博士学习生活大致的情况，地点教育学部二楼，时间 25 分钟。第二次

3. 哪里？二楼地方多了。

在 11 月 19 日中午 1 点钟，我们做了第二次访谈，访谈 1 小时 15 分钟。这次访谈针对一些我要关注的问题做了细致的理解。地点教育学部二楼。访谈结束后 M 同学匆匆忙忙回到单位。两次时间的选择都考虑到 M 同学的工作性质，第一次是在上课前，第二次在政治课结束后。

关于观察，在访谈中因为第一次有录像所以没有观察记录，只是根据访谈对象的一些非言语对象行为做出追问等方式的调整。具体研究中，还采用了参与性非公开访谈，因为是大家在一起上课，所以我偶尔可以参与到她的某些生活情境之中。我们每周都会在一起上课，让我有大量的时间可以观察研究对象，但是这一点没有向研究对象公开。

## 四、个案分析

和 M 的访谈，加上和她接近半年的上课相逢，M 的大学博士学习适应我可以用几个主题涵盖起来：①没有时间；②慢慢变好。

### （一）“我是在计算我的时间”

在职高校女教师，学习、工作、家庭、社会交往、经济压力不可截然分开。M 博士学习既有主观的学习动力，也有客观因素推动。“单位换了一个校长，这个校长是原来高教司副司长过来的，他要求我们所有 40 岁以下年轻人没有博士学位的你就去拿”。这时她也相信自己完全可以应付这些未知的困难的，因为她“原来在工作的时候，已经游刃有余了。就是没有感觉有太多的困难”，在这种背景下她踏上了博士学习的道路，在考博复习过程中她也明白其中的艰辛，“备考的时候，我已经意识到了有一个规训的过程，我有所准备”。她知道学习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它第一次考博，花时间不太够，英语考试没通过。可是“第二次考试，我比第一次考试更充分一点，所以就还比较顺利了一些”。但是接下来的学习感觉在她曾经的预料之中但是艰难的程度又超出了她的预料，她越发“觉得主要是很多方面时间和精力的冲突方面”，她认为这些是自己最大的困难。对于时间和精力的冲突，她这么描述道：

我是一个在职学生。我必须要腾出一半的时间去工作，

去完成必备的任务。我还要像全职学生一样，完成师门的任务，完成师门的读书任务。我觉得我的时间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经常是要计算我的时间。我只有这个时间来做什么，必须要在这个时间做完，我不可能拖到明天，拖到明天到单位的话，那就会有许多事情不可想象，可能忙到没有敲电脑的时间，可能一会要有个会议，一会要让你干嘛干嘛。就是这样子。

现在就是要去协调工作、学习和生活的关系。你总要去陪陪家人,总要和家人度个周末吧,有时候你得有个活动。

从 M 的描述来看（如图 2），她的时间被自己分为了四大块：博士学习时间、工作时间、家庭时间、社会交往时间。可是由于博士学习的压力，让她本来平衡的生活、工作、家庭状态产生了一种陡然增大的紧张感。




图 2　M 目前博士学习间的时间冲突

M 也非常清晰地知道，这些时间上的紧张并不是难以改变，只是限于自己目前学习的能力和生活的负担而难以调整。谈到现代社会的经济压力，她语气急促地说：“我现在特别希望当然也不可能全脱产啊，可是全脱产经济压力太大。”在谈到自己目前的博士学习能力方面，她也焦急地聊到：“我的研究能力，在读书会中体现得不明显，主要是我的信息处理、概括和沟通的能力”“我现在在能力这方面没有感觉到较大的提升，老师现在就是跟我说读书，也不要太早和我谈你的论文题目。”

M 描述了每周二，当这些矛盾集中在一起时，她忙碌紧张的生活状态：

周二是这样，早上我要送孩子到幼儿园，然后呢我要去上班。上了班以后呢上午这半天上完了以后，下午呢我

们导师要我们到K大学去听谢老师的课，所以必要的时候我要和领导请假，领导如果不在，我就可以开溜，不用跟任何人请假说我要去K大学听课，听完课了以后呢，那个课是六点结束，我们学校晚上六点半是我们师门的读书会，我就要在旅途中尽量不要迟到，赶快赶到学校准备上课。

可是常常也有意外情况的发生：

有的时候会有打不到车的情况，有的时候会有等不到公交车的情况，我就特别容易纠结，因为觉得老迟到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们老师也让我安排读书会的主持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迟到了特别的不好，所以恨不得连奔带跑似的跑回来。有的时候真的连饭都解决不了，有的时候就是去K大学上课的时候带些面包，就那样。有的时候从我导师读书会下来的时候，基本晚上10点左右。平均时间10点左右，然后我回到家一般11点左右。

在谈到平时的生活状态中，M谈得最多的是博士学习时间问题。她谈到K大学老师的课程，老师讲课仅仅是简单的概述。她意识到需要读很多原著，只有在原著阅读中才会印象深刻，获得真谛。但是她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在她平淡的叙述中，过去和未来都是不断交错的。目前的时间不够，更加感叹：

我原来的硕士阶段是一种比较松散的。就是老师他有项目他就让你干，干完了以后其实他也没有跟你说你要读哪些方面的书，给你列一个书单，然后也没有跟你说你要攻读哪些方面的研究方法，比较随意的。

4. 是谁？

家庭的忙碌也影响了她的博士学习时间。她在看书的时候，儿子就在边上闹，就会很烦。她感觉到家人就是看见她整天在忙，然后看她也坐在那里读书。他们很少交流些东西，也没有时间交流自己学习的东西。

5. 如何表述需要推敲

时间上的冲突，从更深层次表现在K几种内心的紧张感上，尤其突出表现在学术的紧张感。不过让M感到欣慰的是，她参加了导师的读书会，并且承担了读书会主持人的工作，她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和自信心，用她自己的话说“有了努力的方向”、“上路的感觉”甚至在读书会发言中她“觉得还行，有时候我会听到他们的掌声”。

## （二）“会慢慢变好的”

学生M的访谈中，围绕着很多生活情境，家里、学校、单位、路上，总有很多冲突和困境，她努力不断调整。“交代困境——尽可能解决——有所改善”这样的结构形式常常会透过表面的文字浮现在我的印象里。“会慢慢好的”、“要努力突破”、“慢慢能够有走上正道的感觉”。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①在工作家庭交往方面合理安排赢得时间；②学习方面优化学习策略；③利用导师培养博士生的课程；④在生活学习中尽量学会调整。

### 1. 在工作家庭交往方面赢得时间

工作家庭交往总需要投入很多精力，相对于客观处境来说，学生M并不是坐以待毙的，她常常通过自己的主动，在细缝中去获得点滴的时间。在家，周围人都在说话，碰到这种情况，她常常会选择两种做法。要么是把家人赶跑，要么自己想办法到外面去，可以找时间到单位，也可以到N大学。对于儿子，她会尽量安排孩子出去，到外面上个辅导班什么的。

面对工作，她清晰地辨识到自己身边工作环境对于个人发展方面，非常支持。对于校长，她这么评述“你有这个能力，他就鼓励你去学习，他可以支持你，没有问题的。我们甚至还有行政岗位的老师，还有在英国读博士的，就是完全给她保留公职，就是那样的”。在校长的模范带头下，单位的其他领导“比较支持，他们也不给我压太多担子，他们也知道我学习很忙”。正因为这么宽松和支持的环境，碰到需要上课学习，如果“领导如果不在，我就可以开溜”。周围环境的支持，加上学生M对于家人活动规律的了解也比较巧妙地处理家庭成员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些方面都为她的学习赢得了时间。

### 2. 在学习方面优化学习策略

长时间的工作，学生M非常清晰自己很多年没有摸教育学的知识，已经有生疏感。对于自己的学术训练，她非常客观地认识到学习速度，对于信息的搜集处理能力、概括能力、呈现能力、研究能力存在不足。

6. 概括的不在一个维度上，“学习速度”语焉不详、“研究能力”包括前述的其他。

面对学习上存在的问题，她走过弯路，希望依靠多读书来弥补自己学术能力的不足。她这么描述自己当时的读

书情形：

一开始我选择了一些我读过的，有的是我读过了一两章的，举个例子，我选择了吴刚的《教育社会学前沿讲座》，但是读完了后我感觉还是从教育的圈子里面读教育，感觉没有太多突破。

随着学习的深入，学生 M 开始设计自己的学习方式。首先，她开始系统、整体地了解一门学科，同时把自己的起点放低，最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我要系统重读社会学的书籍。所以后来我选了一本书目，那不是朱老师要求我博士阅读的书目，而是研二还是研三的书目，是谢立中和杨善华的《西方社会学》上下卷，我就去啃那本书，哪怕我开始费劲一些，哪怕一下子我讲不完，我只是讲完了一半，我选择这样一点一点梳理”。其次，学生 M 的博士学习不断和别人的碰撞中加深自己的理解。“我到 K 大学上课，我觉得还是蛮有收获的。就是自己读过的书和自己没有读过的书，你的那种理解和我的理解的接近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最后就是她非常注意完成外在交给的任务，也有自己的主动性。谈到自己导师每周要求的读书量，M 这么说道“没有办法，导师有时间限制，一周是两本书，没有轮到你主讲，或者没有轮到你主评论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钻空子，你也可以不读。像这样别人泛泛一讲和你真切读过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你感觉到门外汉和入局的感觉”。

7. 仅用此词显得用词不当？交流？切磋？讨论……

8. 此处指的是什么？

**3. 利用好导师培养博士生的课程**

M 的学习方式无疑和导师对博士课程的设置分不开。在学生 M 的描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她的导师对于高校在职教师的博士学习培养有自己的想法，开出的课程方案应该是“固本培元，同时也很好地针对了高校在职教师学习的特点”。课程主要是主持读书会、专业课、到 K 大学上课（K 大学上课部分在优化学习策略部分已描述，不再赘述）。

从读书会的角度来讲，分为考博成功后和成为博士生两个阶段。学生 M 在报考博士的阶段已经参与。一开始她的感受是“没有意思”：

我去听他们师门会的时候，我是很不适应的。我觉得

这帮孩子在干嘛,就好像在讨论一个特别没有意义的问题,就好像在那儿你说过去我说来的,也没有说到点子上,就特别没有意思。

尽管内心感到没有意思,但是坚持的效果是让她能够较早进入博士学习的状态。

在进入博士学习阶段后,学生 M 的导师给她安排了读书会主持的角色。从某方面讲,这个角色可以发挥在职博士研究生的工作专长,同时也能在参与中获得自己的思考思维能力,更能够迫使学生 M 多阅读。学生 M 也非常感激这样的安排,并且收获很多,尽管事无巨细,但是她不仅收获了自信和成就感,也收获了学术能力的提升:

读书会就让我来做一些安排,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工作,就是安排大家读些什么书,分配大家一些角色,谁来主持,谁来主讲,谁来评论,然后谁来记录,要有一个安排在里面,包括有一个书目来给大家选择啊什么的。主要就是这些工作,提前做一些联络工作。其实这个工作也让我尽快融入到这个群体。我很快认识了师门的所有学生,包括他们的本硕博学生,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更多的交流,有的时候你没有被赋予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用去管,你去听,听完了就走。当你被赋予了角色的时候,你就要和他们去沟通。你今天去主持,你记得你的书是这个,你记得要把它读完,接着你这次没有读完你下次要把它讲完啊。

在读书会上获得自信,她进而发现自己的工作经验完全可以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所学知识,而不会像有些学生读书鹦鹉学舌。在与人相比较的过程中,学生 M 更加获得了自我的认识。

有的孩子读书的时候可能不在于一种理解,那可能是一种完全的鹦鹉学舌,他们把书上写的东西照着书在 PPT 上生硬地抄写下来了,就在那个上头念,我觉得很没有意思,读书,就得有你自己的理解。再繁琐的话,也应该有你自己的理解,哪怕举个例子……

我们读书会上经常会有一些中小学校长和中小学朋友参加,他们就会说你们讲的什么,我们听不懂。但是当你们联系一些学校实际的时候,我们感觉还很有意思。所以

我觉得吧，通过读书也能反映出大家对读书的认识，一种对学习和工作联系的认识在里面。

她进而更加意识到工作的历练其实也帮助自己可以更好更方便地传递自己的学术观点。比如做PPT，“不要满屏幕都是PPT，从头到尾都是这个，这样让大家很难受，你把你的主要观点和主要理解点出来，弄一个简单的表格，让大家简单一看就有收获。”

导师的专业课的开设，她坚持认真完成备忘录的写作，尽管她有时候也不明白写的原因。但是有一次她不经意和我们分享她上课的心得：

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写备忘录有这么大的收获。其实每次整理备忘录的时候有这么多的反思，有时候突然意识到陈向明老师在书里是那么说的，自己竟然在实践操作中是这么干的。你就会感觉到，呃，我应该调整。所以就是在不断地学习和反思中发现自己的努力，应该努力的方向，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种上路的感觉，就是应该怎样的调整，如何去做。

能够获得这些心得和收获，一方面得益于学生M按照导师的要求去完成，另一方面也来自自己对于专业书目的不断研习。

**4. 在生活学习中尽量学会调整**

学生M常常在描述自己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常常会用到一些词语，如“瓶颈”、“规训”，貌似看来是一些外在环境对人的约束，但是在她语境的描述中又是那么不同。

对于工作中的瓶颈，她这么进行着语词的转换，“工作到了一个瓶颈，或者更确切说是平台期。”瓶颈是外界的约束，平台是自己主动要去跨越，她认为工作阶段已是自己可能学不到东西的阶段。自己就想能不能重新回到学校，改善一下自己的视角。对今后工作，以及对自我的认知，都会有一些帮助。“平台期是指到了一个阶段，工作、学术水平需要提升一下的感觉，要努力突破一下子。上一个台阶。”她反复强调。

规训这个词是外界的权力强制性改变，但在具体言语交流中，她这么转换：“我说的规训，是一种规范训练。”而她所指的训练可以进行能力的提升。她具体描述：

训练，是思维方式的训练，是学习的时间、学习速度，对信息的搜集处理能力，概括能力，呈现能力，与人交流能力的训练，包括研究能力。研究能力随着我们慢慢上这个课。开题的时候，慢慢开始预研究，和老师的沟通中，会有更大的提升。

学生M的自我调整能力，自我暗示，不仅在谈到学习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在谈到自己在家学习时，面对自己孩子的调皮，她这么做：

我在那里看本书，看不懂，看得很艰难，不知道这本书在说什么，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这个时候我的儿子就在边上闹，就会很烦。但是我又要尽量克制自己，调整自己，不让自己发怒，然后找其他的解决途径。

## 五、研究结论

如果说在个案分析的层面仅仅从平面角度呈现了学生M作为高校在职女教师博士学习适应图景。那么故事结论部分着力在博士学习适应背后，更上位的理解。博士学习适应，我们将从在职女教师博士学习的过程图式、在职女教师的学习方式两个层面来回应这个问题。

### （一）在职女教师博士学习过程

高校在职女博士的学习往往分为两个过程（见图3）：①个体与所处环境的不断互动过程；②心理的获得过程。这是内部心智获得与处理的过程。

9. 可否从这一个人的经验概括出高校在职女博士学习图式？说是该人自己的……恐怕更确切。

在职女教师博士学习，不同于儿童学习，也不同于全脱产的学生学习。她们更加自主、自律，更清晰自己要什么，也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学习的过程也是自己和自己复杂的生活情境打交道的过程。复杂的生活情境主要是和家庭、工作、交往、学习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打交道。打交道不仅仅是合理安排好各个方面的时间，并且能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促使博士学习时间充足的过程。这其中，伴随着自身增强学习、工作等能力的过程，外界能够减轻自己的各方面负担，和复杂的社会情境打交道，更是能够在各个角色的转变中合理地调整自己，面对工作中提出高学历的要求，面对家庭生活这样的学习环境，面对小孩调皮

影响自己学习的场面，无疑都是高校在职女博士们需要面对的调整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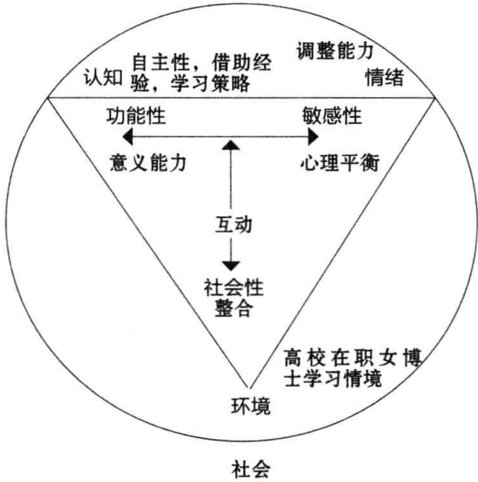



图 3　高校在职女教师博士学习图式

从高校在职女博士的内在学习过程来看，三个阶段分别为：①内容维度通常关注的是知识、理解与技能；②动机维度包含动力、情感和意志；③互动维度包含活动、对话和合作。首先我们相信内在学习过程是自己意义不断建构的过程。在学习的建构中，高校女教师的功利性要求、学习动机、学习信念、内在驱动力、学习意志参与其中。学习的过程也是自己借助自己已有的经验不断整合知识，构建新知的过程。其次，在职女教师的博士学习不仅仅是大脑内的丰富过程，更是其和周边环境，更重要的是和各式各样的人（导师、学生）打交道互动的过程。M 和 K 大学的老师课堂互动，产生了要抓紧时间读书的想法，也让她大量了解学科的思路，借助他人和自主学习相结合。和硕士生们打交道，看到她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也肯定了自己的学术理解力。

最后无论是学习新知，还是与人互动，都经历着复杂的四个阶段：累积、同化、顺应、变构。累积，当博士阶段的学习面对很多新的知识时，积累无疑是必须的。M 系统地了解社会学，这就是她积累的过程。积累并不是面对现在，积累是着眼于未来。在现实多变的情境中累积并不一定有用，在未来相似的情境中才会意识到累积的必要性。同化，是建立在已有的学习经验基础上，面对外来的感官

印象，增进到自己的心智模式中去。M 不断用自己的经验例子来阐释一些深奥的理论，就是这个过程。顺应，是当外在的刺激与自己内在的心智图式不匹配的时候，重新创造变化的情境，进行重构和突破建新的心智图式的过程。变构是最后的阶段。它是学生 M 通过量变达到质变的过程，意味着大量心智图式的一种连贯的重构和组合，它导向了个体人格的变化。在这个阶段可以和各种情境自由联系。

### （二）高校在职女教师博士学习形式

高校在职女教师博士学习采用什么样的学习方式？这方面的研究很少进行。如果我们从学生 M 的个案出发，可以关注到在职女教师博士学习的四种方式：①自主学习；②读书会形式；③到 K 大学听课；④导师开课。（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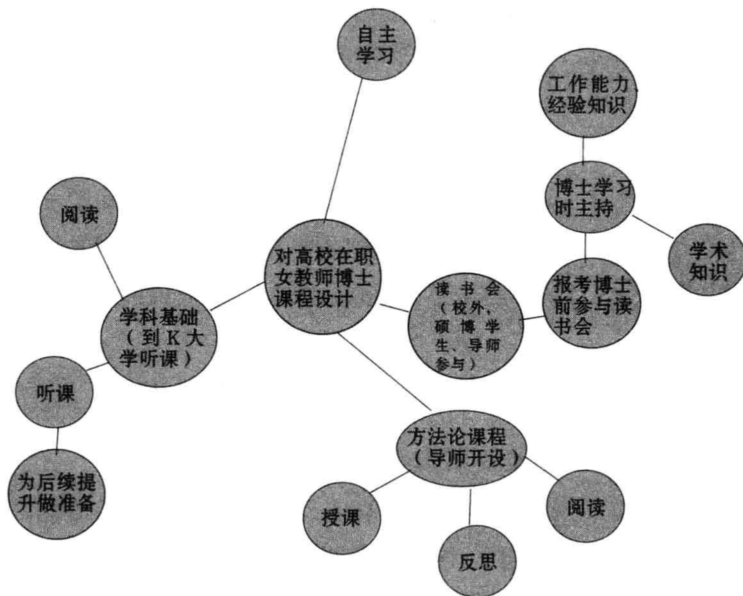



图 4　高校在职女博士学习方式

自主学习是许多高校教师在职博士常常采用的学习方式。她们有非常清晰的自我认识，对自我学习能力、知识资源、知觉加工也有很清晰地辨识，也有非常强的学习动机，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自主学习可以尽量减少读书的奔波，也较少受到时间、地点的影响，是 M 一开始就想到的学习方式。并且这种自主学习也不断和外界环境互动，当她发现效果不大的时候，不能适应自己实践需要的时候，她也果断地进行了调整。准备系统地进行社会学的学习。

当然，由于事务的繁忙，人的惰性，也时常影响在职博士的学习。读书会的形式，让 M 感觉有压力，每周限定读两本书，有任务，可以有提高。读书会的形式，对于学生 M 来说，在未进入博士学习时就已经参与。正式博士学习阶段时候，负责博士论坛主持的工作，让她显示了自己的工作能力、工作经验，同时也收获了学术的进步。

导师的方法论课程不仅仅是交给 M 方法，更是在交给她反思性思维。这种自我的反思和上课的内容、所阅读的书籍，在一起碰撞融合，豁然开朗，产生新意。在谈到导师参与的读书会讨论中，她还强调批判性思维。可见，对于高校教师在职女教师博士学习的思维培养过程、反思性、批判性、主体等的强调得到 M 的认可。

到 K 大学听课。这是 M 基于自己“问题—解决”思路下的选择。面对自己的学科基础知识欠缺，在教师的指点下，她决定到 K 大学听课。正是在学科基础存在问题的背景下，她一方面在课堂获得新知，另一方面也意识到需要自己消化，自己阅读获得知识深刻印象。面对问题——着力解决，也是高校在职女教师博士学习常常采用的学习方式。到 K 大学等方式只是解决问题方式的外在体现。

## 六、反思

### （一）研究效度及其效度检验

10. 质性研究要检验效度吗？用量的研究的概念、术语来反思质性研究是否合适？

效度是指研究结论是否真实反映了研究对象的情况。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困难在于我并不能看到她内心的经验过程。我能做的，在资料搜集过程中尽量悬置自己的主观判断，尽量让我必须成为他人。这过程谈何容易，进行访谈，提问交流怎么可能离开我的主观参与？面对这一个问题，我的思考是研究对象并不一层不变，我和她互动的过程中，建构了新的意义。另外一方面通过长时间的交往可以达到阐释的循环，在不断诠释理解的过程中达到理解。

关于效度检验的问题，我采用三角互证。三角互证，指的是采用多方法搜集研究数据，并互相证明，来确定每类数据的准确性。我将通过研究参与者检验、同行检验等方法保证效度的准确和可靠性。

### （二）推广度问题

就质性研究的方法而言，并不是考虑推广，而是为了揭示案例本身，通过对研究对象本身深入的研究，揭示内部的心理过程及其研究对象和外界互动建构过程的情形，让研究者和研究者以外的特定人群能够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如果说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是不断诠释的过程，在诠释中互相理解互相对看。那么研究者之外的读者与研究论文、及其论文中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也是不断诠释的过程。在诠释的过程中达到理解的认同。这可能就是质性研究的推广方式。

### （三）研究伦理

本研究涉及一些研究伦理的问题。对此，研究者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并且在研究中也尊重被研究者的权力。在正式访谈之前，我向研究对象交代了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并就是否录像可否录音征得对方同意。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我对与她相关的信息都做了模糊化处理，姓名、学校、导师都做了处理。最后，在论文公开发表时经过研究对象的审阅。

［参考文献］

王方（2008）：“我国高校女教师队伍的历史变迁及其社会地位的变化”，《当代教育论坛（宏观教育研究）》，第 2 期，第 67–70 页。

曹爱华（2008）：“高校女教师的角色冲突与协调发展”，《高教探索》，第 5 期，第 122–125 页。

常永才（2005）：“成人学习特点研究的硕果及其学术价值：对诺尔斯自我指导学习理论的评析”，《外国教育研究》，第 11 期，第 78–82 页。

牛丽娜（2004）：“成人学习动机理论在网络远程教育中的应用初探”，《中国电化教育》，第 9 期，第 34–37 页。

万琼华（2001）：“试论高校女教师的进取意识”，《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 5 期，第 22–26 页。

李亚杰（2009）：“成人社会心理成熟的若干维度与成人学习”，《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1 期，第 13–14 页。

沈文钦（2009）：“博士培养质量评价：概念、方法与视角”，《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 2 期，第 47–59 页。

荆建华（2009）：“从学术职业的学术性看高校女教师发展的现实困境”，《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4 期，第 1–4 页。

孙玫璐（2009）：“学习理论的体系化尝试：克努兹学习论综述”，《世界教育信息》，第 1 期，第 63–67 页。

荆建华（2010）：“对国内高校女教师发展问题研究的元分析”，《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2 期，第 32–35 页。

马宇宁（2011）：“高校女教师事业心理需要探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第 1 期，第 130–131 页。

宋尚桂（1998）：“当代西方成人学习理论述评”，《济南大学学报（综合版）》，第 3 期，第 37–41 页。

王红艳（2012）：《新手教师在学校实践共同体中的学习》，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王蔚虹（2008）：“我国博士生培养现状：基于四所高等学校的调查”，《大学（研究与评价）》，第 11 期，第 42–48 页。

禹旭才（2008）：“中国高校女教师发展研究述评”，《黑龙江高教研究》，第 1 期，第 140–142 页。

杨丽（2012）：“中国高校女教师群体状况分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8 期，第 49–51 页。

姚远峰（2005）：“国外成人学习研究的进展：心理学视角”，《继续教育研究》，第 4 期，第 62–6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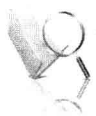
姚远峰（2001）：“成人学习动力探源”，《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第 3 期，第 31–33 页。

张建奇（1997）：“我国高校女教师地位现状之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第 4 期，第 58–65 页。

张建奇（1999）：《高等教育中女性地位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周红伟（2012）：“高校女教师工作——家庭冲突探究”，载于心理学和社会和谐学术会议论文集，2012 年 5 月 20 日，中国上海，武汉大学和科学研究出版社主办，第 31–34 页。

张佩秋、陈亚轩（2012）：“高校教师自我效能感与教师自主发展的关系”，《浙江科技学院学报》，第 2 期，第 156–160 页。



## 文末"评"

这篇论文呈现了一个女在职博士研究生的学习适应状况的某些面向。

作者通过访谈和观察的方法获得研究资料，对于在职博士生M的学习适应的四个方面进行了描述，并试图用克努兹对于成人学习"两个过程、三个维度、四个种类"的理论观点对个案M的学习适应进行描述和分析，力图呈现女博士研究生M学习适应的某些面向以及从中试图归纳在职女博士研究生学习过程。

作者对在职女博士生M的学习"没有时间"、"慢慢变好"的描述比较真实地呈现了该学生的学习状况和学习经验，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部分在职学习尤其是攻读博士研究生学生的学习状况。论文运用克努兹成人学习理论对在职女博士研究生学习适应的分析，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有一定的说服力与解释力。同时，论文在图式的呈现方式也比较直观、生动。

总之，文章作为质性研究方法课程的习作，文中有一些亮点，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文章的不足之处：

1. 资料不够丰富

资料搜集方面，作者访谈的时间过少，有一些重要的资料没有搜集，也没有进行深入的追问与挖掘。由于论文资料不够丰富，因此，无论是描述还是分析都比较表面化，尤其是对于M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内心冲突没有揭示与解释，从这个个案中，看不出时代特点、性别特点以及一些个人化、私人化的经验。作为唯一的个案，作者对女博士生M的工作以及家人的描述太过简单，例如，在"家庭方面的时间处理"，只看到零星的做法，因此，也看不到她的"学习策略"的意义和效果等。M像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人，不是一个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中，特定的工作、学习与生活情境中的人。

2. 简单套用理论，缺乏分析、批判与讨论

论文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对克努兹对于成人学习理论的简单套用。

作者在文献综述中提到：克努兹对于成人学习的"两个过程分别指：①个体与所处环境的不断互动过程；②心理的获得过程，这是内部心智获得与处理的过程。三个阶段分别为：①内容维度通常关注的是知识、理解与技能；②动机维度包含动力、情感和意志；③互动维度包含活动、对话和合作。学习的四个种类为：①累积学习；②同化学习；③顺应学习；④变构学习。（孙玫璐，2009；王红艳，2012）"

之后，作者就按照这个理论对个案的M进行理论解释，得出的结论："高

校在职女博士的学习往往分为两个过程：①个体与所处环境的不断互动过程；②心理的获得过程。这是内部心智获得与处理的过程。”

……“高校在职女博士的内在学习过程”的“三个阶段分别为：①内容维度通常关注的是知识、理解与技能；②动机维度包含动力、情感和意志；③互动维度包含活动、对话和合作。”……“最后无论是学习新知，还是与人互动，都经历着复杂的四个阶段：累积、同化、顺应、变构。

（以上见作者的文章：“五、研究结论”部分。）

该文章似乎只是通过该个案对克努兹的理论进行了印证与简单生硬地套用，而没有自己的批判、补充与丰富，克努兹的理论是解释“成人学习”的，那么，博士研究生学习于此完全契合吗？有没有自己特点？尤其是女在职博士生有没有自己的特点？现阶段中国女博士研究生的特点呢？同时，也没有呈现出 M 作为人的个性、时代性、民族性的一面，简单印证与套用是文章的最大不足。

3.M 的个案研究结论可否推及“高校在职女博士研究生”

文章用仅有的一个个案，可否推及 “高校在职女博士研究生”？此问题值得商榷。



## 学生回应

谢谢魏老师的指点。在这个“繁忙”的 5 月，老师能够为我的作业，就其中存在的问题精心点评，阅读的过程也是我不断加深理解，产生碰撞的过程。

（1）这篇文章在资料的搜集方面不是很充分，老师在文中把我访谈的时间“25 分钟”“1 小时 15 分钟”用颜色做了标记，也指出了由于访谈的欠深入，产生了诸多问题，人物不够立体，人物所在的情境揭示不够，这个问题的确存在。回想自己质性研究的上课过程中，总是头疼作业的繁多，访谈记录分析等程序的繁琐，这种情绪一直纠缠着我的整个学习过程。好在，有同组同学的督促，有老师不断地点名批评，有指导老师的悉心指点。虽然访谈时间不够，但是我仍然要真实记录在论文中，随着学习越深入，我就越能明白质性研究程序繁琐背后其中的严谨、踏实、诚实的重要性。

（2）关于借助理论的问题，在课堂上，我一直很纠结。我记得老师针对

一个到北大读研学生的访谈，让我们分析资料。课堂的讨论，老师的循循善诱，最后得出的一些好的分析案例，都是有很强的理论色彩的。理论和质性研究是什么关系？这的确很难区隔开来，甚至好的质性研究里面所蕴含的理论功底也是非常深厚的。

但是在我的论文中，对于理论缺乏反思，缺乏发展，这一点老师指出来，我觉得是有道理的。研究应该在已有的理论基础上，有更多的发展。

（3）个案能不能推及“高校在职女教师”？我写作的时候，的确认为可以管中窥豹，见微知著，甚至可以推广到全体的。老师的点醒，也让我感觉这么推断，似乎非常武断。如果希望能够推及整体，是不是在抽样的时候，可以采用滚雪球的方法。我的抽样方法，应该是典型个案的抽样，翻看陈向明的《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一书，我才真正懂得了这几行文字“对典型个案进行研究不是为了将其结果推论到从中抽样的人群，而是为了说明在此类现象中的一个典型的个案是什么样子。这种研究的目的是展示和说明，而不是证实和推论。”

短短的一学期学习已经结束，课堂的同组同学，竟成了熟识的朋友。我们常常会在一起聚餐，常常会聊人生，聊未来，感谢这段学习时光。

## 点评专家魏曼华简介

魏曼华：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教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教育基本理论、青少年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50万字左右。代表作有“社会公德文化的历史沉思”，此文获北京市高等学校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成果奖(1994)；“论社会公德”，此文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反思大跃进中的“教育革命”（2013）等。出版著作（含合著与主编）共14本，代表作：《当代社会问题与青少年成长》（2005）。现学术兼职为北京市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 创新人才的心理特征及成长影响因素研究：

## 一个80后创新创业者的个案

文／孙春梅[1]
评／夏林清

［摘要］区别于以往大多数关于创新人才的研究多从学校培养的视角出发，本文以一个创新人才成长的经历为例，着重分析创新人才成长过程中所具备的核心心理特征及其成长的重要影响因素，更加直观地认识创新人才，丰富已有研究成果。

［关键词］创新　创新人才　成长　影响因素

［1］孙春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比较教育学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与管理、俄罗斯教育。

## 一、问题的提出

文中“点”

创新早已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更加将关注点落在创新上，如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等，创新越来越成为国家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而创新的核心在于人才，因此我发现关于创新人才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再有就是我个人的原因，一是我工作中常能接触到企业的一些高级研发人员、企业家，他们中很多都有创新成果，我很好奇他们是如何成长为创新人才的。二是由于家庭因素和传统的教育理念的影响，我成长为“好学生”的同时，创新能力没有获得相应的激发，对自己没有成长为创新人才感到遗憾。本文通过回顾性地研究一个创新人才的成长经历、创新产品过程及其个性特点和代表性事件，试图回答创新人才是什么样的，具备哪些核心的心理特征，在其成长中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

## 二、研究背景

所谓创新人才，就是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拥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掌握创新方法，善于运用创新工具，勇于创新实践，并能够取得创新成果的人。其中创新能力包括创造性学习知识、创造性应用知识和创造新知识的能力（林崇德，2004：530）。狭义的创新人才指在社会生产和社会过程中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人，广义的创新人才还包括那些具备创新性素质或潜能，可能为社会做出创造性贡献的人（林崇德，2009：25）。本研究中的创新人才是指已取得创新成果的人。

有关创新人才的相关研究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出现以来迅速得到了中国教育界的关注，相关专著和论文大量涌现，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某一领域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比如英语创新人才的培养，交叉学科创新人才的培养，体育院校如何培养创新人才；二是相关性研究，比如课程体系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本科生导师制对创新人才培养的作用，创新人才培养与高等教育改革等；三是创新人才理论的研究，如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研究，

创新人才的建构模式，创新人才的成长环境和条件等。绝大多数研究都是立足于高等教育，采用的方法多为理论思辨，实证研究很少。

本研究与林崇德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有相似之处，本研究相当于林教授主持的对科技创新人才研究中的一个个案，研究方法都是深入访谈，不同的是林教授访谈的对象都是院士，最年轻的是1965年生人，而我访谈的对象是1985年生人，刚刚展露其创新才能，取得创新成果，还有一个不同点是，我的访谈对象不仅搞科研还自己创业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本研究虽然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与以往有雷同，但是因为研究对象具有不同特点，因此我觉得本研究具有研究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会丰富对创新人才的研究。

## 三、研究方法

### （一）抽样方法

我采用的是目的性抽样，选择访谈于晨，是因为他在移动互联网领域有创新产品，还是一位年轻的创业者，符合我的创新人才的标准，本来我最初还打算再访谈70后和60后的两位创新人才，但由于时间紧迫访谈三个人唯恐得不到深入细致的材料，再有于晨给我的感觉打破了我对80后的一些偏见，因此我决定只专心深入访谈于晨。

### （二）收集材料方法

收集材料的方法是开放式访谈、QQ访谈、查看于晨的博客以及互联网上搜索公开报道信息。访谈的时间每次大约1至1.5小时，地点由于晨定，我对于晨面对面访谈了两次，第二次访谈于晨之后，紧接着又访谈了他的两位合作伙伴兼同学，每次访谈我都在征得被访者的同意后用录音笔录音，同时记下被访者的表情、神态和肢体动作，以及周围的场景，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早的整理录音资料和自己的反思，后来根据整理的材料又通过QQ对他们进一步追问了一些信息，还在百度上搜索“于晨”，找到一些关于他的报道材料。

通过友人找到于晨后，我手机短信告诉他我访谈他的意愿和访谈目的，他毫无犹豫地表示同意，并约定了具体访谈的时间和地点。

2012 年 10 月 30 日中午 11:50，我提前十分钟来到约定的他公司附近的咖啡厅，于晨还没有到，此时咖啡厅里人并不多，较为安静，有三两人低语的，也有用笔记本工作的，咖啡厅里一份套餐的价格在 26 ~ 32 元，在我看来，于晨选的地方经济实惠，选好座位我发短信告诉于晨，他回复“稍等，马上到”。12:05，于晨到了，他个头不到一米七，上身穿黑色夹克，下身穿藏蓝色牛仔裤，小平头，眼睛特别有神，闪着坚毅的光芒，看上去比网上的照片又成熟了一些。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朴实、内敛、有思想。

坐下后，我告诉他我在做一个关于创新人才的研究，希望能对访谈进行录音，访谈内容如果被采用，我会坚持保密原则，人名和地点等会用化名，他略微有些不解随即表示没问题，我想他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或者可能发现和之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不一样。我们的访谈从对中国教育的看法说起，由于缺乏访谈经验，最初访谈的主导权在于晨，他率先开始对我发问，“孙博士，您对创新是怎么样一个定义？”直接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后来我反思，他率先发问一是要打破陌生人间的尴尬，二是要审核一下他研发的产品是否与我要研究的创新相符。回答完他的问题我马上开始提问，切入我的访谈，从他研发的产品开始问，他讲了他的产品的特点，他们团队创业的历程，他从小到大的求学经历，他的家庭情况，大学时对他影响较大的导师，以及他的兴趣爱好，还有对创新和创新人才的认识。谈到他的专业、研发产品和创业经历时，有些专业用语我不懂，不得不进一步追问。由于访谈时间是在午餐时间，访谈被吃饭打断过，而且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访谈，彼此不熟悉，对有些私人问题我没有追问。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并非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对他自己研究的领域认识很深，对创新的认识也很深刻。访谈结束时，我表示可能后续还会就某些问题再次访谈他，他表示没问题，在我提出希望能对他的团队成员也访谈时，他稍微迟疑一下，经我解释是研究方法所需，他就答应了，并带我去他的公司认识了他的创

业伙伴兼同学高哲。

他的公司位于一个写字楼的二层，在一个开放式办公区，他们公司占有四五个区位，约 20 个左右工位，这是一个典型的软件研发的工作环境，大家都在电脑前操作着，我进入他们的空间，几乎没有人抬头看，个别人看一眼就继续工作，他们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在我询问高哲坐在哪里之后，于晨给我指向一个男孩，并大喊一声他的名字。此时我感到有些歉意，因为我的缘故让他大声喊，破坏了工作的宁静。高哲起身走过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大男孩，青涩地摸摸头不知叫他所为何故，于晨介绍我们认识，并代我说要访谈他，我立即解释说就是询问他一些关于于晨的情况，他同意了并给我一张名片让我联系他。

回来后整理第一次访谈于晨的资料，发现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连同上次我没好意思追问的一些细节问题写了一个访谈提纲，并在 QQ 上与于晨联系，约第二次访谈，并询问高哲的时间，希望能在一天相继采访他们，时间和地点还是由于晨来定。

2012 年 11 月 6 日上午 10:00，我来到于晨的公司，在会议室开始对他的第二次访谈，我们之间的关系相较于第一次见面时要近一些了，气氛也比上次轻松不少，为了避免上次多少有些跑题的访谈，这次我先给他看了访谈提纲，看过之后他有些担心会不会把“家底”都兜出去，我安抚道，即便在文章中使用这些信息也不会用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他不愿意回答某些问题也可以拒绝回答，而且他的“家底”只有我知道，解释后他才放心。这一次访谈的内容主要是他父母的情况、他家里曾经的遭遇、个人的婚姻状况、选修课内容、大学时翘课情况、阅读经历、自我认识和对“半个创新”的解释等。此次访谈时间在半个小时左右，他的谈话要比上次流利、有条理，神情上不那么拘谨，我想一是我们关系更熟了一些，二是这些问题都是私人问题，他比较好组织语言回答。访谈于晨之后，他就把高哲叫过来。他是于晨的大学同学和公司合伙人之一，在公司负责运营、市场、合作。由于我们之前在 QQ 上交流过，因此访谈时不显得生疏，我们坐在会议桌的直角两侧，他靠在椅背上，翘着二郎腿，一手插兜，看过访谈提纲他就滔滔不绝地讲

起来了，他非常健谈，思路清晰，语言流畅，讲话时另一只手随着话语时而抵在颌下、时而摸摸头、时而放在桌上。高哲所谈的大学时期和创业相关的内容与于晨自己谈的大部分相符，他更善于用事例说明他的观点，从他透露的细节中能更好地验证于晨的个性特点和心理特征，比如于晨大学时的学习成绩、学习态度、学习能力，考研工作创业之间的抉择，星座与性格的关系，父母做生意对孩子的影响，创业初期的艰辛，父母对创业的不支持，与家人的相处，由技术“大拿”向 CEO 的转变，识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高哲善于分析总结，让我对于晨的认识更加生动化。与他访谈 40 分钟左右时他接一个电话就离开了，访谈中断了，但是他所谈内容基本覆盖了我要问的全部问题。

高哲离开后于晨进来问我还需要访谈其他人否，由于他的博客传递的信息并不多，因此我还想再访谈他身边的一个人，他就给我叫来了鲁奇，鲁奇身穿草灰色的毛衣，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进来后双腿并拢拘谨地坐在椅子上，十指相扣。一看就知道他是很内向的技术研发人员。鲁奇与于晨不是同班同学，但是他们都上了同一门选修课，也是创业合伙人之一，因此我主要询问了关于选修课和创业的一些情况，基本验证了之前访谈的这部分情况。鲁奇还谈了对于晨的认识和看法，尤其提到了他坚持跑步、看书上表现出的超人毅力。由于到了中午，访谈在 20 分钟后结束了，鲁奇有点意犹未尽，我当即表示有些问题我稍后通过 QQ 与他相询，他表示没问题。

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没有对他的父母、姐姐、爱人、老师、室友、其他同学进行访谈，因此有关于晨大学时期及以后创业期间的信息基本能通过三角佐证方法证实，但是他大学前的情况来源较为单一，缺乏足够的证实力度。

### （三）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运用主题分析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内容分析。主题分析的目的是对研究内容进行编码，开放编码和主轴编码同时进行，对文本资料进行细致分析。先将访谈资料中被辨别为心理特征、个性特点、能力和影响因素的句子或陈述划出，编成独立码号，每出现一个新的特征，

就进行一次登录，本研究共产生自信、有毅力、有理想、勤奋进取、目标明确、承受力强、冒险精神，预见能力、批判性、好奇心、质疑、学习动机、交流能力、行动力强，对自己狠、认真、有主见、沉稳、爱思考、乐观、内向、执著、合作、可信、人品好、基础知识技能、专业能力、选修课启蒙作用、导师引导作用、图书馆资源，父亲严厉、传统家庭方式、家境变故、父母外出打工创业，海量阅读，师兄影响，宿舍环境、工作内容相关性、领导同事的态度、创业伙伴的态度 40 个频次不等的码号。在此基础上将可以概括的部分用上一级概念将它们关联起来，形成上一级类别，逐级上升，从而界定一个编码主题（见图一）。这一工作由研究者本人单独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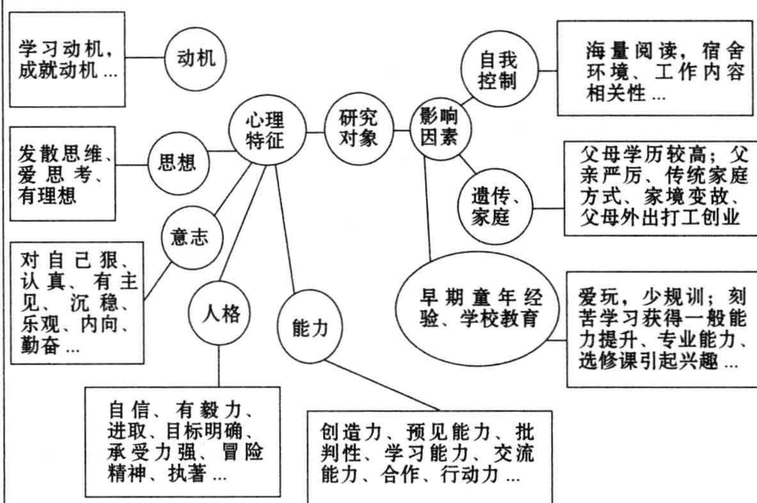



图 1　主轴编码图

## 四、研究结果

### （一）背景介绍

于晨 1985 年出生在江西省上饶市一个乡镇，有个姐姐，虽然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在他们那个三四线城市，家里有两个孩子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幼年时家境还算殷实，幼儿园几乎没有上过，上小学时贪玩，不爱学习，成绩一般，初中离开家去省城一所寄宿中学（重点完中，

后来取消了初中部，于晨是最后一批初中生）读书，初中三年学习不怎么努力，中等水平，比较贪玩，未能考上本校高中，后来父母花钱让他上的。

父亲大学毕业，最初是一家乡镇企业的厂长，较为清高，不善于交际，在于晨上初中时父亲被调到政府机关工作，收入锐减，负担不起两个孩子上学，父亲不堪忍受就辞职下海去浙江一带打工了。初中毕业时于晨和姐姐去浙江看望父母，此行看到父母的辛苦，他深受触动，高中开始奋发学习，成绩上升很快，高一进入全年级前十名，高二到了前三，高三稍稍退了些，但一直保持在前十名，高中时期数学成绩最好。2002 年报考上海一所重点大学，落榜了，复读一年，求稳妥报了北京交通大学，没想到当年成绩考得很不错，除了北大清华，其他院校几乎都能上，毫无悬念被北京交通大学录取了。大学期间成绩顶尖的学生大多数是女生，于晨学习成绩属于中上等，但在男生中是学习好的，他大一过英语四级，大二过英语六级和计算机二级、三级，他还获得全国和国际数学建模大赛小组一等奖。当时报考的专业是信息与计算科学，听名称感觉挺有前途，上了大学才发现原来就是应用数学换了个名字，有些失望，后来无意中选了一门贺教授开的选修课“文理结合”（他觉得跨学科交叉里面往往会出现很多机会），开始接触人工智能领域。贺教授是退休返聘的，每学期开几门与数学相关的选修课，比如模糊数学、文理结合，贺教授从每届学生中挑选几名弟子重点指导，并给出两条选择方向：若是家境不好就学计算机，走计算机这条路赚钱快；若是家境好就跟着他做科研，发文章。由于家境一般，于晨就走计算机这条路，又“觉得单纯学计算机没意思”，同时也接触一些理论知识，两条路一起走，上学期间他发了四五篇论文，大二已经开始编程了，这在学生中是比较超前的。大四面临考研和就业的选择，最初他准备考研，复习了几个月发现“没什么意思”，这不是自己的人生追求，就放弃考研直接找工作了，找工作也很容易，很快就签下了一家知名的国企，在等待毕业的半年多时间里，他受软银孙正义传记的影响开始疯狂读书，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毕业工作的头一年，大约看了千余本。2008 年和同学做了一个

软件，拿着开发产品的雏形去找投资，未果，又回去工作。大学时于晨就预见到手机会向智能机发展，也一直有创业的想法，并跟几个同学交流创业的设想，2009 年他毅然决然地辞职，放弃户口和高薪，出来艰苦创业，最初只有他一个人专职研究创新产品，其他三个同学兼职参与，后来产品成熟了另外三个人也辞职与他一同创业。创业初期吃住条件很艰苦，一直花为数不多的积蓄，后来还借了不少钱，产品上市没有迅速打开局面，产品推出大概一年时间的时候，很多投资公司来谈后说这个产品应该是大公司做的事情，小公司做没有未来，后来赶上苹果语音助手的推广应用，他们赶上一个机遇，公司走出经营困境，用户量达到千万，融到第一笔风投。如今公司有 20 名员工，发展初具规模，入选中关村金种子企业，于晨也完成了从一个技术员到 CEO 的角色转变。

### （二）创新人才的心理特征

从于晨的自述中和他的两个伙伴兼同学对他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于晨是一个自信、有毅力、有理想、勤奋进取、目标明确、承受力强、具有冒险精神的人，他做事认真、有主见、沉稳、爱思考、乐观、性格内向、执著、但是“对自己狠”，他还有预见性、批判性、学习能力强、善于交流、与人合作、具有行动力等这些优良品质，在众多心理特征之中最为核心的是有思想、动机、意志力、能力和人格这五项，这些对于研究对象于晨成长为创新人才起着决定性作用。

（1）有思想是找到创新目标的指明灯。创新能力包括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技能三个方面，因此有思想、有想法是创新人才具备的先决条件。在于晨身上具体表现为:

“他想法很多，思维比较发散。”

“放弃考研，觉得研究生的生活不是我想过的，想去追求更有意思的生活。”“希望做一个服务能让客户用最简单的方式得到一个结果；就是想去改变。”

“他这个人还是很有想法的一个人，每次去（上选修课）的时候都特别积极，而且还带有很多很多想法，跟老师交流。”

“也是因为他这个人性格的原因吧，他总是想做一些很超前的行业，很超前的事情。”

（2）动机是走向创新目标的驱动力。动机是推动人从事某种活动，并朝一个方向前进的内部动力，是为实现一定目的而行动的原因。在于晨身上体现得较为明显的是强烈的学习动机和成就动机。

表现一：学习动机对学习效果有重要影响

“……反正初中三年没怎么去想读书这个事情，所以学习不算好，这三年基本上都在玩，没怎么好好读书，我们那个高中是整个省市的重点高中，考高中没考上，然后花钱进的高中，高中以后开始认真上学，高中学习成绩上升很快，入学时候在班级属于靠后那种，一年左右就到了全年级前十名，高二到了前三，高三退了一些，前十……”

“这个事情（钻研人工智能）我反正是一直保持挺长的时间，因此我大一大二课程可能不是特别好，中等，但是我大三的时候就想用一个学期努力一下，我不相信自己成绩上不去啊，然后有个学期我是蛮努力的，就是说那个学期成绩上去了，大概在年级也比较靠前了……”

表现二：成就动机推动目标的实现

“但实际上是给自己一个平台，创造一个平台啊，让自己更有机会，因为我在任何一个公司里面，不管是大的，小的，实际上，我感觉机会还是比较小，这个成长的速度太慢，对于个人来讲的话，成长的速度太慢，一直希望有更好的环境、平台，让自己更快的发展，更快的成长。所以这次创业也是一个很大的动机、动力。”

“大一接触人工智能，本科时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毕业后的工作选择也与这个方向有关。”

“没有像他一样执著下来的精神真的是做不下来。”

（3）意志力保证其坚定目标不动摇。意志力具有独立性、果断性、坚定性、自制力等品质。在于晨身上表现为：

毅力：“他这个人做事很有毅力，有一次他说想看点书，要不一起去办国图的阅览证，我（鲁奇）说算啦，有点远，不想去，结果他办了，然后大四快毕业那段时间，每天都去，然后几个月吧，在国图还有校图书馆看了大概几百本书。”

持之以恒：“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要出去跑步，跑四五

公里，围着操场跑十几圈，每天都跑，那个时候身体特别好。”

坚定性：“别人认为这个事情（推广研发产品）太大了，很多投资公司认为这个产品是一个大公司来做的事情，小公司不应该做；这个东西未来看不到一个价值；别人不认可，我们就死扛着做。”

执著：“没有像他一样执著下来的精神真的是做不下来。”

（4）能力是实现创新目标的保障。具体表现为：

批判能力：“希望自己多去思考些问题，工作的时候也好，看书也好，总希望找些毛病出来，就是这种心态。”

质疑能力：“在教科书里面，看其他领域的书的时候，总是想挑里边的毛病，看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我会深入地思考，一有没有问题，二有没有解决方式，不太容易去相信它的东西，至少是书面上的东西不太容易去相信。”

预见能力：“从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他就说过，不信你看这个手机以后我对它说话，它就能按照我的指令去控制，反正算是预见了智能机的这么一个预见性的时代吧。”

工作能力：“多少年过去了，原单位的领导和同事还经常联系他，让他回去，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在这肯定是一个顶三个那种，就是能力超强，工作成果都很快这种。”

（5）人格——创造性的人格特点。表现为：

意志坚定：“大家主要还是看好这个方向，觉得他这个人比较靠谱，刚开始加入进来可能也有犹豫，就觉得行不行这个，能做成吗，他用他的这个决心也好、意志也好、行动也好一直向我们证明，他一个人这样做的话也能做好，但是如果有我们加入这块儿的话肯定如虎添翼嘛。”

固执：“因为他的性格本身也比较倔，比较直、固执这种，我记得有段时间他母亲还是很反对他创业这件事的……”

幽默：“创业说白了还是要乐观一点，这是基础，于晨就属于这样，比较自己找乐子这种”，“我是团队里的唐僧。”

自信：“今年同类产品也出现过很多，都是短期行为，看到这个好就做，没有积累，没有后续资金的支持，根本就没有机会能赢。”

从于晨的创业伙伴兼同学对他的评价是“他这个人比较靠谱”，“他的性格本身比较倔，比较直，固执”，“他这个人总体来说，很执著、热情、踏实勤勉，大多数时候对自己特别狠，人品好，有担当”，“性格方面，可能是狮子座的有雄心壮志，霸气十足这种”。于晨对自己的评价是“我这个人比较无私、比较内向、比较理想主义”，他认为“创新，需要一些人，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还要有很强的欲望去做，早期的积累也很重要”。

于晨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很难说哪些是创新人才特有的，只能说明是他这个人具有的，某些心理特征比较突出，与林崇德教授（2009：25）研究的72名创新人才所表现出来的重要心理特征和人格特征相比，有吻合的，如勤奋努力、内在兴趣、坚持有毅力、有理想、专业素质和功底、积极进取、自信、冒险性、诚实、爱思考、精力充沛、沉稳等；也有不一致的，比如批判性和质疑、承受力强和预见能力等，批判性与质疑，我认为是我的研究对象属于80后群体的一种特质，承受力强和预见能力跟他同时还是一个创业者有很大相关性。当然还有很多心理特征和个人特征是我的研究中未发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研究资料的有限性，以及我的访谈远未深入有关，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的研究对象很年轻。

### （三）创新人才成长的影响因素

创新人才的成长过程中其心理特征起着决定性作用，除此之外他的心理特征和成长轨迹还受到了遗传因素、家庭环境、早期童年经验、学校教育以及自我控制因素的影响。

（1）遗传和家庭因素：父母学历较高，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在当时家境不太富裕的情况下肯花钱让于晨上好高中。“父亲比较清高、不善交际”，这一点在于晨的性格中也留有印记。

“父亲不善于跟领导打交道”，从厂长位置被调到政府机关后，收入减少，这种落差使父亲“呆不下去了”，辞职外出打工，于晨看到父母在外的艰辛后开始奋发学习，产生学习动机和动力，由于“从小父母长期在外”，于晨独立性特别强。另外父亲这种果断、不妥协的性格对于晨

的心理发展也有影响。

（2）早期童年经验和学校教育的影响。

1）学前及义务教育阶段：少规训，思想开阔。

早期于晨不怎么学习，特爱玩，没受到太多学校条条框框的规训，拥有更多自由，有利于创造性的养成。

“反正小的时候，我幼儿园从来不上的那种，星期五我记得他发吃的，所以我才会去嘛，这种情况。小学，算中上这种水平，后来读书也不算是特别的认真。因为我初中就开始离开家里去外地上学，住校嘛，反正初中三年没怎么去想读书这个事情，所以学习算是中等，不算好，这三年基本上都在玩，没怎么好好读书。”

2）优质高中：打下良好的知识基础。

高中是各学科打基础的阶段，常见到高中时成绩突飞猛进的现象，而这样的学生往往到大学时也能一直保持这种优势，优质的高中教育往往令人终身受益。

“我们那个高中是整个省市的重点高中，其实我们进初中已经很幸运了，（我们学校）最后一批招（初中）生，考高中没考上，本校的初中考高中没考上，然后花钱进的高中，高中以后开始认真上学，高中学习成绩上升很快，入学时候在班级属于靠后那种，一年左右就到了全年级前十名，高二到了前三，高三退了一些，前十，第一年高考没考上，考得不太好，报的上海那边一个重点大学，没考上，第二年我复读，成绩好一些，当时成绩除了北大清华，稍稍差一点的那些基本都可以上。”

3）大学阶段：通识教育开阔视野。

现在一直强调大学通识教育，其实对于培养一个人的综合知识、开拓视野还是很有必要的。

“专业课主要还是包括数学、心理学……其实还是蛮广的，专业毕竟是应用数学嘛，所以呢很多课程还是跟数学有关系，接触的其实还是蛮多的，包括哲学、英语、文学、逻辑学，及各个学科的东西、物理，反正基本上主流的学科还都学过。”

4）选修课：引起兴趣，带入人工智能领域。

选修课的内容、授课方式、导师的学术引领和培养方式等为于晨开展创新输送了智慧的种子。“（选修课）像

讲故事一样，很多交流，导师给予生活和工作上的指导”，“没有固定上课模式，经常去他（导师）家，有时候师兄带一下师弟。”授课内容很丰富多彩，也很出人意料。“模拟设计树叶怎么落的，水冲到海岸的图形，雪花的结构等”，“建了一个网站，里面有往届的一些程序，代码都是开放的，可以自己用，也可以去改写新的东西，然后再去做一些深入的拓展”。“他跟其他的老师不太一样，特别喜欢和学生在一起，虽然他是咱们国家这块儿（人工智能领域）的奠基人，他基本上都给本科生上课，课上他喜欢把他的思想拿出来大家讨论，特别是关于人工智能这块的展望，然后用他本人年轻时的例子教导大家。”

（3）自我控制：自我控制能力非常强，这也是意志力的一种表现，于晨通过大量阅读，使得他对 IT 领域有了前沿性思考，有助于他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见，这是创新得以产生的前提。他大学期间被分到与其他班的同学一个宿舍，“独立的时间就相对多一些”，避免了和本班“特别爱玩的一群在一起，就越来越独立”。

## 五、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几个结论：

（1）创新人才必须具备的核心心理特征有：有思想、有成功动机、意志力强、优秀的人格品质、多种能力。

（2）创新人才的心理特征形成以及成长过程受到了遗传、家庭环境、早期童年经验、学校教育以及自我控制因素的影响。

（3）不同阶段的学校教育对创新人才的成长所起的作用不同：学前和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应少规训，多给些思想空间和自由；高中阶段扎实打好知识基础；大学时期主要是培养学科视野；选修课则是培养兴趣点，启发创新。

## 六、讨论与反思

半结构式访谈提纲是按照“学校教育对创新人才的影响”的主线设计的，然而由于访谈者对方法掌握不娴熟、不专业，再有不想对访谈对象造成干扰和引导，因此访谈

对象所讲的内容比较零散，通过对访谈资料的聚焦和分析，发现资料在说一件事，那就是访谈对象之所以成长为创新人才，他所具备的心理特征以及一些关键人生经历起着重要影响，因此，我遵循资料修改了研究主题和框架。

在研究信度上有缺陷。首先，围绕一个人的成长进行研究时，理应进行 360 度访谈，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我只成功对较为方便联系的他的同学和同事进行访谈，而没有对其父母、老师、校长、班主任、室友、朋友等进行访谈是很大的缺憾，造成了所掌握信息的不完整；其次，在对资料进行编码时，都是我自行编码，没有经过他人检验，这也对最终的研究信度有一定影响；最后，掌握的资料不完整直接导致有些信息缺乏三角佐证，影响结论的信度。

在研究方法上不专业。初次访谈的时间和地点不合适，安排在午餐时间咖啡厅内，访谈过程多少受到些干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访谈效果；再有访谈经验不足，对陌生人访谈有一些顾虑，未能及时追问一些重要信息。由于第一次访谈时未给访谈对象看提纲，在没有条框限制的情况下他思维发散，所讲信息涉面较广，借鉴于此，第二次访谈提前给他看了提纲，然而我感觉对他起了暗示和引导作用，这也是我一直掌握不好的度。

在成文时，我感觉最无力。资料分析已经完成，但是到了资料解释时，我不知道如何下手。这里深深暴露了我作为研究者缺乏学科基础的弊端，也是最核心的问题所在，虽然所有分析已然指向心理学层面，但是由于缺乏心理学学科知识背景，导致对资料的解释不深入、不深刻。

**[参考文献]**

林崇德（2004）：《教育与发展：创新人才的心理学整合研究》（第2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林崇德等（2009）：《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刘宝存（2003）：“创新人才理念的国际比较”，《比较教育研究》，第5期，第8页。



## 文末“评”

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领域中，自然科学实征分析（empirical-analytic）的研究方法是年轻研究者首先会学习熟悉的；许多教育、心理与社会工作专业的研究者则因关切个人、群体与社会诸多现象之间的动态关系，会开始援用田野或民族志的诠释—历史（hermeneutic-historical）研究方法或是实践取向的批判—解放（critical-emancipatory）研究方法。唯不同的研究范式（实证主义/positivism，现象主义/phenomenology与实践哲学/praxis-oriented philosophies）的推论方式与思维逻辑是不同的，因而学习所谓的“质”性研究，通常会发生一个研究者对自身的探究逻辑如何察觉明辨的转折历程，这就是我说的“入场券”。“创新人才的心理特征及成长影响因素研究——一个80后创新创业者的个案”就恰恰反映出了作者孙春梅在学习不同范式过程中的一个夹缠不明的课题。

年轻的研究者想要接续“创新人才与教育创新研究”（林崇德教授主持的大型项目）往80后企业创新领域进行探索研究；她的行动带领她推进了一次深入案例研究，她进入了一个研究者与不同人的互动关系中如何去发现与辨识的。然而，由研究文章的题目与副标的使用，以及“主题分析的数据处理方法”和“对研究者与被访谈人互动关系与研究成果”的故事性写法来看，这两段的表达，都传达出了研究者在两种思维逻辑（实证主义与诠释现象主义）间来回。

“因素研究”是实证逻辑的验证语词，若视一个案为一重要的“去细辨与发现的案例”，那就是诠释现象的思路逻辑了。进入一组被访谈人的生活现场，并对互动中发生的谈话材料进行理解与诠释和以“心理特征因子化”的眼光去断片化与类别化“数据”也是两种不同的思维逻辑。在这篇研究中，确实看见了研究者所花的力气与时间，也同时在若干叙事性陈述的段落中见到了研究者被两种思维逻辑所夹缠困住的矛盾。

作为年轻研究者，孙春梅或许无须为自己缺乏心理学学科知识背景而感到挫败，反而该回看研究过程中，自己研究思路与研究策略的选择所承载着的矛盾性。毕竟，我们对不同研究范式的明白掌握也是由“做中学”而得来的。



## 学生回应

很高兴台湾辅仁大学的夏林清老师点评我的文章，夏老师在百忙之中还要饱受这近万字的折磨，对此我深表歉意和由衷的感谢，同时对编委这段时间的辛勤付出道声辛苦啦！

夏老师的点评一语中的、醍醐灌顶。的确，成文过程中我一直就很纠结，尤其到了解释和分析的时候写得很“痛苦”，原本以为根结在于缺乏心理学背景造成的分析没理论高度、结论空洞，看过夏老师的点评我真的是豁然开朗。没错，我就是在诠释和实证这两种思维逻辑中“夹缠不明”，一边是按部就班要按照所学的质性研究的方法去做，一边又受到实证主义范式的惯性影响，还不自知。此处我想起在朱老师的课上讨论时，在试图解释分析某现象时似乎也常受到实证研究思维的“干扰和纠缠”。

回头重看自己的文章，发现首先题目就是一个败笔。这不是一个质性研究的风格，如果改成“一个80后创新创业人才的成长——教育的影响”或许更贴切些。再有分析方法不用主轴编码，不硬找心理学理论，只是去解释现象，分析教育在其成长中给予了哪些影响，并用事实材料相互印证，这样应该会更符合阐释的逻辑。

我知道要想真正掌握质性研究方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实践，需要理清不同范式的思维逻辑，尤其需要克服一些惯性思维，才能真正把质性研究的魅力展现出来。

### 点评专家夏林清简介

夏林清：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辅仁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台北县芦荻社区大学负责人。学术专长与研究专题为性别与心理治疗、生涯发展与成人教育、团体动力与社群发展、组织学习与专业实践、家庭关系、行动研究法、反映思考与专业实践等。其实践研究以解放为目的，协助人们创造一个更为公平的世界，去改变那些不正义的分配，以发展一种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以“转化社会不公现状”为长期承诺的热情学术。出版编译专著8部，发表学术和会议论文60余篇，参加专业服务20余项。曾获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及发展部“全球签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项”（2005）、英国巴斯大学“英国皇家学院研究访问奖助”（2003）、美国社会治疗中心“社会心理治疗贡献奖”（2002）、美国富布莱特特基金会“杰出学者交流奖助”（2001）等。

# “双面胶”与“双面焦”：

## 80后女性家庭与职业选择困境的质性研究

文／武晓伟[1]
评／熊秉纯

[摘要] 本文从四个典型个案入手，剖析了中国80后女性在处理家庭生活和选择职业时出现的各种困惑，遇到的各种问题，甚至是矛盾和冲突。以此来探讨传统文化、市场经济、家庭观念和社会发展对80后女性群体的影响，特别是当女性处于家庭和工作的拉锯战时，80后女性的态度和行为。

[关键词] 80后　女性　家庭　职业　性别分工　市场经济

[1] 武晓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教育学原理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性别研究。

文中“点”

# 一、研究缘起

## （一）个人旨趣引发的思考

80后是很特殊的一代。这个词组最初由少年作家恭小兵提出，本是现代文坛对1980—1989年出生的年轻作家的统一称呼，后被各个领域借用，其包含的实质意义远远超过80后文学的简单字面含义，它指代整个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80后历经了现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是亲眼见证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日渐发展崛起并与之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国家提出“鼓励只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致使相当一部分80年后出生的孩子成为独生子女，在他们出生、长大的小环境里只剩“独享”而没有“分享”；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踏上了“市场经济”的快轨，不可逆转地高速前进，可以说，在物质上80后经历了中国社会和个体家庭迅速脱贫并走向富有的全过程；1999年是中国高考扩招元年，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80后是最大获益群体，几乎同时，2000年教育部停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派遣报到证》和《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派遣报到证》，启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科就业报到证》和《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1]，“不包分配、竞争上岗、择优录用”的新机制全面出台，走进象牙塔时的兴奋很快被四年后“找工作难”的现实打碎。

80后的女性有着不同于以往代际女性群体的独特性。首先，她们是独立的。80后女性是在中国国门打开后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女性群体，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客观上激励了每个家庭把女孩也送进了学校，让她们和男孩一样有了独立的人格和升学机会。然而，正像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一样，我们也很难自由地选择传统文化，任何时代的女性观总是无法逃离历史（魏国英，1995）。80后女性虽然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和自由的年代里，但中国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文化却以各种形式无声无息地影响着男女的社会生活，接受了多年正规教育的80后女性希望走出家门，走进职场，但现实却让她们不得不在“家

[1] 摘自《人民日报》1999年12月24日版

庭”与“工作”的拉锯战中几经沉浮，无疾而终。她们无法抱怨，也没有人理解和同情，中国世代以来的女子统统“无才便是德”，现代社会给予了女性读书的机会，但并不意味着她们可以置家庭而不顾。这些年轻的女性就像一株株植物，身体拼命想要向上伸展去看看天空，脚下却被土地牢牢牵绊；其次，她们是无力的。对于一部分“三十而立”的80后，他们已经成为建设中国现代社会的主要劳动力群体，女性也毫不例外。和男性一样，当“绩效”、“效率”、“数字化”不断充斥整个劳动力市场时，她们的付出被无情的“货币”所购买，而女性天然地渴望“被尊重”、“存在感”、“安全感”和“荣誉感”等情结在这里得不到满足，她们比男性更加努力，却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无休无止，让她们身心疲惫。

### （二）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西方学者对中国妇女的关注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西方学者的研究逐渐从宏观转向中观与微观，开始深入探讨诸如劳工、父权家庭、教育等问题，并试图还原女性作为历史主人的地位与作用，如曼素恩(Susan Mann)《珍贵的记录漫长的18世纪中的中国妇女》；到90年代，西方学者又一次转向，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性别及两性关系的形成、发展与变化，特别是性、婚姻等角度，试图把中国妇女置于社会的大历史背景下来考察，以探究社会历史变迁与中国妇女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如罗丽莎（Lisa Rofel）《现代意向与“他者”现代性》。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脚步和妇女问题的大量涌现，一大批中国学者和妇女实际工作者开始了妇女学研究的拓荒工作，经过20多年的发展，各种学术观点纷呈，研究领域和问题也更加丰富。

在这些研究中，着重评析熊秉纯博士的著作《客厅即工厂》。在熊著作中她主要探讨了双重弱势的女性工人如何能承受“生命之重”。台湾现代工厂生产体制把母亲、妻子和媳妇的已婚妇女，以工人、无酬的家属劳动者或临时工的身份纳入到大生产的体系，成为这个体制中的重要劳动力。她们之所以能够坚韧地生存或乐此不疲，是因为

她们重视的是“家庭本位”，而非市场经济中不断强调的“原子化”个体，即将经济行为嵌于家庭本位中，并以此来维护家庭的存在和生活的完整。

熊的研究给予研究者很大的启发，本文将以经济特别是市场经济为“经线”，中国传统性别文化为“纬线”，试图探讨如下问题：①是什么原因导致 80 后女性面临家庭与职业选择的困境？②面对矛盾和困惑，80 后女性的态度如何，会做出怎样的回应？③这些态度和行为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在起作用？

##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四个典型个案，通过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收集数据。访谈从类型上来说分为两种：正式的结构性（或半结构性）访谈和非正式的无结构访谈。前者主要在研究的中后期使用，后者主要是在研究的前期使用。在非正式的访谈中研究者一般从情境中的某件事情，或某个场景遇到的问题入手，引发访谈。正式的结构性访谈中研究者预先拟定详细的访谈提纲，访谈时间约为 1 ~ 1.5 个小时。其中，人名与地名以其首字的大写字母替代。个案 Y 与 G 采取面对面访谈（其中与 Y 的访谈发生在 2012 年 *10 月初，历时 1 小时；G 的一次访谈发生在 2012 年 11 月*初，历时 1 小时，二次访谈发生在 12 月中旬，历时 2.5 个小时）；个案 S 与 C 借助电话和网络视频访谈完成（其中 S 通过电话进行，发生在 2012 年 11 月底，历时 1 小时；C 通过网络视频方式，发生在 2012 年 12 月底，历时 2 小时），并且 S 提供了 5 份日记，作为实物分析资料。

参与式观察的方法使用于个案 Y 和个案 C。对个案 Y 的观察始于 2004 年 9 月—2005 年 9 月，历时 1 年。在这期间研究者因与 Y 生活的一起，故采取跟踪式观察的方式，详细纪录了 Y 这一年的活动。对个案 C 的观察始于 2007 年 10 月—2008 年 1 月，历时 3 个月，研究者的观察主要集中在 C 的日常工作上，观察范围主要在办公室及 C 所参与的社交场所。

总之，质性研究本是一个过程（邓津、林肯，2007：

1. 从全文资料的引用上，作者并没有标明资料来源，根据行文，作者好像只是引用了四个当事人的访谈翻录，田野笔记和日记的资料并没有囊括在内。

2. 作者既然做了田野观察，又有五份当事人的日记，如果能把田野观察细致的洞见包括进来，应该可以有更丰富和深刻的呈现个人与周遭人、事、物的互动，而个人的日记也应该可以更精准地捕捉或铺陈当事人的内心世界。

22）。其研究中的“资料”几乎可以包括研究进程中所有听到、看到或通过其他途径传达的东西，因此，研究方法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问题。

## 三、个案分析

### 1. 想要做支“双面胶”

Y出生于J省某村，1982年生。父亲常年外出打工，母亲在家务农。由于农村“重男轻女”观念影响，其母在生下4个女儿后无奈生了第五个儿子。Y是家中长女。从Y记事起，父亲便很少回家，家中生养负担都在母亲一人肩上。Y不仅供养自己读书还帮助母亲供养四个弟妹。2009年结婚，丈夫也出生于J省农村，家有一弟。Y童年成长的经验及对“家”和“责任”的理解，让她在自己的婚姻和职业选择上想做一支“双面胶”。

“我和他谈恋爱时，他的家人很反对。主要是他们觉得我家太穷了，家里孩子又多，那时他很坚定，不顾家人的反对一定要和我在一起，我心里特别感激他，并发誓要好好努力。大学毕业后我考上了N大的研究生，而他当时报考F大没考上，他想再考一次。其实，我当时很想他能够去工作，如果他工作了，就能减缓一下我的压力。但他执意要再试一次，他家人也同意。为了方便他读书，我研二时就在外租房住，这对我来说是一笔特别大的开支，我还有四个弟弟妹妹都在上学。那时拼命帮导师做项目，带家教，只要一切能赚钱的机会我都不会放过。第二年他还是落榜，他家人有点急了，他是老大，还有个弟弟在上大学，他也不能总让家里养着，但他很固执，还想再考，我没办法，又苦挨了一年。第三年他仍旧没考上，我已经要升入研三了。本来他打算要放弃，但整日无精打采，什么也不想做，这让我很恼火，而且那个时候他脾气特别不好，总是我忍让着他，我想可能是因为考试所带来的情绪上的失落，随着工作后应该会慢慢好起来，我就劝他去找工作，但几次找工作又遇到打击，他的状态就越来越差了。当时我经常带他到N大社会学系去听课，后来我认识了一个老师，求他帮忙推荐我男朋友，他说只能在他专业范围内想办法。

我无奈就问我男友愿不愿意换专业。我心里明白他不想换，也不甘心，但现实摆在面前，他也不得不低头。第四年，他终于经过调剂考上了G大人类学研究生。我根本不想他到那个学校，地方远不说学校和专业都不好，三年后就业还是个问题。但他却很高兴，家里人也觉得出了个研究生很体面。2007年我毕业，他去读研。”

这是Y与丈夫在恋爱时的一段经历。可以看出，Y的家庭出身对她选择恋爱对象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列宁曾说“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吴德辉，1984）在中国，特别是中国农村，主张通过男性，即丈夫和儿子地位和价值来衡量与体现女性，即妻子与母亲的作用和功能。由于Y母亲接连四胎没能生育儿子，造成了作为“老大”的Y在自己的恋爱上也“低人一等”，并导致Y与男友在恋爱关系建立之初的不平等。Y在求学期间承载着学业、工作和家庭供养的诸多负担，即便如此，她也没有向男友及家庭寻求帮助，而是通过自己的不懈坚持维护着作为女性的自尊。

“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率先变心。有一天，他的一个师妹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经常骚扰她，并说自己实在是没办法才打电话求助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时我都震惊了！我去了一趟G大，他说他是一时冲动，并说他心里还是深深地爱着我。我的心又软了。就这样，挣扎了好久，我决定再给他一个机会。”

对于男友的背叛，Y选择了退让，尽管她内心对男友的行为充满了愤怒，但考虑到自己多年来辛苦经营的感情和从男友及其家人那里赢得尊重与信任，Y选择了原谅。此后，Y更加努力地学习、工作并一步一步从社会的最底层向上艰难迈进。

“我早就料到只凭借他的学历和成绩找工作简直是天方夜谭，他父母让他回老家，说那里有亲戚给他找一份职业院校当老师的工作，但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去。他家就开始给他施压，逼他跟我分手，要么就把我一起带回老家发展。那个时候我已经在上海H大读博士了。所以，我托人费了很大的劲在H大给他找了一份行政人员的工作。我读博的三年发表了不少文章，导师很看重我，帮我推荐到

X 大学做老师。我很想去 X 大，第一我喜欢当老师的这份工作；第二离我家也近，我可以帮母亲照顾弟妹，第三它也是我的母校。但遗憾的是 X 大不能解决他的工作，我辗转了很久决定放弃。当我离开 X 大返回上海时在火车上我哭了一路。我觉得自己太辛苦了！为了他，为了家，我连自己想做的事都做不了。后来 W 市教育局答应接收我，并以'买一搭一'的方式解决了他的工作，还给我们周转房住。我跟他商议后，他觉得还不错，我们就一起去了 W 市。09 年我们结婚。结婚那天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高兴不起来，可能两个人都在一起这么多年了，结婚是自然而然的事，所以并没有太多的欢喜成分。"

在选择职业时，Y 与丈夫的关系使得她不得不出让自己的喜好。因为中意的工作无法解决男友的就业，而正当 Y 痛苦抉择时，男友及其家人却毫不顾及 Y 的感受执意选择一个 Y 并不喜欢的城市和工作。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从夫家"的封建思想仍很盛行，家庭的核心支配权在男性（包括男性家长）一方。从 Y 与丈夫所建立的小家庭来看，Y 无疑对家庭经济收入、家庭的社会地位、家庭对外面貌的贡献远远超于丈夫，但家庭的实质领导权却在丈夫，甚至是丈夫背后的夫家大家庭。Y 娘家的贫弱是 Y 在夫家一直抬不起头来的原因，而 Y 长久以来无法摆脱的对自我在家庭中的"从属定位"也是致使她一次次退让的重要原因。

"在 W 市我一直不开心。可能是我自己出身贫寒，也没有什么人际关系网络在当地，所以工作起来非常吃力，而我自己本身心里还惦记着做学问，跟同事们谈不到一起。那两年我真的很痛苦。这时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最终做了选择。我怀孕了，并生了个女儿。我公婆非常重男轻女，到产房里一看我生的是女儿，连话都没跟我说就走了，一个月都不出现，我跟他母亲大吵了一通。这也让我终于决定辞职，离开 W 市。因为当时 W 市教育局接收我的时候就是'买一送一'的方式，所以随着我辞职，我爱人的工作也自然没有了，房子也收回了，他家人这才着了急，跟我道歉。"

"后来我申请了北京 Z 大的博后，并跟他说明我的情况，他们刚好在宁波有个基地，我就被派驻在那里了，每

个月给我固定6 000元生活补助，而且帮我爱人也推荐了工作。”

“以前上学时，很多同学都觉得我是个很有‘野心’的女生，说我总在不停地向上爬。其实，我根本不是个有‘野心’的女人，前段时间看了一部电视剧叫《双面胶》，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想做一支‘双面胶’，家庭、工作两面都最好能贴住，能粘得牢牢的。”

Y在做每一次职业发展规划时，都不是为自己单独制定，而一定是考虑到丈夫、孩子、丈夫的家庭和自己的家庭，并其排序为——①丈夫；②夫家；③自家；④自我；⑤女儿。随着女儿的长大，她的位次很有可能会再次提前。也就是说，在“家庭”与“职业”的较量中，哪怕是已做博士后的高级知识分子Y，表面上看是不断自我向上流动的态势，但实质上却终究无法逃离屈从家庭的命运。

**2.“感情总是善良，残忍的是人会成长”**

S生于G省某市一个高干家庭，1983年生。父母均为知识分子，良好的家庭背景和独生子女的优越感一直伴随S的成长。23岁从H医科大毕业后，经父安排在G省某大学附属医院儿科担任医师。丈夫年长S很多，家业丰厚。2010年S产下一子，远在外国定居的公婆希望S能够退出职场，可S却一直想继续进修，并希望在事业上有所发展。

“我爱人年纪比我大很多，在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觉得我不像其他女孩子那么有心机。我本身家境就很好，根本不在乎他的钱，我想这是他喜欢我的原因吧，他总把我当成小孩子，这种感觉也不错。”

S有着较好的家庭背景和稳定的经济收入，因此，在选择配偶和组建家庭时，经济因素考虑得并不是太多，尽管丈夫年长S很多，年龄的差距容易形成S对丈夫在情感上的依赖，但在处理家庭及公共事务上S本能地希望和丈夫有平等的话语权。

“医生的工作很忙，我在住院处要值夜班，有时候一晚上遇见一两个急诊就别想睡觉了，而且小孩子的病不能耽误，一天一个样，儿科医生最辛苦。我晚上值夜班后第二天回到家累得连话都不想说，更加不要说做家务了。幸好家里有阿姨（保姆）做饭打扫卫生，实在不想在家吃了

就出去吃，周围的饭店都被我们吃遍了。”

中国目前核心家庭的增多使职业女性不得不成为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但由于S家经济收入的丰盈，使得S可以通过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方式，即聘请家政服务人员，减少料理家务所需要的时间和劳动量，把精力放在自己的职业发展上。

“当初来这里也是凭借我父母的关系，我是一个本科生，现在我们医院进来的都是研究生、博士生，还有很多‘海归’，我的压力很大，而且不少人知道我的底细，虽然他们嘴上不说，但心里都会有想法。其实，我很想在专业上有所发展，凭我自己的本事吃饭。我来医院也有几年了，等今年升了‘主治’我就去读书，考个在职研究生，以后就会有发展。”

对于工作，S有着较高的期望值。在中国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凭借单个的智力资本竞争并获取胜利的人已不占多数，以整体家庭为单位的无形的社会人际网络成为当前年轻人求职不可缺少的资源。S进入职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的家庭，这也是S及周围同事心知肚明的事实。S并不满足于目前的工作状态，她更希望能靠自己的“实力”在职场中取得成功，并相信这种在工作上所获得的成就感也会带进她的家庭，让比自己年长很多的丈夫刮目。在处理家庭与职业的关系中，S由于没有经济上的实质压力，因此，在自身角色定位上更容易偏向工作，特别是通过正当的劳动所获得的成就感。

“我生了儿子后，我家婆（婆婆）和家公（公公）几次让我辞职在家里带孩子，不要上这么辛苦的班。的确，在有了孩子之后，真是顾不过来，因孩子而耽搁工作次数很多，领导偶尔照顾一下，如果经常缺班、换班，同事和领导就会有意见。”

虽然S的家务劳动被保姆或家政服务员承担，但由于家庭对独生子女的期望值增高，而教养的负担母亲是不可推卸的。因此，在有了孩子之后，S的生活重心不得不发生转移，生理差异造成女性人力资本在职场的贬值。生育，是女性无薪劳动的很重要一个部分，由于女性生育的“私人性”、“非常商品性”和“自然性”，生产生命的劳动

和与之相联系的哺育生命、照料生命的劳动便被排斥在公共劳动之外，当这些劳动不能表现为有偿劳动时，女性在职场中的低地位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孩子这么小，我要读书，还要工作，真的就是有心无力了。我家人还希望我多生几个，我不是不爱孩子，是不想被孩子拖住了，再生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出去工作了，所以我坚决不会生。从始到终，所幸的是我爱人很开明，并没有让我退出职场，也没有给过我压力，可我明白他的期盼，我甚至都能理解公婆，他们的感情都是善意的，残酷的是成长，我也需要成长，而且想独立自信地成长。”

在S不断地争取和纠结的过程中，丈夫一直处于一个相对沉默的状态。当问及S的丈夫如何看待S这一行为时，他如下回答：

“坦白地说，我对她（S）在事业上成功与否根本没有任何期待。因为我个人的收入养家、养孩子根本不成问题。我不会勉强她，她高兴做就做，不想做回到家里我也没问题。”

通过丈夫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把S看做和他处于平等位置的家庭生产者，而实际上S的收入根本无法跟丈夫相比，但正是因为以“家庭”为单位的S和丈夫已经摆脱了温饱阶段，实现了富裕，因此，丈夫对于S工作这件事的态度就开明了很多。

3. 作者引用了当事人先生关于当事人工作与否的意见得到印证。从已有的研究我们知道，已婚妇女是不是留在职场、怎么安排家务劳动、照顾孩子、嘘寒问暖父母或公婆，跟先生的态度以及是不是实际分担家务劳动很有关系。

**3. “如果不能全给我，就全都别给我”**

G生于H省某市，1981年生，独生子女，父为中学教师，母为私企会计。G大学毕业后先后在H省几个市从事过短期工，2010年转辗到B市并报名学习瑜伽，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不仅考取了瑜伽教练证书，还在当地一区开办了自己的瑜伽馆，正式落户该地。G对感情和家庭的态度很淡然，至今未婚。

“我在大学时谈过一次恋爱，可能是那次后就改变了我对爱情的看法。那时我还小，我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他女人知道了，带着孩子找到我们要自杀。那时我还很年轻，被吓坏了，赶紧让他带着老婆走了。后来他一直求我，并答应我跟他老婆离婚娶我。有段日子我们真的过得很快乐，但我内心还是没有安全感。果然，不久又出事了，他老婆

这次叫了家里的人‘追杀’过来，又是一场天翻地覆的战争。我真的再没力气，不愿意再这样下去。我就把他给我买的一切都扔了，一个人来到 B 市。这时我才发现，这么多年，我除了一身的伤痕居然什么都没有。”

“当初是为了疗伤，才学的瑜伽。但渐渐地，我发现我真的喜欢上这个了。再后来考了瑜伽证，又认识了很多和我一样的朋友，他们鼓励我重新开始，我跟爸妈借了钱在当地买了房子，把它装修成一个私家生活馆，我还聘了好几个教练，现在有了属于我的事业，我觉得挺好。”

G 对事业强烈的追求来自于感情的挫败。当今中国社会有很多事业成功的女性背后有着心酸的情感经历。女性想要追求职业的成功，必定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并需要克服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弱势地位；而且，基于对“成功人士”的评价，男女两性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化了的标准。男性关注他在公共领域中的成就，女性既要有公共领域的良好表现，也要在家庭生活中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对于后者的要求更甚。G 在感情上一连遭受打击，并让她心灰意冷，进而把全部精力放在经营自己所喜爱的事业上。G 深深明白女性得以在社会上立足，最重要的不是依附于某个男人，而是有自己完全独立的社会地位，而这种独立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经济的独立。

“很多男人对我的职业不理解，包括他们的家庭，觉得我现在做的好像不是件‘正经事’，是吃‘青春饭’的，没有保障，他们是因为不懂，才有偏见。我看到过有很多年纪很大的人都在做瑜伽、教瑜伽，况且我现在有了自己的瑜伽馆，将来即便我不做教练了，我也有自己经营的事业。也有一些男人一听说我自己做老板，就怕了，没自信，以为做老板的女人都是‘女强人’，觉得驾驭不了我，后来慢慢也都散了。现在陪伴我的，值得我信赖的就是我目前的事业。我从没打算放弃，还希望能继续扩大规模，我已经做出经验来了，等资金到位后我就想再开分店。我不会因为男人而放弃我热爱的工作。”

一次感情的失败让 G 转而投入了追求职业的成功，这也是很多“成功女性”不陌生的片段，当被冠以“女强人”这个概念，也就意味着除了“聪明”、“能干”之外，“刚愎”、“强

悍”这类看似中性词，但从社会性别理论分析的框架出发，就成为了贬义词，体现了“强人”而非“女人”的特点（陈向明，2000：282）。根据社会择偶的“阶梯理论”，即男性在选择配偶时，通常会在年龄、教育和职业成功方面比妻子更优越。[1] G 不断追求职业成功的过程也是不自觉地，甚至是“被剩”的过程。

“人说‘三十而立’，我今年已经三十出头了，若说不孤单是假话，我是最早一批在‘世纪佳缘’网站上报名交友的女人，我当时在那相亲交友的时候根本没有‘非诚勿扰’。但对婚姻我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紧张了，对待感情，我觉得如果不能全给我，就全都别给我。有更好，没有就安静自己度日。”

作为 80 后年轻的女性，职业并不是全部，在 G 的心底仍旧渴望一份属于自己的感情，但随着年纪的不断增高和职业发展的顺利局面，在择偶问题上必定困难重重。

**4. 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双面焦”生活**

C 生于 G 省某市，1984 年生，独生女，父母均在事业单位工作。C 毕业于 H 大学音乐系，原在 G 省一所私立大学做学生工作老师，现已结婚生子，丈夫在一家私营企业工作，收入中等。事业与家庭做选择，C 选择退回到家庭，现为全职主妇。

“我高考成绩一般，考了艺术类，学唱歌，毕业后找工作特别难，面试了很多单位都不行，用人单位要么嫌我没专业，要么嫌我是女生，后来费了好大力才找到现在的工作。”

G 市这座中国一线城市向来以“快速”、“高效”著称，衡量劳动力有效与否的第一要义就是人力资本的产出要大于投入。这对于女性劳动力是非常不利的，很多用人单位把女性看作“安于现状”、“成就取向低”的群体，尤其对于年轻女性，工作不久马上就会面临结婚生子，给用人单位带来不便，而且，婚后女性流动性差，也不利于人力资本的增值。对于家庭背景一般的 C 来说，找到称心如意

[1] 择偶阶梯理论可理解为“男高女低”的择偶模式，该理论假设，若以甲、乙、丙、丁来从客观上划分不同婚姻条件下的男女，大多数情况下，“甲男”配“乙女”，“乙男”配“丙女”，“丙男”配“丁女”，于是“甲女”就无辜地成为婚配市场下的“剩余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女强人”在感情上总是失意的原因。——作者注

的工作并非易事。

“结婚后，很快地婚姻跟工作就冲突了。学生工作非常繁琐，最烦的是每次领导宴请外面来的人都要我作陪，因为我歌唱得好，他们一去吃饭K歌就一定要我去，每次都会搞到夜里一两点，有的时候还会被一些讨厌的男人揩油（占便宜），我老公非常不喜欢我做这样的事。我很难过，不去吧，领导会说，去吧，老公又不开心。我觉得自己两面都做不好，‘双面焦’，家庭工作都协调不好，那段时间我自己精神状态特别差。”

职业女性除了要面临繁重的工作之外，职场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性骚扰”。“性骚扰”最初是由激进女权主义者麦迪农提出来并意指处于权力不平等关系下强加的讨厌的性要求，它包括言语和行为（易菲，2007）。C在工作中遇到的“揩油”事件是女性在职场被骚扰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们一般说的性骚扰就是掌权的男性对无权的女性的统治，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有了对职场性骚扰的明确界定（如美国），但目前我国法律还未出现类似规定，因此，面对这种“无证据”的骚扰，女性是无法获得理解和申述的。当C的丈夫得知自己的妻子被骚扰，没有把责任归结为C单位的领导，反而跟C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并以此为由，让C退出职场。

“去年我生了孩子，家里人都很开心，但工作和家庭不能两全，最终，我选择退回到家庭。现在我是个全职主妇了，天天都在家照顾孩子和老公，也并不轻松，比工作时更忙，每天有做不完的事，但我心里却总有莫名的失落感。”

迫于家庭的压力与在工作中遇到的困境，C最终选择了退回到家庭，暂时平息了“双面焦”似的生活。回到家庭中的C并没有因此而轻松，沉重的家务和失落感天天折磨着她，而且伴随着C的失业，家庭少了C的收入，而丈夫工资水平中等，加之孩子的到来，C和这个小家庭必将迎来更大的考验。

## 四、结论

### （一）中国传统性别分工与文化导致女性重家庭、轻职业

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模式是伴随着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即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分离逐渐出现的。男性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而女性则分工从事辅助性的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这种性别分工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状态中无疑是对女性进行人类自身再生产——生育活动的一种保护，是人类早期家庭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然而，这种分工客观上却使女性因失去社会角色从而失去了社会地位和权利，随之在家庭中也就渐渐成为男性的附属品。而且纵观中国的传统文化，男性被更多地赋予了承担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的角色，女性则被看成“相夫教子”的典范，这是儒家文化伦理纲常用以规范女性的行为，女性就应该在家庭这个狭小的环境里，并从“相夫”和“教子”的成就中去获得自己的成就感，追求有限的情感满足和人生价值。与此相关的诸如“母以子贵”、“妻以夫荣”等。虽然中国已经进入到现代社会，但任何时代女性的观念必然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延续，因此，当代社会对男女成就的不同评价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传统性别分工和文化的影响，女性的成就无法或很少通过职业渠道来表征，也是很多女性，如C轻率地退出职场回归家庭的原因之一。

### （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父权、夫权双重压力导致女性的生存困境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剧，人们越来越相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个显性外部性便是“个体化时代的来临”（陈文超，2012）。在个体化社会中，个体能动性的张力得到了扩展，但仍然难以逃脱既有社会结构的束缚。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和中间层次的社会成员来说，他们将遭受到更多的束缚。为了谋求整体家庭的发展，女性不得不作为家庭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者走出去，成为社会生产链条中的一环，而且随着女性知识和智力资本的增高，这一环的重要性也

会加强（如 Y）。随之带来的便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关系，即雇主与雇佣工的关系。在现代科层制的作用下，雇主处于管理层或上层，雇佣工则处于被管理层或下层。在阶级分析框架之下，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体现了女性在父权资本体系下被支配性的地位。反映在社会中，即是女性“找工作难”，女性职业生命力短，职场“性骚扰”，已婚女性职业提升困境，孕产期女性被边缘化等。在家庭中，尽管女性已经有一定经济收入，但传统的性别分工导致男性仍在家庭权威和权力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女性为家庭做出了牺牲和付出，其劳动成果无法得到相应的认可和价值计算，地位只能处于男性的支配之中。如个案中 Y 丈夫的几个工作都由于 Y 的努力，但在丈夫工作后，包括 Y 自己在内都不再会计较这个事实；又如 S，尽管 S 非常努力地谋求职业上的发展，但在丈夫看来，S 的工作不过是消遣。女性在社会、家庭场域中处于的双重弱势地位，使其遭受着双重的生存压力。

### （三）无薪社会劳动的非商品性，使女性的育、养得不到报偿

我们通常所指的就业是人们从事社会劳动并取得报酬或有经营收入的经济活动。它必须具备以下特征：①从事一种劳动或劳务；②这种劳动必须得到社会的承认，是一种社会劳动；③这种社会劳动必须是有报酬或有收入的（贺绍奇，2007：121）。可见，女性的生育劳动是不属于就业范围内的，并将其定性为无偿的、非社会性的、非商品性的、私人性的家庭劳动，它既不被认可为“社会劳动”，也没有获得报酬和收入，因此，女性的这种无薪劳动经常被男性及社会所忽视，并认为是件“自然而然”的事，与生育相伴的女性对于年幼子女的教养劳动也就“自然而然”地被摒弃在社会总劳动之外了。对社会而言，各种劳动都应是社会必要劳动的组成部分，从理论上讲应该是价值相等，特别地，对于女性来说，和异性结为夫妇并生育子女，把子女养大，即人口的再生产劳动——这是一套社会活动的体系，也是社会劳动力资源得以维持和更新的必要保证。这就是上述 3 个个案中出现的女性在做了母亲后，无论多

么钟爱自己的事业，可面对孩子时都无法放手。如果社会不能够把评价女性的标尺移到其对社会贡献的全部劳动上，而只衡量其家庭外部的公共劳动，是无法把女性的真实存在进行还原的。

### （四）80后女性“共同体”的消解，女性孤立无援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存在方式，个体、家庭没有太多私有财产，整个社会是一个比较平等，分配均衡的社会，“集体”、“共同体”的概念深入人心，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也是有依赖感和安全感的。随着西方自由主义的涌入，全球化消解了国家、集体，取而代之的是由“利益”和“竞争”构筑起来的“脆弱的共同体”。80后无疑是这一过程的见证人和亲历者，国家现代化、市场化的进程不断加速，80后毫无选择地被裹挟进去，投入到劳动力市场的残酷竞争中，特别是女性，缺乏一种可以在情感、心理、价值上支持她们，让她们产生安全感、存在感的“共同体”。当她们遭遇到困难、不公的对待时，她们无法从内心深处对某个“共同体”获得认可并得到安慰和帮助，加上竞争的日渐激烈，生存压力的日渐增大，以及她们本身价值观被“物质了的世界”不断冲击所发生的摇摆，都会直接作用在她们对家庭与职业选择上，使我们看到，表面上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个案，但事实上却是这个年代的女性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参考文献]：

陈向明（2000）：《质的研究方法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陈文超（2012）："嵌于家庭本位中的经济行动及其实践理性"，《创新》，第 5 期，第 101–104 页。

邓津、林肯主编（2007）：《定性研究：方法论基础》，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贺绍奇（2007）：《〈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用问答》，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魏国英（1995）："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知识女性的角色选择"，《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 期，第 79–82 页。

吴德辉（1984）："列宁的'两种文化'的理论与民族文学"，《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 期，第 14–18 页。

易菲（2007）："美国职场性骚扰法律制度及对中国之启示"，《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法学版）》，第 7 期，第 49–53 页。



## 文末“评”

1. 主旨

作者很准确地从市场经济、社会变迁、教育体制改变等各方面，凸显“80后的世代”女性所面对的挑战、抉择、困境。经由对四个案例的分析，虽然当事人的经历和选择迥异，但是社会性别的脉络贯穿了她们的经历和抉择。这样透过个人经历解读宏观变迁的尝试，不仅有洞悉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潜能和空间，也可以把学术的探索，应用到观察市井小民生活、解析个人经历等方面的议题，在此基础上，更可以探索如何从微观入手，进行一步一脚印的改革（transformative actions）。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的研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起步。

因为这是一个质性研究方法课的习作，我从研究方法和议题解析的两个角度，提出以下意见，作为作者更上层楼的参考。

2. 研究方法的相关议题

作者表示，是以访谈和田野观察等为主要的搜集资料方式，所根据的文字资料包括：四份访谈翻录、为期一年和三个月的观察资料和田野笔记、以及5份当事人的日记。就资料的涵盖面而言，算是相当深入而全面。然而，全文资料的引用上，作者并没有标明资料来源，根据行文，作者好像只是引用了四个当事人的访谈翻录，田野笔记和日记的资料并没有囊括在内。因为作者没有说明仅仅依赖访谈资料的原因，读者无法了解这个决定背后的原因。而且，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不管是结构或半结构访谈（structured or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研究者的思路很大程度限制了当事人叙事的方向和内容，作者既然做了田野观察，又有五份当事人的日记，如果能把田野观察细致的洞见包括进来，应该可以有更丰富和深刻的呈现个人与周遭人、事、物的互动，而个人的日记也应该可以更精准地捕捉或铺陈当事人的内心世界。这些面向都是单单采用质性研究深入访谈为研究方法所不容易涵盖的。

这一点可以从第二个案例里，作者引用了当事人先生关于当事人工作与否的意见得到印证。从已有的研究我们知道，已婚妇女是不是留在职场、怎么安排家务劳动、照顾孩子、嘘寒问暖父母或公婆，跟先生的态度以及是不是实际分担家务劳动很有关系。例如，Stone 和 Lovejoy 的研究发现，虽然先生会轻描淡写的说“完全由她决定”，“我不会要求她做什么”，但是他们实际上的“不粘锅”往往是美国妇女“不得不”“选择”离开职场的社会、文化氛围（Stone & Lovejoy, 2004），蓝佩嘉的研究也显示，这也是台湾中产阶级妇女雇用外佣分担家务的主要原因之一（Lan，2006）。

3.“80 后的世代”的特殊性

本文企图凸显“80 后的世代”的特殊经历和挑战，作者也做了文本分析。在本文的基础上，很需要进一步的深究造成这些挑战的机制。例如，案例二，文中指出，“但由于家庭对独生子女的期望值增高，而教养的负担母亲是不可推卸的”“在有了孩子之后，S 的生活重心不得不发生转移，生理差异造成女性人力资本在职场的贬值。”案例三，作者指出“在 S 的心底仍旧渴望一份属于自己的感情，但随着年纪的不断增高和职业发展的顺利局面，在择偶问题上必定困难重重。”是谁、在什么客观或主观的氛围下认定“教养的负担母亲是不可推卸的”；是谁、经由什么机制不断地复制“生理差异造成女性人力资本在职场的贬值”这样的概念和标准；是谁、经由什么机制让受访者“在择偶问题上必定困难重重？”

另外，从比较的视野看来，所谓“80 后的世代”所面对的特殊挑战，似乎也有它非特殊性的一面，中国妇女自从 1949 年以来一直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政治、经济氛围下处理类似的挑战。西方妇女，虽然没有儒家文化的传统，也一直要处理类似的问题。虽然跨时代、跨空间的比较不是本文的主旨，但是如果要根据本文的基础，更上层楼，细密的处理以上所提出的论断，会是一个“登高必自卑”的学术起点。谨以此勉励作者，苟日新、日日新。



## 学生回应

首先非常感谢熊秉纯老师中肯的点评。我最初了解熊老师是始于她《客厅即工厂》这本书的阅读，这本著作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不仅仅是书中的观点，还有熊老师为做好质性研究而付出的艰辛努力。作为一个质性研究者，进入现场，面对纷繁复杂的现象和形色各异的研究对象，为了避免“局外人”的缺陷，熊老师每天跟随这些女工一起工作、作息，参加她们几乎所有的日常活动，而只有在深夜，其他人入睡休息后，她才得以有时间安静整理一整天丰富的田野笔记，琢磨其中的关联，不断从文本中挖掘一个又一个意义，才成就其这本著作。质性研究并不是件“好玩儿”的事情，可能最初由“好玩儿”开始的，但如果没有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决心以及理性的思考，是无法承担后面复杂的研究工作。第一次真正与熊老师接触是一个很偶然的

机缘，去年年初，熊老师回国搜集资料，完善有关她对“文革”期间一些问题的研究，在这期间，我陪同熊老师在北师大搜集资料，她的认真、专注和投入一次次感动和感染了我，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或者，我此时还并不能算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学者，从熊老师身上，我看到她为人、为学的品质。其次，此次论文点评，我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来敲熊老师的大门，远在加拿大并且工作异常繁忙的她，在收到我邮件后的第二天就给予了肯定的回复。带着忐忑和期盼，打开熊老师的回复邮件，看到她中肯、认真的点评，让我再一次为之感动和感激！

现就熊老师点评中的一些问题，予以回应。

（1）有关主旨。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选题并不断聚焦成一个研究问题，是因为在此前，我总是不断思考一些我无法绕过的问题，诸如：我的研究兴趣究竟在哪儿？哪些是我真正关心的东西？哪些议题能让我兴奋起来，一想起便激动不已……我个人认为只有做一个自己真正关心、在意的问题才能持续进行后续的研究。另外，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应该包含两重含义，一是研究者对该问题确实不了解，并希望通过研究对其进行认真的探讨；二是该问题涉及的地点、时间、人物和事件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对被研究者来说有实际意义，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作为一名年轻80后女性，我和我的很多研究对象一样，有着现实日常生活的丰富体验，但与此同时，也充满了困惑，并遭遇了种种困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的研究选题是一个有意义的真问题。

（2）有关对80后的思考。在我研究之始，我是有“前设”的，即80后，特别是80后女性比以往代际经历了更多社会发展的变化和自身价值观念的转型与冲撞。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80后女性，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可以说是一个“局内人”，就此反思我整个的研究，我发现了“局内人”的优缺点。其优点在于，作为一个与研究对象有着共同文化的映照，我是可以比较透彻地了解研究对象的处境、想法、行为意义以及情感的表达方式，甚至能够在她们不言说的情况下“心领神会”，与其产生共鸣。但是，我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由于来自同一文化，也给研究布下了很多陷阱，而且失去了研究所需要的距离感，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正如熊老师一针见血指出的，我在讲述这些80后女性的特殊性时，忽略了其非特殊性的一面。中国妇女自古在君权、父权、夫权（男权）的压迫下，一直似乎都要处理我们这个世代所面临的问题，甚至比当代社会更严重，但作为一个缜密的研究我的这种“局内人”身份让我夸大了一些东西而回避了另一些东西，进入研究后，未能理性地悬置起自己的“前设”，反而让一时的情感使得研究丧失了不少“真相”。

（3）有关访谈资料收集和整理。本研究在方法和方法论层面有缺陷，这

也是在我把论文发给熊老师后一次又一次阅读原始资料，再次整理和分析后，发现之前的研究过程是非常粗糙的。本研究主要采取的是访谈法，4 位被访者每位都有录音，有的是一次完成，有的还做了二次访谈；其次是实物分析，其中一位被访者提供了 5 篇日记材料。我对这些大量的原始资料的整理和分析不够系统化、条理化。陈向明老师也曾说过，质的研究者虽然不一定要抽象出关于事物本质的知识，但是对资料的整理和分析是研究者的一种加工，是通过一定的分析手段将资料打散、重组、浓缩的过程。面对丰富的访谈资料，首先在分析前我没有进行初步整理，而是很“顺手”地截取其中我需要的部分，在截取过程中，我又没有暂时悬置我的前设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做到完全让资料自己说话，比如说在案例一和二中，被访者其实都提到自己并不是孤立地“作战”，特别是在有了小孩之后，家人（包括公婆）给予了很多的帮助，的确提供给自己不少自主支配的时间和空间，只是自己有时是因为担心和想念孩子，母亲的本性反而让她们放不下。这是一条非常珍贵的信息（现在看来）但当初我在分析资料时，却忽略了它，只是简单地搜寻那些我认为可贵的信息。对于母亲来说，与孩子情感的连接是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它有时甚至与家族传统、乡土社会、男权压迫无关，然而我在研究中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研究者个人的思维方式很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在建构意义的同时也摧毁意义。从这点上看，在我以后的研究过程中，我应该更多地让材料说话，尽量开放自己的同时也能够从不同层面来解读资料，让更多的资料进入我的视野。

（4）实物资料的分析。实物属于一种物品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对其的分析也遵循一条不同的模式，即联想模式，其意义主要来自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践理性”。很偶然地，我的一个被访者在访谈结束后，她仍旧觉得没有完全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所以愿意提供 5 份日志供我分析。而且这 5 篇日志是个案自行选择的，从读书直到为人母亲，不同阶段的 5 篇非常真实而感人的实物材料。在我的研究中，我曾犹豫是否要呈现，或者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呈现，但最终还是放弃，是我当时觉得从访谈中我已经非常“全面”地了解了她的想法，甚至是她先生的想法，所以觉得日记便可有可无。但在后续的思考中，也是熊老师所指出的：“如果能把田野观察细致的洞见包括进来，应该可以有更丰富和深刻地呈现个人与周遭人、事、物的互动，而个人的日记也应该可以更精准地捕捉或铺陈当事人的内心世界。”我才明白实物资料不是负累，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比访谈中受访者使用的语言更加具有说服力，可以表达一些语言无法表达的思想和情感，而且实物分析还可以用来与访谈资料进行相互补充和相关检验。

以上是我对熊老师点评的一些肤浅回应。自己对质性研究这一方法的掌

握还有所欠缺，因此，未能很好地回答熊老师的提问和点评，非常惭愧；但同时，这一次与专家的对话也开启了我继续学好方法的决心，并且动力十足。再次感谢熊老师在百忙中认真恳切地点评。

---

**点评专家熊秉纯简介**

熊秉纯：现于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研究所任教。研究领域包括：社会性别、家庭变迁、社会性别理论、质性研究方法的方法论与认识论。中文相关著作包括：《质性研究方法刍议》（社会学研究，2001，5:17–33）；《客厅即工厂》（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深度访谈中“反思”的教与学》（质性研究：反思与评论，2010, 2:1–22）。

# 关于学部制改革中组织认同的质性研究

文／吴娱[1]
评／余凯

[摘要] 本文以学部制改革为背景，通过质性研究方式探讨了组织变革中的组织认同问题。研究发现，组织变革中，不同“圈子”的文化在一个整合的教育组织内相互交织在一起，有冲突也有融合，并与组织认同的认知因素、情感因素、价值因素等密切关联。

[关键词] 组织认同　组织变革　学部制

[1] 吴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教育信息化。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大学将跨学科建设和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大学成立学部就是打破学科壁垒、整合学科资源、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重大举措，通过构建一体化优质教育创新平台，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打造世界一流学科。研究者本人在学校职能部门工作期间，自始至终经历了教育学部的筹建过程，参与了方案论证、资料调研、实地访谈等工作，学部成立后一直从事学科建设方面的工作，对组织制度创新、组织文化建设、组织认同等方面的现象比较感兴趣。例如，在学部筹备初期，检索国内进行学部制改革的学校，只看到浙江大学等个别高校正在进行相关探索；教育学部成立之时，主要媒体以“大学管理体制改革走向深水区”等为题纷纷进行报道，指出教育学部是我国高等教育学部制改革的“先行者”；近两年西南大学、东北师大等部分高校也陆续在原有学院基础上建立了实体性或虚体性的学部。那么，学部制在协调优质资源、积聚优秀人才等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组织变革对学科融合、组织文化建设、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调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就学部教职工来说，是否已经形成了很好的组织认同？教师组织认同的核心因素有哪些？如何进一步强化教师的组织认同？

以上问题涉及很多领域，从研究的可行性考虑，本研究计划以学部制探索为例，对组织变革与组织认同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由于在学部筹备期间，曾对学校职能部门、各学术机构管理者和教师做过访谈调研，如今学部成立已近四年，再次选择学部教师、管理者等作为调研对象，旨在对学部建设阶段性成效的一些方面进行思考。以上调研对象是相关建设过程的直接参与者或间接参与者，代表了不同的观察视角，在多个层面具有借鉴意义。

##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教育学部为例，通过质性研究方法，获取关于组织认同的一手资料，为进一步深入开展问题研究准备现实依据。

**文中“点”**

1. 学部成立的政策宣示与实际运行中组织认同之间存在断裂，此处应具体罗列问题的表征。如果将这几个问题作为研究问题，需要进一步进行操作化定义。从操作性定义中应能归纳出不同的观察视角并展开论述。

借鉴相关理论，结合教育组织特性，尝试探讨组织认同的维度、特征和影响因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 三、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我国大学正由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的阶段转变，在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但对于推行时间只有几年的学部制改革，尚未开展深入的研究。因此，对其进行理论上的探索是很有必要的。

学部制改革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与组织认同密切相关，以往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较为少见。教育学部是推动学部制改革和跨学科组织建设的试验区，研究者作为当事人，对学部制改革中的组织认同问题进行分析和探索，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

### （二）实践意义

**1. 更好地解释教职工心理及其行为**

组织认同比物质激励有着更持久、更稳定的激励效果，它会使成员自发做出符合组织整体利益的决策。通过探究组织认同各个维度的具体内容以及相关的组织公民行为，使跨学科组织管理者对教职工的心理形成清晰的认识和判断，理解组织认同程度不同的教职工在行为方面会有哪些差异，进而更有效地与教职工进行沟通，更多地关注和培养成员的组织认同，使其行为对组织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正效应。

**2. 为管理制度优化提供参考**

宏观教育政策要通过微观高校实践来实现，论文聚焦在组织变革中的组织认同研究，通过深刻描述个案，对变革中的组织认同情况和原因进行分析调查，探索实现组织认同的有效路径。组织管理制度是随着组织改革内外环境的变迁而不断优化的动态过程，总结已有经验，将为后续管理制度的优化提供一定依据。

**3. 有利于学部学科建设实践与发展**

实践层面，教育学部也需要对学科架构、队伍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成效进行研究与思考。通过学部制改革

背景下的组织认同研究视角，探讨学科组织方式如何适应学科创新发展的需要，如何依托专业化的队伍实施更加科学高效的内涵管理，以及师生和社会广泛参与的开放型管理，带来跨学科组织管理模式的新气象，促进学科组织间的协调运作，提高其工作效能，进一步推动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

## 四、文献回顾

### （一）核心概念

#### 1. 学部与学部制

德国哲学家康德最早提及“学部”这一概念，是指致力于教授某个特定主题的学术群体。牛津大学的“学部”是指一个跨学院的机构，主要承担管理科学研究和部分教学事务，同时也协助主管校长做出学校日常财务和计划的决定。日本京都大学的“学部”，则定义为大学教学与学术的“协调性”单位，主要负责本科生教学及管理，类似于当前中国部分大学内部设置的本科生院。不同国家、不同大学对“学部”有不同的表述与理解，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根据国内外大学学部的设置情况，有研究者（孙伟琴，2010：17-18）尝试将学部管理结构分为“学部—讲座”管理结构，“学部—学系”管理结构，“学部—学院—学系”管理结构三大类。以上三种管理结构中，后两类管理结构形成了两种对“学部”概念的不同理解：①学部等同于学院，是指开展同一门类学科教学、研究等活动的办学机构；②学部是学院以外开展教学和研究管理工作的实体或虚体机构。这两种情况在当前我国部分大学所开展的学部制改革中都是存在的。同学院制一样，学部制也是高校内部管理模式之一，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学部设置，学部的职能不尽一致。一方面，学部帮助学校管理层级承担部分学术事务的规划和审核等；另一方面，学部能够协调学部所辖各学院、学科间的交叉与合作，在更高更广的层面上构建交叉学科研究平台和资源共享平台等。因此，学部制可以认为是整合优质资源、促进教授治学、推动交叉学科发展的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新模式。

2. 学部职能的两个方面需要展开作为学部制实施的政策宣示，尤其是作为国内第一个教育学科的学部制实验，需要重点论述其与其他大学学部制的不同，以及组织承诺何以在此情境下成为突出问题。

2. 组织认同

过去 20 多年来，组织认同一直是组织行为学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有研究者（王华，2008：8）指出，Ashforth & Mael 基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提出的社会认定理论，提出了组织认同的概念，认为组织认同是社会认同的一种，是个人对从属于某个组织或与组织同一性的认知，这一定义把认同看作是一种认知层面的意识，而非情感和行为，为回答“我是谁”提供了一种答案。Cheney 认为，对组织等群体的认同，是个体主动将自己与社会情境中的元素连结的过程，包含了情感依附、对组织的忠诚和组织成员与组织的相似性。根据社会认同理论，认同源于两种需求，一种是自我归类（self-categorization）的需要，一种是自我增强（self-enhancement）的需要，这也就要求组织成员身份能够给个人带来某种程度的益处。目前，组织认同的定义有十几种，Riketta 于 2005 年总结了组织认同的三类定义：从认知角度出发，Ashforth 将组织认同定义为个体对于组织成员感、归属感的认知过程，它体现了个人与组织在价值观上的一致性；从情感角度出发，O'Reilly 将组织认同定义为成员出于对组织吸引和预期，进而保持在情感上的某种自我定义；从社会学角度出发，Tajfel 把组织认同定义为个体由于具有组织成员身份从而产生的一种自我定义，由于这种成员身份产生了价值观上的一致和情感上的归属。

与组织认同相关的概念还有组织认定、组织承诺、组织文化、组织沟通等。组织认同的概念清晰反映了两大特性：一是组织认同反映了自我与组织之间的归属关系；二是强调了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与寻求。因此可以将组织认同理解为个体对自己所处的组织赋予意义而解释自我的认知，通过这种认知过程，组织与个体的价值目标产生了一致性，个体在此基础上将对组织的价值认同转化为自己的实践认同，从而对组织绩效产生正向作用。

3. 此处需要围绕本文的研究问题给出作者对于组织认同的操作性定义，缺乏操作性定义将为质性资料的收集和分析带来困难。

## （二）相关基础理论与主题研究

1. 组织认同的基础理论

个体的认知受到诸多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

认知主体、认知对象和认知进行的情境三个方面。组织认同的基础理论,归纳以往研究可大致分为3类观点:差异论、信息论和资源论。差异论将研究重点放在主体因素对认同的影响上，注重个体在认同过程中的差异比较，通过分析差异冲突，参照对比来揭示认同过程。信息论更多关注信息传播在认同进行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通过研究信息发出、信息传播渠道和信息接受过程来分析认同过程。资源论比较在意资源在组织认同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试图分析组织形象、组织独特资源对组织认同起到的作用。这 3 类观点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组织认同过程，“差异”是组织认同的起点，“资源”是组织认同的基础，“信息”是组织认同的媒质。个体从“我”到“我们”的过程，可以说是“从异到同”的动态调整，也可以说是个体不断认识组织资源的体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源”和“差异”通过“信息”被成员认知，直至产生认同（魏钧，2007）。可见，三种理论观点角度不同，却又相辅相成。

**2. 组织认同的维度和前因结果**

通过回顾以往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组织认同具有多个维度。虽然不同的研究在表述上存在一定差异，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基本上都可以归入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这 4 个维度。认知维度是组织认同的基本的、同时也是必要的维度，这一点已经得到学者们的普遍认可；情感维度和评价维度的存在也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认可和支持，但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混淆，界定还不够明确；行为维度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其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学者们的认可，即使不是组织认同的维度，也是与组织认同密切相关的前因和结果变量。国内有学者对中国背景下的组织认同结构进行了研究，得出归属感、身份感知、成员相似性、个体与组织的一致性、组织吸引力、组织参与、感恩与效忠、人际关系、契约关系 9 个维度，其中前 6 个维度基本能够涵盖现在西方研究中已经提出的组织认同的维度，并且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有存在的价值和特殊意义，后 3 个维度是中国背景下组织认同所特有的维度，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意义。还有学者基于传统文化研究了成员在组织认同过程中的信息感知途径问题，首先利用扎根理

4.在选择和综述文献时，研究问题应是最重要的标准。教育组织尤其是大学的组织认同具有和商业组织和中小学完全不同的特点，作者需要据此进行选择并评述相关研究。文献综述时重要的是按照操作性定义对相关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以及结论进行评述，以帮助读者对于研究问题有关的知识领域的总体状况有一个清晰认识。

论的质化研究方法，萃取组织认同信息感知途径量表，然后收集有效问卷以检验假设，结果表明，组织认同的信息感知由率先垂范、体恤关爱、外部认可、明理述规、行为一致五个维度构成,通过对组织认同的多重回归分析发现，它们对组织认同均具有显著影响 。

组织认同的前因可归纳为个体特性、组织特性和环境特性三类，组织特性又集中表现为组织形象、组织氛围、工作特性和文化特性。组织认同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对合作意图、满意度、基于组织的自尊、组织公民行为和离职意图的影响。

**3. 学校组织变革中的组织认同研究**

唐宁玉、王琦琪（2010）对高校合并后教职成员的组织认同进行了研究。研究从合并效用和合并沟通角度出发，通过对合并方教职成员对合并收益和社会账户的知觉满意度的测量，探索合并后组织认同的影响因素。通过对百余名教职成员的调研发现，社会账户中的原因解释账户以及对合并收益中组织声誉的满意度会显著影响合并后的组织认同。

操太圣、卢乃桂（2005）的研究表明，学校组织变革的最终目标在于学校组织文化的重建，但由于文化形成的长期与稳固的特性，使得学校组织的深度变革异常困难，其具体表现为教师出于对自身价值观念的维护而怀疑、否定，甚至抵制变革。研究发现，激发教师对学校发展愿景和变革目标的认同，将有助于在学校里建立起改革取向的强势文化，动员教师投身改革的信心和动机，进而促进学校组织变革的顺利进行。

吴国林（2011：36）对并校背景下的组织认同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强调了组织沟通的重要性，并对相关研究进行了以下梳理：Smidts 等在实证研究中将沟通氛围作为沟通内容影响组织认同的中介变量，结果发现沟通氛围与组织认同正相关；Mccauley 和 Kuhnert 等学者的研究表明，管理开放度和参与组织决策的程度会增加成员对管理层的信任；Rosenbeg 和 Rosenstein 的结论是，沟通能增加组织效益和效率，良好的沟通氛围能鼓励成员主动参与组织决策，从而培育“主人”意识；Kitchen 和 Daly 则认为支持

性的沟通对组织的生存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Welsch 和 LaVan 发现参与决策、动机和目标设置均与组织承诺有积极关系；Guzley 也发现组织认同与沟通氛围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毛亚庆、吴合文（2005）对合并高校整合管理的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在高校合并的操作过程中，文化由于是大学内在的品质往往容易被忽视，但在现实中它是影响合并是否有效的很重要因素，必须将文化要素纳入高校合并的整合管理视野中。通过对大学文化内在差异性的分析，剖析合并后大学原有成员之间存在的文化冲突，进而从功能主义、冲突论和生态学等不同视角探究隐藏于文化冲突背后的深层原因，有助于我们解决合并大学的文化冲突并促成文化的融合。

## 五、研究方法

### （一）选择与联络研究对象

本研究主要以学部教职工作为研究对象，选择标准和策略方面，考虑年龄、性别、学科、职称、职务等影响因素，采用目的抽样、方便抽样等策略。我首先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与研究对象进行初步联络，说明计划开展的研究及其意义，并征求对本研究的建议，如果有必要，再当面约谈，就相关问题进行更有效的沟通。原先还设想过在选择研究对象和联络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对方不太理解，研究对象工作繁忙无法安排，或者对问题回答有顾虑等情况，这时就需要请其另外推荐合适的人选，事实是七位老师还是非常配合的，可能原因之一也是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已构建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在这里向各位老师表示真挚的感谢。

5. 此处需要根据目的抽样和方便抽样的原则对于最后选定的七位教师构成的样本进行描述和评价。

### （二）研究者个人身份及其与研究者的关系

由于研究者一直在相关部门工作，与研究对象比较熟悉，并且认真细致、谦虚好学，也许是开展研究的一个比较便利的条件，可以利用个人所积累的理论材料、实际经验和个人背景，去注意、了解相关现象，再经过研究的程序，使之成为理论的一部分。研究者在了解被研究者的需求、经验后拟定研究策略，并在研究过程中不断修正。另外，

研究者在与被研究者的互动中还可以启发被研究者的真实意识，达到研究的目的。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是，也许在实际调研过程中不能达到理想的抽样状态，并且由于研究者个人身份的限制，研究结果可能不够全面；还需要夯实理论基础，拓宽研究视野，合理运用研究方法。

### （三）进入研究现场

本次研究采用的研究方式主要是访谈，一般选取教师办公室这样比较正式的场合，以不影响受访者正常工作为基本前提。由于双方比较熟悉，前期对研究背景、内容、目的也有一定的了解，因此以开诚布公的方式进入访谈现场，遵循礼貌、关系、交流、合作的原则，在坦诚的交流中，达成双方的信任和彼此的理解。受访者大多认为这个研究作为对学部建设成效的一个方面的思考，很有意义，并且研究者也根据受访者的建议对研究设计适当进行修改。当然，在进入现场时使用的策略，遇到的问题以及克服阻力的方式这本身就是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四）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

就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来说，研究者既是“局内人”也是“局外人”。研究者作为学部的行政人员，如果去访谈行政人员，则可以称作“局内人”，但另一方面，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真正的“局内人”是不存在的，因为当一个人作为一名研究者对自己的文化进行研究时，就已经与自己的文化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如果是访谈教师，则是“局外人”。因此，研究者兼具这两种身份的优势与劣势，例如：距离感虽然使局外人保持相对“客观”和轻松的心态，但也会使得对于深层意义建构的理解存在障碍；局内人也会因对于情况比较熟悉，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可能在收集资料和探询意义方面产生困难。研究者的“内”“外”角色与公开与否、亲疏关系、参与程度还会相互交叉形成许多复杂的关系。当然，这两种角色也为研究者创造了一定的空间，可以将自己的身份特征作为与被研究者互动时的一个宝贵资源，更重要的是积极调动参与意识、全身心投入，双方之间进行积极的、互为主体的对话。质的研究是通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两个主体的互动共同建构“现实”

的一个过程。需要采取有利于双方“视域”融合的方式，建立起理解的桥梁。研究者正是在这些丰富的互动关系中与被研究者一起协商和建构着一个构成性的、不断往前发展着的“现实”。

### （五）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式

首先是阅读相关文献和学部筹建期间的文件，使得自己进入研究思考情境，然后主要是通过访谈法获得信息资料。根据大致的访谈框架，采用了开放式的访谈问题，这些问题涵盖了组织认同的多个维度（但访谈过程中认识到问题不够具体），访谈提纲部分地帮助我获得了所需要的信息；由于是开放式的问题，访谈过程没有完全按照事先设计的思路进行，访谈者根据受访者的反馈，及时调整前后顺序和问题之间的过渡。在访谈中，我通过认真倾听、适时追问、点头回应等方式与受访者互动，应该说是共同建构了访谈结构，基本上是顺着谈话的脉络开展访谈，只有在偶尔冷场的时候，根据事先准备好的访谈提纲提出问题，不过这也造成了访谈结束后才发现有些问题没有被问到。受访者的非言语行为也会成为很好的佐证，例如受访者在谈到组织中的一些有凝聚力的事件时，会有微笑的神情，这也反映了对相关组织文化的认同，并且在对自己认为重要的观点进行详细论述的时候，会摊开双手，这也是通过肢体语言的辅助对话语进行展开的方式。

6. 质性研究是一个宽广的范畴，具体研究方法（现象学研究、人种志（民族志）研究、扎根理论研究等）是其下位的研究路径，此处需要作者进一步阐明。

此外，我也在一次会议中进行了参与型观察，会议情境是成员交流的重要领域，是成员尽快适应组织环境的重要资源，集体会议的交流话语结构主要呈现和塑造着成员的角色、关系和认同，相互间的对话传递和塑造着成员对于组织的态度。当然，在会议情境观察中，感觉观察风格和个人前设对观察结果也是有影响的，这需要在事后进行反思。在观察中也遇到的一些问题，例如，观察时会根据研究目的区分现象的主次，不知这样是否会遗漏一些后续整理中才发现是重要的细节？是否需要事无巨细地记录？还有理论反思的适切性和系统性问题。今后在计划观察前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在观察的时候，做到不断地转换焦距，从关注个人到关注整个集体。

在分析资料的过程中，主要采用了画图表、备忘录、类属分析和三级编码等方法，本来尝试结合使用情境分析法，但由于本次研究的时间和经验所限，今后将在不断收集丰富资料的基础上逐渐完善。关于组织文化和组织认同的信息资料需要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收集，质的研究的资料来源可以包括文件、档案记录、访谈、直接观察、参与观察、实体制品（例如反映组织文化的物品）等，不同来源的证据从不同的角度、层次涉及问题的本质。目前的判断是从几位受访者那里获得的资料是基本准确的，但有些现象及其原因无法用单一的方式了解，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全面验证，以真正保证研究的信度与效度。

## 六、研究分析及结论

### （一）组织认同的前因

**1. 组织层面**

7. 以下研究分析的维度应产生于研究问题和文献综述，需要说明这些维度的合理性。

1）组织变革背景和组织的价值内涵

在大部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学校将教育学部作为大部制改革的试验区，发展的共同愿景是教育学科在我校率先实现建成世界一流学科的目标。这在近三年的教代会报告主题中也得到一定的反映，从“创新机制、强化特色”到“拒绝平庸、追求卓越”，始终围绕“建设世界一流的教育学科”这一目标。在组织变革中塑造共同的价值观，是形成组织认同的前提。

8. 质性研究的优点在于能够细致展开研究问题中存在的断裂，即政策宣示与教师实际感知之间的差异，这应该成为所有分析的起点。

2）组织发展阶段

在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有侧重地采取相关措施，增强认同感。

2010 年的第一届教代会报告写到：“学部作为新成立的组织，师生认同感非常重要，学部以活动为载体，从多个方面着手加强文化建设，增强师生对学部的认同感。”具体体现在：设计学部标识系统，引导师生加强对学部定位、现状和未来发展的认识和关注；召开教师大会、毕业生典礼等，让师生在仪式化的活动中感受学部文化氛围和大家庭的温暖；组织参加文体活动，创办宣传刊物，营造

学部文化，扩大影响力。2011 年的教代会报告中提到："学部作为学校内部治理模式改革实验区的地位进一步明确；部务会制度完全走上规范化的轨道，院系所长例会制度初步建立，学部领导联系各院所的制度也开始实施；民主协商和专家咨询的作用开始加强；学部各级领导的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有了显著的增强，广大教师的学部认同有了积极的变化"。2012 年的教代会报告指出，用现代大学精神引领学部文化建设工作，努力将学部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学术社区。进一步发扬民主；进一步宣传"崇教爱生，求真育人"的部训精神，营造历史厚重、时代感强、教育特色鲜明的学部文化；加强学科传统教育。制作宣传片，编写年鉴，增强广大师生的认同感、自豪感和荣誉感。完成英东教育楼的文化整体设计和施工，进一步提升学部的文化品味，通过"教工之家"为广大老师提供温馨的交流场所。

**2. 外部环境层面**

在学部制改革的理想与现实中，创建落实相应的管理体制机制，理清校部关系、部处关系、部院（所）关系、落实自主权问题等，也是影响组织认同的外部因素。在建设积极向上、自由平等、民主公正、和谐共进、追求卓越的学部文化的同时，扩大学部在国内外教育界和教育学界的影响，进一步提升学部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也会增强教职工的认同感、责任感与使命感。

在访谈中，学部教师也表达了相关看法："大部制也许是种理想的模式，但是在组织变革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第一次学部教师全体大会报告中有个折线图，在成立后的磨合阶段组织认同是下降的，随着新的秩序的建立，组织认同度逐渐上升，觉得分析很有道理，事实也是如此"；"学部成立以来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提高认同"；"成立后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大多教师对学部在组织认同方面所做的努力表示了认可。

### （二）组织认同的影响因素

**1. 理性的认知**

认知与认可是组织认同的生存性维度，包括个体与组

9. “理性认知”下的四个维度需要有进一步的类属概念和编码梳理，仅仅使用访谈文稿的原句并不能充分实现这一功能。以下“情感的归属”等维度需要进行同样的处理。

织的一致性、组织吸引力、组织声誉与自豪感、成员相似性与身份感知等。

1）个体与组织的一致性

上文提到了组织的共同愿景，成员与组织要“有共同的愿景和目标”。个体与组织的一致性就是个体的目标、价值观与组织相一致的程度。“组织的价值观信息被成员感知接受，文化建设是重要途径”；“价值观的传递很重要”不仅有各种场合的宣传，还有“领导的事业追求和工作精神，感动了成员，获得认同。”不同人对组织价值的感受也不一样，“还会受到自我和自我所处的场域因素影响，有认知才有认同，但并非认知越多、了解越深对组织的认同越强，如果传输出积极向上的信息，认同越强，反之则降低。”

而且，“教育组织和其他组织不完全一样，有特殊性的差异和表现。”核心在于，“组织要考虑大多数个体发展路径，促成个体目标实现，学部要成长为一流学科，教师也成为一流专家。”当个人价值和组织的价值达成一致，组织推行的文化会逐渐被接受，“加班也都齐心协力”。

2）组织吸引力

社会交换论认为，个体对组织的认同是建立在组织能为个体带来多大利益上。认同是一种基本理性的个体行为，也就是个体需要通过组织进行交换，获得社会资源，实现个体生存与发展。组织吸引力不仅包括个体适合、良好待遇、工作环境，还包括组织便利，即组织身份所带来的特权、资源、信息等，权衡利弊得失，以实现价值和利益最大化。

在访谈中，也有教师表示“目前对收入基本认同，但是自己对资源的把握度降低了，利弊都有吧”；“大组织中各种活动资源都要申请，等待程序审批”；“薪酬问题很重要，尤其奖励性、补助性的津贴等，在当今社会背景下，需要有尊严的生存”；“奖励的事情，好像时有时无”；“其他单位有奖励制度，例如《新华文摘》转载等”。从“理性人”的视角来看，成员对组织吸引力的认知有其权益取向，如资源主动权、相对剥夺感（特别是经济福利上的相对剥夺感）对组织认同和工作积极性有显著影响。

3）组织声誉与自豪感

组织声誉良好时，成员因归属于组织而深感骄傲，会

感觉自己拥有社会认可以及由组织身份所带来的自尊，进而提高了组织认同。比如有教师提出“大家对北师大很认同，那么怎样才能对学部更认同？”从组织声誉的角度来看，需要依托整体实力的提升来扩大影响力，当每一位教职工都能感受到自己与组织之间是荣辱与共的紧密结合体时，可以使教职工更加积极主动去维护组织荣誉。组织间的差异性和组织间的竞争也会对组织认同产生影响，前段时间北师大教育学科在国家第三轮学科评估中名列第一，这一结果及时以群发短信的方式告知全体成员，也是增强组织荣誉感的举措之一。

另外，如果和其他组织相比，现在的组织在某些方面对于个体来说具有相对优越感，也就是能满足个体的需要，例如“期刊发文章对评职称、课题结项谁都用的上，对于学部教师还是有好处的”；“对外号称可以带来很多实惠”这也会使个体愿意以此组织的身份来对自己进行定义。

4）成员相似性与身份感知

认知过程的去人格化是个体把群体的某些特征归于自己身上，把个体的“我”变成集体的“我们”的过程。根据情境的不同，个体会对单一个体身份或某一组织成员的身份进行选择。有教师在访谈中谈到“以前是比较紧密的组织，人际沟通顺畅”，这反映了规模小的组织交往频率高，成员相似性高，而“学部成立后陌生了”，是由于成员来源多样化，一开始沟通程度和相似性有所降低，并带来了文化的冲突与重构。也有的学术机构重组后“成员主体具有延续性”，这样依据组织成员身份对自我进行定义的程度就比较高。

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当意识到其他组织的存在后，个体会发现自己组织内部成员间的相似性更加明显，尤其是中国背景下，组织成员的身份感知往往是在同外部群体的接触时凸显出来的。依据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组织认同与外部组织和群际交互的情境密切相关。如果“工作类型一致，大家天天都坐班在一起，组织好建立”，而“教师不坐班，教学研究方向不一样，协调就比较难”。松散结合的组织与紧密结构的组织具有不同类型的组织氛围与情境因素，其成员对相似性的认知也有所不同。

**2. 情感的归属**

组织认同的归属性维度，包括归属感、主人翁精神、人际关系、组织参与、知觉到的重视与尊重、组织公平等。杜克斯认为这种情感是个体对群体正面的态度和评价，包括了群体凝聚力、群体自尊等内容。有研究表明，“自我”并非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与他人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在社会单元中，每个人都有适当的位置，个人只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有研究者（周国华，2012：284）指出，中国式组织认同很看重关系取向和归属感的成分，有时当理性遇见情感时，也会退到一边。

1）归属感

组织成员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形成情感联系，产生对成员资格的满意度和对群体的归属感。中国背景下，组织成员会依据他与组织间是否存在劳动契约来形成自己的归属感，组织也希望成员能发挥主人翁精神。

同时，大学中教师组织具有松散耦合结构的特殊性，科层制的规章制度以及物质利益都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还有文化因素、情境因素等对归属感和凝聚力起着重要作用。对组织有归属感的教师提到大家“关系非常好，平等、开放、真诚交往，午餐时间也是一道风景线，通常 4 ~ 5 人一起用餐，很少 1 个人，交流过程中有快乐感、幸福感的生成。”体现了组织文化、交流情境的影响，归属感也促进了成员间的情感支持、关怀照顾和相互启发。

在组织的仪式化、制度化的过程中，也会促进情感归属。“通过感受到有情义的工作，例如大合唱和运动会，在一起取得成绩，尤其有认同。”还有教师认为“空间的距离很重要”；“行政人员的组织认同也许比较强吧，一天八小时天天在一起，联系比较多，更能感觉到有形组织的存在，而教师联系就松散些。” 但不能仅依据这种“情境下的自我”下定论，还需要探讨，受学科群体文化和个人发展空间等复杂因素的影响，教师的认同度可能比行政人员高。

2）人际关系

同事情谊和团结精神，实质上都反映了一种以人际关系和人际互动为基础的组织氛围，这种氛围强调人际和谐

与统一，使个体根据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来对自己进行定义，从而形成对整个组织的认同。“人际关系如果好，认同度也高，在外界对他的评价和他对每个人的评价方面，如果相互包容，就有好的氛围”；“教师的交流也有非学术性的，话题自由民主，也有争论，但是之后又恢复到很原初的状态，没有顾忌。”人际信任使“身心获得进步和提升”，这是组织认同很重要的方面。

3）组织参与

社会认同理论指出，认同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降低不确定性，个体通过参与组织的活动而获得对周围事物的了解，从而获得对自己身份的感知，降低与他人交往时的不确定性。“比如每年的红色旅游、团拜会，增加了大家了解的机会。”这种共同的经历使得个体之间产生一定的情感联系，通过集体活动交往消除不确定性，进而发展成对整个组织的认同。在中国的组织情境下，组织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而成员个体会主动寻求对组织的依附，成员希望感受到“和组织有一种内在的密切关联，否则可有可无就不好了。”个体由于共享目标和经历而获得的一种共同的背景，通过参与组织活动，以获得的组织对其的接纳，并对组织情境增进熟悉和了解，形成更明确的身份认知。

4）知觉到的重视与尊重

很多研究表明，组织成员受重视和尊重的程度将影响到其组织认同程度和个人地位，知觉到的重视包括物质生活方面、发展机会方面、话语权方面等。

如果“民主氛围强，比如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能够提出意见还能得到反馈，认同会强一些”；“重视我吗，当回事吗？”如果不当回事，会在付出的同时有不对等的感觉。还有群体感到“现在是话语太分散了，都没有见过委员会开过会，至少应该是领导参加，可能遗忘了。”在这里不仅是知觉到的重视，还有权益维护机制以及诉求传递渠道和制度落实的问题，否则分散的个体在话语中处于弱势，逐渐成为“沉默的螺旋”。要让“每个成员感到被重视，意见得到反馈”，关心诉求、认可贡献、为个人发展提供支持等。在组织中提升教师知觉到的尊重，是提高

认同感的重要途径之一。

5）组织公平

组织公平包括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人际公平、信息公平等。对组织公平的感受会影响到认同度和满意度。分配公平让组织成员感到其努力可以得到合理的回报，程序公平可以给成员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人际公平可以使成员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信息公平使成员更容易做出准确的判断与决策。如果组织采取措施让成员感到公平，成员在认知层面和情感层面都会更愿意把组织的价值观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使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保持一致，并在组织公民行为中体现出来。

如果组织中的群体在提高组织声誉方面作出了贡献，但组织在分配方面有所忽视，会觉得“重视不够”，影响到情感归属和认同感；如果“有点大锅饭的感觉，做得好和不好没什么区别”，那么影响到积极性，“慢慢的大家都比较散漫了。”即使一如既往地“都很敬业”，也许是出于职业认知的“良心活”。而且基层成员与中层管理者在组织公平方面的感受也不一样。

还有教师谈到，“一对话就有利于解决问题，例如在教代会上向大家解释来龙去脉,发现其实是想到一块去了。”民主程序有助于提高教师的决策参与程度，促进人际互动和制度落实；如果存在“沟通不畅的情况”，需要通过多渠道的组织沟通消除信息不对称，做到“透明公平，获得更好的认同”。

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也需注意筛选，处理好“收到一些无关信息和防止有用信息被遗漏的问题”，并且感知度还有个体差异，例如“信息能力强的人就不怕信息多”。要采取多样化的交流方式，拓展协同办公系统、BBS 等交流空间，营造民主氛围，传递组织价值，促进团结一致。

**3. 价值的实现**

价值实现是组织认同的成功性维度，是指个体的努力能否得到组织的认可，组织情境是否有利于个人未来的发展，这也反映了个体的信仰、目标、价值观与组织相一致的程度，体现了“人的发展”这一核心因素。

对于学部制改革来讲，逐步取得了资源共享、项目合

作、跨学科知识生产等成效，对于教师来讲，“产生认同的核心因素是职业发展、学术精神和学术发展动力，如果组织在这方面有高影响，则认同高。”大学组织还具有自由民主、学术价值等特殊性，“个人的价值能否实现，在知识分子中的成就能否被认同？是很在乎的。”在访谈中，有教师将价值实现寄托于评价机制的合理化，期待“有人专门管一管”，在“职称评定、申报课题和奖励方面”有更多机会与空间，在建设一流教师队伍的过程中，希望落实“以人为本的激励制度”。

### （三）组织认同的结果

组织认同的结果属于行动维度，与价值维度呼应，体现在组织公民行为、工作满意度、离职倾向、合作意图等方面。如果个体认同自己与组织是“共同命运”，那么就会有“我支持我的组织”的行为，并且会在工作中体验到成就感和幸福感，愿意为组织的事业而奋斗。

组织认同是渐进的、多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一般来说，组织变革初期，组织成员“适应原来的制度环境”，认同都不高，在从低到高的动态过程中，“需要机制和智慧，经验的参考和理论的证明”；如果“新组织运行得很好，在各个方面比原来的单位都有所提升”，在比较优越感等影响因素的作用下，“也许会更认同新组织，假以时日，可能认同度会更高”。组织要用事业凝聚人心，缩短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为不同类型教职工的事业发展提供更为适宜的平台。

### （四）本土概念——“圈子”的文化

在对几位教师的访谈中，我对以下一些表述印象比较深刻，比如“学术机构都各不相同，亚文化、圈子是怎么形成的”；“对学部的认同和学院的认同不一样，有小家和大家、历史渊源问题”；“不同院系所老师的组织认同感也不一样”；“有的团队‘很抱团’，有的团队就批判精神比较强”。

研究对象在叙述中，用“圈子”“亚文化”“小家与大家”“抱团”等词汇生动表达了组织认同的影响因素与表现，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实际上都反映了隐藏在组织架

10.“圈子”文化是本文中发掘出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本土概念，集中反映了研究问题中的断裂，是本文最有价值的部分，应该进一步归纳类属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质性数据。

构中的深层次的文化因素，尤其是“圈子”这个概念，可以很形象地涵盖上述词句以及解释相关现象的意义。借鉴布迪厄教育社会学理论，不同的教育组织具有不同的文化，主要原因是文化资本差异引起的教育场域结构分化；同一组织的成员，由于所拥有的惯习相近，呈现同质化的特点，因此也表现出一种“圈子”文化；不同教育组织的成员，由于所拥有的惯习不一样，呈现出异质化的特点，组织文化也表现出差异。组织变革中，不同“圈子”的文化在一个整合的教育组织内相互交织在一起，有冲突也有融合，并与组织认同的认知因素、情感因素、价值因素等密切关联。

组织文化根植于组织发展历程以及与内外部环境的互动之中，具有特定学科传统的学术组织在履行功能的过程中产生特定的价值观，与组织制度、组织声誉、人际关系、个人权益等因素相互作用，逐渐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圈子”文化，并成为支撑组织运行和指导成员行为的精神力量。

当组织变革发生时，原本缄默的文化因素以多种形式逐步显示其影响，组织成员通常会基于先前的组织文化，对当前“新圈子”的文化形成认知和价值判断，并经历着不同的愿景调节、理念调适、情感调整等过程，来适应“圈内圈外”环境的变化。新成立的组织需要将发展脉络汇集到新的历史起点上，激励共同的使命感，凝聚统一的学术信念，营造积极的组织氛围，建设合理的利益平衡体系，争取落实各项支持措施，将不同学者群体对学科的忠诚和对新组织的忠诚联系起来，以多种形式引导成员的认同，不断构建一个文化有机融合的共同体。

## 七、关于伦理道德、信度效度等方面的反思

本次初步尝试质性研究，使得自己对研究设计、伦理道德、信度效度等问题进行了更具体的反思。

从伦理的角度看，被研究者有权利了解研究的真实目的和实施计划，然后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参加研究。在访谈中也涉及对学术研究道德和严谨性的探讨，例如相关内容是否适合公开？资料是否能合理保存？还需要向被访谈者告知如何使用相关材料等。我通过学习和实践，了

解到在质性研究中，研究伦理包含以下应注意的问题：研究者太深入研究议题、事件，而失去自己的立场；被研究者资料保密问题；读者无法分辨资料和研究者阐述之间的差距等。

质性研究的信度效度问题一直处于不断的探讨之中，为使得研究发现或结论更具正确性与说服力，需要以不同的角度、层次或时间地点，来探究问题本质并寻求答案，需要通过不同的资料来源、不同的调查者、不同的观点与方法进行三角佐证。我想今后可以采用焦点团体访谈的方式，通过受访者相互启发，会产生更多有价值的讨论内容，同时收集分析相关的实物制品、文件档案等，尽可能地使用更多不同种类的证据资料来源，相互佐证以提高研究的品质。

正如陈向明（2000：340）所指出的，“写作是对‘现实’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解说，目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结晶。每一次结晶都只是从一个角度对‘现实’进行昭示，因此也必然是不完全的，不完美的。然而，通过无数次不同角度的结晶，‘现实’的各个部分、各个层面、各种关系会相对明晰地凸显出来。”研究者今后将进一步梳理研究维度，拓展研究的思路，希望在逐步探索这个结晶体的不同侧面的过程中，折射出其历程与全景。

[参考文献]

宝贡敏、徐碧祥（2006）：“组织认同理论研究述评”，《外国经济与管理》，第 1 期，第 39—45 页。

操太圣、卢乃桂（2005）：“论学校组织变革中的教师认同”，《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 3 期，第 43—48 页。

陈向明（2000）：《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陆伟（2011）：“信息沟通对组织认同的影响述评——基于信息论角度下的思考”，《大陆桥视野》，第 11 期，第 31—32 页。

毛亚庆、吴合文（2005）：“合并高校整合管理的文化因素分析”，《高等教育研究》，第 12 期，第 24—30 页。

孙健敏、姜铠丰（2009）：“中国背景下组织认同的结构：一项探索性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1 期，第 184—216 页。

孙伟琴（2010）：《大学学部制改革动力机制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唐宁玉、王琦琪、李倩（2010）：“高校合并后组织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上海管理科学》，第 3 期，第 38—43 页。

王华（2008）：《中国文化背景下组织认同量表的开发及其验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魏钧、陈中原、张勉（2007）：“组织认同的基础理论、测量及相关变量”，《心理科学进展》，第 6 期，第 948—955。

魏钧、张勉、杨百寅（2008）：“组织认同受传统文化影响吗？中国成员认同感知途径分析”，《中国工业经济》，第 6 期，第 118—126 页。

吴国林（2011）：《并校背景下促进个人——组织认同的对策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周国华（2012）：《大学教师组织认同研究：影响因素及其建构基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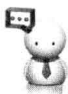
## 文末“评”

吴娱同学的《关于学部制改革中组织认同的质性研究》选取了学部制改革中一个突出的难点问题——组织认同作为研究内容，通过分析学部制实施的期望与四年以后学部教师的组织认同感之间的距离，来展开在大学的组织结构变革情境下，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真实境遇，以此折射组织之于个人的意义。选择质性研究方法，无疑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一研究目的。它不同于调查研究等量化手段对同一研究问题所做的研究路径，后者能发现和概括组织个体在组织认同方面所具有的整体概况和特点，但并不能探寻现象背后的原因，揭示现象发生或变化的内在规律，这也可以视为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区别。质性研究在这一研究问题上的意义恰恰在于它能详细展开组织变革对于个人工作和生活的影响，并能体察在此过程中事件对于个人的意义。

大学的组织变革具有和其他类型组织如商业组织不一样的特点，这是由其组织性质所决定的。大学组织的松散耦合特点，学科知识的自身属性，研究过程的自由探索等，无不赋予大学的组织承诺概念以其自身独有的意义。对于学部制改革中组织认同的质性研究，必须围绕这一核心概念展开，在此基础上提炼研究问题，从已有关于大学组织变革和大学组织承诺研究的文献中形成分析维度，对有关核心概念进行操作性定义，继而从原始的访谈资料中浮现出有用的类属概念并以之组织质性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在这一方面尚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质性研究是一个众多具体研究方法的集合名词，其中不同的研究方法有着不同的研究路径和操作流程，包括研究材料的选择、使用，数据的分析和提炼。从目前的文本还看不出来具体的质性研究方法为何，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研究的可靠程度。在考虑研究对象时本研究使用了目的抽样，从目前的文本中还无法获知其抽样的依据为何，不过按照目的性抽样所做的质性研究，七个研究对象在学部制改革前后各自的生活和工作改变的情境无论如何也需要各自展开，以便于读者体察组织变革在个体层面上的影响以及个体对于学部制改革的个人认知，而目前作者在这一方面并无充分说明。

作者本人的组织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研究提出了挑战。作为一名参与了学部组织方案讨论和实施的行政管理人员，她可能比学部教师更清楚也更易于接受在管理上学部制带来的优势，从而在心理预设上更倾向于接受学部制改革。尽管作者使用了三角互证并考虑了研究的局限尤其是研究伦理的问题，然而，从现有的文本中还难以看到，不同竞争性解释在同一个问题上的交锋以及深入的追问和探讨。希望在最后的研究以及写作中能够得到加强。



## 学生回应

就评审专家的文中“点”评 1–10 做以下回应：

1. 由于研究问题的确定是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因此在研究之初，只是提出了“组织变革对组织认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相关的设问，还未深入到“政策宣示与组织认同之间是否存在断裂”这样的层面。随着研究的进行，将根据已有研究成果、调研访谈的内容等，进一步明确操作化定义，归纳不同的观察视角。

2. 在学部制改革这一特殊的组织变革情境中，时刻折射出组织认同对组织变革成效的影响力，组织认同反映的是“自我概念”与“群体成员身份”的融合程度，组织承诺反映的是个体对其组织所持的态度，二者既有关联又有区别。

3. 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组织认同包含与自我概念相关的认知因素，以及与归属感相关的情感因素，而这些因素会进一步影响个体的行为。关于组织认同的操作性定义是否可以理解为与之相关的各个维度？

4. 文献综述中关于教育组织变革和高校教师组织认同的评述还不很全面到位，后续研究将进一步完善。

5. 依据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尝试采用目的抽样和方便抽样方式，计划选择的合适样本是，在组织里工作了较长时间，亲身经历了组织变革的过程，比较熟识、易于沟通，能提供较大信息量。起初基于分层目的型抽样的原则，联络了十余位教职工，最后得到七位老师的反馈并进行了访谈，其职称涵盖初级、中级、高级，职务包括管理者和普通教师，年龄为 40 ~ 50 岁，性别分布均衡，但专业未能完全涵盖十余个学术机构。作为一篇习作，目前也许还不具有整体上的代表性（并且关于“代表性”的讨论还在继续），今后将随着研究目的进一步明确，更好地实施抽样和访谈。

6. 本研究尝试了扎根理论的研究路径，在资料分析阶段尽量遵循了“开放编码—轴心编码—选择编码”的程序，并在资料和理论之间不断比较，试图处理好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之间的关系。在前期开放式编码阶段，尽量挖掘文化主位的语言，在后续的聚焦式编码阶段，也使用了文化客位的概念。然而，作为研究新手，在处理原始资料、研究者个人理解、前人研究成果这三者的关系方面，尚需改进。

9. 这也是成文时研究者遇到的一个困惑，尝试引用研究对象所说的话来表达其观点和感受，但也感到不足以支撑资料分析的结果，还需进一步明确类属概念。

10. 感谢老师的肯定和建议，组织文化与组织认同的各因素密切关联，后续研究中将进一步深入挖掘质性内容并进行分析归纳。

---

**点评专家余凯简介**

余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教育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与公共政策，教育评估，学校改革。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中国大学教学》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级课题多项，为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撰写多份咨询报告。

# 研究生在毕业求职的过程中是如何自我定位的：

## 两个女硕士研究生的个案研究

文／朱春芳[1]
评／张莉莉

[摘要] 随着我国研究生数量的增加，研究生的就业问题日益引起了社会关注。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之外，研究生本人的自我定位是影响研究生毕业求职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以观察和访谈法为主，对2名女研究生毕业求职过程中的自我定位过程进行了个案研究，将访谈资料按照“自我”和“他我”两个维度建立分类编码并加以分析，按照“自我”、“他我”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引起的调适三个层面对资料进行解释。研究发现求职过程中的自我定位过程是研究生本人在受到“自我”与“他我”这两个层面的影响并对其做出相应调适的过程。

[关键词] 研究生　毕业求职　自我定位

[1] 朱春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比较教育学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跨文化教育比较。

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院校招生规模进一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1998到2010年，高等教育在校人数由不到800万人增加到3 105万人，增长了3倍，先后超过俄罗斯、印度和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9.8%提高到26.5%，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的数目也在增长，由此导致的问题就是就业难。解决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就业问题已经成了上至中央政府下至黎民百姓关心的迫切问题。因为我本人也是研究生，在读博士研究生之前也经历过找工作、求职中自我角色及社会角色不断冲突调适的相关过程，而且最近网络和报纸上刊登了一些关于研究生就业的信息，引起了我的注意。所以想对研究生在毕业求职的过程中是如何自我定位的这一主题进行研究。

为了保护被研究者的个人隐私，文中的人名和地名都是化名。文中的“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12级的博士研究生。报告中采用第一人称代表“我”，一是为了更直观清楚地描述研究现场、使读者更明确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收集资料、了解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当时的情感、认知状况及对问题的敏感性与伦理道德思考；此外，还有利于研究者本人进行反思、更真实地呈现研究者在不同阶段、情境下的思考与情感变化。

## 一、问题的提出

2012年10月17日，河北青年报刊载了《研究生毕业回家种地，老父气绝服毒》这则新闻。河北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苗卫芳曾是太行山深处这个不足百人的小山村的骄傲——他是村子有史以来的第一名研究生。苦读三年毕业后，苗卫芳没能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又回到了原点，到村里种地。街坊邻居议论纷纷难以理解。面对村民的闲言碎语，苗卫芳的父亲感觉压力很大。于是偷服安眠药，但于次日被其母亲及时发现并送往河北医科大学附属以岭医院抢救。所幸抢救及时，其父亲起死回生。对此，很多人发出“知识难以改变命运”的感叹。41岁的苗卫芳，曾因考研成功而成为保定阜平柳树沟村的

**文中“点”**

1.“自我定位”的概念不够清楚。

2.下面的案例描述和分析应简化。

骄傲，如今却成为村民教育孩子的“反面教材”。他真的是“读书无用”的注脚吗？他为何会选择回家种地？他的悲剧背后有怎样的隐情？

经调查，在苗卫芳看来，他理想的收入稳定的工作，就是所谓的“铁饭碗”——当公务员或进事业单位。苗卫芳先后试图寻找或试用过 3 个不同的工作，分别如下。

1）苗卫芳曾到保定七中应聘教师，他过五关斩六将，最后在试讲阶段被淘汰了，他认为招录“不公平”。保定七中校办工作人员回忆，今年春天学校招聘教师，印象中确实有苗卫芳这个人，今年春天前来应聘，安排苗卫芳试讲了十几分钟，最后没通过的原因是，他的仪态、形象不佳，口才不好。

2）经熟人介绍，苗卫芳还曾到保定东方双语学校宣传科工作，负责校报编辑和领导讲话稿写作，但上班十来天就辞职了。该校办公室的杨老师说，苗卫芳离开的具体原因不大清楚，“人家是研究生，可能是这里容不下人家”。而苗卫芳说，他离开的原因是该校领导总是骂人，他也没有一个适合写作的环境。

3）今年 7 月份，灵寿县护驾疃中学得知苗卫芳研究生毕业后还没找到合适的就业单位，主动联系他回到该校教书。苗卫芳曾在灵寿护驾疃中学教过两年历史课，之后辞职前往另一所私立学校。该校负责人白祥虎说，学校给出每月 2 500 元的工资待遇，可是苗卫芳要求 2 800 元，否则不来。学校认为苗卫芳纠结于 300 元的差价，情商不是很好，就未答应他的薪酬要求。苗卫芳最终也未得到这份工作。

对上述现象的分析（尽管被调查者的身份不同，解释原因也极其不同），可知是各种因素综合导致了苗卫芳这名研究生的就业困难。可能是：①他本人自我定位不现实，硬要找一个“铁饭碗”式的工作，比如公务员或事业单位；②他本人 40 岁可能年龄过大，而且语言表达能力、形象与仪态不佳；③用人单位对他有一种定势的观点，认为研究生是高学历人才，可能不愿屈就于在本单位就业；④用人单位的某些方面，比如薪金达不到他的要求；⑤他本人对工作的某些方面比如薪金要求偏高，不愿降低标准；⑥他

的情商不高。结合这一案例及对自己研究生毕业求职过程的回忆，现将影响研究生就业过程中自我定位的因素划分为自我和他我两个层面四个维度，分别是：①研究生自我层面，包括，a. 研究生本人的基本素质（包括年龄、外在仪表与形象）对研究生职业选择的影响。研究生是否因为自己年龄较大倾向于选择稳定的职业？ b. 研究生的价值观。研究生是否因为自己是研究生，所以对职业期待较高？是如何看待各职业的？职业是否有体面之分？欲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②影响研究生毕业求职的他我层面，即所谓的社会压力。包括，a. 父母期待。研究生父母是如何看待研究生群体的？研究生学历意味着什么？ b. 用人单位的期待。用人单位是否因为年龄因素而拒绝接受研究生群体？他们对学历持什么样的观点。c. 同辈群体的影响。同辈在职业规划、职业选择、薪资待遇等方面是否影响了研究生本人？ d. 感情因素，如配偶或恋人的影响。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一）重要概念界定

在界定概念时，通过查阅相关工具书，即中英文词典中关于“定位”这个词的中英文词源、词根，最初概念定义。查阅相关学术文献、期刊关于“定位”这个词的意义。但是发现，很多关于“定位”这个词的意义都是与角色、战略、市场或特定物体相关的，而不是与求职直接相关的。因此，需要自己加以定义。

3. 自行定性概念界定的合理性不足，需要依据文献做出更加合理的界定。

本研究重在求职过程中的“自我定位”，与“自我概念”有关，即自己关于自己的看法或观点；而“自我定位”是在“自我概念”之上形成的，在认识到自己身份认同、角色认同及与社会认同之间差异的基础上做出相应调适，以便更明确确定自己在社会诸角色上的相应地位。求职过程中的“自我定位”则是指求职过程中自己关于自己在社会中应扮演的角色、应从事的职业的认识，及对社会期待的回应。

4. 概念界定不清晰。

1）角色定位：研究生自己认为具有研究生学历在社会上应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身份？或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研究生毕业后欲打算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20 世纪 80、90

5. 下面忽然转为角色定位和职业观，逻辑不顺。

年代，在大学生很少的年代，本科生都很少，研究生更是少之又少时，研究生自然被称为社会精英群体，就业情况很好。而在后大众高等教育时代，研究生（包括博士生）只是社会众多职业中的一种，并无特殊性。甚至有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博士生从事普通职业则表明该国教育程度比较高。

2）职业观：研究生和社会是如何看待各种职业的？各种职业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职业是否有体面、高贵与否之分？

3）应对社会期待的影响做出的相应调适：社会对研究生在社会中应扮演的角色予以一定的期待，以此形成了“自我定位”的参照物。社会期望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应具备哪些相应的能力。

### （二）已有研究

6.文献综述应更加简洁，且要进行更深入的梳理。

我查阅了图书馆内书目及网上图书馆的相关网址，比如CNKI等，我在CNKI网上输入关键词“研究生”“就业”“定位”之后，仅显示的硕、博士论文就有29篇，其中博士论文5篇。张明明在其硕士学位论文《硕士研究生就业压力、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中对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压力、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①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压力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密切，就业压力各维度与总体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与消极情绪呈显著正相关。②硕士研究生的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密切，即积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③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压力与应对方式关系密切，即求职竞争压力与解决问题和求助呈显著负相关。④硕士研究生的就业压力和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极其显著的预测作用，就业压力和应对方式都进入了幸福感的回归方程；⑤应对方式在就业压力与幸福感之间没有调节作用（张明明，2011）。魏静在其硕士学位论文《硕士毕业生就业薪酬期望研究》中分析了硕士毕业生的薪酬期望在专业、性别、学校、家庭环境之间的差异，进而从政府、社会、高校、个人的角度，分析了影响硕士毕业生薪酬期望的因素，得出结论：①硕士毕业生的就业地区选择、行业选择、单位

选择、专业市场需求、家庭环境状况、学校类别等因素与自身薪酬期望密切相关。硕士研究生的薪酬预期受多种利益取向的影响，呈现多元化趋势。②硕士毕业生的就业地区选择、单位选择等主观因素与性别差异、专业类别、学校类型等客观条件混合交织在一起，使得硕士毕业生对于就业的薪酬期望，难以实现理性的价值判断。③政府、社会、高校以及硕士毕业生个人等因素，对于硕士毕业生的薪酬期望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硕士研究生薪酬期望不再是简单的就业期望问题，已经涉及与就业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魏静，2012）。杨遇春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择业观研究》中对下述几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上海地区教育学硕士研究生的择业观现状究竟怎么样？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择业观存在哪些特点与问题？影响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择业观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帮助教育学研究生转变择业观念、解决择业观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教育学硕士研究生：①择业动机强烈，升学需求后移，择业侧重自我发展，并渴望将自身的发展与对社会的贡献有机统一；②择业意识清晰，岗位意识模糊，择业定位富有弹性；③择业期望趋于理性，择业重心逐渐下移，就业指导彰显不足；④择业态度积极，择业主动性较强，择业信息不愿共享。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择业观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入学动机存在误区、择业价值取向偏向功利、岗位意识存在盲区、就业信息共享程度偏低、对高校就业指导期望偏高（杨遇春，2010）。姜昆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某综合大学医学院应届毕业研究生就业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分析了医学毕业研究生本人、用人单位、研究生培养单位以及国家的相关政策等因素对就业的影响。类似研究很多，在此不再赘言。

综合以上研究，发现以往的研究多偏重于研究生就业压力源、影响就业的因素、某某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就业情况和择业价值取向、女研究生就业问题相关研究、职业需要、就业薪酬期望等的研究。这些研究有以下几个不足之处：首先，多采用问卷调查方法，理论探讨相对薄弱。方法以问卷调查和量化研究为主。局部研究较多，整体研究相对薄弱，一般只侧重于研究生群体中某一特殊群体，如女研究生、教育学专业、就业压力或价值观等某一局部进行研究。

7.“理论探讨相对薄弱”有何证据支持？

8.应该更加明确局部和整体的含义。

9. “前人研究没什么新意”有何证据？

而且有的研究结论被人们一再重复引用，几乎没什么新意。从现有文献资料来看，关于就业与研究生自我定位或与定位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很少。

## 三、研究方法

### （一）选择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选择采用逐步聚焦、缩小范围的方法。由于问题是关于研究生在毕业求职过程中的自我定位，前面已提到影响研究生求职自我定位的 2 个层面，即自我和他我的一些因素，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些因素与研究生求职过程中自我定位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打算选择即将毕业的研三学生及已经毕业一年左右的硕士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前者是正在经历这个问题，而后者是刚刚经历过这个问题。由于本人现在是北师大的研究生，为了省时省力，研究地点是北京师范大学，各种校园招聘会以及前几届刚刚毕业的研究生群体所在工作单位。由于引发本人研究问题中的主人公就业难的主要障碍是年龄因素，算是研究生群体中的极端个例。为了进一步了解年龄因素与研究生群体就业之间的关系，本人欲对两组人员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分析年龄因素对研究生就业的影响。所以本研究对象范围进一步缩小，按照年龄这个标准去寻找，所以研究对象的范围最终定为研三学生（包括 35 岁左右和正常毕业年龄段）和已经毕业一年左右的硕士研究生这两个群体。

### （二）抽样

本研究打算采用分层目的抽样的方法来选择研究样本，具体方式是滚雪球或锁链式方式和目的性随机抽样。之所以选择分层目的抽样，是因为本研究涉及一个维度两个群体——35 岁左右和正常毕业年龄，通过对这两个群体的个案进行深入的探讨，可以集中对这两个群体内部的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发现这两个群体内部的个别差异，进而达到对总体异质性的了解。下面的样本情况移入这个部分，说明样本的特征。

### （三）收集资料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选择本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对

象分别是：①即将毕业求职的硕士研究生 A；②刚刚经历过毕业求职的硕士研究生 B。对面临求职的研究生 A 进行现场观察、访谈（开放式访谈）与非正式交谈。正式访谈有 2 次，非正式交谈 1 次。访谈时间每次大约 1 个半小时，地点是在学生宿舍，选的时间都是宿舍无人的时间段，尽可能地排除外在干扰。每次访谈时，我都在征求对方意见后，用录音笔录了音并仔细的用笔记本记下对方的面部表情、形体动作及事后我的反省与思考。访谈一结束我就把录音记录逐字逐句的转换成访谈笔记，并反复思考对方的每一个肢体语言、面部表情是什么意思。哪些问题可能对对方而言很敏感而不适宜这么问，我在提问时是否暗含着我的假设，分别是什么假设，我的假设是如何影响对方的作答，还有哪些具体细节、问题没有问到或者对方没有提到，还用进一步追问什么问题、哪些顾虑因素会影响对方的作答，双方谈话中有没有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本土概念”，等等。通过各个方面对研究生的个人评价表、各种各样的书面材料进行分析，与对研究生的现场观察和访谈记录进行对比，对一些结论进行相关检验（三角检验）。

由于研究对象 B 与我不在同一个城市，且距离较远，而且平时上班工作很忙。所以选择了 QQ 视频聊天进行采访。一共访谈了 2 次。每次时间一个小时左右。

### （四）资料整理

建立编码体系，将整理好的访谈记录按照研究问题的维度进行分类编码。编码共分 2 个大的层面，W 代表自我层面，F 代表非我层面。在分析资料时，发现自我层面又包括综合素质（C）和价值观（V）2 个维度。综合素质（C）包括 N（年龄因素）、X（性别因素）、J（工作经验）、I（形象谈吐），V（价值观）又包括 Z（职业观）、D（对文凭或学历的看法）、S（传统性别角色观念）、A（对人生、事业或别的事物的态度）；非我层面又包括 F–F（来自父母的影响）、F–P（来自恋人或配偶的影响）、F–Y（用人单位的影响）、F–T（同辈群体的影响）。将访谈资料划分成自我、非我 2 个维度共 12 个方面。将资料归类存放之后，建立分类文档，对文字进行分析与解释。

### （五）成文

10. 具体是怎样使用这四种形式的，应该有更加具体的说明。

本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质的研究写作风格中常见的四种成文形式：①现实主义的故事，“现实主义的故事”的写作风格是纪实性的，作者对一些典型事例、文化模式或社区成员的行为进行详细的描述；②印象的故事，“印象的故事”是将事件发生时的情境以及当事人的反应和表情详细地记录下来，对具体的过程和细节进行生动、形象的描绘；③批判的故事，“批判的故事”遵循批评理论的指导思想，主要从历史、社会、文化的大环境对研究结果进行探讨；④规范的故事，“规范的故事”通过研究来建立、检验、概括和展示理论，因此，行文风格比较正规、严肃，逻辑性很强（陈向明，2000）。

### （六）推广度

11. 本研究是如何达成“顺应”这一目标，需进一步阐述。

质的研究通常是对小样本的调查，而且这些样本揭示的往往是独特的、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现象。通过与这些特例之间进行反复、辩证的对话，我们自身的认知方式和建构世界的方式都会得到扩展和创新。质的研究中的“推论”功能可通过人类认识新事物的两种主要方式来实现，即“同化”与“顺应”。“同化”在功能上与量的研究中的“推论”及质的研究中的“认同”十分类似，即个体将原有认知结构可以辨别的新事物接纳进来，在认识上获得一种认可。“顺应”是目前质的研究者尚未讨论的另外一种“推论”方式，即当特殊案例不能被个体已有的认知结构所“同化”时，个体必须改变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来接纳新的知识（陈向明，2000）。所以，本研究报告意不在推广，也无法推广，旨在通过对这个关于女研究生求职过程中，对社会现实与定位之间的冲突进行自我调适的过程及其影响因素的个案研究，来更详细、更充分的解释与阐述研究生在毕业求职过程中是如何自我定位的这个研究主题。如果硬要推广的话，本研究通过这个个案进行研究，结合我的个人生活体验、学术实践，通过同理心而产生认同，由此在具有相似经历的人身上产生的情感上的共鸣，也算是一种推广。

## 四、资料分析与解释

### （一）研究者自我层面

（1）个人基本素质，如年龄、性别、外在形象与气质、学养会对求职过程产生一定的影响。一般而言，个人基本素质与所获职业有密切的关系。下面是访谈中的一些对话。

12. 这一结论为空泛，而且下面的案例也不足以支撑这一结论。

A：总体而言，一个外在形象很好，又有学识的研究生找工作是要相对容易成功一点。如果只有外在形象，学识一般、也比较好找。比如，我这届毕业有一个同学个子很高，长得很漂亮，尽管学识一般，但会说话，就到北京语言大学做校长助理了。学识很好，外在形象一般的同学基本上都是去了中小学，而且是一些郊区小学。年龄也是个使人纠结的问题，女生超过 35 岁、男生超过 45 岁了，很多职业连面试资格都没有，但有资历的除外。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是因人而异的。

B：根据我这么多年的观察，我觉得好的形象气质，加上优雅得体的谈吐会非常有助于提高找工作的几率的，尤其是女生。这么说不是贬低学识的作用。有些工作如科研，对学识的要求是高于一切的。但是别的工作，如教师和公务员，在基本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则对形象和谈吐的要求更高。

（2）个人态度、价值观会对求职定位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我知道求职是一个漫长甚至痛苦的过程，你在此期间是如何调适的？即你在求职过程中的锁定目标、工作地点、薪资待遇、职业观等前后有没有发生变化？

B：只要一家人能生活在一起，在哪工作都一样。至于薪资待遇倒没有什么明确的要求，因为英语专业的研究生到学校教书的话，工资也不会很低。因为，随着个人资历增长，不断进修，不断提高，个人的职业、命运也会变得好一些。正如这句英语“Your luck improve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yourself”所说。

我：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私立学校，因为觉得不稳定。你是怎么看的呢？

B：这些都只是暂时的。因为只要你有能力，你可以调到别的更好的学校。就像爬楼梯一样，没有人是一下子就

爬到顶端了。

（3）学历观。对研究生学历的看法因人而异，但总体而言还是认同学历的社会流动正作用。

我：你认为研究生学历给你带来了什么吗？或者你如果不读研究生的话会怎么样？

B：我认为研究生学历是一块敲门砖，没有研究生学历，我是进不了大学的，哪怕只是一所私立大学。

我：上次访谈中你说研究生学历是一块敲门砖，没有研究生学历，就进不了大学，哪怕只是一所私立大学。那么你能谈谈你身边的一些研究生是如何看待研究生学历的？

B：别人怎么想的，我还真的很难说。但从平时的聊天中可以知道，很多人都认为现在这个时代学历贬值，本科生到处都是，再不读个硕士研究生就根本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尽管很多职位不是研究生就一定可以去做，但是没有这个文凭，你连面试的资格都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文凭还是可以起到改变命运的作用的，特别是对于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村出身的孩子们。

（4）职业观。研究生对职业性质并不存在刻板印象。

13. 结论中的研究生其实只是两名被访者。

我：你和你的一些同学们又是如何看待私立学校的？或者是对私立、民办机构有偏见吗？

B：这个我不敢保证，毕竟每个人观点不一样，但总体而言，以后国内的趋势就是公、私立机构的待遇将越来越趋向一致，不会像以前那样有天壤之别。而且政策是在不断变化的，就像国企改制一样，一夜之间多少人下岗啊。所以，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倒也不那么看重单位性质了。这个年代，只要你不断学习、不怕吃苦、有头脑，肯定不会活得有多么惨。”

## （二）他我层面

（1）配偶或爱人限制了找工作的范围。以下是本人在访谈 A 时的对话。

A：我最大的麻烦就是男朋友在福州，所以毕业后只能跟他去福州了。

我：如果求职过程中遭遇挫折，你会做什么样的调整？

A：因为我男朋友在厦门，所以我只能选厦门了。地

点是不能变的。

（2）父母可能与研究生本人存在思想差异，但对研究生的职业观及就业的影响不大。

A：不过，我爸就不是很想让我回去教小学，因为他自己是小学校长，知道小学教师工资待遇不好，而且工作也很繁琐。况且，他觉得研究生回去教小学好像有点大材小用。

我：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呢？

A：因为在我们泉州，小学一般都是本科或专科学历。我爸就是个专科毕业。所以他觉得多读了这么多年书，做的工作跟人家本科生没有什么区别。

我：你的家人对你毕业后求职有什么样的期待，他们是如何影响你的职业期望的？

A：我现在都是独立的成人了，父母只是希望我找一份稳定的、待遇高的工作，我想天底下父母都会这么想的，但是也没做什么、没怎么干预。

（3）用人单位选聘员工时带有极强的现实性、功利性，注重研究生的实践经历等能够带来增值的因素，因而对年龄、性别、有无经验还是存在一定偏见与歧视。

B：第一次面试的是北京某中学高中英语教师的职位，可能人家看中我以前5年的工作经验吧。我过去先统一笔试，只这一职位的应聘者就坐了满满一个大教室。笔试完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出笔试成绩，笔试成绩排在前几名的人过去试讲，我试讲准备得很充分，因为是第一份面试工作，非常有热情。面试过后几天，又接到通知让我去面试。面试我的是一位50岁左右的中年男性，具体什么职位我也不清楚。他问我一些基本情况，比如配偶啊，配偶工作，孩子啊，等等。聊了将近1个小时，但后来杳无音讯。我后来仔细回忆这场面试，觉得也没什么做得不好的，或回答上有什么不妥的。后来想一想可能是我说我配偶不是北京户口，人家可能觉得我可能待不了很长时间。还有一次面试是北京××大学让我过去面试外事秘书这一职位，刚开始也是笔试翻译一段英文文章，之后是英语口试。随后就是见外事主任，他也跟我聊了很长时间，大概40多分钟吧。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问我以前是不是只负责教书，没有别的

工作经验。他问完后好像对我不怎么感兴趣了，然后就随意问了几个问题，面试就结束了。后来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没有考虑我。还有很多我不想多说了，但总体感觉，用人单位都是很务实、很功利的，他们需要一个既有学历、又有相当工作经验的，此外，还会考虑你是否会待很长时间，是否有潜力等。

（4）求职过程与求职定位受同辈压力比较大，同伴群体之间攀比、盲从现象严重。

A：学校附近的一些什么出国培训机构、英语培训机构、公务员培训机构、求职面试培训等机构太多了，有的时候看见周围的同学们报了什么培训结构，会经不住诱惑也去报。比如，看见我的舍友报华图公务员培训，我也去报，那就自然也会去报考公务员了。在大学校园里，这些跟风现象很严重。

### （三）求职过程中自我定位与调适

（1）求职过程中的自我定位与调适因人而异，并不是所有的研究生都会经历一个前后对比反差明显的过程。心态是决定是否会前后反差明显的主要因素。心态积极的人因为事前没有太强的预期，所以求职前后不会经历很大的变化。

我：如果求职过程中遭遇挫折，你会做什么样的调整？

A：因为我男朋友在厦门，所以我只能选厦门了。地点是不能变的。要调整的话，也只能是调整应聘求职的单位性质了。比如从重点学校到非重点，从公办到民办，从市区到郊区。如果实在不行，公司也可以。

我：那你就是逐步降低标准了？

A：那也不一定。因为求职就像找对象一样，也是个缘分。

我：你是如何看待你求职前后心态、职业期待等的变化的？

B：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因为一开始心态就比较平和，比较现实，随遇而安，抱的期望不是很高，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失望或大的反差。

我：是吧。那你周围有没有人一开始定的目标过高，

薪金很高，而后慢慢降低标准的人。

B：也不是降低标准吧，只不过是一种现实的调整。就像应届毕业生一样，一开始想得很理想，很浪漫，但是在现实中磨练一阵后，就会变得比较现实。但也不是一种逐步降低标准的那种。我觉得这种过程是很好的，就像两个人互相磨合、相互调整一样。

（2）研究生求职定位与时俱进，具有挑战性，但也不排除盲目与功利。

我：上次访谈中你说至于薪资待遇你没有什么明确的要求，因为英语专业的研究生到学校教书的话，工资也不会很低。这么说你还是有一个工资标准的？

B：也不全是。刚毕业的研究生先找一个平台，在此基础上如果表现出色的话，人家自然就会给你涨工资。所以，不要一开始就问别人能给你什么东西，先问你自己能给别人什么东西，别人认可你的价值后，你想要的自然就随之而来。所以，我不是很看重什么预期薪资。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你的心态真好。不知道你周围的同学是怎么想的？

B：大多数人还是很功利、很务实的，对薪资待遇还是有要求的。

## 五、结论

经过对上述访谈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研究生的求职受到自我层面综合素质的强烈影响，综合素质强的研究生就业情况一般较好。

（2）研究生求职过程受到自我价值观的强烈影响。传统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只存在于一部分女研究生身上，即认为女生为了照顾家庭应该找一份相对轻松稳定的工作，有一部分人愿意从事一些更具挑战性的职业。

（3）研究生普遍认同学历在发挥社会流动作用中的正作用，具有积极自我概念的人对未来职业有一种更积极乐观的开拓意识，自我定位相对而言比较朴实、清晰。

（4）研究生在求职过程中受非我层面如父母、同伴压力影响的程度因人而异，但在地域选择上，普遍受配偶或伴侣的影响。

（5）有过工作经验的研究生对自己将来的职业有相对比较明确的定位，而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研究生显得比较盲目。

（6）有无工作经验、年龄是否处于优势等因素对于研究生在求职前后的职业期待，及对自我定位调整之间的关系不具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因人而异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某一类人群，如有工作经验或年龄处于优势的人在求职前后的职业期待、自我定位反差较小，或反之亦然。

## 六、反思

（1）在分析研究资料中发现有更多的“本土概念”需要澄清，有必要对一些陌生的熟悉词进行重新定义。访谈过程中发现，访谈者与被访谈者关于一些常见词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比如“就业歧视”、“签约率”。我认为“就业歧视”是一个范围很广泛的词，包括性别歧视、家庭背景歧视（农村或城市、父母职业）、学校级别歧视（最初学历、最终学历是否 211 或 985）、政治歧视（是否党员或无党派人士）、专业歧视（热门、冷门专业，本硕专业是否一致）、年龄歧视。但在被访谈者的意识中，“就业歧视”等同于“性别歧视”，被访谈对象将“签约率”等同于“就业率”。

（2）访谈之前自己的前设太强，一心想着受访者回答出我所前设的东西，而忽视了受访者的回答或对一些问题缺乏敏感性。整个访谈都受了我个人前设、知识及相关经历的很大影响。因为我之前经历过求职，对求职中的各种歧视，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出身等深恶痛绝，这些也都无形中会影响我问的问题，问问题的方式，甚至是对受访者的反馈。在访谈中，我会无意识地流露出对这些类似现象的反感，而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受访者的回答。在事后整理访谈资料时才发现对一些问题应该进一步追问，而访谈当时却没有意识到。

（3）习惯性的总结归纳访谈者对问题的回答，本想借此澄清意义或验证自己的前设，但反而会干扰研究对象的思路，让他陷入我预设的布局中，不利于发现真实的信息，得出真实的结论。对于追问的度不知道如何把握，不能及

时把握时机进行追问或发现有待追问的问题。有时当某一方提到的一些更详细的、或关于某个问题的更深入话题，从而激起了受访者或我的兴趣时，就会按照谈话者的思路无边无际的展开，因而离研究问题越来越远。

（4）关于第二个访谈，采用的是 QQ 和电话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尽管通过 QQ 视频可以见到对方的面部表情，但还是很模糊，而且视频时和电话中的语音明显有别于面对面交谈时的语音，缺乏面对面访谈时的那种对受访者问题回答的直观灵敏度、直觉判断力、情感共鸣的感觉。很难对受访者问题回答的真实性进行验证。而且因为是电子虚拟的场景，双方又不熟悉，受访者可能不会很严肃认真地回答我的问题。QQ 聊天本身具有的游戏性与虚假性也不免影响到本研究的真实性。

（5）研究结论的效度与信度不够，因为我的访谈对象 A 急于回家找工作、面试和结婚，无法给我提供更多信息，B 由于远在丽江，且毕业半年了，也无法提供详实的线索，全靠对访谈资料的搜集与分析，没有什么书面材料或与别人进行三角检验。正如米达尔（Myrdal, 1969）在谈及民族志时所说的“民族志涉及一连串真理的实验，而这些真理实验绝对无法单独完成。”身为研究者，我们从来无法真正获得任何社会与文化“完整真实”的面貌，相反的，从我们的特定观点看来，我们仅能产生一个关于真实的译本，仅能提供给他人一个我们视之为最适当的观点作为思考（安・格雷著，许梦云译，2009）。

（6）在分析资料与解释资料的时候，分不清哪些是从资料中提取的观点，哪些是自己的观点。而且在分析资料时发现自己对问题的分析比之前设想的更具体了，拓宽了问题分析的维度，发现了以前没有发现的问题。如在分析“自我”层面的资料时，发现了最初设想的“个人价值观”这个维度太笼统，因此，在整理访谈资料时分成了 4 个维度，即个人价值观、态度、职业观和学历观对研究生就业的影响。

［参考文献］

安·格雷著，许梦云译（2009）：《文化研究：民族志方法与生活文化》，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陈向明（2000）：《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魏静（2012）：《硕士毕业生就业薪酬期望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郑州：河南师范大学。

杨遇春（2010）：《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择业观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上海师范大学。

张明明（2011）：《硕士研究生就业压力、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 文末“评”

该论文关注了一个高等教育中的重要问题——毕业生就业过程中的自我定位问题。随着研究生总量的大幅增加，这个群体在就业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新的困境：难以进入自己期望的职业领域或具有较高职业地位的工作岗位。本研究通过一个典型案例导入所关注的研究问题，尽管案例的篇幅略长，但较好地呈现了研究的社会背景及研究价值。

作为一个课程作业，该论文反映出作者比较认真的学习态度。论文从整体上看结构比较清楚，研究过程交代得比较具体，体现了“做中学”的精神。下面从如何使研究更加深入而规范的角度，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作者对于自我定位的概念界定从字面上看不够合理，且未能从相关理论与研究中获得有价值的启发。相关的文献回顾比较简单，文献述评中的一些评判缺乏充分的支撑。

研究采用质的研究方法对两名个案进行了访谈，抽样方法可交代得更加清楚明确，如对于两个个案的背景有所梳理。另外，为何本研究中聚焦的研究问题适用质的研究方法，也应进行分析探讨，以突出质的研究的优势，知晓其不足。研究者对于访谈数据进行了编码分析，但之后的案例报告中，这些分析的作用呈现得不具体。本研究给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但呈现数据的方式单一，未能充分反映个案研究的优势：整体性的透视。研究结论部分，未能给以必要的实证和理论支撑。研究结果中反映出作者对于性别问题的关注，如果能够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探讨，也会有一些很有价值的发现。

另外，本研究的推广度需思考结论中的研究生的含义。按照李银河的理解，此处的研究生指研究对象是研究生，而非研究结果适用于所有的研究生。

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更好地聚焦于某类研究问题，如文科女研究生就业中的自我定位进行研究。另外，对于影响定位的因素的理论分析也应更加重视，从而为研究搭建更好的理论框架。

尽管研究中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但勇于尝试、认真开展研究的态度还是会使这一课程作业凸显出其特有的价值：在行动中成长。



## 学生回应

（1）关于“自我定位”的概念界定问题。本人在查了CNKI、维普等期刊和学位论文及相关工具书后发现，尽管有关于“定位”的相关概念界定，但是没有特别适用于研究生毕业求职过程中的“自我定位”这一情境的相关定义。如果硬将“自我”与“定位”这两个概念的界定合在一起则有点牵强。于是，就自己进行了定义，可能确实有点词不达意。

（2）关于文献回顾。可能由于文献查阅时仅仅关注CNKI和维普等学术资源网上的期刊和学位论文，对著作及其他学术资源的关注较少而造成统计不全面，对有些研究有所遗漏，因此，文献综述确实做得不是很专业、全面和有说服力。

（3）本人在做文献综述的时候，发现大多数先前研究采用的是量化的研究方法，尽管方法和结论有数据支持，显得合理可靠，但总是有如雾里看花的感觉，冷冰冰的数字后面缺乏具体的细节。质的研究可以清晰地呈现事物的全景及具体细节，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甚至情感上的共鸣。本研究采用质的研究，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旨在尽可能呈现事情的真实图景。但是由于篇幅所限，不能详细阐述相关细节。由于本研究基本上是根据资料进行分析与解释，没有采用任何量化研究的方法，因而没有相关数据支持。此项研究旨在真实呈现事情的原貌并将其解释清楚，因而不可能产生一些脱离资料本身的抽象、宏观的“大”理论。如果真要生成理论，也只是扎根于资料本身的“小”理论。

（4）关于研究的推广度问题。因为质的研究结果侧重于对研究对象的真实具体的呈现，重在深描、整体视角，不是数量上的推广，研究结果不可复制。因而用一种抽象的、概括性的集体名词代表所有属于该上位概念范畴的具体的、下位的事物，如“研究生”代表所有研究生、“中国文化”代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这一做法是有失偏颇的，尤其是在质性研究这种方法中。个人认为本研究的标题直接改成“关于两个女硕士研究生在毕业求职过程中自我定位的个案研究”可能会更真实的反映本研究的意图和情况。

## 点评专家张莉莉简介

张莉莉：香港大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师大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多元文化教育、教育研究方法。主持并参与了多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的课题研究，是中英西南基础教育项目、国务院妇儿工委两纲监测等项目的咨询专家。相关著作有：《教育公平》《女性领导力建设培训教材》《妇女学研究方法》《妇女在中国科技发展中面临的机会和挑战》等。讲授的课程包括：教育统计学、教育研究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妇女与教育等。2008 年春季，曾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讲授“女性领导力”课程。2011 年 9 月到 2012 年 5 月，以富布莱特学者身份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伊利分校讲授“妇女社会学”课程。

# 全日制专业硕士群体消极情感的研究：

## 以S校学前教育专业为例

文／涂玥[1]
评／郑新蓉

[摘要] 本研究采用访谈法对S校学前教育专业六名全日制专业硕士进行访谈，分析全日制专业硕士的心理状态。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为：（1）全日制专业硕士的群体消极情绪表现明显，包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情绪、培养过程与自身需要或期望不一致产生的失望情绪、与学术型硕士对比产生的自卑情绪；（2）外部消极评价通过群体成员内化会形成消极的群体刻板印象，使得群体在社会比较中形成外群体偏好，是群体消极情绪产生的重要原因；（3）全日制专业硕士群体消极情感对个体的影响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受到个体的心理特征（敏感性、情绪的自我调节能力、学习动机等）及群体非共享的经验（录取方式、导师培养方式等）的影响。

[关键词] 全日制专业硕士　群体消极情感　群体心理

---

[1] 涂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学前教育研究所，学前教育学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学前教育基本理论。

## 一、选题缘由

文中“点”

为了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教育部于2009年3月下发了《教育部关于做好2009年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安排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2009年在已下达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基础上，增加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5万名……主要用于招收应届本科毕业生。”这一政策的出台，使我国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由原来的普通硕士教育和专业硕士教育改为了学术型硕士和专业学位硕士，并且专业学位硕士对应届生开放。

从2010年开始，我国各高校逐步减少学术型招生人数，调整缩减的部分全部用于增加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标志着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开始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同年7月，国家公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明了“加快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下一阶段发展的重要任务。根据教育部规划，2015年专业硕士将在整个招生名额中占50%。

尽管国家投入了较大的人力、物力发展专业硕士，但与学术型硕士相比，发展专业硕士的道路还很漫长。从报名人数来看，虽然近年来学术型硕士的招生人数在缩减，专业硕士的招生比例在提高，但报考学术型硕士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专业硕士。从培养方式来看，大多数院校对其招收的全日制专业硕士采用与学术型硕士相同或相似的培养方式，在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等方面均未体现出培养特色。

1.注意学科边界和研究目的。我们做论文、做研究是改善情绪，还是改变目前教育的现状，哪一个方面可行？为什么？

笔者为S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S校学前教育专业于2011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此前本专业的每位导师每年只招收1～2名硕士研究生，但从2011年开始，每位导师每年要带4～8名硕士研究生。全日制专业硕士这一话题在同学之间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部分学术型硕士对这一政策颇为不满，认为专业硕士的扩招“挤占”了他们原有的资源，也有部分导师认为招收专业硕士打乱了自己的培养计划，给他们的教学和论文指导带来了一定

2.其实也是两类研究生的对比。

的困难。目前，第一届专业硕士明年即将毕业，我和许多人一样关心他们的就业情况如何，想了解他们这两年的生活和思想状况，也想了解他们对招收专业硕士这一政策有何看法。因此，本研究将从群体情绪的角度来分析S校在全日制专业硕士培养方面存在的问题，为改善和提高全日制专业硕士的培养质量提供思路。

## 二、概念界定

### 1. 全日制专业硕士

专业学位（professional degree），是相对于学术性学位（academic degree）而言的学位类型，其目的是培养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并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从2009年开始，教育部推出了“全日制专业型硕士”，面向应届生招生，目的就是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应用型人才。他们在1月份参加全国统考，获得攻读硕士学位的资格，毕业后可获得国家承认的学位证和学历证，出来学历是研究生，也就是“双证”。

### 2. 群体消极情绪

3. 是借助心理学的理论还是教育社会学理论？请详细说明理论资源。

群体消极情绪是群体情绪的一种类型，群体情绪是群体的情感体验，独立于个人自我的情感体验，具有群体内的普遍性。它体现在群体成员看待与群体有关事件时表现出的情绪，既包括对该群体的情感体验，也包括对本群体和外群体关系的情感体验。群体消极情感是指该群体体验到的群体情感主要而且长期是负向和消极的。

## 三、研究设计

###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解决的问题包括以下三个：（1）全日制专业硕士群体消极情绪体现在哪些方面？（2）全日制专业硕士群体消极情绪的作用机制是什么？（3）全日制专业硕士的群体消极情绪对群体中的个人有何影响？

4. 其实就是原因探讨。

###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质性研究，主要采用访谈法和实物分析法搜集相关资料。在确定访谈对象的时候，笔者根据方便取样

的原则，首先与同门师弟J取得联系，告知其研究目的并征得J同意后，与J进行了第一次访谈。在这次访谈中笔者了解到J是12级专业硕士班的班长，J向笔者介绍了他们班级的情况，包括班级规模、人员构成、住宿条件、学费、学制等，并邀请笔者参加他们班级10月27日组织的活动。就这样，笔者参加了他们的班级活动。通过这次活动，笔者认识和了解了12级专业硕士这一群体，并确定了进一步访谈的对象。考虑到是否跨专业、录取方式、性别、导师培养方式等都会影响个人对专业硕士的看法，因此，笔者选择了他们班级中另外三名同学作为研究对象，以保证抽取的样本能够覆盖不同的情况。此外，考虑到12级的专业硕士没有经历实习和找工作，笔者还选取了两名11级的专业硕士，重点了解他们实习和就业的情况。根据方便取样和目的取样的原则，在征得研究对象同意的情况下，笔者共访谈了以下六名同学：

5. 很多学者对质性研究中"抽样"、"目的取样"存有质疑，希望多关注。

| | 年级 | 性别 | 生源类型 | 录取方式 | 是否跨专业 |
|---|---|---|---|---|---|
| J | 12级 | 男 | 应届 | 保送专硕 | 是 |
| Q | 12级 | 女 | 应届 | 保送专硕 | 否 |
| T | 12级 | 女 | 应届 | 调剂 | 是 |
| Z | 12级 | 男 | 往届 | 调剂 | 否 |
| L | 11级 | 女 | 应届 | 调剂 | 是 |
| C | 11级 | 女 | 应届 | 调剂 | 否 |

笔者对每名同学进行了1小时的录音访谈，收集了报考原因、对专硕的了解、生活和学习状态、课程安排及导师培养、就业期望等方面的信息。

J在访谈中提到自己有写博客的习惯，在征得本人同意后，笔者还对其博客内容进行分析，成为笔者获得资料的又一重要途径。J的博客共121篇，笔者选取了J来S校读书后的6篇博客进行分析。

## 四、研究结果

### （一）全日制专业硕士群体消极情感的表现

本研究分别对三位研究对象进行了时长为1小时左右

6. 这部分的过程反思和总结很好！

7. 情绪是存在的反映，到底是什么存在结构，存在形式呢？

的访谈，在征得研究对象同意的前提下，对访谈内容进行了录音。将访谈录音转录为文字后，笔者对研究对象提到的有关心理状态或感受的词汇进行了初级编码并整理归类，发现研究对象在提及就业时，经常使用迷离、迷茫、发愁、稀里糊涂等词语，体现出全日制专业硕士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产生的忧虑情绪；在提及学制、课程设置、导师培养时，经常使用不合理、不满意、有落差、不舒服等词语，体现出培养过程与他们的需要和期望不一致产生的失望情绪；在提及招生和生活、学习条件时，经常使用不公平、不重视、有差距、受歧视等词语，而且在叙述时经常与学术型硕士进行对比，体现出群体间对比产生的自卑情绪。

**1. 忧虑的情绪**

Z：我也挺**发愁**的，这个专业硕士以后能找什么工作呀。

T：还有就是职业规划**迷离**，现在这个真的是最迷离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以后找什么样的工作，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真的很**迷茫**。

Q：好多人都不愿意去幼儿园工作。但你是一个专硕，比较高级的研究所也不可能要你。第一届专硕也还没有毕业，不知道我们的就业前景怎么样，所以大家现在都很**迷茫**呀，然后现在不知道自己干嘛好。

全日制专业硕士普遍对自己的就业前景表现出忧虑的情绪，他们的忧虑情绪一方面是由于自己职业规划不清晰，没有明确的就业目标所致（如T所述），另一方面是由于本专业第一届专业硕士还未毕业，在就业方面没有参照物所致（如Q所述），另外还有些人出现担忧的情绪是担心现实的就业情况不符合自身的期望所致（如Q所述）。

**2. 失望的情绪**

T：所有的专硕上的同样的课，我们和思政、历史、文学系的同学一起上，但是幼儿园老师跟中小学老师差异性很大，但是他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特别不合理**。

Z：就是对整个课程设置**不太满意**，我们跟学术型硕士上的课差不多，没有突出专业的、实践的和技能的这种课。

Q：我就觉得学校对我们这届刚招进来的学生培养计划也**不是很合理**的，我们也很**无奈**。比如我们没有选课的自由，课程已经排好了，也不管课对我们合适不合适。

C：我觉得对我们的安排很不合理。我们现在在实习，不仅要写实习小结，还要完成开题报告，时间不够用。一年级的时候上那么多没用的课，这个学期又排得那么满，真的不合理。

在提及学制、课程设置、导师培养时，他们经常使用不合理、不满意、有落差、不舒服等词语，体现出培养过程与他们的需要和期望不一致产生的失望情绪。他们认为学校和院系在培养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

首先，课程设置没有突出专业性和实践性。学前教育学专业硕士的课程分为学位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实践教学四个模块，总学分不少于 36 学分。专业课部分（包括专业必修和专业选修）与学术型硕士开设的课程一致，“许多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还是按照给学术型硕士上课的那样培养”，教师很难在上课的过程中凸显专业硕士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全日制专业硕士开设的学位基础课包括外语、政治理论、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研究方法和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他们所有的学位基础课都是与其他专业的教育硕士一起上。通过访谈，笔者了解到，他们认为课程与教学论、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等课程与自己的专业相关性较小。“中小学课堂管理案例研究，为什么要让我们上呢？整个那种教学的模式都是中小学用的，跟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T 访谈记录）“我觉得上课程与教学论，就觉得不是针对幼儿园的课程与教学，跟我本科上的课程与教学论特别像，对于我们专业指导性一点都不大。”（Q 访谈记录）“还有课程教学论，人家这个老师研究的呢就是中小学，他叫你设计的教案也和幼儿教育的很不一样，目标、设计思路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课我们就和它有很多冲突。课程设置得就不好，因为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幼儿教育自身的独特性，而不应该把它划归为中小学教育，因为他们毕竟是学龄后期的，肯定不一样。”（J 访谈记录）

其次，任课教师忽视学生的专业和学科背景。Q 在访谈中提到她本科学的就是学前教育专业，但是由于班级大多数人都是跨专业录取的，所以老师在上课时更多的是普及学科和专业的基本知识，像在重复本科时候的课程，对

8. 课程方案中没有专业实践和训练是原因之一。

9. 看出专业硕士有很清晰的专业期待和认识。

她来说课程没有起到提升的作用，这是她对培养过程感到失望的另一原因。

第三，部分导师对全日制专业硕士缺乏明确的培养计划。“H老师去幼儿园反而不带学硕的，只带专硕，这就表明她对专硕比较重视，因为她觉得专硕是她积极申请建立起来的制度吧，她就想把专硕搞得更好些……但是我们老师还是比较偏学术型硕士，她会比较重视学术能力的发展，所以说各个老师还不一样。”（J访谈记录）“我们就是扩招的这种，一下子打乱了人家原来的节奏了，一个导师本来不应该带这么多，现在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老师一下子也忙不过来，所以从导师那获得的东西也比较少。我感觉以前老师会带着研究生一起做课题什么的，但是现在好像根本没有这种机会。”（Z访谈记录）

10. 教师的无意识和无力感也是原因之一。“扩招”是一个非常值得分析的词。这是老师眼里的“专硕”学生。

**3. 自卑的情绪**

在提及招生和生活、学习条件时，全日制专业硕士经常使用不公平、不重视、有差距、受歧视等词语，而且在叙述时经常与学术型硕士进行对比，体现出群体间对比产生的自卑情绪。

J：我还是觉得专硕其实是**不受重视**的，首先，我们要收费，学校也没有奖学金的计划；再一个，我们住宿还是在校外，对学校没有归属感。

T：我觉得是没有按照人的发展来弄的，那个同学又有专长，他读专硕不是更好吗，但是就拿学分绩点来卡，其实很**不公平**。

从招生录取来看，12级学前教育专业硕士共30人，在报考时仅5人第一志愿填报的是学前教育专业硕士，25人第一志愿填报的是外专业学术型硕士，由于分数不高被调剂到学前教育专业读专业硕士，还有5人是保送专业硕士的名额。自愿填报学前教育专业硕士的5位同学认为专业硕士比学术型硕士更容易考，考上的机会更大，更容易圆他们的“硕士梦”。5位保送生在争取保送名额的时候，也是由于成绩绩点低于其他人，只能获得保送专业硕士的名额，而绩点较高的同学则能获得保送学术型硕士的名额。因此，专业硕士普遍认为他们录取分数低于学术型硕士，产生了自卑情绪。从学校提供的生活和学习条件来看，学

11. 学生是调剂而来也是原因之一。

校对学术型硕士实行免学费的政策，为其提供校内的住宿，并且设有多种奖学金，而全日制专业硕士两年需要缴纳学费2.5万元，每年住宿费为2 300元，且被安排住在校外。学校对两种类型硕士的不同待遇也使全日制专业硕士在对比中产生了较强的自卑情绪。

12. 培养方案不区别而生活待遇区别是值得细分析的。

### （二）全日制专业硕士群体消极情绪的产生机制

群体外成员对某一群体的评价会影响该群体成员对群体的自我评价。对于新出现的群体，外部评价对于群体自我评价产生的影响尤为重要。S校学前教育专业全日制专业硕士从2011年开始招生，至今仅招收了两届学生，作为研究生扩招背景下新出现的群体，群体成员如何看待本群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界对该群体的评价。在访谈中，笔者发现全日制专业硕士认为本群体的社会认同度普遍较低，他们在录取之初就曾通过各种手段（上网、询问亲友等方式）了解到全日制专业硕士的社会认同度，或者在录取和就读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到了外界对全日制专业硕士的态度和看法。

13. 这一段看出基本结论是他者的态度和评价，看似他人评价和态度的“外归因”？！

首先，群体成员通过内化外部评价会形成对本群体的刻板印象。

对全日制专业硕士群体情绪产生影响的外部评价不仅包括整个社会的认同度，如T在访谈中提到自己接受调剂后就立刻上网去查专业硕士的相关情况，结果发现网上很多人都说专业硕士就是混文凭的，学不到什么东西，也很受歧视……还包括教育系统内部（高校、任课教师、导师、同学）对该群体的评价。群体内的成员通过内化外部评价，会对本群体形成共同的评价，由于全日制专业硕士的外部评价以消极为主，因此全日制专业硕士群体成员对本群体的评价也以消极为主，形成了对本群体的刻板印象，包括专业硕士比学术型硕士档次更低，专业硕士想要继续深造或从事研究的工作几乎不可能等。以下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外部消极评价会导致群体消极情绪的产生。

J: 我是保研的，保的就是专硕的名额。学校根据平时的成绩还有参加各种活动的情况来确定你是否有保研的资格，我当时排名是第三，只有前两名有资格保送学术型，所以我就只能保送专硕了。

14. 这句话描述的是制度和文化的原因。

J：我有时候也会想在我们这种制度里选拔人才就是看

分数，分数的高低证明了你这个人能力的强与弱，没办法，我们录取的时候分数就比学术型的低，那自然受到的待遇也就……

从 J 的例子可以看出，学校在招生录取时以分数作为区分专业硕士和学术型硕士的标准，分数高的可以选拔上学术型硕士，而分数较低者则只能攻读专业硕士，J 接受了这种评价标准，所以认为自己分数低，理应受到更低等的待遇。在这一过程中 J 将外部以分数区分专业硕士和学术型硕士的做法内化为自己对专业硕士和学术型硕士的看法，形成了专业硕士比学术型硕士分数低，档次更低的刻板印象。长期以来，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上形成了重学术轻实践的风气，大学被认为是培养高精尖人才的摇篮，以争做“研究型大学”为荣，在这样的氛围下，定位于应用型和实践型人才的全日制专业硕士必然难以受到社会的认可。招生录取不仅仅是一种人才选拔方式，更重要的是这种选拔方式背后体现出社会和高校对于全日制专业硕士的价值判断，是一种重要的外部评价方式。

15. 分析得深入！多琢磨“外部评价方式”，分析很深，结论用词仿佛又简单化了。“外部”是指什么？

T：我当时考北京的时候老是受到辅导员各种鼓励的，结果我被调了专硕之后，就对我另眼相看了。比如，系里举办新老生交流会，让考上研究生的同学与学弟学妹交流，这个时候没有叫我去。可能老师就觉得还挺丢人的呀。再比如，我有一个人大的同学，她跟我说她也是啊，就是人家开完了这个交流会她才知道……最后很多老师就会觉得专硕不好，比如 H 老师批评我们一个师姐做得不太好，令她不满意……

T：你说你还能干嘛呢，当时我们就在想，让你去读个博士，你一个专硕，你也不太现实。

T：我们的培养方向完全不一样呀，我们这方面接触得太少了。而且哪个老师会要呢，他们本来就对专硕不满意。

T 考上了 S 校的专业硕士后，学院组织学生交流会，所有考上研究生的同学都被邀请为嘉宾，但她由于考上的是专业硕士，被排除在外。T 感受到的是她作为专业硕士中的一员受到的冷遇，以致后来 H 老师即便只是针对其他同学，她也会把老师对其他同学的评价看作是对专业硕士这一群体的评价，从而产生了专业硕士在老师眼里不受重

视，想要继续深造不大现实的刻板印象。

其次，消极的外部评价容易使全日制专业硕士在社会比较中形成外群体偏好，产生群体的自卑感。

在群际关系的研究中，一个最一致的发现就是内群体偏好效应，即社会群体成员更偏好内群体，而不是外群体。但是也有研究指出低地位群体的成员对外群体的成员反而抱有积极的态度（Jost, J. T., Pelham, B. W., Carvallo, M, 2002）。本研究发现全日制专业硕士对与其处于“竞争”地位的学术型硕士并无敌对的态度，更多地表现出羡慕和向往的情感。通过社会比较产生了群体的自卑感。专业硕士与学术型硕士的接触并不多，这学期他们只有一门课是在一起上的，私下的交流也非常少，本学期两个班级一起组织的活动只有一次，而且学术型硕士只有2名同学参加。在访谈中，访谈对象也承认自己与学术型硕士接触不多，但仍一直反复提及学术型硕士的学习和生活状态，而且叙述时不会出现具体的某位学术型硕士，而是用笼统地用学术型硕士这一称号代指，更多的时候是他们想象出来的学术型硕士的学习状态。

16. 他们是竞争对手吗？他们“敌对”什么呢？

C：人家学术型硕士住在校内，享受的资源肯定更丰富，像我们住在校外每天花在坐车上的时间就那么久，人家这个时候可以坐在图书馆里看书。而且有些讲座我们想听但是也没办法听，太晚了就没车回住的地方了。

17. 一方面不愿趋同，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区分，这是一种矛盾心态，可以加以解释。

Q：学硕他们天天看英文文献，天天帮老师写东西，日积月累的，毕业时科研能力肯定不一样的……

T：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就没有给他们上课的老师那么牛。（那你知道哪些老师给他们上了什么课吗？）具体的不太清楚，但是我们上的课根本与学前教育没多大关系，他们上的一些课我们没有开设啊。

他们认为学术型硕士理论水平高、科研能力强、需要经常阅读大量的英文文献、经常帮助导师干活、学习很努力……他们的这种认识并非建立在对学术型硕士非常了解的基础之上，而更多的是自己的想象或者偶尔“听说”过一两个这样的例子就将其作为对学术型硕士的整体评价，并将这种状态与自己每天的生活和学习状态对比，进一步加剧了内群体的自卑感。

第三，刻板印象使全日制专业硕士倾向于选择符合群体“规范”的典型事件进行加工，进一步强化和扩大了消极群体情绪的影响。法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群体表现出来的感情，不管是好是坏，其突出特点就是极为简单而夸张，群体情绪的夸张倾向使得群体容易被极端情绪打动（古斯塔夫·勒庞，2010）。由于全日制专业硕士自认为比不上学术型硕士，已经形成了低人一等、学校不重视的刻板印象，因此他们在访谈中倾向于述说部分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同学的典型事件，或者特别能代表他们消极情绪的事件。在访谈中，Q、T、Z 都曾经提到同一件事——班级里 4 位女同学觉得所学课程没有意义，导师又不管她们，实在太郁闷，晚上集体出去喝白酒。他们将这件事情作为最能代表他们感受的典型事件反复提及，在叙述的过程中语气和表情较为夸张，进一步强化了对本群体的消极情绪。笔者也了解到其实他们班级也有部分同学比较用功，但访谈对象在谈及他们的时候语气较为平淡，将这些同学视为特例，他们认为这些同学是“比较特殊的”。

综上所述，群体成员会结合自己作为群体一员的经历和遭遇，将外部的评价逐渐内化为自身对本群体的评价，而外界对于全日制专业硕士这一群体的评价多为负面消极的评价，再加上全日制专业硕士在招生录取中多为调剂生，学校和学院的培养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因此群体成员多形成低人一等、学校不重视的刻板印象。带着这种刻板印象，全日制专业硕士在与学术型硕士进行社会比较的过程中往往对学术型硕士产生羡慕和向往的情感，更加深了群体内的自卑感。此外，刻板印象使全日制专业硕士倾向于选择符合群体“规范”的典型事件进行加工，进一步强化和扩大了消极群体情绪的影响。

18. 这部分概况比较好。

### （三）全日制专业硕士群体消极情绪对个体的影响

心理学许多研究都关注了情绪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众多研究表明个体的情绪与行为具有相互影响的作用，积极的情绪更容易产生积极的行为，积极的行为又会引起积极的情绪，同样，消极情绪与消极行为之间的关系亦如此。

一些突发群体事件的研究也探讨了群体情绪与群体行为之间的关系。群体情绪会影响群体中的个体成员对待与群体有关事宜的态度和行为，但是由于个体心理特征的差异以及个体的经历与遭遇不同，群体情绪对个体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下面以T、J、L三人为例探讨群体消极情绪对个体的影响。

T的例子

T本科就读于某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报考B校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生，被调剂为学前教育全日制专业硕士。

◇录取方式：跨专业调剂

T：我本校的同学有保研的，也保的是专硕，她就跟我说区分没那么大的。可是人家保这个的可能就是当时了解清楚了去保，但我没得选择。

◇导师培养：放养型，导师疏于管理，师生缺乏交流

T自述：导师根本不管我们，她经常说硕士两年能学到什么东西，就让我们不管是学术型还是专业型的硕士，只要是跨专业来的，都去听听本科生的专业课。反正我们跟她没有单独交流过，不敢，她气场太强大，有点害怕。

同门Z：我们这学期就见过导师三次，一次是新生见面会，就见了个面她就走了，还有两次是开师门会，还都是讨论师姐们的开题和论文，我们就在旁边静静地听……

◇ 敏感性：高

T：结果我被调了专硕之后，我们有一个新老生交流会就是考了研的要和学弟学妹交流，这个时候没有叫我去，只要考上研究生的就是作为嘉宾去的，我都没有被叫，可能老师就觉得还挺丢人的呀。

◇自我调节能力：低

“但是专硕我们心里面还是很不认同的”，“我自己感觉就是没有接受的那个过程，调试期特别艰难”“受歧视的话，很多人说是会的。真正我体会的东西也是……”她在访谈中使用的消极情绪词汇最多，一直是抱怨的话，很少从积极的方面思考。

◇ 群体消极情绪对个体的影响：影响较大，被动地接受群体消极情绪

自述：

T: 我觉得没必要那么认真学习，反正以后也是当幼儿园老师。

T: 得过且过吧，我本来还想好好读一下的，结果你看安排的这些课，我现在就想快点过完这两年，拿个文凭早点找工作。

Z 对 T 的叙述：

我们班很多人都心里觉得不好受，像 T 和 ×× 前天晚上因为太郁闷了就一起出去喝酒，大家都是心里不舒服。

J 的例子

J 本科专业为教育技术，获得专业硕士的保送名额，自己选择了学前教育专业。现为班长，并通过竞选成为研究生会主席团成员。

◇ 录取方式：保送专硕名额

J：我是保研的，保的就是专硕的名额。学校根据平时的成绩还有参加各种活动的情况来确定你是否有保研的资格，我当时排名是第三，只有前两名有资格保送学术型，所以我就只能保送专硕了。

◇ 导师培养：放养型，导师疏于管理，师生缺乏交流（与 T 同导师）

◇自我调节能力：高

J：因为我已经是专硕了，我就特别想往专硕的好的方向想 。首先它专硕比学硕少一年，然后专硕是面向就业、职业导向的，是应用型人才。学硕呢，它相对来说是搞学术的，很多人也说学硕是为将来考博士做准备的，是博士的跳板，学得比较深入。我们的应用比较深入，发展前景比较好。

常常警醒自己是好的，就像常常把自己的不足列出来一样的。看得到不足，总比看不到的不足好改的多。（摘自 J 博客 ）

◇学习动机：为了求知，学习动机来自内部，强

读书，真的太重要的。这一年里，尤其是后半年，越发的觉得自己知识的匮乏和素养的低下。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在非学术领域……（摘自 J 博客）

今天读到威廉·德莱塞维茨（William Deresiewicz）在

斯坦福大学的演讲时，看到如下的话，觉得此时对我很受用……（摘自J博客）

◇群体消极情绪对个体的影响：积极地进行自我调节，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群体消极情绪较少影响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学习。

J: 不想浪费时间，我们的培养方式的确有问题，要是我自己再不努力，那这两年不是白上了吗。我偶尔去听听本科生的课，还是有些收获的，总比自己什么都不做强。J还向我借了两本专业方面的书籍，偶尔碰见他的时候他也会跟我讨论。

19. 主客观的互动来理解。

L的例子

L本科就读于某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考研时被调剂到学前教育读专业硕士。

◇ 录取方式：调剂

L：当时也不给我们考虑的时间，当场就必须决定把你调剂到学前教育读专业硕士你愿不愿意，我对专业硕士什么都不了解就必须做决定。

◇ 导师培养：导师有较明确的培养计划，在学习上经常给予帮助。

L：我们老师对专业硕士和学术型硕士的培养是不一样的，她经常带我们下园，可能觉得我们偏实践吧。

L：我跟导师说想出国读博，她很支持我，有时候会鼓励我。

◇ 敏感性：高

L：比如说只要用“你们专硕”这样的词大家都会比较敏感。H老师当时就说其实学硕和专硕也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啦，你们可以大家混合呀什么的，我听起来就觉得不舒服，就感觉她其实心底还是觉得我们和学硕不一样。

L：她没有明确说专硕要求就要低一点，但是上课的时候会表露一下，其实这个东西专硕也是需要的，就好象说也不能放低自己的要求，该学还是要学，但是对学硕可能心里面期待要更高。

◇ 学习动机：来自外部，学习动机强

L：我男朋友在国外××大学读博，他家里人觉得我是专硕，可能有点配不上他，不想让我们在一起，所以我

现在在准备雅思，希望也能到那读博士。

C：L 就很有计划有目标，她打算申请国外的 PHD，她男朋友在国外，她必须要出去，所以她很努力。她的生活更像是学术型研究生的生活状态，天天看英文文献，天天帮老师写东西。

◇ 群体消极情绪对个体的影响：L 对专业硕士的评价很消极，想要逃离该群体的意愿很强烈，并积极地准备考博。

L：真的很后悔当初接受调剂，我宁愿再花一年的时间复习考研，社会上对专业硕士的评价普遍不好，有些用人单位都没听过专业硕士，就算毕业了也不知道能做什么。

从上述三个例子中可以看出，群体消极情感对于群体成员的影响不尽相同。T、J、L 分别代表了群体消极情绪对个体产生影响的三种类型：T 消极地接受群体消极情感，会降低对自己的要求；J 会频繁地进行自我调节，尽量往好的方面想，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保持对自己的高要求；L 对自己属于专业硕士这一群体感到反感，群体认同感低，积极地努力想要逃离该群体。他们之所以有不同的行为和表现，个体的心理特征（如敏感性、情绪的自我调节能力、学习动机等）以及群体成员非共享的经验（如录取方式、导师培养方式等）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个体心理特征来看，敏感性高、自我调节能力弱、学习动机弱的群体成员更容易受群体消极情绪的影响；从录取方式来看，跨专业调剂的学生受群体消极情绪的影响较大，更容易产生厌学、自卑的情绪和自暴自弃的行为。

20.“降低”、“努力”、“逃离”的提炼还是很好的，应该三种类型做一些深入分析。

## 五、讨论

全日制专业硕士的设置是为了满足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全日制专业硕士群体消极情绪的产生反映出社会需求与大学人才培养方向上的矛盾，也是研究生培养方向转型的产物。传统上，大学被认为是培养高精尖人才的地方，科研成果是大学评估的重要指标，我国大学都以“研究型”大学为荣，因此，大学重科研和学术轻应用和技术，理论研究者的社会地位高于实践工作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以实践性、应用性为培养目标的全日制专业硕士在大学中的地位不高便可见一斑。我国专业硕士的开设借鉴了欧美

21. 虽然从分析中看不出为什么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很好，超越了就情绪解释情绪。

等西方国家研究生培养的模式，但西方国家强调研究生培养的专业性是以本科教育为通识教育的基础上，而我国本科阶段其实就已经开始了专业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全日制专业硕士与本科毕业生有多大程度的区别？况且许多开设全日制专业硕士的院校在人才培养上仍然穿新鞋走老路，依然沿用学术型硕士的培养方案，也完全不考虑全日制专业硕士自身发展的需求，如他们多为跨学科调剂生，学科和专业知识欠缺，院系在开设课程时应考虑专业硕士的生源特征以及他们对职业定位的差异。

## 六、研究反思

### （一）研究者的身份

我是S校学前教育专业的博士一年级学生，硕士也就读于S校该专业，对该专业的招生、就业和培养情况较为了解。研究对象为笔者的师弟妹，其中有三名为同导师的师弟妹。由于我是高年级的师姐，在我提出访谈邀请时，他们基本都欣然同意，且提供的信息较为全面，愿意与我分享他们的生活、学习现状，也会向我倾吐他们的困惑。他们较为信任我，有时我甚至感到自己像是他们的辅导员。记得有一次，一位同学主动与我QQ聊天，说有重要的事情想要询问我，他们班级有位同学怀孕了，不知如何向导师开口说明情况，担心导师会让她休学一年，问我应该如何处理。由于他们长期感到不满，有时候访谈更像是他们在“吐槽”。另一方面，由于大家都处于同一专业，对各自的导师都较为熟悉，访谈中涉及导师培养的部分相对来说比较敏感，部分同学会有所顾虑，在问到这部分的情况时仅一两句话带过，也很少主动提及。

22. 有很好的方法论反省。研究的写作是坦诚、认真和考虑周到、仔细的，很好。

### （二）研究方法

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我主要采用了访谈法，但我认为如果能够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上课情况进行观察，获得的资料会更丰富，而且可以通过相互佐证检验资料的真实性。此外，在访谈中，我也意识到了研究者如何发问非常重要。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有些问题的价值取向过于明显，对访谈对象有导向作用。在访谈过程中，

23. 正视自己的价值和立场也很重要，坦诚是解决之道。

尽管我大多数时候在认真倾听,但由于自己的敏感性不够、访谈经验不足，常常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错过了许多需要追问的地方。最后，由于本人并不健谈，性格较为内敛，在遇到同样内向的研究对象时，访谈容易陷入尴尬的局面,而且经常在访谈时会发现自己脑子一片空白，忘记自己下一步应该问什么，还需要在日后的研究中训练自己的访谈技巧。

24. 性格内向对访谈也是有优势的，主要是研究者要充分准备，多练习。交流、访谈的质量不取决于性格。何况研究不同于新闻访谈，不是“表现”而是要深入细致探究原因。

### （三）研究伦理

尽管我在访谈前征询了访谈对象的意见，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接受访谈，是否可以录音，并取得了他们的同意，但我感觉自己在问他们生活、学习状况时，有可能会唤起他们的消极情绪，毕竟集体消极情绪在个体身上并不是时时刻刻都会表现出来，只有在涉及有关集体事件时，才会表现出来。因此，我不知道我的研究是否会强化这种集体消极情绪，虽然我的问题都没有直接询问他们的感受，也避免将他们与学术型硕士进行比较，但由于这些问题，他们会激活心中的集体消极情绪。

25. 这些做法很好，也有很好的反省。

[参考文献]

别敦荣、赵映川、闫建璋(2009):“专业学位概念释义及其定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第6期,第52页。

陈向明(2000):“本土概念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第3期,第196-19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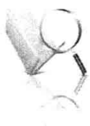
陈向明(1999):“资料的归类和分析”,《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第223—225页。

林晓珊(2005):“‘边缘群体’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歧视探析”,《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第1期,第36—40页。

刘国瑜(2005):“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特征及其体现”,《中国高教研究》,第11期,第31—32页。

聂文娟(2011):“群体情感与集体身份认同的建构”,《外交评论》,第4期,第83—95页。

石中英(2007):“论专业学位教育的专业性”,《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第1期,第7—1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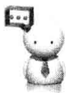


## 文末“评”

论文既有心理学的范式，也有社会学的味道。无论怎样，该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一群新型而另类的研究生群体的学习、生活以及情绪体验，并很好地分析了这种情绪产生的原因。

作者很用心，实事求是地、细致地收集很有信服力的各种资料。读来很有磁性，会走进这个群体，并会启发更多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的选题很好，研究过程也很深入。研究比较规范，有较好的结构，写作具体、生动，用词达意，遣词用心，叙述流畅。全文始终，作者使用质性研究方法的认真、严谨以及不住地反思。只要善于反思，就会进步。

在研究方法方面，作为初入门者，如此认真灵动地把握质性研究，已经是非常不错的，还可以想想，自己是怎样梳理材料的？一些主题是怎样出现的，结论与梳理材料的主题是什么关系？在呈现出来的访谈资料上，希望看出你的“编码”和分析的痕迹，这样方便理解和阅读。



## 学生回应

首先非常感谢郑老师对拙文的细致点评，让我感受到了郑老师对初入门者的鼓励，增强了我日后从事质性研究工作的信心。从郑老师的点评中可以看出，由于我在文章中没有交代如何进行编码和分析，仅将最后的结果呈现出来，给读者的理解和阅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在此，我想简要叙述写作的背景和思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篇文章。

最初选题的时候，我是想了解目前学校对学前教育专业全日制专业硕士是如何培养的，在整理访谈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经常使用一些消极的心理词汇，因此，我使用“群体消极情感”来概括这些消极的心理词汇，并将其作为本文的本土概念进行分析。我希望通过分析全日制专业硕士的群体消极情感的表现及成因，揭露出目前学校培养方式上存在的问题。但是由于我将重点过多地放在群体消极情感的分析上，对学校培养方式的分析显得薄弱，不容易让读者抓住重点。因此，在今后的学习中，我要进一步学习如何更好地围绕研究问题将资料呈现在读者面前。

郑老师在文中“点”提到了很多值得进一步分析的地方，如导致全日制专业硕士产生群体消极情感的“外部评价”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全日制专业硕士为什么会产生既不愿趋同又不愿区分的矛盾心理等，如果能够进一步地挖掘相关信息，也许文章会更有深度和内涵。

---

## 点评专家郑新蓉简介

郑新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元文化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妇女研究会副秘书长，全国妇女研究会妇女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第十二、十三届、十四届人大代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育政策研究系，福布莱特高访学者（2004—2005）。主要从事教育学、马列教育思想研究、教育法学、基础教育改革、农村教育、教师支持体系、多元文化教育、教育社会学、性别研究以及妇女教育的教学和研究。

# 一个特别的培智学校学生：

## 家长与教师之间的“战争”

文／陆莎[1]
评／朱志勇

[摘要]本研究对某培智学校学生进行了个案分析，采用了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进行数据收集，对家长教养方式与学校教育方式的差异进行了剖析。研究发现家长教养方式与学校教育方式的差异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对自闭症的接受程度不一致，二是对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社会支持的匮乏。

[关键词]家庭教养方式　学校教育方式　自闭症　家长　教师

[1]陆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研究所，特殊教育学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特殊教育基本理论。

自闭症是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主要以社会交往障碍、语言障碍、兴趣范围狭窄和行为方式刻板重复为基本临床特征，通常在三岁前发病，持续终身并广泛影响个体发展(DSM-IV 自闭症诊断标准)。自 1943 年美国的临床医学家 Leo Kanner 发表《情感交流的自闭性障碍》以来，研究者对自闭症的诊断和干预进行广泛研究，目前还没有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我国患有自闭症的儿童不在少数，如果根据现今国际公认的标准，即十万分之二至十万分之十三的患病率来推算，我国约有自闭症儿童 30 万 -50 万。自闭症几乎是伴随终生的，其存在着行为困难、认知损伤、社交及沟通技能缺乏等问题，其父母要持续面对各种应激，严重影响心理和社会适应（Rodigue,1990）。国外研究显示，自闭症儿童的父母通常面临个人生活及情绪受到影响、婚姻关系危机、工作时间改变以及必须承担维持家庭秩序的责任等压力源（Gray,2003）。家庭、学校是自闭症儿童成长的主要场所，家长的教养方式、学校老师的教育方式对自闭症儿童的成长至关重要，教师、家长对待自闭症儿童的方式值得关注，这将直接影响到自闭症儿童的成长。

## 一、家庭教养方式与教师教育方式

在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家庭教养方式”这一概念的使用并不统一。经常被使用的词语有：家庭教育方式、教育行为、教养方法、教养教育等。虽然用词上不尽相同，但其实际包含的意义却大同小异。它用来表示父母在教育儿童的活动中通常使用的方法和形式，是父母的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其对儿童的情感表现的一种组合方式，是父母各种教养行为的特征概括。Darling & Steinberg（1993）认为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教养态度、行为和非言语表达的集合，它反映了亲子互动的性质，具有跨情境的稳定性。教养方式包含着抚养和教育两个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父母不仅要为子女的身体健康成长投入精力，而且还要通过家庭关系、家庭活动、家庭游戏等方式培养子女健康的心理，并且在情感上要给予子女最大的支持和帮助。家庭中的教养，事实上是通过养而教的，即在养育的过程中达到教育的目的。Baumrind（1971）提出常见的三种教养方式：

**文中“点”**

1. 如果一定要使用这种表述方式，那么后面列出的文献最起码得三个以上，否则“国外研究显示”就显得单薄。如果不使用“国外研究显示”，可以直接列出研究者。这说明研究者在做研究之后行文陈述方面存在问题。

2. 第一段这部分，研究者到底想要说明什么？

3. 这一部分作者需要思考如下问题：这部分与上文第一段的关系？研究者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为什么陈述“家庭教养与教师教育方式？”如果是要提出研究问题，那么研究问题在哪里？研究问题只沉湎于书堆中思考吗？以上两部分中陈述的观点是否具有较好的逻辑性？

专制型、权威型、纵容型。

教师的教育方式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定行为模式，它贯穿于师生交往的互动过程，对学生多方面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程巍，申继亮，2001）。研究表明，教师对待学生的不同方式和态度可影响学生在认识、情绪、自我评价等方面的发展（White and Kistner,1992; Minuchin and ShaPiro,1983;Lewin and Lippitt,1968,1939）。

4. 陈述到这里依然没有告知读者研究问题是什么？研究问题还没有，哪来的“研究方法”可言？这是什么逻辑？

## 二、研究方法

### （一）研究对象

5. 在称呼研究对象时用这样的字母标示符合质性研究的研究伦理吗？既然是研究这样的一位学生，研究者是如何进入研究情境的？又是如何告知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的？

本研究将北京市某培智学校一名自闭症学生的家长和学校教师作为研究对象。相比培智学校的其余学生而言，这名自闭症学生 W 的特别之处是有一名陪读老师陪读。W，男，现在 15 岁，在三岁时已经被正规医疗机构确诊为自闭症。

### （二）资料收集

（1）访谈法：本研究访谈了学生 W 所在班级的教师，包括班主任、部分任课教师；同时也访谈了学生 W 的母亲以及陪读老师。

6. “教师”与“老师”的区别在哪里？到底如何使用？一位质性研究者难道对所使用的概念没有好好琢磨吗？

（2）参与式观察法：研究者采用了参与式观察的方法（研究者以班级实习老师的身份进入班级），观察的内容包括教师在课堂中、课后对学生 W 的教育方式；教师在遇到突发情况时的应对方式；学生 W 的母亲在校陪读时的教养方式。在进行观察时，研究者主要是在教室后方对学生 W、教师等进行观察。

7. 这里是搜集资料的方法，那么“文本分析”是搜集资料的方法吗？到底如何表述？

（3）文本分析：本研究收集了学生 W 在校的个人档案，个别化教育计划，家校联系本。

### （三）研究工具

8. 从小标题的陈述方式看，研究者是否带着一种“量化研究”的思维模式在做质性研究呢？质性研究的研究工具到底是什么？

质性研究中，访谈提纲需要呈现在正文中吗？

根据研究目的编写访谈提纲，教师访谈提纲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学生 W 初到校时的情况，现时状况与初到时比较；（2）在教学中教师如何对待学生 W，学生 W 不听从教学指令，扰乱课堂纪律时教师如何处理；学生 W 完成学习任务时教师会如何对待；（3）在教学外教师与学生 W 的互动；（4）教师与家长就学生 W 的学习生活等是如何交

流的。家长访谈提纲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从觉察孩子表现异常到确诊为自闭症、到孩子接受训练、到孩子在普通小学上学再到现在孩子在培智学校上学，在这个过程中母亲是如何应对的；（2）从确诊为自闭症、到孩子接受训练、到孩子在普通小学上学再到现在孩子在培智学校上学，在这个过程中母亲教育方式上的变化；（3）母亲对W的教育方式以及W在家庭中的情况如何；（4）母亲与学校教师沟通W的学习生活情况。在进行观察时的观察提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上课时老师对学生W的关注频率、关注方式、关注原因；（2）学生W出现扰乱课堂行为时老师的处理方式；（3）老师如何指导学生W完成教学内容；（4）学生W在课堂上的表现。母亲在校陪读期间主要观察母亲与学生W的互动、遇到突发情况时母亲的处理方式以及母亲与学校教师的互动情况。

9. 研究者在访谈中，出现“不听从”、“扰乱”这样的概念对整个访谈有什么影响？

### （四）研究程序

访谈前先进入现场观察，了解学生W在学校的情况，调整访谈提纲内容。访谈后也通过观察对访谈结果进行验证。访谈采用正式的结构性访谈和非正式的无结构的访谈。对于学校教师的访谈，研究的前期主要采用的是非正式的无结构的访谈，一般是从情境中的某件事情或某个问题入手，引发访谈。访谈对象为学生W所在班级的任课老师及陪读老师，主要是从各方面了解学生W的在校情况；正式的结构性访谈一共进行了三次，其中对学生W现在的班主任L老师面对面访谈两次，第一次访谈于2012年10月中旬在班级教室中进行；第二次访谈于2012年11月末在教师休息室进行。第三次访谈对象是学生W以前的班主任J老师。对学生母亲的正式访谈在2012年11月初家长会后进行。每次访谈的时间约为40分钟。在访谈时，考虑到学生W母亲对涉及家庭方面话题比较敏感，向其说明了此次访谈是为了解学生W在家的表现情况为学校教师制定教育计划做参考，同时与家长交流其对学校教育的评价和建议。

10. 什么现场？指学校？班级？课堂？课外活动？还是家庭？等等。何时进入？如何进入？

11. 观察什么？在哪儿观察？观察谁？如何观察？

访谈资料的分析采用类属分析方法和情境分析法，类属分析法即在访谈资料中寻找反复出现的现象以及可以解释这些想象的重要概念的过程，将具有相同属性的资料归入同一类别，并且以一定的概念进行命名。“情境分析”

12. 这里已经涉及“资料分析”部分，那么以上有关资料搜集方法是否要与“资料分析”方法分开，研究者需要思考。这里研究者需要考虑读者的阅读逻辑。

指的是将资料放置于研究现象所处的自然情境之中，按照故事发生的时序对有关事件和人物进行描述性的分析。这是一种将整体先分散，然后再整合的方式，首先看到资料的整体情形，然后将资料打碎，进行分解，最后将分解的部分整合成一个完整的、在一个真实情境中的故事。

13. 这两种分析资料的方法是你自创的？如何结合研究者所搜集的资料来论述？

## 三、分析与讨论

在研究进行中，从与陪读老师、母亲、班主任 L 老师和 J 老师的交谈中多次听到“要求”这个词，班主任老师多次说“母亲和我们的要求不一样”，陪读老师经常说“母亲要求太高了”。起初注意到这个词是陪读老师在对母亲的一些行为的控诉，后来发现这个词语背后反映了教师与家长围绕着 W 教育方式的“战争”。“要求”这个词对研究者找寻研究问题的答案有很大的帮助。“要求” 即本研究中的本土概念，涉及家长和学校教师双方在教育方式、教育观念方面的看法以及家校合作等。

14. 这些角色之间有什么关系？研究者是否需要简单给予介绍？这种介绍可以使用当页的脚注方式来陈述。“陪读老师”是一个什么身份？为什么称此人为“老师”？此人与学校中的该生在学校中的教师是同样的角色吗？

15. 研究者在这里针对双方的矛盾使用“战争”是否妥当？需要再思考。

16. 如果这段以及后续的几个段落都是在分析“本土概念”，这里是否需要给出一个二级目录“本土概念”？

首先，“要求”这个词从表面上说就是一个中性词，但是不同人说出来就带有不同的个人观点。陪读老师表达的是与 W 母亲雇佣关系之间的抱怨，也能从侧面了解母亲对孩子的教育理念和教养方式。学校教师表达的是母亲、教师双方在教育方式、教育评价方面的差异。其次，通过“要求”能够看出教师、母亲在对待方式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以下将以母亲、教师的两条线路，从家庭教养过程 / 学校教育过程、具体的教育方式以及家校合作三个角度对其进行分析。

### （一）家庭教养方式

17. 如果这里的分析情境是“家庭”，那么研究者的资料分析到底在哪里“发力”？“发力”之后又会形成什么样的“焦点”？最后又会建构什么样的“结论”？这些都需要研究者重新思考质性研究资料的搜集以及“分析”！

**1. 家庭教养过程的特点（即母亲对发现孩子异常、确诊为自闭症、到孩子接受训练、到孩子在普通小学上学再到现在孩子在培智学校上学这一过程中母亲的变化）**

（1）觉察到异常

以往的研究表明，自闭症儿童的早期发现与早期治疗对康复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访谈过程中发现，学生 W 的母亲在确诊之前就觉察到了 W 身上存在的异常情况，也有些怀疑。“W 一岁的时候还不太会说话，和别的小孩子比起来，

他就比较安静，那时候我就想可能我的孩子说话就比较晚。两岁的时候看着呆呆的，老是自己疯跑。”

（2）面对诊断的反应

自闭症儿童的确诊对家庭教养的影响是逐步显现的。教养者通常会对医生的结论产生怀疑。查阅 W 的档案发现，W 在 3 岁的时候已经被北京某正规医院确认为自闭症，据 W 的陪读老师说“W 奶奶是医生，认识北京某医院的医生，当时就推荐给一位 90 年代最早做自闭症诊断的医生看看，结果那医生说就是自闭症，但是我们都还不相信，因为 W 那时候挺聪明的，一些数字计算的什么都会，我就不相信 W 会是自闭症，当时对自闭症这个也没有什么了解。就觉得应该是搞错了。”之后家长就会寻求各种渠道去验证这样的诊断是不是正确的，W 的妈妈说“后来发现医生说的很多症状，对照 W 的一看，差不多，那时候就觉得肯定是了。”当孩子是自闭症这一事实被确认的时候，家庭的生活秩序有了很大的调整。W 的班主任 J 老师谈到“W 爸爸在孩子被确定为自闭症之后，接受不了孩子是自闭症，越来越少回家，和她母亲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虽然 W 爸爸不太回家，但是爷爷奶奶还是很爱这个孙子，当宝贝似的，可怜好好的一个孩子是一个自闭症孩子。W 虽然经常回爷爷奶奶家，但是主要的照料者还是母亲，这几年 W 爸爸只是一个月回来见一次孩子，带孩子出去吃吃饭什么的，今年也听说 W 爸爸妈妈已经离异。”

（3）不断的训练

自闭症儿童的教养过程事实上就是家长不断学习的过程。因为无法采用药物等手段进行有效的治疗，W 妈妈认可通过不断的训练让 W 和普通儿童一样。“那时我带着 W 去过很多专门针对这种孩子的训练机构，去过大连的一个通过孩子与海豚接触训练的，也去过北京的一些私人办的机构，也去了星星雨，那也是一家自闭症机构，创办机构的也是一个自闭症孩子的母亲，那时候我向单位请了三个月假，就带着 W 在那训练，那几个月，说实话对我影响挺大的，让我觉得从内至外进行了一次洗礼。也可能是那个妈妈的那种经历说出了我心里的很多话，让我学着怎么去带 W，之后由于单位工作不太好请假，我就也很少去参加

18. 这里的陈述方式是否类似于在初高中时写论述文的形式，即先有观点再有论据？观点是来自资料的分析，还是来自前人的研究？所以，这里就带来一个非常值得研究者思考的问题：前文所论述的资料分析法中的“类属分析法”与“情境分析法”到底是如何展示在研究资料分析中？看起来好像有“两张皮”的嫌疑？而这里的后面的陈述也是这样的风格！

19. 这是一手的访谈资料吗？如果是，所有不同访谈对象的资料难道不需要时间、对象、次数的标号吗？这样随意的引用所搜集的资料，又如何证明该研究资料搜集及引用的“连续性、系统性、整体性、真实性、科学性、规范性”？又如何呈现？

20. 这里是来自研究对象的资料，如果是简短的观点，到底如何引注？研究者需要认真思考，读一读前人的研究论文。

那样的培训了。”

对于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训练，母亲没有特别的明确的参考标准，能用什么就用什么。对 W 使用过 ABA 行为训练，海豚音疗法，生活训练等，取得过一些效果，但是 W 还是达不到正常儿童的水平。

（4）普通小学四年

在 W 七岁的时候，母亲还是将孩子送到了椿树馆小学上学，母亲说“在椿树馆小学的时候，W 头几年还是表现不错的，能跟得上学校的课程，学习成绩也不错。到后来学习跟不上了，学校那边建议说换个学校才转到这边（指现在的培智学校）来的。”班主任 J 老师是培智学校最早接手 W 的老师，对 W 转学到这边来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当时 W 转来这边的时候，我们这边的老师还到椿树馆小学进行了一些调查，问问 W 在那边的情况，据那边的老师说 W 在那边最严重的时候就是躺地上不起来，直接就横躺在走廊里不起来，W 也到了青春期，力气大，一般老师也拉不起来他，整不了他，又实在影响老师上课，所以校长就建议 W 的妈妈能把 W 转到专门的学校去，所以就这样 W 才来的我们这边。”

从把 W 送到普通小学上学看，W 的妈妈还是希望 W 能够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也希望 W 在学习等各方面能够和普通儿童一样，但是 W 在社会交往、情绪表达等方面的表现使得 W 已经不适合在普通学校学习。

（5）进入培智学校

W 在 2010 年进入北京市某培智学校，当时学校正进行综合课程改革实验，W 进入了学校的实验班。J 老师和 L 老师是这个班级的班主任，采用生活化课程对学生进行教学，目的在于既能让学生掌握生活技能又能让学生学习知识，其中自我服务的能力是关键。J 老师回忆说，“当时相比班上其余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听指示的能力，W 的能力是比较差的，经常跑出教室，或者躺在地上，蹲在地上不起来。W 的这种行为时好时坏，随着 W 的年龄长大，力气也大，我们老师一个人弄不过来，又不能放着整个班级的学生不管去追跑出去的 W，就只能和 W 的妈妈商量，看看能不能请一个陪读，这样至少有人管着 W 不乱跑。”

因此，在学校的建议下，W 母亲请了一人在学校陪读并负责上、下学接送。

从这个教养过程中可以看出，虽然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但是 W 妈妈还是坚持着让 W 在普通教育环境下接受教育，希望他能够获得与普通儿童一样的成就，到后来在普通学校中接受教育给周围同学、教师造成困扰时才选择在培智学校中接受教育，其对 W 的“要求”一直是与普通儿童一样，期望 W 在知识学习上能够取得很高的成就（母亲在访谈中提到过，“W 在小学的时候可聪明了，什么东西一教就会，会背唐诗，算数也很厉害，我就希望他和他班级里其他儿童一样优秀。”陪读老师在访谈中聊到关于 W 在家主要做什么的时候说到，“W 三点半放学回家，休息十分钟左右，她妈妈就会让我教 W 学这学那，下午到晚上要安排学读课文，写日记，算数，写字，唱歌。老师在学校教的这些叠衣服啊、叠裤子啊在家基本都不练习，他妈妈就希望多学习些这个。其实 W 的自理能力没他妈妈说的那么好，在家 W 洗脸、刷牙、上厕所这些都是要人帮忙的。”，而忽视了对 W 生活自理能力的训练。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说，自理能力往往比学习成绩、知识学习更加重要。只有这样，他们能够进入社会，进一步自立。

21.“家庭教养过程”这一节中探讨的是自闭症儿童W的“早期发现、治疗、确证、教养过程、上学、培智学校、陪读老师”，请问这几个关键性的“概念”是从“资料分析”中“获得”，还是研究者从已有文献思维中“拿来”？这里的分析方法是“类属”还是“情境”？按照标题“家庭教养过程”来看，好似“情境分析法”，但是研究者没有凸显“家庭”这一“情境”中的“教养者及其教养行动、教养者与教养对象的互动及其产生的影响”，等等。

**2. 具体的教育方式特点**

从访谈资料中可获得母亲平时生活中对待 W 的方式：“我对 W 是比较赏罚分明的，做错了就要批评，做好了就要表扬。平时 W 做好了我就会说：真棒；做得不对的地方，我就会说不对。”陪读老师描述母亲教育 W 的方式：“妈妈比较宠他，在家妈妈都对他一手包办，洗脸、穿衣服、吃饭、上厕所都是他妈妈帮着，晚上还带着睡觉，现在 W 都 15 岁了都是宝宝啊，乖乖的叫，晚上都还让他抱着洋娃娃睡觉。当 W 非常不听话的时候，他妈妈就会摆脸色不高兴，W 就会听话些，绝大多数的时候母亲都是哄小宝宝一样的哄着。很严重时，他妈妈才会生气，这样的情况下，W 就会听话些。”

22.这里的文献标注呢？Baumrind 的父母教育子女方式的理论是针对自闭症儿童的吗？如果不是，这里引用是否合适？

结合观察母亲在校陪读的情况，母亲叙述的教育方式与实际是有差异的。按照 Baumrind 提出的常见的三种教养方式，专制型、权威型和纵容型。纵容型的养育方式又可

23. 这位学者是否是在特殊教育方面有所研究？他的著作是否针对特殊儿童的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如果不是，为什么不引用相关领域的学者的研究和观点？

以分为“溺爱型”和“放任型”两种。母亲对W的教育方式更倾向于宠溺，尽管母亲说是赏罚分明，但在W犯错时母亲大多只是口头教育，并没有根据具体情况而采用合适的方式进行教育（如：在母亲陪读时，W私自跑离教室去往操场，母亲发现后只是在走廊对W教育说跑出去是不对的，下次不能这么做）。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说，学习规则、习惯养成不是通过简单说教就可以达到，适度、正确的使用惩罚、奖赏对他们学习规则、习惯更有帮助，具体的惩罚或表扬措施比口头说教更有效果。

**3. 家校合作**

家校合作就是“联合对学生最具有影响力的两个社会机构—家庭和学校的力量对学生进行教育。在教育活动中，家庭和学校相互支持，共同努力，使学校能在教育学生方面得到更多的来自家庭方面的支持，使家长能在教育子女方面得到更多的来自学校的指导”（马忠虎，1999: 第120–121页）。特殊儿童生理和心理上的缺陷使得家长的教养压力和学校教师的教育压力更大,面临的挑战也更多。在此情况下，更需要家长参与到学校教育中来，形成一股合力，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特殊儿童的潜能，增强他们的自理能力，提高他们的适应能力。

W所在的培智学校平时采用家校联系本、短信等方式与家长沟通，老师每天会把学生在校情况、家长辅助事项以及学校通知等通过家校联系本通知家长，家长也可通过此联系本将学生在家的表现情况、训练情况与老师沟通。

查阅班级中所有学生的家校联系本，W母亲在家校联系本上很少留言，即母亲没有向老师反馈W在家的情况。班主任谈及W母亲与学校沟通状况时说到，“起初她还是对老师的一些小建议，布置的作业还是蛮配合的，也会积极写到在家练习了在校的学习内容，慢慢的我们老师觉得W的情况没有他母亲说的那么好，也奇怪是不是W在家会好一些，与W母亲的谈话也会说W在家都是很好的情况，后来我们老师就觉得W妈妈只是表面上答应得好好的，实际上可能没有做到。慢慢的，她对W学校外的情况说的也越来越少，联系本上基本上也是空白。”相比别的家长，W母亲在与学校老师沟通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在教育上

没有和老师达到同步。对于自闭症儿童的教育来说，家长与教师能够保持在统一战线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学校所学的技能需要在课后进行训练，而是教师与家长的相互支持，形成一条坚固的战线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自闭症儿童的潜力，增强他们的自理能力乃至适应能力。

### （二）教师教育方式

#### 1. 教师教育方式的过程特点

对比刚入校时和现在的情况，W 有很大的进步。一是 W 的认知能力有所提高。班主任 J 老师说“W 刚来时，他的能力比较差，基本的认知能力都没有，与人沟通也不行，老师的指令完全听不懂，经常在学校乱跑，一溜烟他就跑了，乱咬书本，分不清哪些是该吃哪些是不该吃的。现在他在听从老师指令方面有了进步，当他情绪好时会把任务完成得很好，在基本的生活自理方面还是有一些进步的。”二是 W 的坏行为习惯有所改变。“这两年主要取得了 2 个成果，一是孩子的不守规则，不高兴了随处就躺地上，二是纠正了孩子的手淫的习惯。”W 在培智学校的这两年期间，班主任 J 老师与 L 老师对他投入了较多的精力。J 老师在初期培训 W 的生活习惯时，每天放学后都会写一份关于 W 训练内容、训练步骤的建议给母亲，在班级上给予 W 的注意力也比较多。其后因为别的家长反映由于过多的精力放在 W 身上对班级别的学生不公平，教师对 W 的精力慢慢减少直至回复到与别的学生一样。

#### 2. 具体教育方式的特点

老师们对 W 的教育方式具有较高的民主意识，对学生既有严格要求，又尊重他们的人格和能力。“W 不乖的时候，我们基本不会像他妈妈那样去哄。越哄他就越张狂，他的很多行为都是娇惯出来的。在学习上，我们就会要求他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批评就批评，他闹，躺地上，我们也不会去哄，要么就拉他起来，要么就忽视他一会，让他自己安静下来。”W 现在的情况，与其母亲的教养方式有很大关系。W 母亲采用婴儿式的教育方式，没有对不好的行为习惯进行约束。“W 这个孩子其实也不是很难带，其实他什么都明白，只是这么多年没有人约束他，很多习惯养成了。其实只要要求明确，他还是能做好的。不是说 W 不

24. 如何来证明“欠缺”这个结论？难道只是访谈就足以？研究者明明搜集到了“家校联系本”这么重要的一手资料，但是研究者意识到这个资料的重要性吗？是否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质性研究中研究者对资料敏感性体现在哪里？

25. 这段所谓的“分析或者讨论”读起来好像是“抄袭”过来的，就算不是直接抄袭，也是一种间接的抄袭！因为研究者没有针对研究个案中的“母亲与教师、母亲与儿童互动合作”的一手资料进行分析而得出具有实质性的讨论。而是研究者脱离自己的研究、脱离资料、脱离研究个案、脱离个案中的特殊行动者在“自说自话”！研究者在这里没有提炼出这个母亲与学校教师互动的方式，没有进一步阐述这种互动方式对 W 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26. 既然是分析出所谓的“特点”，那么能否用你得出的具体的特点来作为“标题”呢？上文中家庭教养过程的“特点”又是什么呢？研究者难道不需要一个或者多个概念来具体陈述这个“特别”的“点”吗？或者在该节后小结一下

可教，其实他还是可教的，很多方面还是有更好的发展的。她妈妈那样的把他当小孩的方式还真不适合他。”

分析出的“特点”吗？后面的分析存在同样的问题！

**3. 家校合作（教师与家长沟通方面）**

从学校方面来说，教师是希望家长与教师保持一致，共同致力于先培养学生好的行为习惯、自理能力然后提高其自立能力。学生在学校学习的生活常识都需要家长在家中指导并练习，这样才能够使学生学习的知识不会遗忘进而延续到日常生活中去。从学校教师看来，母亲在这方面做得还是很不够的。母亲一开始还是比较配合学校教育的，也比较认同我们，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他妈妈口头上认同但是实际行动上却不是那样。最开始的时候，J老师对W特别上心，每天都会有一大篇纸写着W在学校学了什么，学的怎么样，然后会写一些建议给家长希望家长在家能配合，可是W妈妈收到了就收到了也没有反馈。我们和她说一些建议或者道理，母亲最开始是很和颜悦色地听着，也答应的很好，可是就是不按着做，后来她妈妈干脆说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老师经常感叹，W开学从家回到学校后已经学习的知识基本都会遗忘，很多不好的行为习惯又会死灰复燃。

27. 这里资料进行分析了吗？分析出什么特点了吗？难道把资料“堆”在这里，就是“特点”吗？如果把前面的“家校合作”改成“校家合作”，这种标注方式还需要吗？

通过以上的分析能够看出教师、母亲在对待W上是有很大差异的。在教育目标上，母亲更偏向于让W学习更多的知识，比如会写日记、学习算数、读课文等；教师则偏向于让W先学习生活基本常识，提升自理能力，比如听从老师的指令、能够独立叠衣服等。在评价标准上，关于生活常识、行为习惯等母亲倾向于只要W学会一点即可而不要求W可以独立完成；教师则倾向于让W独立完成学习内容，能够达到自理的标准。在教育方式方面，母亲与教师也有很大差异。母亲倾向于宠溺，母亲对孩子的爱是出于天性的，但是过分宠溺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说反而会对他们的成长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教师在教育方式方面倾向于民主，认为学生通过能够获得相应的自理能力，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从而让他们生存得更好。

28. 研究者在这里总结上文的“资料分析”时，是从“教育目标、评价标准、教育方式”这三个方面着手，这与上文的资料分析的方法（类属分析法还是情境分析法？）一致吗？所有这三个层面中的观点都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吗？

## 四、结论

**1.“战争”源于对自闭症的接受程度**

从W母亲发现孩子异常到确诊再到不断参加训练、普通小学上学四年再到培智学校上学的过程中，母亲对孩子的成长定位更趋向于和普通孩子一样，也可以说她在以一种普通孩子的发展视角来对待自己的自闭症孩子，没有客观地对W的现在或者未来做出规划。在养育自闭症儿童的过程中，只有W母亲自己承担起主要的教养任务，一方面是她要面对孩子，坚守住漫长教育效果缓慢的过程；另一方面她要面对自己，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承载着很多压力，要以各种方式不断调适自己的情绪。W父亲由于不接受自己的儿子是自闭症与W母亲分开，家庭中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在照顾孩子方面力不从心等这些都给W母亲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在她内心中对于W的成长定位还是和普通孩子一样，希望孩子成才，忽视了孩子在自理能力、行为养成等方面的发展。对于学校教师来说，对于W是自闭症这一事实在入学的那一刻起的目标就是先自理后自立，朝着更好的自己发展，对于自闭症这一事实是理智接受的。因此，在学校教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方面都根据学生的需要进行及时调整，在日常学习中更要求学生在自理能力、自我服务方面的发展。

**2.“战争”源于对残疾儿童及其家庭社会支持的匮乏**

社会支持的概念起源于二十世纪中期，在几十年的发展中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内涵有各自的理解，对社会支持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Malecki 和 Demaray（2002）认为社会支持是来自外在的可以提高人们社会适应性，使之不受逆境伤害的一般或特殊的支持性行为。我国对自闭症的研究起步较晚，不但缺乏相关研究者在理论方面的深度探索和实践方面的专业支持，更缺乏人群中对自闭症知识的普及和对自闭症患者的理解，导致了自闭症患者获得的社会支持十分有限，不能满足其需要。

学校方面：进入学校和专业的康复机构是自闭症儿童走向社会的第一步，但是自闭症儿童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得到良好的社会支持。我国残疾人保障法中规定义务教育阶

29. 在结论中分析“战争”的来源之前，该研究是否已经把“战争”的状态分析清楚？把“战争”类别或特征分析清晰？

30. 该研究的资料分析以及讨论与隐喻“战争”之间能够“匹配”吗？

31. 这怎么理解？联系上下文来说是否不通顺？研究者对这个结论需要慎重

32. 研究者在下这个结论的时候需要谨慎！难道现在中国没有一个专业机构来诊断自闭症？尤其是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研究者到底多大程度上了解前人研究？

33. 研究者凭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再说，这样的叙述与本研究有什么关系？研究者在质性研究中到底如何做“结论”？

34. 研究者如果要论述这一方面，就需要搜集一手的资料，而不是凭他者“由于行为方面与别的同学不一样”而轻易做出这样的以及下面的论断！

35. 该研究中的“家长”又是什么状态呢？本研究中缺乏一手的资料。

36. 本研究中的研究对象的母亲到底是什么状态呢？

37. 这里的观点是针对本研究中的研究对象及相关的研究对象来“讨论”及“下结论”的吗？

段学校不得拒绝残疾学生入学，但是实际上不是如此。本研究中的 W 在普通学校上学四年后，由于行为方面与别的同学不一样而被校方婉言劝告转学。若是普通小学对自闭症儿童能够真正做到接纳，提供相应的教育资源，或许 W 的求学之路不会如此周折；若是教师、学生对自闭症都有一定的了解，教师能掌握自闭症儿童的专业知识、训练方法等，或许 W 也不需要重新换一个环境，也能一直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

家庭方面：一直以来，社会生活中人们对自闭症儿童身心状况的关注较多，而忽视了家长在精神、物质上的需要，导致了我国自闭症家长所获得的社会支持十分不足，而同时照顾自闭症儿童给家长带来的经济压力、心理压力又使其在生活条件、身心状态以及社会交往等方面面临严重问题。自闭症家长在照顾过程中大多表现出精神压力大、睡眠质量不佳（马欣荣，方建群，2011）、焦虑抑郁水平高（吴雯，2010）等生理、心理消极状态，甚至常常由于孩子的疾病导致婚姻质量下降（秦秀群，彭碧秀，陈华丽，2009），出现夫妻关系不稳定（陈一心，詹明心，濮正璋，2010）。一般情况下，父母会因为孩子的病情产生自责情绪，自我评价较低（高雪，2010），导致其自卑而不愿参与人际交往，难以感受到亲友关怀，缺乏社会整合感或团体归属感（林云强，秦曼，张福娟，2007），他们大多也就不会主动向亲友、更不要说邻里求助，加上普通大众由于不具备自闭症知识对自闭症儿童和家长缺乏理解，一些家长甚至向外人隐瞒孩子病情。因此对大部分家长来说，他们很难从亲友邻里处获得较多的非正式社会支持，唯一较好能为他们提供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就是网络，随着网络的发展、网上专业自闭症论坛的建立，许多患者家长能直接、快捷地从网上了解到自闭症康复训练相关知识、国内外有关自闭症的最新研究成果、交流自己孩子的治疗心得。

因此，政府应该在相关政策的建立、财政经济的投入等方面从总体上引导针对自闭症群体的社会支持。大众媒体可以结合政府政策，加大对自闭症的宣传，公正、客观的向群众普及相关知识，消除他们的误解，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增强大众对自闭症患者的理解，可以使社会对自

闭症患者更加宽容、接纳，同时有效减轻患者家属的心理负担。

［参考文献］

Baumrind, D. (1971). "Current Patterns of Parental Authority."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 4(1,pt.2), pp. 1–102.

程巍，申继亮等（2001）：“中学教师教育方式倾向性的研究”，《教育科学研究》，第 4 期，第 25—29 页。

陈一心、詹明心、濮正璋（2010）：“孤独症儿童父母的心理特征与心理支持”，《中国儿童保健杂志》，第 10 期，第 736—738 页。

高雪（2010）：“育儿过程中自闭症儿童家长需求的个案研究”，《教育理论研究》，第 1 期，第 177—178 页。

Gray,D.E.(2003)."Gender and Coping: The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High Functioning Autism."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 56, No. 3, pp. 631–42.

林云强、秦曼、张福娟（2007）：“重庆市康复机构中自闭症儿童家长需求的研究”，《中国特殊教育》，第 12 期，第 51—57 页。

Malecki, C. K. and M. K. Demary (2002). "Measuring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 and Adolescent Social Support Scales (CASSS)." *Psychology in the Schools*, Vol. 39, No. 1, pp. 1—18.

马忠虎（1999）：《基础教育新概念：家校合作》，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马欣荣、方建群（2011）：“孤独症儿童父母生活质量与睡眠的相关研究”，《四川精神卫生》，第 2 期，第 77—79 页。

Lewin, K., R. Lippitt, and R. K. White (1939). "Patterns of Aggressive Behavior in Experimentally Created 'Social Climate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10, pp. 271—299.

Minuchin, P. P. and E. K. Shapiro (1983). "The school as a context for social development."pp. 197—274 in *Handbook for Child Psychology: Socializ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Vol. IV), edited by P. H. Musse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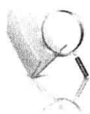
Darling, N. and L. Steinberg (1993). "Parenting Style as Context: An Integrative Model."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13, No. 3, pp. 487—496.

秦秀群、彭碧秀、陈华丽（2009）：“孤独症儿童父母的社会支持调查研究”，《护理研究》，第 7 期，第 25—26 页。

Rodrigue, J. R., S. B. Morgan, and G. Geffken (1990). "Families of Autistic Children: Psychological Functioning of Mothers."*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Vol. 19, No. 4, pp. 371—379.

吴雯（2010）：“孤独症儿童父母社会支持与焦虑的关系研究”，《赣南师范学院学报》，第 2 期，第 100—102 页。

White, K. J. and J. Kistner (1992). "The Influence of Teacher Feedback on Young Children's Peer Preferences and Perception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Vol. 28, No. 5, pp. 933–940.



## 文末"评"

家庭和学校对患有自闭症的儿童所给予的影响和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本研究就这样的话题进行个案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但阅读该研究的文本之后，研究者的整个研究存在如下问题：

（1）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到底是什么？整个论文中研究者没有正式陈述该研究的研究问题。没有具体的研究问题的研究还能称之为研究吗？基于"自闭症儿童的教育"这样一个社会事实，研究者们可以提出很多相关的研究问题，如"父母对待自闭症儿童持有的观念和对待的方式有哪些以及产生了什么影响？学校中不同学生对自闭症儿童的方式有哪些以及产生了什么影响？自闭症儿童与同伴如何交往的？自闭症儿童如何看待他人？"等。

（2）如果撇开"研究问题"这一问题，该研究旨在探究针对自闭症儿童W的"家庭教育方式"与"学校教育方式"之间的关系以及对W"产生的影响"，那么研究者搜集的资料存在严重不足。根据该研究的"目的（只是从论文的字里行间读出来的目的）"，该研究的研究情境是两个，即自闭症儿童W所在的"学校"和"家庭"，涉及的研究对象包括"自闭症儿童W、W的母亲、班主任、老师及陪读老师"，但是针对这些研究对象的资料搜集做得很不充分。研究者也没有到W的家中进行观察、没有进行学校课堂的观察，访谈中的追问不到位，访谈次数不充足。也就是说，研究者没有做到围绕W对相关的研究对象进行360度的资料搜集。实物搜集也不充分。

（3）资料分析层面，研究宣称有"类属分析法"和"情境分析法"，但是研究者在呈现资料技术上给读者一种非常随意的态度。资料整理中没有编号，不太规范。有些观点的呈现不是从资料分析中厘析出来，而是带有从文献中"拿来"，而后用搜集到的资料去验证，这样思维痕迹很明显。实物搜集法中的文件资料也没有得以呈现，课堂观察资料没有充分展示。

（4）资料的解释层面，研究者在资料分析基础上提炼出"要求"这样的一个本土概念，但各个研究对象对W的"要求"之间的差异就是隐喻概念"战争"所涵盖的吗？如果要围绕"要求"来做研究，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要求"？这些不同"要求"对W产生了什么影响？而这些影响又是如何"加固或弱化"那些"要求"的？

（5）在讨论与结论部分，研究者到底要讨论什么？和"谁"讨论？针对"谁"下结论？下了这些结论到底又要和谁"讨论"？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缺乏清晰的认识。

（6）文献综述到底放在哪里呈现，这可以视研究者的思维方式或写作风格而定，但是该论文中研究者对文献的掌握不充分，甚至不了解相关研究的发展，而论文中针对文献的“论（辩论、讨论、争论）”却是一名学者最起码的学术素养和品质。

（7）在论文的话语呈现方式中，研究者需要深入反思其对质性研究方法论的认识，这种方法论与量化研究背后的方法论有什么区别？研究者的理论立场或曰视角或曰“学者之眼”在“资料分析与解释”部分很不清晰，或者说基本没有。那可能有什么呢？会是什么呢？这需要研究者进一步反思其学术训练的历史与过程。

（8）研究者在文字表述、文献引用、文献标注方面不规范！

（9）如果从以上层面来下一个结论，这不是一篇规范的质性研究论文。



## 学生回应

本研究的目的是想通过对教师、家长教育方式/教养方式的探究从而厘清教师、家长为什么在针对自闭症儿童的教育上存在分歧，在研究过程以及文章撰写上还是有很多改进之处。

文中评回应：

针对第2点回应：这一部分是想做研究的缘起介绍，一是因为自闭症儿童的数量逐年增加，给家庭带来很大的影响，二是研究者个人的经历。研究者的个人经历在文中未提及，可加入“在实习时遇到一个特别的学生，这名学生每天都有一名陪读老师全程陪读。起初，对他的好奇只是在于他为什么会有陪读老师而且和陪读老师在一起的时间超越于与父母亲在一起的时间。随后，在班级中经常听到老师们谈论家长教育子女的各种话题，而这名学生经常成为老师们的谈论对象，其中很多讨论都有这名学生的陪读老师的‘爆料’。谈论中也能经常听出老师们对这名母亲的教养方式颇有微词。”

针对第3点回应：家庭教养方式与教师教育方式是本研究中涉及的概念，因此进行介绍。研究的问题即围绕这两者展开。①自闭症学生的家庭教养方式是怎样的？②学校教师对自闭症学生的教育方式是怎样的？③家庭教养方式与学校教育方式是否存在差异？若有差异，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要提出研究问题，应该在研究缘起这部分的末尾将其引出。

针对第 7 点回应：应使用实物资料收集。

针对第 8 点回应：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是描述研究方法，介绍收集资料、分析资料的方法。在叙述时也受了量化研究的影响，认为应该把研究中所用到的提纲等都应该一一介绍，再重新审视这一部分时，可以将文中的小标题等直接略去，将收集资料的方法，如何使用，以及观察、访谈的详细方式介绍清楚即可。

针对第 9 点回应：访谈中使用的是“若学生在课堂中出现类似不跟着老师的指令走，或者老师需要学生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学生不配合时，老师会怎么办？”这样具体的事例，叙述时想简化具体的事例才使用这些词语。

针对第 14 点回应：可加文中注释：J 老师和 L 老师是学生 W 在入校时所在班级的两位老师，当时 J 老师为班主任，L 老师为搭班老师。后来学校进行课程改革，班主任 J 老师调离由 L 老师接手 W 所在班级班主任。陪读老师实际为学生 W 母亲为照顾其在校生活的一位辅助人员，她在学校不直接教导 W，教学还是由学校老师进行。陪读老师在校只是监督 W 的日常行为，比如按时进教室上课，上课期间不乱跑出教室，接送上下学等。

针对第 15 点回应：“战争”这个词语的使用是为了说明家长与教师在对待自闭症儿童的教养方式与教育方式上存在差异，使得教师、家长各有说辞，无形中就存在着战争的影子。

针对第 17 点回应：家庭部分资料的发力点应该是从“家”这个环境中入手去观察母亲在家的教育方式、观察儿童在家的表现情况，以及访谈母亲关于教育儿童的看法等，综合陪读老师在家庭中了解的情况以及学校教师之前与母亲的交往状况，这位母亲对于自己家庭的变化较为敏感，不太愿意让外界知晓家庭的情况，这位母亲出于对自己家庭隐私的保护拒绝了研究者进入家庭，所以也就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收集资料。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陪读老师有几天请假未能陪读是由母亲亲自陪读，趁此机会对母亲的教养方式、以及与教师的互动情况进行了观察。为争取到能与母亲面对面的访谈机会，借着班主任召开一对一家长会的机会对母亲进行了访谈。

针对第 18 点回应：分析母亲的家庭教养方式，除了上述观察母亲在校陪读期间母亲在课堂中陪读时的具体状况、母亲在校如何应对孩子的突发情况以及母亲与教师的互动情况外，就是通过自闭症孩子诊断前到确诊之后（即母亲对发现孩子异常、确诊为自闭症、到孩子接受训练、到孩子在普通小学上学再到现在孩子在培智学校上学）这一过程中母亲从行为到心理的变化过程，这一变化是与母亲的教养方式息息相关的，母亲心理的变化会影响母亲的观念、行为等，所以研究以自闭症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五个阶段为节点分析母亲的家庭教养方式。

针对第 21 点回应：家庭教养方式这部分中的三个小标题可以分别概括为①向普通儿童看齐——家庭教养过程的特点 ②倾向于宠溺的具体教育方式 ③消极被动的家校合作 这样三个部分的主要内容能够从标题中即可看出。

针对第 23 点回应：查阅国内文献关于特殊儿童的家校合作的文献，引用的定义多为马忠虎与岳英所提的家校合作的概念，本文中应可以引用国外家长参与（parent involvement）的概念。

针对第 24 点回应：家校联系本搜集后，对比自闭症学生与班级上其余学生的家校联系本，主要是从家长反馈的次数，内容，篇幅来进行比较。一般来说，每天老师都会将学生当天的表现或者学校的通知等在家校联系本中告知家长，家长会相应的给予反馈。从次数上来说，这位自闭症母亲不是每次都有反馈，有反馈的内容也简短，家校联系本中反馈孩子在家的表现情况的次数也非常少。班级上其余学生的家长会在联系本中分享孩子成长的点滴，比如某一个行为相比之前进步了，某段时间的情绪不好等，但是这位母亲很少与教师分享这些，从这点上说，教师很难从家校联系本上获得学生在家的表现情况。文中应该将家校联系本的分析加入其中。

针对第 26 点回应：教师教育方式这部分中的三个小标题可以分别改成：①朝最好的自己努力——教师教育方式的过程特点；②倾向于民主的具体教育方式；③缺乏积极响应的校家合作。

针对第 30 点回应：此部分想要表达的是由于对自闭症这个事实程度的接受不同，老师、家长对这名学生的定位就不一致，造成了家长、教师在教育方式上的差异。结论一的标题更贴切的表达应该为“战争”源于对自闭症儿童成长的定位不一致。

针对第 35 点回应：补充：本研究中的母亲自己一人带着孩子生活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有不少压力的。母亲在访谈中也提到自己很少单独带孩子出去，一方面是自己一人应对不了在公共场合孩子的行为失控，另一方面也是周围人会以异样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孩子。既需要努力工作保障家庭经济收入又要照顾自闭症儿童，这些使得这位母亲在照顾自闭症孩子时显得有些孤单。

针对第 37 点回应：本研究虽然讨论的是家庭教养方式和学校教育方式，但是自闭症儿童生活的环境不仅仅是学校和家庭，家长所持的教育方式与周围的环境也是相关的。若社区或者学校中能够给特殊儿童的家长提供“喘息”服务；社会大众加强对自闭症的理解，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完全接纳这些特别的孩子；国家能在社会保障方面，能够对自闭症儿童进行终身保障，自闭症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都会有改观。

## 点评专家朱志勇简介

朱志勇，香港大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旨趣为教育社会学、学校教育与社区发展、教育管理、族群教育等。出版英文专著 1 部、译著 3 部、编著 2 部，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 30 多篇。曾在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2003—2004），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2005—2006），美国福布莱特新世纪学者（Fulbright New Century Scholar 2007-2008），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2011—2012）。曾获得中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2009），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8）。

# 后　记

我想先讲两个小故事。

2012 年 11 月，北京已深秋，我的导师郑新蓉教授带我走进贵州大山深处一个又一个小村落。我们的任务是完成一个与教育部、联合国儿基会持续合作了 7 年的项目。贵州威宁，只是这列长途车路过的一站，而在这里，我却行进坎坷。

裸露的土地、了无生机的人畜、随处可见的破败。一路上都在下雨，雨水又轻又细，深黛色的群山被浸湿，山缝里青草簌簌涌动，不知名的野花泛着光彩。我隔窗远望，两种截然不同的镜头迅速切换，很有张力，也足够能说明问题。

在那里，我跟随老师做了无数组访谈，有小组的也有个人，有开放的也有半开放式。每次约几个人坐下来问，起初还能够从容陈述，但不到一半，我表达的很可能就只剩一种情绪，而且常常是热泪盈眶。我几次被老师拉到一边提醒：你是一个研究者。

半个月调研过后，我仍觉得自己表现很好啊，大多我的访谈对象都会被我带动，悲情、苦大仇深统统连根拔起。回京整理访谈资料时，我带着自我感动、自我先行地一遍遍回听录音。然而，我越听越恐惧。终于明白老师当时深刻的提醒：你是一个研究者！

自我感动取之便捷，容易上瘾，尤其当你进入一个陌生的现场，各种景象扑面而来，一个研究者，应该用理性抽丝剥茧，厘清由现象交错编织起来的历史、社会和逻辑的大网，而不是刚走到半山腰就嚎啕恸哭，更不能牵动你的被访对象，无知而强硬地把他们带进你所认为的肤浅的“真相”里。

这若干段访谈录音中几乎全部是我的声音和情绪。毫无疑问，我的第一次“质性研究”尝试以失败告终。

学部今年为 2012 级博士研究生开设了“教育研究方法论”课程，第六讲邀请了陈向明教授。在即将结束时，班上一名女生起身提问：我读了你的书，且按你的方法去做，但为什么得不到和你一样的结果？你能告诉我在访谈中如何才能和被访者建立起信任关系？

陈老师：我认为做研究如同做人……（打断）

女生（上体微微前倾）：如果人家就是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怎么办？

陈老师：第一个“话轮”特别重要，当你刚跟陌生的被访者接触，特别唐突地进入问题，没有人际边界的概念，很可能他不愿意跟你继续下去……（再次打断）

女生（眼神咄咄逼人，一手持笔，边问边周遭指点）：那提问时有哪些技巧？

陈老师：质性研究者本身就是研究工具，因此，做质性研究就是在修炼自我。纯粹的技巧我不愿意讲，书上都有，但当你进入实际操作中就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研究者只有不断修炼自我，在实践中犯错误、反思，才能有所长进。

以上仅是我在学习过程中的两个小案例，却引我不断发问：如何做好质性研究？

陈向明老师给“质的研究”以定义：它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研究现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研究，从原始资料中形成结论和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1]

可见，质性研究首先强调的是自然主义的传统，更加注重研究过程和结果的“真实性”，它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和“视域融合”。那么，当我们作为一个“学着做”的质性研究者，在实践中遭遇到的种种问题都是对“质性研究”的回话与相互映照，对概念的理解并一次次重构问题框架，调适主体的思维，甚至是情感、价值观与信仰。

至今，我仍旧面临很多问题，诸如：如何聚焦“真问题”？如何构建可操作的规范性文本？如何与被访者在情境式对话中了解事实和意义？如何解释资料背后的深意？如何具备高度的敏感性，并不断反思因自我身份和立场给研究带来的影响？……

我们走在质性研究的路上。

在真做研究和做真研究的过程中，激发了我们的灵感，并一次次与固守思维和观念发生“大冲撞”，才得以有今天随课程而出的这本作品。

2012 年年底，我们 5 个选课同学成立了“质性研究学生论文集编委小组”。2013 年寒假结束后，朱老师让我“牵头”，酝酿了一整个假期，编委们在热情洋溢的新年氛围中正式宣布启动工作。

3 月初，我们把 21 篇稿件重新进行了审阅，保留了 18 篇。之后，把这些文章再次分发给作者，进行包括文字、标点、格式、参考文献等方面的二次修正。两周后，文章收回。而在这期间，我们调动所有资源紧锣密鼓地搜寻可为文章做点评的专家。18 篇文章就意味着要有 18 位国内外从事该领域研究的顶尖学者做评析。初出茅庐的博士生，何以得到这些人为一部普通学生自办刊物的无偿支持？我有些为难地向朱老师求救。他把香港大学由学生主编的 *Research Studies in Education* 一书送给我，并鼓励我们可以做到。此后，我草拟的“致专家的一封信”由编委们同时向国内外质性研究领域中最优秀的 18 位学者分发出去。怀着忐忑打开回信，意外地，我们却收到了一个个肯定的回复——

熊秉纯：你们的出版计划很不错，我愿意考虑。

陈向明：好，虽工作忙，但接受。

夏林清：很好，期待！

贺晓星：定会认真完成所交付的光荣任务！

……

[1]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p12

如果说教育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事，它一定永远不会停止。就像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触碰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感谢这些专家学者们！

其次，12级博士班是一个团结的群体，我庆幸自己是其中一员。我们思辨、争论，却包容、欣赏，心怀对学术的神圣信仰和坚定不移的决心。感谢这18位同学，感谢他们周而复始地修改，以及对编撰工作的分担。另外，也要对所有修课的博硕士研究生们表示谢意，虽然在这里我还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但谢谢他们在这个课堂上的努力和贡献。

最重要的是，感谢朱志勇老师。他是个平易近人又不失棱角的学者，尽管他一再强调学生是一个独立的编辑团队，而真正成就这本书的人却是他。他的宽慰、鼓励和不强压、不催促，让我们得以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和体会，并感受到悠然收获的快意。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985世界一流教育学科与中国教育创新"项目的大力支持，才得以使这本学生作品顺利问世。

感谢重庆大学出版社的几位编辑：雷少波、邹荣等老师。他们对书中所有内容进行了审核，对书稿的结构和文字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使这部完全由学生编辑出版的书避免了很多错误。

最后，感谢和我一起为这本书付出了辛勤劳动的4位编委同学，我不能够替代他们想说的话，让他们有机会自己来表达——

李廷洲：我是纯粹的理科背景，本科学习数学，研究生学习教育经济学。曾经认为社会现象可以化约为若干维度和要素，这些维度和要素按照某种客观规律存在、变化和相互作用。研究方法上尊崇量化研究的范式，习惯用数据说明问题，乐于寻找变量间的统计规律。随着质性研究方法的学习和哲学、社会学作品的研读，我逐渐看到了客观社会现象背后丰富的意义世界。质性研究方法不仅让我获得了研究社会现象的另一套方法体系，更赋予我一个全新的认识世界和思考问题的视角。这个视角引导我关注社会行动的背景、情境、历史，关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更加关注行动者的价值取向、情感状态、文化结构、意义获得、认知过程。感谢朱志勇老师为我们讲授精彩的"质性研究方法"课程。他秉承建构主义的知识观，循循善诱，让我们在实际操作中真正领会实证研究的理念和操作系统。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会更深入地对质性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并结合以往量化研究的训练，寻求二者更恰切的结合方式。

程接力：要写后记了，突然觉得编辑过程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也暗合了质性研究的某些特点。譬如，朱老师最初提出编书想法，就好像抛给了我们一个"研究问题"——大家在这门课上的收获如何？大家对质性研究有了怎样的认识？这些对自己、对同行又有什么样的意义？接下来，我们开始设想书的结构体例，就好像一个"资料收集的框架"，依据这个框架，我们开始收集阅读同学们的论文并联系相关专家学者进行点评。而要求专家们按照"文中点"加"文末评"的形式做点评就好像是在对他们做一种半结构化的特殊访谈。同时，同学们对专家点评的回应又使我们看到了"研究对象"

之间的进一步互动，这中间呈现的内容显然更有利于回答我们的“研究问题”。然而遗憾的是，作为编委的我们在“资料分析”和“做结论”方面所做的工作却很少。正如读者所见，我们所做的仅是将这些“研究资料”略加修饰和编排。但是我们希望这些资料自身呈现出来的那些呼之欲出的东西，能引起读者们的思考，更希望读者能和我们一起对这些“研究资料”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解读”，最终得出一些具有深度和宽度的“研究结论”。这样的“研究结论”想必会超越我们最初的“研究问题”，从而产生更大、更深远的意义。新书即将付梓，大家心中自然充满了喜悦和期待，因为这不仅仅是一本质性研究论文集，更寓意着我们这些晚生后辈们的学术成长将从此开始质的变化，寓意着我们充满奋斗张力的学术梦想从此将开始翱翔于更广阔的海天之间。

涂玥：这些日子以来，最让我期待的一件事便是这本书的出版问世。对于论文被收录进该书的同学来说，能够与质性研究的大师们共同交流，并看见自己的作品展示在众人面前无疑是人生的一大乐事。回首这段时间的工作，只有一个词能表达我的感受，那就是“感动”。最初，我们最担心的是有多少专家会接受邀请，邀请函发出之后，却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惊喜，那段时间最开心的事便是看见讨论群里闪烁着“某某教授接受了我们的邀请！”然后我们五个人一起对着显示屏乐呵……每一位写作的同学也让我感动，主动修改核对稿子，为校对和排版节约了不少时间。编委团队晓伟、廷洲、接力、琳燕，他们的认真、坚持和鼓励也让我感动。我相信若干年后当我看到这本书，我会想念你们，这是属于我们五个人共享的一种经历。就让我们举起这本书，向我们的青春致敬！

阮琳燕：我是五位编委中唯一一个硕士，我以局外人的身份做着局内人的事，从一个硕士研究生的视角感受博士研究生的学术历练和学习氛围，是否做到了视域融合呢？我想，多少有一些吧。这是一本普通的书，作为众多质性研究书籍中的一部，它只是冰山一角。但这又不是一本普通的质性研究书籍，它记录了北师大教育学部 12 级博士研究生“质性研究课程”五个月的学习和收获。也许稍显青涩，也有许多不足，但却不乏热忱。专家们的文中细评，让我们对自己忽略的细节恍然大悟；文末深评，更让我们对质性研究的方法和理论有茅塞顿开之感。这些感悟，都与课程的学习、研究的展开和后期的不断磨合息息相关，这正体现了质性研究接地气的特点和魅力。

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它包括文字本身，唯一不朽的是文字所传递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与思考。我们希望这只是一个起点！在课程基础上创立的集研究方法、理论视角、问题意识于一体的学术刊物《质性研究：实践与评论（第一卷）》，能够伴随课程得以延续，走得更好！

武晓伟<br>2013 年 6 月于北师大